

儒法斗争史稿

国营第三五六厂、云南大学历史系理论组编写

一九七五年三月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说明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孔孟之道是中外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头子惯用的思想武器。在我国历史上，法家和儒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儒法两家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因此，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这对于深入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1974 年下学期云大历史系 1972 级工农兵学员和部分教师在学习和宣讲儒法斗争史时，与国营 356 厂的工人同志一道编写儒法斗争史，作为培养理论队伍的一项措施，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写出了现在这部很不成熟的稿子，作为内部参考和征求意见之用。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根据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阐明不同历史阶段儒法斗争的演变情况和特点。本书内容以思想政治斗争为主，着重从儒法两家的活动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生产力的发展等方面，揭示儒法斗争的实质，揭露和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罪行，进一步认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

在编写中，我们遇到了某些有争论的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但我们还是提出了自己的不成熟意见。

有的同志认为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某些朝代不存在儒法斗争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儒法斗争并未断线，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某些朝代也不例外。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儒法斗争，是表现为地主阶级内部坚持复旧倒退的特权阶层与主张前进革新的较低阶层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在代表保守势力的儒家越来越占优势，法家受到压制打击的情况下，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往往披着儒家外衣，与正统的儒家进行斗争。由于儒法两家的阵线不象过去那样分明，故有的同志认为某些朝代不存在儒法斗争问题。其实儒法斗争并未中断，只是斗争形式比较隐蔽、曲折而已。在孔孟之道已成为强大传统势力的形势下，一般说来，法家代表人物总是借助于农民起义的成果，顺应历史潮流，推行以法治和耕战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这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同时，一些进步的

思想家也往往是在农民起义大破孔孟之道的的基础上，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孔孟的传统观念，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社会改革制造舆论；这种批判同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基本一致，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因此，我们把这部分思想家也归入法家阵营。这样，就有利于弄清儒法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进而把被中外反动派歪曲、篡改、颠倒了了的儒法斗争历史颠倒过来，更好地开展评法批儒，批判地吸取法家思想中的民主性精华，求得借鉴，把批林批孔运动普遍、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民族融合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这是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此，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时，我们是把各族统治者建立过的全国政权和局部性政权，当作国内问题加以论述。至于民族间的矛盾和战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挑动民族矛盾、战争的是各族的反动统治者，各族劳动人民则是渴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的。因此，我们在论述儒法两家对待民族战争的态度时，主要是看他们怎样对待进步战争和反动战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这样处理，是否妥当，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针对云南是多民族地区的特点，我们着重论述了儒法两家在开发西南边疆和建立集中统一多民族国家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路线斗争；以较大篇幅肯定了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汉武帝、诸葛亮等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功绩；批判了孔孟信徒王莽之流的反动民族政策，以及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对民族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同时，狠狠揭露了苏修叛徒集团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无耻地捏造历史，挑拨民族关系，妄图分裂和颠覆我国的罪恶阴谋。

总之，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想在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实践中，培养提高理论队伍。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了贯彻争鸣的方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了讨论；对某些新提出来的理论问题，我们还缺乏研究，故阐述不清；对某些问题虽也提出了我们的看法，但由于水平有限，必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诚恳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目录

| | |
|-----------------------------------|-----|
| 毛主席语录 | ii |
| 说明 | iii |
| 目录 | v |
| 第一部分 | 1 |
| 第一章 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产生及初期的斗争 | 1 |
| 第一节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1 |
| 一、在阶级斗争的冲击下奴隶制的锁链出现了缺口 | 1 |
| 二、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产生揭开了儒法斗争的序幕 | 5 |
| 第二节 法家先驱与反动儒家的初次交锋 | 7 |
| 第三节 卓越的反孔英雄——柳下跖 | 9 |
| 第二章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及其在与儒家斗争中的发展 | 12 |
| 第一节 前期法家朝气蓬勃地登上了政治舞台 | 12 |
| 一、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斗争 | 13 |
| 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斗争 | 14 |
| 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斗争 | 14 |
| 第二节 讨伐天命观天才论的战斗檄文 | 19 |
| 一、荀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批判了孔孟的天命观 | 20 |
| 二、荀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孔孟的天才论 | 22 |
| 第三节 法家思想发展的高峰 | 24 |
| 一、韩非法后王的社会历史观批判了孔孟法先王的历史倒退论 | 24 |
| 二、韩非的统一集权思想批判了儒家的分封割据谬论 | 26 |
| 第三章 秦王朝在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儒法斗争 | 28 |
| ——兼论中华民族的形成 | 28 |
| 第一节 秦始皇时代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 | 28 |
| 第二节 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及其历史影响 | 32 |
| 第三节 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儒法斗争 | 36 |
| 第四节 赵高的复辟政权和秦末农民大起义 | 40 |
| 第四章 汉承秦制，在集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儒法斗争 .. | 44 |

| | |
|--|-----|
| 第一节 人民群众的浴血奋战，荡涤了中央和地方的复辟势力，打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天下..... | 44 |
| 第二节 地主阶级局限性，在统一局面中又留下了分裂割据的缺口..... | 48 |
| 第三节 汉武帝坚决实行法家路线的历史功绩..... | 51 |
| 一、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促使长期分裂的中国逐步形成一个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体..... | 52 |
| 二、改革财政经济制度，奠定集中统一和抗击匈奴的物质基础..... | 53 |
| 三、坚决反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武装侵扰..... | 54 |
| 四、执行法家的统一路线，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郡县..... | 55 |
| 第四节 汉武帝在执行法家路线过程中尖锐激烈的儒法斗争..... | 56 |
| 一、在国家政权上，统一和分裂的斗争..... | 57 |
| 二、在经济命脉上，官营和私营的斗争..... | 58 |
| 三、在匈奴侵扰问题上，反击和妥协的斗争..... | 59 |
| 四、在边疆民族问题上，“化内”和“化外”的斗争..... | 60 |
| 第五节 盐铁会上大刮翻案妖风..... | 63 |
| 第六节 反革命复辟派痛痒相关和汉武帝反复辟的全局战略..... | 67 |
| 第二部分..... | 69 |
| 第五章 西汉末至东汉，儒家思想逐步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 69 |
| 第一节 复辟逆流的回光返照..... | 70 |
| 第二节 改造过的儒家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 74 |
| 第三节 反对神学唯心主义和讨孔伐孟的斗争..... | 81 |
| 第六章 三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 89 |
| 第一节 曹操的法治思想和实践..... | 89 |
| 第二节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和实践..... | 95 |
| 第七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儒法斗争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 104 |
|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政治思想斗争概况..... | 104 |
| 第二节 西晋的尊儒反法和礼治路线..... | 106 |
| 第三节 魏晋玄学是汉代儒学的演变和改装..... | 109 |
| 一、王弼的“贵无”思想..... | 110 |
| 二、郭象的“崇有”思想..... | 111 |

| | |
|-------------------------------|-----|
| 第四节 魏晋唯物论者反对玄学唯心主义的斗争 | 113 |
| 一、杨泉、裴颜对“贵无”思想的批判 | 114 |
| 二、反映农民要求的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 | 114 |
| 第五节 东晋南朝佛教和儒学结合的政治意义 | 116 |
| 第六节 唯物论者范缜反对“神不灭论”的斗争 | 117 |
| 一、范缜前无神论者反对“因果报应”的斗争 | 117 |
| 二、范缜反对“神不灭论”的斗争 | 118 |
| 三、神灭论的政治意义和局限性 | 120 |
| 第七节 前秦丞相王猛的法治与北中国的统一 | 121 |
| 第八节 北魏末年贾思勰的尊法反儒思想 | 124 |
| 第八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儒法斗争 | 127 |
| 第一节 隋文帝杨坚重法轻儒 | 127 |
| 第二节 法家占主要地位的唐代前期 | 130 |
| 一、李世民的法治思想 | 130 |
| 二、女政治家武则天的法治路线 | 132 |
| 第三节 法家代表人物柳宗元的反儒斗争 | 135 |
| 第四节 五代时柴荣的“法治”措施 | 139 |
| 第三部分 | 143 |
| 第九章 宋元时期的儒法斗争 | 143 |
| 第一节 革新与守旧的斗争 | 143 |
| 一、北宋经济政治的特点 | 143 |
| 二、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 | 144 |
| 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 148 |
| 四、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 149 |
| 第二节 理学和理学的反对派 | 150 |
| 一、阶级矛盾激化和人民的反孔斗争 | 150 |
| 二、程、朱理学的反动性 | 151 |
| 三、陈亮、叶适的反理学斗争 | 153 |
| 第三节 元代统一，结束了中国的分裂局面 | 155 |
| 第十章 明清时期的儒法斗争 | 162 |
| 第一节 明中后期的阶级矛盾及社会变化 | 162 |
| 第二节 明中叶沿着法家路线前进的戚继光和张居正 | 164 |
| 一、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抗倭斗争 | 164 |

| | |
|--|-----|
| 二、张居正的变法革新 | 165 |
| 三、张居正的法家路线为明中后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166 |
| 第三节 李贽的反传统思想 | 168 |
| 一、批判反动的儒家思想 | 168 |
| 二、赞扬法家 | 171 |
| 第四节 唯物主义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批判君主专制制度 | 173 |
| 一、明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及维护这个制度的孔孟之道。 | 173 |
| 二、王夫之对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 | 175 |
| 三、黄宗羲的民主思想 | 179 |
| 第五节 清代初期的儒法斗争 | 182 |
| 一、清初统治的加强及康熙的法治措施 | 182 |
| 二、人民的反孔斗争和清王朝统治下儒法斗争的特殊形式 | 185 |
| 第四部分 | 191 |
| 第十一章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 192 |
| 第一节 横扫孔孟之道势如疾风骤雨 | 193 |
| 第二节 向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宗法思想挑战 | 196 |
| 第三节 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发扬 | 198 |
| 第十二章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 | 203 |
| 第一节 改良主义思潮的产生和改良主义运动的兴起 | 203 |
| 第二节 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斗争 | 207 |
| 第三节 变法维新运动的迅速失败 | 210 |
| 第十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斗争 | 212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兴起 | 212 |
| 第二节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 | 216 |
| 第三节 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胜利 | 221 |
| 第十四章 辛亥革命后反尊孔反复辟反卖国的斗争 | 224 |
| 第一节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派尊孔复辟媚洋卖国 | 224 |
| 第二节 全国规模的反尊孔反复辟反卖国的斗争 | 228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对孔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 | 230 |

| | |
|---------------------------|-----|
| 第四节 近代尊孔与反尊孔斗争的历史经验 | 232 |
|---------------------------|-----|

第一部分

春秋至西汉时期的儒法斗争

(公元前 770—前 49 年)

第一章 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产生及初期的斗争

第一节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前 476 年),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兴起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革命与反革命、新与旧、前进与倒退的斗争,表现得十分激烈。

一、在阶级斗争的冲击下奴隶制的锁链出现了缺口

列宁指出:“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在我国的奴隶社会里,奴隶被奴隶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大量被安置在奴隶制的“井田”(也叫公田)上及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食于官的工商行业里,成年累月地担负着整个社会的生产任务,在奴隶主的皮鞭下从事繁重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创造着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在奴隶主的交易所里,五名奴隶的价格,仅仅等于一束丝和一匹马,残酷的奴隶主随便惨杀大批奴隶当祭祀的牺牲或殉葬。殷墟墓地就有大批奴隶殉葬。仅武官村一座大墓的殉葬者就多至四百人左右。总计殷墟发现的殉葬者在两千人以上。用人作牺牲的人祭,从甲骨文上见到的有百多次,每次数十人以至数百人,最惊人的一次人祭“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这是奴隶主贵族残酷杀害奴隶的血腥罪行,这是酷烈的阶级斗争的见证,也是控诉奴隶制度的罪证。

奴隶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生活更是牛马不如。在出土的商代墓葬中,有的奴隶因长期吃带壳的坚硬食物,牙齿全磨平了;还有两个奴隶蜷曲在长 1.6 米,宽 1.1 米的深坑中,共用一个残鬲。生活的悲惨,可以想见。

奴隶们不堪忍受这极为残酷的剥削压榨，不断起来对奴隶主进行斗争。奴隶主除了用暴力镇压奴隶的反抗斗争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还用了分封、等级、世袭制来保持他们的特权。所谓分封，就是奴隶主总头目“天子”把土地和奴隶分封给诸侯，诸侯又分封给大夫，大夫再分封给士，层层授予统治和剥削的特权。这种层层固定的等级名分，也就是等级制。同时，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又按血缘关系的亲疏组成宗法制。又由宗法制规定了大宗小宗的世袭特权，这种“父死子继”的世袭制，也就是所谓“世卿世禄”制。另外，奴隶主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又把被统治阶级分为庶人、百工(生产奴隶)，仆奴(家内奴隶)等不同等级，严格加以控制，由此形成一个宝塔形的剥削制度。最大的奴隶主头子——天子，就通过分封、世袭、等级这三种办法用血缘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织成天罗地网，保持奴隶主的种种特权。为了维护这套统治制度，他们又规定了很多规章、制度、礼节、仪式和镇压奴隶的刑法。这一套东西，在西周时，经过奴隶主头子周公修订，补充而更加完善起来，就叫“周礼”。这种奴隶主贵族的专政就叫“礼治”。

周公制礼作乐虽然费尽了心机，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奴隶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奴隶们在长期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发展、创造，生产力不断提高。在农业方面，青铜农具的使用，比石器、骨器更锐利，更有利于开辟荒地，不断扩大耕地。这些新开辟的土地，没有贡赋义务，纯属奴隶主贵族所有，称为私田，可以任意交换抵押，打破了井田制“田里不粥”即不能买卖土地房屋的限制。这类“私田”，在西周中期的金文就有了记载。

春秋初，齐桓公时，管仲(约公元前 730 年到前 645 年)就曾建议用“美金”(即青铜)铸剑戟，用“恶金”(即铁)铸成开荒平地除草的锄头及砍伐林木的铁斧等农具。在手工业方面，则有铁制的针、锥、凿等工具。说明这时铁器已经开始代替石器、青铜器了。铁制的农具，更有利于开辟山林荒地，发展私田。私田面积因而急剧增加，一些下层奴隶主贵族就日益豪富。有的奴隶主更将其私田分给奴隶耕种，采用封建地租的剥削办法，于是奴隶主向新兴地主转化，所属奴隶上升为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得到飞速发展。相比之下，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奴隶主贵族为了满足其荒淫腐朽的生活，一方面压榨奴隶的剩余劳动开私田，增财富，另一方面利用职权强取豪夺，阶级矛盾日愈尖锐。《诗·魏风·伐檀》揭露了奴隶主贵族不劳而获的剥削罪行。《魏风·硕鼠》把奴隶主贵族比喻为专门偷吃粮食的大老鼠，表现了奴隶们无比的愤恨和对奴隶主的

鄙视。同时，奴隶们还“适彼乐土”(迁徙到可安居的地方)，进行逃亡斗争。齐国就因为奴隶们大量逃亡而“无田甫田(大田)，惟莠骄骄(草盛而高)”。“无田甫田(大田)，惟莠桀桀(草茂盛)”。奴隶主的大田上都长满了杂草，造成邦国土地的荒芜。在阶级斗争的冲击下，统治阶级的先进分子，不得不承认新兴地主的私田所有制，承认私田上佃耕农的劳动为合法劳动。管仲在一些地区废除井田，“相地而衰征”即按土地的肥瘦、定赋税的轻重。就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改革，这就在禁锢奴隶的锁链井田制上突破了一环，打开了一个缺口。

到春秋后期，铁制农具的使用更为广泛，楚国在奴隶主的压榨下，阶级矛盾日愈尖锐：“道殣相望，盗贼司目”即道路上随时可以看到饿死的人，起义斗争的人很多。新兴地主则“量入修赋”即按土地的好坏，产量的高低确定赋税的多少，以缓和这一矛盾，这也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而改变的。郑国也在奴隶“多逃”的形势下，实行了子产(约公元前574年至前522年)的“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政策，就是承认土地的私有，划定田界，每亩征税，并把农民按什伍编制起来。这些改革措施，都承认土地私有权，这对奴隶制经济的基础——“井田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就使那些拥有大量私田的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他们的身份也开始转变为地主。

这种情况，在鲁国表现得比较突出。

鲁国的私田面积逐渐超过公田，大夫的私财富也逐渐超过公室。而鲁国的大奴隶主鲁君越来越荒淫，奴隶们不断进行逃亡斗争，造成“公田不治”。例如鲁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民困于下，怠于公事”公田荒芜日甚，鲁君收入日少，眼见大量的私田又不上税，“是以有履亩之税”。于是在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并一律取税。由于私田每亩征税，拥有大量私田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越来越不满意，到公元前562年，他们就联合起来，把有名无实的鲁君的土地和奴隶瓜分了(“三分公室”)。季孙氏采取了征税的办法，即封建剥削的方法；叔孙氏仍用奴隶制的旧办法；孟孙氏则采用新旧各半的方法经营所分得的土地财产。由于季孙氏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采取了较为彻底的改革措施，变奴隶剥削为封建剥削，从而解放了一些生产力，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新景象，季氏的实力大大超过了其它两家。这种转化，正如斯大林指出的，是让农民具有“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须的某种劳动

兴趣”，过了二十五年，他们又对公室重新瓜分“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大势所趋，三家全采用了新的封建剥削办法。充分说明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有害无益了，旧的剥削方式已经行不通了。这些过去的大夫等奴隶主贵族的身份也就向封建地主转化，变成了新兴地主。这种情况，在春秋末期越来越多，新兴地主也越来越多，一个新的阶级——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产生了。

在新兴地主阶级形成的时候，广大奴隶的身份也起了很大变化，奴隶们从公田上逃亡以后，有的逃进山林、川泽，有的投入另外一些贵族门下，成为他们的“隐民”。这些贵族，也象季氏一样，为了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开辟了大量的私田，需要招来逃亡的奴隶，役使他们为自己耕种。为了防止他们再度逃跑，他们采用封建的生产关系，分给他们小块土地，使他们有了自己的个体经济，这样就较奴隶的地位有所改善，提高了劳动兴趣。这些奴隶也就慢慢变成了农民。还有一些奴隶，利用当时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获取自由。例如晋国的贵族范氏和栾氏斗争，范氏很惧怕栾氏手下的一名大力士，范氏的奴隶裴豹就提出，只要范氏把他的奴隶册即“丹书”烧掉，他就可以去杀掉这个大力士。范氏因而焚了丹书，裴豹也就获得了人身自由。

奴隶身份的变化，标志着另一个新的阶级——农民阶级也在逐渐形成。

这时期，手工业、商业中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专门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工商食官”的牢笼打破了。私营手工业，个体手工业出现了。商业交换也活跃起来，手工业同个体农业经济结合，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

总之，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新的生产关系——封建的生产关系产生了。一些大贵族逐渐没落，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新兴地主阶级，有的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来，有的从平民，工商业者、诸侯的家臣中上升起来；一部分庶人、工、商，由奴隶变成了农民和独立的手工业者；特别是在战争中，更造成了这些变化的有利条件。“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就是这些变化的证明。奴隶制的土崩瓦解，已近在眼前。

二、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产生揭开了儒法斗争的序幕

“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

广大奴隶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创造着我国的文明史，推动着历史前进，也奠定了政治变革的基础。

在奴隶制行将土崩瓦解的大变革时代，是站在时代前列积极投入政治变革呢？还是在站在反动立场上，阻止历史车轮前进，这是革新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焦点。出身破落奴隶主贵族家庭的孔丘，顽固地逆历史潮流而动，梦想把历史拉回到西周的奴隶制“盛世”，为了搞反革命复辟，他创立了儒家学派。所谓“儒”，是在奴隶社会替奴隶主贵族“相礼”，遇有婚丧，替奴隶主贵族吹吹打打的一种职业。孔丘出身贵族，三岁死了父亲，自幼学习文化，懂得“周礼”，因家道衰落，就充当儒生来维持生活。后来，孔丘得到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支持、吹捧，名声越来越大。他招收门徒聚众讲学，鼓吹反革命复辟谬论，逐渐形成一个势力很大的学派，儒家就成了这一学派的专称。以孔丘为首的儒家，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是历代一切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

孔丘毕生致力于搞反革命复辟活动，鼓吹文武周公时代的所谓“盛世”，希望在东方复辟行将崩溃的奴隶制。他的反动政治纲领是“克己复礼”，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他妄图用虚伪的“仁爱”来掩盖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还炮制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论思想，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论”以及“亲亲、尊尊”的反动教条来维护奴隶制度的等级，分封，世袭制。他鼓吹什么“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人们一举一动都不能违背“周礼”的规定。而“仁”的根本是“孝悌”，就是要采用“亲亲”来维护父子相传的世袭制；用“尊尊”来保持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对于新的变革，无不竭力反对，那怕是一个酒杯形象的微小改变，他也很哀叹地说：“酒杯不象个酒杯，酒杯啊！酒杯啊！”大的革新就更凄厉、抽泣了。林彪污蔑“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其仇恨新生事物的心情，与孔丘多么相象。总之，以孔丘为代表的反动儒家，坚持“礼治”路线，妄图用这一套来加强奴隶主内部的团结，维护日愈崩溃的奴隶制度，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退。

“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新兴地主阶级从奴隶社会中产生出来以后，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因此，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产生自己的革命思想，为推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的专政而斗争，这就产生了“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法治思想。春秋末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壮大，法家的先驱者就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儒家的礼治思想，开始了儒法两家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斗争。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对奴隶实行残酷的刑法，镇压奴隶的反抗。这些刑法，只用于奴隶阶级，而不施加于奴隶主贵族，（“刑不上大夫”）这时，新兴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限制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就规定一些新的刑法条例，公诸于世，共同遵守。公元前 513 年，晋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赵简子，把新的刑法条例，铸在鼎顶上，公布出来。郑国的子产铸了“刑书”，邓析作了“竹刑”。这就是“法治”。

“铸刑鼎”、“铸刑书”以及“竹刑”，标志着奴隶的解放，具有初步的人权；标志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法治思想的最初体现，它预示着“法治”与“礼治”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因此，当这个新生事物出现时，以孔丘、叔向等为代表的顽固复辟派，就跳出来竭力攻击、反对。孔丘大骂晋国铸刑鼎说：“晋国要亡了！人民从鼎上知道了法律和犯罪的轻重，哪里还会尊崇贵族呢？这样，贵贱就没有秩序了，那还成什么国家？”叔向在子产铸了刑书后，也写信给子产说：“法律一经宣布，人们就知道如何避免刑罚，那就不怕贵族了。如果是非都用刑书来作标准，贵族怎么办呢？”子产回答说：“我为的是救世啊！”不管孔丘之流如何歇斯底里地谩骂、攻击，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新生事物总是要发展、壮大，战胜腐朽事物的。“法治”思想在与儒家斗争中不断发展，它是不可战胜的。

总之，春秋时期，我国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转化。完成这个转化的决定性的力量是人民，是奴隶革命的暴风骤雨。同时，在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激烈斗争中，新兴地主阶级借用奴隶斗争的大好形势，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展开了对维护奴隶制的儒家思想的斗争，揭开了儒法斗争的序幕。

马克思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春秋时期这样一个大革命的时代里，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是奴隶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同时，新兴地

主阶级的主要矛头也指向奴隶主，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属于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第二节 法家先驱与反动儒家的初次交锋

反动儒家的祖师爷——孔丘，面对春秋末期奴隶制的崩溃，封建制兴起的一派大好形势，气急败坏，捶胸顿足地反对任何变革，他痛恨一切新生事物，迫不及待地抛出那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妄图把已经被推翻和正在被推翻的各国奴隶主贵族扶植起来。他把新兴地主阶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竭力反对，残酷镇压。

当时，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法家先驱少正卯(?——前 498 年)在鲁国招收门徒，宣传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思想，揭露奴隶制的腐朽反动。由于他的宣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生动有力，吸引了很多人去听讲，甚至孔丘的学生，也因为听厌了孔丘那套喋喋不休的“克己复礼”的说教，纷纷跑到少正卯那里接受革新思想，使得孔丘的学生“三盈三虚”，几乎跑光。仅仅剩下一个顽固不化的颜回在那里陪着孔丘念“复礼”经。

孔丘对少正卯恨之入骨。公元前 498 年，一心想做官的野心家孔丘用阴谋手段爬上了鲁国司寇的职位。(司寇相当于警察总长)上台不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就露出了大恶霸的狰狞面目，血腥镇压少正卯，并且陈尸三天，向新兴地主阶级示威。孔丘给少正卯安了五条“罪状”，根据赵纪彬同志的考释，从这五条“罪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法家先驱的一些政治主张。

第一条，所谓“心达而险”。心，指政治思想，达，就是要求掌握政权，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险，是变革维新的路线。由此可见，“心达而险”实际就是少正卯要求破坏奴隶制的“礼”，把奴隶主贵族的是非标准颠倒过来，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标准去代替，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

第二是“行辟而坚”。行，指的是政治措施，具体的行动；辟，就是法，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刑法；坚，是坚定不移。这就是说，少正卯坚持的是一条“法治”的路线，他的政治实践，措施，就是要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反对“礼治”。他的行动是果断的、立场是坚定的。

第三条，所谓“言伪而辩”。言即言论，“言伪”，指的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要求。辩，即批判的方法。少正卯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推翻奴

隶制的统治，这种要求，在当时也反映了一些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因此，少正卯用批判旧制度的方法宣传新思想，得到人民的拥护。

第四条是所谓“记丑而博”。记，指的是少正卯讲学的“讲义”或他的学生的笔记。丑，指的是对立统一。博，是广博的意思。这实际反映了少正卯利用大量感性材料，论证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说明了一些矛盾、变化的现象，用哲学的思想为变革、前进的政治路线服务。

最后是“顺非而泽”。顺即顺从；非指是非曲直；泽，是加工，提高。这一条，反映了少正卯不仅顺从、支持了人民群众反对奴隶制的要求、言论，而且还对这些言行给予加工提高，使其有更大的威力。

孔丘宣称，在这五条中，只要犯了其中一条“罪状”，就应该处死。少正卯五条都犯了，所以非处死不可。

少正卯倡导革新，宣传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奴隶们起来造反，反对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坚持“刑辟”即“法治”的观点，孔丘就杀害了他。这说明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总是要负隅顽抗的。儒法斗争，从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

杀了少正卯后，围绕着政治上是实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还是恢复奴隶制的“礼治”，孔丘站在反动立场上，继续顽固地反对法家先驱人物革新政治的主张。齐国的大夫田成子，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办法，争取群众，实行封建剥削。大批的奴隶，“归之如流水”，田成子的经济、政治力量越来越大。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了齐国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实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七十一岁的孔老二听说了这件事，赶快洗了澡，早早地跑去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田成子。但此时的鲁哀公自己也没有什么实权了，他只好叫孔丘去报告给季孙、孟孙等三个大夫。孔丘又慌慌张张地去请这三位大夫出兵。但是，这三个大夫都是支持革新的，谁也不理睬孔丘，孔丘碰了一鼻子灰，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可见，孔丘对一切新事物，对实行“法治”的人和事，都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儒法两家在“礼治”与“法治”这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是多么旗帜鲜明，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一时期，儒法斗争在思想路线方面，主要表现在尊“天命”和反“天命”上。奴隶主贵族为维护其统治，就借助于鬼神、天命来压迫、奴役奴隶。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天命鬼神思想也动摇了。一些具有法治思想的人提出了对天命鬼神的怀疑。晋国的史墨，根据“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自然变化

现象，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历史进化观点。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大造舆论。郑国邓析不仅作了“竹刑”来反对奴隶主贵族，支持政治上没有地位的新兴地主跟奴隶主斗争，他还宣传“山与渊平”的思想，认为高山可以变得与深渊一样，批判了奴隶主贵族“天尊地卑”的思想。孔丘为了维护反动的奴隶制，必然要竭力维护奴隶制的统治思想——天命观。他大肆鼓吹“天生德于予”，“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还说要“畏天命”。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也极力编造一些谎言，把孔丘打扮成“天生”的“圣人”。他们说什么在孔丘出生前，就有麒麟在他家门口，吐出一本“玉书”，上面写着：“天上的星宿要下凡了，将来要振兴周朝”等等。一切反动派，总是把天命鬼神思想作为救命稻草，为其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孔丘的一生，就是“克己复礼”的一生，他打着“克己复礼”的破旗，为挽救没落奴隶制奔走呼号。他执行的是一条复辟倒退的反动路线。大叛徒、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继承了孔丘的反动衣钵，狂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他要复的“礼”，就是资本主义，就是要把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充当苏修“核保护伞”下的儿皇帝。让全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和孔丘一脉相承，都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但是，两千多年前的孔丘，一心想复辟奴隶制，时时“梦见周公”，结果是四处碰壁，惶惶而死；两千多年后的林彪，抱着孔丘的僵尸，扛着“克己复礼”的黑旗，最后的下场，同样是折戟沉沙，葬身沙丘去“复礼”。

第三节 卓越的反孔英雄——柳下跖

在摧毁奴隶制的战斗中立下了不朽功勋的英雄柳下跖，统领着“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转战在黄河流域。他旗帜鲜明，“侵暴诸侯”，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奴隶主贵族。在起义的过程中，穷人没有地方住，柳下跖就住在他自己的“跑马道”两边。他“保民不保国”，对当时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国家，哪国都不服，哪国都不保，而是带领奴隶们自立为王。有一次，他听说卫国征收了很多粮食要运往国都，就带领起义奴隶截回来，分给穷人。柳下跖率领着充满对奴隶制仇恨的起义队伍，在黄河上下，关中平原，浩浩荡荡，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击着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大大小小的奴隶主闻风丧胆（“大国守城，小国入保”），惶惶不可终日。

柳下跖的英雄事迹，一直流传到今天。在柳下跖的家乡，春秋时期鲁国西北部的柳下(今河南省淮阳县一带)，还留着柳下跖跑马、射箭、练兵的“跑马道”。在“跑马道”的两旁，相传当年是他的“仓库”、“马场”。在一个叫柳下屯的东寨墙上，原来还有一棵大柏树，两三丈高，几搂粗，已经干枯，群众叫它“拴马桩”，据说柳下跖曾在树上拴过马。在山西省，也有“柳子沟”等地名，群众传说是因为柳下跖曾在那里驻扎过，附近还有“蹈马坪”和“插旗石”等柳下跖插旗、蹈马的地方。

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柳下跖不愧是一个杰出的战斗英雄，在与奴隶制的卫道士孔丘面对面的舌战中，柳下跖同样是个气吞山河的好汉。他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进行了不懈的反孔斗争；在砸烂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粉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他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谬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揭露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阐述了劳动人民的阶级观点，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卓越的反孔英雄。

孔丘为了配合奴隶主对奴隶进行镇压，曾亲自出马，去见柳下跖，企图用儒家的反动说教劝诱柳下跖“罢兵休卒”。假惺惺地奉承柳下跖兼有“三德”，用“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尊将军为诸侯”作诱饵，阴谋把柳下跖拉进奴隶主的圈套。但孔丘的这套阴谋诡计立即被柳下跖揭穿，他手按宝剑，声若猛虎，义正辞严，痛斥孔丘是“作言造语，妄称文武”，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是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污蔑攻击的“巧伪人”；揭穿他鼓吹的“孝悌”，“仁义礼智信”等等都是个骗局。最后，柳下跖宣布：孔丘“罪大极重”；是个应该杀头的“盗丘”。命令他立即滚开。吓得怕死鬼孔丘面如死灰，赶快逃走，趴在车上，大气都不敢出。柳下跖的家乡柳下屯的群众，至今还流传着柳下跖派人捉拿孔丘的故事。孔丘被起义的群众团团围住，只好化装逃跑了。后来，他叫子路带了兵来报复，镇压起义，结果被柳下跖打得大败而逃，鞋都跑掉了。他们师徒打败仗的那个地方，后来时“落阵屯”。

柳下跖对孔丘的痛斥，代表了当时劳动人民对奴隶主阶级反动言行的批判和揭露。代表了奴隶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孔丘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在他几十年“复礼”的生涯中，象无头的苍蝇到处碰壁。正如鲁迅先生讲的：“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

孔丘到宋国去，带着他的学生，在一棵大树下演习“周礼”，他这种倒行逆施，遭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对，宋国司马桓魋，叫人把这棵树砍了，并要抓住孔丘杀掉他，孔丘吓得魂不附体，赶快逃跑了。

后来，孔丘到了陈国，谁也不理他，连饭都不给他和他的学生吃。使他们“七日不火食”，“弟子皆有饥色”，一个个饿扁了肚子。广大劳动人民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不过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本领。桀溺还形象地把春秋时期社会的变革比喻为滔滔的洪水，而孔丘就是一个妄想改变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跳梁小丑；有个守门的人也说孔丘是一个明明知道他那套“复礼”的反动纲领行不通，还要硬着头皮去做的家伙。这样，孔丘在当时就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反面脚色，他那套反动说教，到哪里都兜售不了，都受到人民群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抵制。因此，他虽然周游列国，到处摇唇鼓舌，费尽心机，结果仍然被滚滚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滚滚洪流，把孔丘之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奴隶制在奴隶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新兴地主阶级在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中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产生了它的政治思想——法治思想及其早期代表人物，展开了向反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夺权斗争，提出并执行了一条革新、前进的政治路线。而以孔丘为代表的反动儒家，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地推行一条维护奴隶制“礼治”的路线，这样，就揭开了我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序幕。同时，奴隶们对儒家的鼻祖孔丘，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批判，从一开始，就以鲜明的旗帜，尖锐的语言，坚定的立场，展开对儒家的斗争。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反孔、批儒，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主力军作用。

第二章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及其在与儒家斗争中的发展

第一节 前期法家朝气蓬勃地登上了政治舞台

——李悝吴起商鞅的变法及其与孔孟反动思想的斗争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春秋时期，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尤其是柳下跖“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的奴隶大起义，无论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都给予奴隶主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使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丧魂落魄。法家路线的先驱郑子产，晋范宣子，鲁少正卯等就凭借着奴隶大起义造成的有利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有利条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踏上奴隶起义斗争所铺平的道路，从事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改革，或为革新大喊大叫，制造革命舆论。《共产党宣言》指出：“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里说的虽是资产阶级及前一历史时代的贵族中的一小部分在革命斗争中转到革命阶级方面，但我们从这里得到启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春秋战国时期一小部分奴隶主贵族在革命斗争中脱离奴隶主阶级转到新兴地主阶级方面，是符合这个原则的。法家先驱人物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转到新兴地主阶级方面，主张法治，反对礼治。前期法家魏文侯，李悝、吴起、楚悼王、秦孝公、商鞅等，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转到新兴地主阶级方面来，旗帜鲜明地针对儒家的复辟思想，制定反复辟的政策法令，坚决推行法治，反对礼治。下面谈谈他们的政治路线及其在变法斗争中与儒家的斗争。

一、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斗争

春秋末期，柳下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的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各国的奴隶主阶级，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的革新开辟了道路。公元前 445 年魏文侯即位时，亲见亲闻的人们，还可指画谈论当时的革命风暴情景。联系到孔丘反对社会变革的一系列谬论，革新和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极为尖锐。魏文侯坚决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走法家路线，任用著名法家李悝等人实行变法，从政治、经济方面给予儒家反动路线以致命的打击。

李悝(约公元前 450 年—前 390 年)，魏人。他在魏国的变法，总结了法家先驱的变革经验，为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制度，制定《法经》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的出现，是法家先驱一再公布的成文法的发展，是在儒法斗争中法治路线战胜礼治路线的丰功，沉重地打击了“刑不上大夫”等类的贵族特权。

孔丘奔走乎号“克己复礼”，政治上任人唯亲，经济上维护井田制，妄图恢复文武周公时代的礼治。李悝针对儒家的反动路线，制定适应时代要求的法治路线的各项政策，坚决实行法治。政治上强调“食有劳而禄有功”运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剥夺了“淫民”(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废除了孔丘妄图维护的世卿世禄制，并用这被废除的爵禄来报酬愿为魏国效力的四方的贤士。于是，必有功有能的人，才能得到禄位，受到奖励，贪暴昏庸之流就必然受到应得的惩罚。“赏必行，罚必当”，赏罚严明，在与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建立了封建的等级制度。

经济上主张“以沟洫为墟”。既把井田制上的沟洫废除，扩大耕地面积，并把耕地分给人民。“魏氏之行田(即分与土地)以百亩，邲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即根据土地的好坏，每户分给土地百亩或二百亩。广大奴隶分得小块土地，自耕而食，由奴隶身份解放成为农民，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形成了封建生产关系。后来商鞅在秦“开阡陌封疆”就是这个办法。

为了发展生产，提出“尽地力之教”。谷物种植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即使有的作物遭受自然灾害，还有其它作物可以收获。若治田勤谨，便可每亩增产三斗，不勤谨就会每亩减产三斗。在这样的倡导和鼓励下，粮食增产了，农民就不会离散，政府可增加收入，国家就可富强，这是法家的重农思想，对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又创立“平籴法”即丰年平价购储，荒年平价出售，既打击了投机商人，又保障了农民最低生活，不致因凶年而流散，使劳

动力和国家赋税收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些政策法令都有利于魏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时，既要强调农本，发展生产，达到富国的目的；还要强兵，即加强革命暴力，保卫革新取得的胜利果实，抵制妄图捣乱的反革命复辟势力。魏国的“武卒”以作战勇敢著称，就是在强兵的政策下建立起来的。此后的法家，总结了耕战政策的经验，都通过耕战政策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耕战政策遂成为法家的传统政策。由于魏文侯死后，反革命复辟势力不断干扰，新法未能彻底贯彻，故魏国未能向着日益富强的道路前进。

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斗争

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卫人吴起(?——公元前381年)是魏国的西河守，当时著名的军事家。魏文侯死，武侯想谋杀吴起，吴起怕得罪，因逃往楚国，帮助楚悼王变法革新，把魏国“明法审令”，的一套带到楚国，积极推行法治。他看到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严重阻碍法家路线的贯彻，于是裁减坐食无用的冗官，废除疏远的公族，并规定每个封君传了三代，国王可以无条件地收回其爵禄，省下钱米来练兵养兵，这就是“要在强兵”

的政策。“强兵”与重农相结合，反映了吴起“农战”并重的思想。

为了发展生产，扩大耕地面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变相没收他们原来分封的领地，进一步摧毁了奴隶主贵族特权。

吴起的这些革新，严重地打击了孔丘所维护的世袭贵族，有利于楚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奴隶主复辟势力便起来围攻吴起，吴起死于乱箭中，革新也就随着夭折。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多么激烈!“楚不用吴起而削乱”国势也就一蹶不振了。

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斗争

秦在商鞅变法以前，由于“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厉(厉共公)、躁(躁公)、简公、出子(惠公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所谓“不宁”或“国家内忧”既是“君臣乖乱”的现象，也是人民反抗斗争日益尖锐的说明。《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后，秦国“山无盗贼”，“乡邑大治”，正说明变法前的秦国是“山

有盗贼”，“乡邑不治”的事实。就在这阶级斗争的推动下，秦简公实行“初租禾”即按田亩征取租税的剥削方法，正式承认私田的合法性。秦献公时，先后进行“初行为市”、“为户籍相伍”等革新，政治上、经济上都有新的建树。这些变革，既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反映，亦是商鞅变法的序曲。通过这些革新，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比起东方国家仍显得落后，不得参与东方国家的会盟。秦孝公不能忍受这样被人轻视的耻辱，坚决走法家路线，重用著名法家商鞅，进行变法。

商鞅(约公元前 390 一前 338 年)卫人。“少好刑名之学”，现存法家学派辑录而成的《商君书》，反映商鞅的基本思想。

商鞅变法后，反革命复辟势力很嚣张。儒家的卫道士孟轲，公开以救世主自命，胡说如果要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就没有别人。力竭声嘶地鼓吹孔丘的“克己复礼”，抛出所谓“仁政”的礼治路线，叫嚷“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即恢复井田制的复辟倒退道路。商鞅针对儒家的反动思想，提出一条与孟轲所谓“仁政”相对立的法治路线。法治和礼治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严酷斗争，反复较量于变法的整个过程，商鞅为坚决贯彻法治路线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从四个方面说明这场斗争的前后过程。

(一)厚今薄古的进化观点战胜了是古非今的谬论

关于变法前夕在变法决策会上的路线斗争。《商君书更法》记述了这场论战。商鞅为了坚定秦孝公变法的信心提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论点。就是说只要能强国，就不必走老路，只要能便民就不必按照礼治那一套。站在反革命复辟立场的甘龙，立即跳了出来，胡说什么“秦国之故”不可变，旧时的“礼”不可改。另一个家伙杜挚，则叫嚷“利不百，不变法”。“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商鞅毫不动摇地站在法家路线上，斩钉截铁地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坚持变法，反对守旧，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法治理论，驳得甘龙、杜挚之流哑口无言，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马上颁布了《垦草令》。

(二)“秦行商君法而富强”

商鞅在秦的变法，主要的有公元前 359 年(秦孝公三年)和公元前 350 年(秦孝公十二年)两次。现将两次变法要点，综合简述于下。

在政治方面，商鞅采取种种措施，摧毁儒家所维护的世卿世禄制度。如奖励军功政策，规定有军功的按功受爵，私斗的，各依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取消了奴隶主贵族世代继承爵禄和“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换句话说，即奴隶主没有军功的，不得继承享受俸禄，立有军功的就可受爵做官，为新兴地主阶级开辟了仕途，促进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发展，使各级政权逐步地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军功政策，鼓励用暴力来战胜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站在奴隶主阶级反动立场的孟轲，则咒骂“善战者，服上刑”流露了怕得要死而又无可奈何的悲鸣。

为了集权国君，商鞅又在秦国合并各小都、乡、邑、聚(村落)为县，设置令丞，推行县制，县令由国君任命，随时可以调动任免，消灭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的地方势力。从此，国君可直接控制全国的县及所属民户，把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政府手里。同时严密刑法，把人民按十家或五家组织起来，实行连坐，一家犯法藏奸，其它各家就要互相告发，不告发的腰斩，告发的与斩敌者同赏，隐藏的与降敌者同罚。这些措施，固有压迫人民的一面，但把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编在什伍里面，严格监视了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活动，起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针对孟子死心塌地妄图恢复井田制的反动主张，正式用法律条文规定，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准许自由买卖。这是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即以封建的生产关系取代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从而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奠定了地主经济在秦国的支配地位。由于秦国地广人稀，乃制定“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的“徕民”政策。即用分给新来的人民一定的田地房屋，免除他们三代人的赋税徭役等办法，招徕三晋人民开垦草茅荒地。这样既增添秦国的劳力，又减少三晋的兵源，收到“以战胜同实”的效果，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孟轲对这些变革恨得要死，咒骂秦孝公、商鞅是：“暴君污吏”，是“民贼”，真是反动透顶。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保证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和兵役来源，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禁止父子兄弟同家共财，互相依赖。有两个男子以上的人家，若不分居，就要加倍征收赋税。在鼓励小农生产的同时，规定农民必须努力耕织，产量多的可以免除徭役负担。若不从事农业生产，进行小商贩经营或因好逸恶劳懒惰贫穷的就罚作公家的奴隶。前面提到的《垦草令》提出了二十条垦荒的措施，集中反映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孟轲站在反革命复辟立场，咒骂“辟草莱，任土地”是犯罪的行为，正好说明《垦草令》政策挖了奴隶主经济基础的根基。这些政策既起了促进生产的作用，而一家一户进行生产的小农经济形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从上看来，商鞅站在时代的前列，根据秦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革命的政策法令。尤其是“农战”政策，明确地把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战斗能力，看成富国强兵的要素。“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这样一条正确的“农战”路线，发展了李悝、吴起的耕战政策，为以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国家作了准备。商鞅变法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坚决与反革命复辟势力斗争到底

商鞅变法虽取得“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的成就，但在贯彻法令的过程中，受到的阻力可不小。变法令推行不久，上千的反革命复辟势力，纷纷议论新法的不便。及至变法取得辉煌成就时，这些家伙又连声称便。商鞅一眼看穿这些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斥为“乱化之民”，把他们迁往边城。商鞅为了进一步摧毁反革命复辟势力及反动思想的依据，把“去奸”当作变法的当务之急。所谓“奸”包括“奸民”和“虱”。《商君书·画策》说：“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为奸民”。则“奸民”实指享有特权的奴隶主贵族，儒士和奴隶主商人。所谓“虱”则指“诗书”“仁义”等反动的儒家思想。前揭“农战”“垦令”政策及“燔诗书而明法令”的策略，都是强有力的“去奸”措施，起到不断清除前进道路上的垃圾的作用。

反革命复辟派感到一般的反调动摇不了商鞅的决心，乃唆使太子驷犯法，破坏革新。商鞅面临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毫不动摇妥协。太子是未来的国君，虽不可按律治罪，但太子犯法，教他的师傅不能辞其咎，遂“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维护了法令的尊严，扫荡了阻碍法令推行的绊脚石，使新法贯彻得更为彻底。

但是，反革命复辟势力并不死心，总是想方设法；阴谋捣乱，妄图恢复失去的天堂。商鞅对这些反革命阴谋活动决不姑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杀了奴隶主贵族祝懽，判处七百多名反革命的死刑，给予反革命复辟势力很为沉重的打击。

没落奴隶主贵族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想有机可乘，以求一逞。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阴谋诡计，反动儒生赵良则破门而出，称引儒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反动谬论攻击法家，威胁商鞅“危若朝露”。要他下台，隐退田间。商鞅坚持了法家路线，以贯彻新法到底的革命行动，回击公开和暗藏的反革命复辟势力。秦孝公死，太子驷执政，公

子虔之流从阴沟里爬了出来，复辟倒退的反革命腔调甚嚣尘上，造谣惑众，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下令捕杀商鞅，并施以车裂(五牛分尸)惨刑，以发泄这些反动家伙的豺狼本性。商鞅为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结束了战斗的一生。

(四)一条发人深思的教训

在商鞅战斗的一生，由于坚决推行法家的法治路线，废除儒家的礼治路线，打击一切反革命复辟势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体现了路线决定一切的精神，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一条经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到商鞅不畏强暴，与反革命复辟势力斗争到底的革命意志，不禁拍手称快，精神为之一振。但商鞅被杀的血的教训，从历史上证明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在阶级斗争还存在的社会主义时代，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吴起在楚国被乱箭射死，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间短，楚国旧贵族的反动势力很大，虽在变法期间受到沉重打击，一旦风吹草动，黑云压城的险境是有可能出现的。商鞅在秦推行新法二十年，政治、经济、军事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最后不免于反革命复辟势力的陷害，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商鞅为什么死于非命？最根本的是商鞅失去了革命警惕。他坚决论处了公子虔之流，但对他们的阴谋活动注意得不够，赵良明以刑黥太子师傅、杀贵族祝懽，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相威胁，商鞅犹等闲视之，不为戒备，孝公死，才牺牲于虚构的谋反罪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革命人民不断提高觉悟，提高革命警惕，故能揭露刘少奇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使得一个个粉身碎骨，遗臭万年。商鞅被杀的教训，加深了我们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的理解。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更为错综复杂，刘少奇、林彪一伙反革命复辟势力虽被打垮，但还会出现新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对不甘心失败的反革命复辟势力既不能施仁政，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使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活动无所藏其奸。奋起革命的千钧棒，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的规律证明，反动势力是决不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商鞅的被杀，就是奴隶主贵族妄图复辟的反革命暴行。商鞅被杀后，秦惠文王虽一度

排斥法家，重用旧贵族魏冉等人，政局出现了暂时的反复。但因商鞅制定的和推行的法家路线，举凡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废除世卿世禄，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措施，都给予奴隶主贵族以致命打击，使新兴地主阶级成为控制秦国政治难以动摇的力量。加以商鞅公布的法令，必使明白易晓，宣传深入广泛，致妇女儿童都说得出商鞅的法令来，形成了抵制复辟势力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又因商鞅的政策法令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革命人民的要求，历史发展的趋向，一时的黑风恶浪，怎能倒转历史的车轮！所以“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秦国的政治仍沿着法家路线前进，商鞅的政策法令仍能继续推行，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断得到完善，经过秦昭王重用著名法家范雎、蔡泽的不断革新，奠定了秦灭六国的物质基础，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帝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上面无论李埋、魏冉，吴起在楚及商鞅在秦的变法斗争，都充满着朝气蓬勃，锐不可当的气象。他们所推行的法家政治路线，摧毁了儒家反动的礼治路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商鞅变法，为法家思想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著名的法家荀子、韩非的思想，能够发展到那样的高度，是与前期法家丰富的实践经验分不开的。

第二节 讨伐天命观天才论的战斗檄文

——荀子的“天人相分”与“勘天”思想

战国时期，在阶级斗争和新旧势力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先后夺取或部分夺取政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法革新。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及其它国家的变法，进一步打击了没落奴隶主的特权和政治地位，土崩瓦解的奴隶制已无法继续维持，封建生产关系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农业方面，由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制的“井田制”，在土地私有的法令下，许多奴隶有小块土地可耕，解放成为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更因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水利工程的不断兴修，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的进步，耕作技术和耕作经验的日益丰富，不仅许多荒野和森林逐渐开垦为农田，农业生产也出现一个飞跃发展的局面。在工商业方面，已打破了“工商食官”的牢笼，解放了生产力，加以铁制工具的使用，分工的细密，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了民间的手工业和商业。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变革。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上，封建

的中央集权制度代替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形成了官僚制度。在地方管理上，郡县制代替了奴隶主贵族的分封制。由于交通的发展，物资的交流，使得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大有四海若一家的趋势。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成为时代提出的迫切任务。建立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国家，还是维护诸侯割据局面，遂成为当时矛盾斗争的焦点之一。由于各诸侯国的革新有深浅，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打击程度有不同，因此，消灭诸侯割据，实际上是对反革命复辟势力的斗争。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既是巩固和发展封建制的迫切需要，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著名法家荀子进一步批判儒家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想，顺应时代的要求，怀着“天下为一”的希望，广泛宣传统一集权的必要，为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造革命舆论。复因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经过范雎、蔡泽的发展，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打击日益沉重，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起了深刻的变化，国富兵强，具有完成统一事业的力量。通过荀子在秦国的实际观察，把秦国的深刻变化写在《强国篇》里，高度赞扬秦国的封建制度是“治之至也”。治是治理天下的一种制度，“治之至也”就是最好的社会制度。荀子歌颂了秦国老百姓很朴素（“其百姓朴”），官吏办事很认真（“百吏肃然”），工作效率很高（“听决百事不留”）等新气象和社会变革，把完成统一事业的希望寄托在秦国。

荀子名况（约公元前298—238年），赵国人，又称荀卿或孙卿。他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法家的重要代表，著名法家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他曾在齐国的稷下讲过学，后又做过楚国的兰陵令。现存荀子一书，是研究他的思想的重要著作。

一、荀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批判了孔孟的天命观

战国晚期，法家与儒家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或“天人相与”的斗争。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孔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着人间的一切。孔丘自称“五十而知天命”，把天命说得很威严，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天命。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们的生死祸福，富贵贫贱全由天定。孟轲和孔丘一样，胡说什么“舜有天下”就是“天与之”的，他把“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过程，说成是天为了考验一个大人物，给他安排艰苦锻炼的机会，是天的有意培养。“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意即非人力所为而做成的是天意，非人力所招致而达到的是命运。也说明人事都受天的支配，天命是不能违抗的。这就是孔孟所宣扬的“天人合一”或“天人相与”的鬼话，妄图用天命来吓人，从思想上消除“犯上作乱”的斗争，挽救奴隶制崩溃的命运。

与孔孟的天命观相反，荀子主张“天人相分”，认为天是物质之天，没有意志。荀子一篇重要著作——《天论》，就是批判孔孟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的战斗檄文。

《天论》指出：列星随着大地旋转，日月轮替着照耀，春夏秋冬四时流变，阴阳化育，风雨普遍布施，万物各得阴阳的调和而产生，各受风雨的滋养而生长。《礼论》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说明自然界万物的生长是天地阴阳变化的结果。这样以物质性的天地阴阳来说明万物生成和变化的原因，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天象是天象，人事是人事。天既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岂能主宰和支配人类！人的祸福贫富治乱，是社会问题，与天无关，天人之间就没有什么神秘的关系了。

荀子认为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天行有常”就说明天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不因有贤德的尧而存在，也不因有昏乱的桀就消灭。办事符合自然规律就能有成果，不按照自然规律的行为就会造成祸殃。“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假若人们摆脱所谓命运的支配，努力创造条件，克服困难，就可取得“勘天”即征服自然的效果。他说，与其盲目的尊天而想发财，不如加强生产积蓄财物，由人自己来控制。与其歌颂天的盛德，不如掌握天的规律，使之为人服务。与其不动而待时机，不如应时而加以使用。弃人为而望天赐，是反万物之情的妄想。就是说，人对自然界，不是要顺从畏敬，而是要用人力向自然界作斗争，使天地万物为人所控制，所利用。荀子在否定天命观的基础上，强调人要与自然作斗争，并进而征服自然，这是光辉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谓的人也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还不可能看到真正能够胜天的广大劳动群众。在他眼里，劳动人民还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主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才能看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发挥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真正地充分地体现“人定胜天”的精神。

荀子在“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这就是说，搞好农业生产，省吃俭用，天就不能使人贫穷。充分准备，按时耕作，天就不能使人受灾。人们的行动按照正确的道路走去，天就不会使人得祸。反过来，若“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即自己不劳动，不搞好农业生产，生活又奢侈，天就不能使你富起来。不充分准备，不按时耕作，天就不能使你安全。违背时代潮流，轻举妄动，天就不能使你吉祥。那么所谓贫富祸福，完全取决于人为，与天毫无关系。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下定与天斗，与地斗的决心，就必能克服困难，取得胜利。迷信天命，是最愚蠢的人。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为法家的耕战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王霸篇》指出“农分田而耕”，即家耕百亩之田，使“耕者乐田”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农业出现一个跃进的局面。与耕相联系的是战，法家都赞扬革命暴力。商鞅强调“以战去战”，奖励“农战”，使得秦国兵强国富。他总结了“农战”政策的经验，认为开辟了田野，积蓄了粮食，就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支持统一六国的兼并战争，坚决维护商鞅的“农战”政策，把统一六国的希望寄托于秦国。

二、荀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孔孟的天才论

人的认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孔丘从唯心主义天命观出发，提出“生而知之”、的论调，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并吹嘘他自己的道德才智就是上帝赋予的。孟轲继承孔丘“圣人生知”的先验论，进一步提出“良知良能”的观点，胡说什么“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即是说：“良知”“良能”是头脑里固有的，认为人的思想、知识、道德都是天赋的先验的。只要闭门修养，把这些先验的东西“扩而充之”就行了。孟轲还说：“天之降才”，把“天”和“才”第一次连在一起，大肆宣扬唯心主义天才论。

与孔孟的唯心主义天才论相反，荀子的《天论》还论述了形体和精神的相互关系问题。“形具而神生”的论点，说明了形体、物质是本原的，第一性的；精神、认识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具备了形体，精神才能派生出来。因此人们认识事物必须“缘天官”（眼、耳、鼻、舌、身）。即由感官接触外物，获得感性知识，然后再通过“天君”即心加以思维，获得“征知”。所谓“征知”，

是指通过头脑(心)思考而形成的理性知识。“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意即同是人类，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也是相同的。这虽是消极的反映论，与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时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却是难能可贵的。

人虽然通过感觉和思维作用可以认识世界及其规律，但人的认识不是先验的，而是全靠学习积累得来的，所以《劝学篇》很强调一个“积”(积累)字。“故不积跬步(半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就是说，不把半步半步的行路积累起来，就完成不了千里的路程；不把溪流积累起来，就不能成为大江大海。人的知识学问就是通过“锲(刻也)而不舍”的学习逐渐积累起来的。

知识学问虽由学习积累而来，但若要认识较全面，较正确，就得排除主观和客观的种种障碍因素，这叫做“解蔽”。只有从唯心论和片面性中解放出来，才能认识事物的真面目。《解蔽篇》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如说有人黑夜把路边的大石头当成老虎，吓了一跳，这是黑暗蒙蔽了人们眼睛的缘故，在受蒙蔽的情况下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才把石头当成老虎而大吃一惊。荀子举了很多例子后，作了这样的概括：一个人在受蒙蔽下做出的判断没有不错的。所以，要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必须解除蒙蔽。儒家的唯心论是最大的蒙蔽。荀子强调解除蒙蔽，积累知识，不断认识事物，不断深化知识，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荀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力地批判了孔孟“圣人生知”的唯心主义天才论。

荀子既不承认孔孟所说的天才，还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因此，在用人路线上，也就反对孔孟的任人唯亲路线，主张“尚贤使能”路线。《王制篇》强调指出，贤能的人可以越级提拔，无能之辈立即撤职，那怕是王公的子孙，若“积文学，正身行”就可以选拔为卿相士大夫。做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特权，自无侥幸存在的可能了。这条用人路线，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必然，对打击腐朽的反革命复辟势力，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林彪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求助于反动的孔孟之道，拾起“圣人生知”的破烂，鼓吹“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无耻地吹嘘他的儿子为“虎儿”、“老虎儿”，他的老婆是“受于天”的。把他们一伙打扮成“天才”、“超天才”、“天马”，并以“至贵”超人自居，把篡党夺权作为他们所谓超人

的反革命死党的历史使命。我们研究荀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孔孟的唯心主义天才论，深挖林彪一伙反革命复辟思想的根源，对于深刻揭露批判林彪一伙的罪恶，进一步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是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三十年前，林彪死党、托派、叛徒陈伯达对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极尽歪曲的能事，胡说什么“法家之所谓的‘法制’，在基本上，实是儒家正名主义和礼治主义的往古推演……的推演者”。这样把著名法家荀子与反动儒家合二而一，是对荀子的最大侮辱。其反动实质，就是要奉儒家为“正统”，达到独尊儒家反对法家的目的。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复辟势力，到头来总是要被革命人民所扫除、打倒的。

第三节 法家思想发展的高峰

——韩非集法家之大成

韩非(约公元前 280——233 年)，战国末期魏国人。曾受业于荀子，“喜刑名法术之学”，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变革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地批判了儒家思想，从理论上完整地形成了法家的思想体系，为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韩非子》一书，是我们研究韩非思想的重要著作。

一、韩非法后王的社会历史观批判了孔孟法先王的

历史倒退论

在韩非生活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要前进还是倒退？要搞复辟，还是反复辟？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儒家认为历史是倒退的，“吾其为东周乎”！就是孔丘法先王的政治理想。

按照“周礼”的规定，“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号施令，是“天下有道”的表现。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平王东迁以后，强大的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更因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激烈，封建因素的滋长，通过社会革命日益强大的大夫，更是锐意革新，轻视奴隶制的礼乐政刑，于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而是“陪臣执国命”。这本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必然现象，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进步的。但是孔丘却倒过来看，

把这些变革看成是“天下无道”的表现，这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的倒退的历史观。

孟轲和孔丘一样，认为历史不是在发展，而是在倒退。他说：“王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孟轲开历史倒车的反动观点。因此，孔丘“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轲“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言必称先王。他们一唱一合，反复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盛德，力竭声嘶地叫喊着法先王。

与孔孟相反，法家认为社会历史是前进的，发展的，后来居上，今胜于昔，坚定不移地主张法后王。荀子在所著《非相篇》说，要想看到圣王法治的业绩，就在于那些灿烂辉煌的事功，那就是当代的圣王。当代的圣王，是天下的君主；舍弃当代的圣王而谈论上古的，犹如舍弃自己的君主而去侍奉别人的君主一样。这就清楚说明，后王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五蠹》是韩非的一篇重要著作。蠹是害虫，蛀虫。“五蠹”就是社会上的五种蛀虫，儒学是蛀虫之首，危害最大。《五蠹》的第一段就批判了儒家法先王的倒退历史观。他说：“上古之世”，“构木为巢”，“钻燧取火”，作出很大贡献！但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有人在“中古之世”的夏朝还“构木为巢”，“钻木取火”，一定要受到鲧、禹的讥笑。如果有人在“近古之世”的商周还无故地去决河排水，必然要受到汤、武的讥笑。那么，如果现在还有人赞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一定受到“新圣”的讥笑。他所谓的“新圣”，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此，他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就是说，不要遵行古法，墨守陈规，要就当前事物的发展情况来论事，并做好一切准备。“守株待兔”的故事，就是墨守陈规的典型。孔孟法先王开历史倒车的观点，也就和这个“守株待兔”的人一样，是十分可笑的空想。韩非很鲜明地阐释了法后王的社会历史观，热情颂扬今胜于昔，厚今薄古的发展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孔孟法先王的今不如昔的历史倒退论。

二、韩非的统一集权思想批判了儒家的分封割据谬论

要统一中国、集权中央，还是分封割据？也是这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孔孟奔走呼号“克己复礼”，就是恢复奴隶制时代的分封割据局面。当时在秦国窃取丞相职权的吕不韦，也跟孔孟唱同一个调子，胡说什么“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多封建，所以便其势也”。妄图通过分封制度达到分裂割据的目的。甚而利用职权，把卫国被推翻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

与儒家的分封割据思想相反，韩非本着时代的要求，发挥了荀子“天下为一”的思想，坚决反对分封割据，指出：“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主张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机要，四方来效”。他总结了商鞅等人的法治思想和实践经验，强调中央对于巩固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提出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法、术、势”是什么意思呢？《定法》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法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即公布法令，使人民知晓，守法者赏，坏法者罚，是每个臣下应当遵守的。换句话说，法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律制度。“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是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部分。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即用人唯贤，考核完成任务情况，掌握生杀大权，查实群臣才能，这是君主应当执掌。所以“术”就是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若把握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选拔办法，自能避免循私舞弊，统一集权国家也就可以巩固起来了。

“势”就是政权，权势。“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也可以说“势”是统治人民的凭借和权力。韩非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无“术”就不能“知奸”、“去奸”，说明“法、术、势”三者“不可一无”。他根据复辟反复辟的经验，吴起、商鞅实行变法波奴隶主贵族杀害的事实，《孤愤》着重指出：儒家两条

路线的斗争是“不可两存之仇”，在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有可能“危于身而殆于躯”，因制定这套集权中央的法治理论，为地主阶级最后战胜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无怪秦始皇读到《五蠹》、《孤愤》以后，就很感慨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此外，韩非继承法家传统，非常重视耕战政策。强调发展农业和加强武力，既是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根本，也是通过革命暴力，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不可缺少的基石。因此，他把不从事耕战的儒家，带剑行凶的游侠，摇唇鼓舌的说客，投身权贵逃避耕战的人以及投机营利的工商业者称为“五蠹”，认为不把“五蠹之民”铲除，就谈不上富国强兵。他总结了法家富国强兵的经验，把耕战思想提高到理论上，作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

的结论。他说：“当今争于气力”，不提高农业生产，不加强军事力量，就不能战胜敌人，加强地主阶级专政，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

不仅在政治上加强地主阶级专政，《五蠹》还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主张，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即把儒家记述“文武之道”和“先王之语”的书简予以取缔，以新兴地主阶级的各级官吏做“老师”，且法治思想教育人民，把人民的言谈纳入法治的轨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对奴隶主贵族的专政。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事而富国，有事则兵强”，从而实现封建变革的政治目的。这种主张是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继续和发展，奠定了秦始皇焚烧“诗书百家之语”这个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

韩非总结了以前法家各派的理论和实践，提出商鞅、申不害，慎到所主张的“法、术、势”须互相结合，不可偏废。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一整套路线、理论和政策，不愧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秦始皇在商鞅变法以来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上，采用了韩非等法家思想，任用李斯等法家人物，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新兴地主阶级终于战胜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封建制终于战胜了奴隶制，法家终于战胜了儒家。这一系列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韩非所制定的路线、理论、政策的胜利。这是韩非对历史的贡献，也是法家政治、思想、路线在历史上的贡献。

第三章 秦王朝在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儒法斗争

——兼论中华民族的形成

毛主席指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封建制全面战胜奴隶制，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新兴地主阶级成了统治阶级。从此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统一中国是时代的要求，是新兴地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先进的秦国担当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秦始皇实行法家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统一路线，在人民群众积极支持下，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秦始皇巩固统一的各项措施，客观上又发展了形成民族的一些条件。历代都行秦政法。在长期统一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步形成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

秦始皇在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尖锐剧烈的儒法斗争。焦点是复辟和反复辟。秦始皇虽然坚决果断地镇压了一些复辟势力，但是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镇反不可能彻底，又让暗藏的敌人赵高之流钻入心脏，颠覆了秦王朝。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赵高复辟政权，荡涤了地方复辟势力，为西汉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奠定了基础。以后复辟和反复辟斗争还在继续。统一的主流中不时出现分裂的逆流。说明“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第一节 秦始皇时代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

春秋以来，连绵不断的奴隶起义和逃亡，逐步瓦解着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到处撕开裂口，出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出现了私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出现了佃农和雇农。许多农业劳动者由奴隶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被广泛采用，许多荒田和

森林辟为良田。奴隶主贵族垄断工商业的局面已逐步被打破，民间手工业和商业有较大发展。出现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农村也有了定期的集市。新兴地主阶级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有许多是靠市场提供；个体农民的生活必需品，例如铁器、木器、陶器、食盐等也要靠市场交换。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尽可能扩大共同市场，加强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但是在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下，这种经济联系往往被战争割断。而且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和度量衡，差异很大；他们又互相防范，设置了许多路障、关卡，苛查勒索来往行人，限制了商品的流通。要发展地主经济，必须扫除这些障碍，实现全国统一。

水是农业的命脉。住在江河流域的农民，首先是防水患，其次是兴水利。但在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下，往往利用水作为战争武器，破坏堤防互相浸淹，毁灭敌国的城邑，毁灭人畜和庄稼。他们兴修水利也是损人利己，把邻国当作溢洪道，排水库，所谓“以邻为壑(音喝)”。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剥削收入和财政收入；摆脱奴隶地位、具有某种劳动兴趣的农民，也希望多得一点生产品。他们都反对人为的水害，要求因势利导地修水利。因此，也渴望全国的统一。

新兴地主阶级要发展封建经济，农民要进行个体生产，首先要求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时代，他们为了争城邑，争俘虏，进行无休止的混战。春秋二四二年中，大小战争多达四九〇多次，战国一八二年中，战争更频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每次出兵十万几十万，社会生产经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要扫除害人虫，首先是扫除割据称雄的诸侯，他们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因此，全国的统一，是时代的要求，是新兴地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正如荀况所说的：“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

法家荀况顺应历史发展，提出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统一路线。统一中国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条路线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客观上也是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儒家孟轲也曾提出“定于一”的主张。但“孰能一之”？他的希望是由文、武、周公之类的大奴隶主来统一，重建“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宝塔式的奴隶制。这在本质上是截然相反的两条统一路线，应该分辨清楚。

割据和统一既然是一场阶级斗争，必须进行暴力革命，以进步的统一战争去消灭反动奴隶主阶级分裂割据的战争。商鞅提出“以战去战”的理论，荀况提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者也”的理论。只有依靠人民的浴血奋战，

才能够统一全国，任何和平途径都只是妄想。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社会改革比较彻底的秦国身上。

落后的秦国变成先进的秦国，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春秋初期，秦还是一个僻处西方的一个小国家，不仅不能和中原各国抗衡，甚至还没有资格参加会盟。秦国也经历了奴隶制，但是立国时间短，旧势力较小，历史包袱并不重。“孔子西行不到秦”，这个一生进行复辟活动的孔丘，就认为秦国是没有作为的地方。封建制革奴隶制的命，就是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取得较为彻底的胜利。

春秋时秦穆公奋发图强，用谋臣百里奚，战胜晋国，扩地到黄河边上。又用谋臣由余，灭了十二个戎国，开地千里，成西戎霸主。战国时秦孝公重用商鞅，两次变法，使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无比的统一国家。

秦孝公在位时，就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害，但是法家路线并未改变。“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继续执行法家路线)，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继承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的成就)，已经具有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

一些法家代表人物都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秦国。荀况亲自跑到秦国去考察，认为秦变法革新的结果，“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即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代能够连续战胜诸侯，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所谓“政脩”，主要是坚持封建土地所有制，部分地满足奴隶的土地要求。商鞅所谓“意民之情(体会人民的愿望要求)，其所欲者，田宅也(他们都希望得到一点田地房屋，进行独立生产)”。“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悬赏招徕三晋之民入秦垦荒，给他们田宅，还免除三世的赋役)，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这样做一定会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使他们摆脱最悲惨的奴隶地位)。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

恩格斯指出：“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秦国的新兴地主阶级采用了当时奴隶所能接受的剥削方式，取得了摆脱奴隶地位的“耕战之民”的积极支持，是荀况所谓“治之至也”的集中表现。因此他断言秦国足以“令行于天下”，即有希望完成统一事业。

当时许多游士都到秦国来，李斯所谓“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其中有不少法家人物。秦始皇以李斯为廷尉(最高司法官)，尉繚为国卫(最高军事长官)，王翦、蒙恬为将军，逐渐在政治上、军事上建立了以法家为主体的领导核心。秦始皇在亲政前，经历了吕不韦、嫪毐阴谋篡权复辟的恶风险浪，阶级斗争的残酷事实教育了他，必须实行法家路线，才能够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进而统一中国。因此当他读到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著作时，十分欣赏地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不仅重用法家人物，而且钻研法家著作，总结历史经验，作为指导思想。

秦始皇提出了“烹灭强暴，振(拯)救黔首”的口号，来发动统一六国的战争，得到了“黔首”们的普遍支持，积极投入战斗。他不仅有一条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同时还有为这条政治路线服务的军事路线。秦始皇采纳李斯尉繚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制定了从取韩开始，南北出击，破赵、燕，灭魏、楚，横扫两翼，然后歼灭齐国的战略部署。他在关键时刻，三次亲临前线。自公元前二三〇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结束，“并吞战国，海内为一”，达到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统一中国的共同愿望，出现了“黔首大安”的崭新局面。

秦始皇决战决胜的原因，在于政治路线正确，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此相反，楚国在战国七雄中，土地最广、人口最多，军队的武器、装备、训练都很好。所谓“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用沙鱼皮，犀牛皮做铠甲)，坚如金石；宛钜铁铠(用南阳精炼的铁制作戈矛等武器)，惨如邈(音峰)蜚(非常锋利)；轻利鏖速(士卒训练得矫捷轻快)，卒如飘风(行动非常迅速，来去有如旋风)。但是路线不对头，终于覆亡。法家吴起在楚国变法，遭受重重障碍，结果被奴隶主贵族乱箭射死。楚国在儒家路线统治下，“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公元前300年，秦与韩魏等共攻楚，杀楚将唐蔑)；庄骄起(庄骄率领奴隶，农民起义)，楚分而为三四(楚国土崩瓦解，四分五裂)”。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兵六十万攻楚，楚国也“悉国中兵以拒秦”，其兵力将近百万。大决战的结果，“大破荆军(即楚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遂灭亡。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主力军始终是人民群众。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第二节 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及其历史影响

秦灭六国，既然是封建制和奴隶制的大决战，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其它各条战线上还要继续战斗，取得全面胜利，才能够巩固统一。

首先是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中央，组织了统管全国军、政、法、财、文教的专制政府；在地方，全面推行郡县制，由中央派去随时可以更换调动的流官，全面废除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从国体和政体上巩固封建制的胜利成果，扫除分裂割据的因素。并且收天下兵器，堕毁六国的城郭要塞，要求做到“灾害绝息，永偃甲兵”。

其次是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主贵族大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制，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即下令“黔首”各人自报所占田数，交纳相应的赋税，这就从法律上把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肯定下来，彻底改变所有制关系，取消奴隶主贵族搞分裂割据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确定“人民”的范围，“更名民曰黔首”就是把奴隶的称谓“民”改为“黔首”。这项法令公布后，天下“大酺”，千百万“黔首”饮酒欢呼，庆祝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大改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的产物，说明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划分已经不是主流了。在“黔首”中，也包括新兴地主阶级，而大量的摆脱了奴隶地位的“农战之民。”正是由于他们的浴血奋战，才摧毁了奴隶制，把中国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次是适应地主经济的发展，并加强中央的集权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马道，统一文字，决通川防，因地形、顺水性进行水利建设。

所有这些，围绕着一个中心目的，就是全面废除奴隶制，全面确立封建制，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制。

这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民族的形成，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自秦汉以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各民族，已经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它已具有斯大林概括的四个民族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秦始皇建立封建国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巩固集中统一的措施，客观上又起到发展这四个民族特征的作用。推行郡县制消除分裂割据的因素，巩固了共同的地域；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修筑驰道，发展了民族市场，加强了东、西、

南、北、中的经济联系；统一文字，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也在加强经济联系方面，提供一种共同的交际工具。

这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当然不是现代的资产阶级民族，但也不是欧洲中古封建分割时期的部族。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和商品性较强的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分不开的。毛主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中国封建制一开始，就是封建地主经济。新兴地主阶级要改变奴隶主大土地所有制，要废除分封和“世卿世禄”制，要实行“耕战”政策，要求把政治特权和经济剥削分开，占有土地并不附随政治权力。由于新兴地主有土不能有民，直接生产者就有了较多的自由，较少人身依附关系。以后占有大量土地、享有政治特权的皇室、贵族、门阀地主虽又加深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分散的个体生产”仍占相当比重。

这样的农民，具有较大的独立性。由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他们必须独自料理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一个人不能兼备百工，男耕女织可以解决部分自给的问题，而盐、铁、陶、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还要仰给于市场；为了交纳赋税，还要掌握一点货币。因此，自耕农必须挤出一点商品粮，贫农也要想方设法弄一点货币，“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在地主和商贾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下，农民过着“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非人生活，但和市场的联系却依然是很密切的。

地主和奴隶主也大不相同。他们的生活所需不再是依靠下属奴隶主的贡赋，不再是依靠工业奴隶(百工)、家庭奴隶提供。从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古墓里，可以看出许多送死之具不是一个地方的产物，他的生前奉生之具，当然不限于本地，而要通过商贾得之于远地。《荀子·王制篇》形容战国时代货物流通的情形说，北方的走马大狗，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东方的粗细麻布、海鱼海盐，西方的皮革毛织品族牛尾，在中原地区的市场上都能买到。住在泽地的人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水产，这些都是“结驷连骑”，周游天下的大商人运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活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生活资料的来源不是窄狭了而是更为广阔了。

地主和农民都有一些商品需要，因此，在封建地主经济

中，农、工、商业是缺一不可的。所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此四民所衣食之原也”春秋

末年范蠡、计然在越国变法，主张平抑粮价，所谓“夫粢二十病农(粮价低到二十钱就伤害了农民)，九十病末(粮价高到九十钱就伤害了工商)。末病则财不出(工商业者受到粮价过高的伤害，就会影响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农病则草不辟矣(粮价过低就会影响农业再生产)”。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国变法，制定“平籴法”，则由官府以稳定的粮食价格收购和出售粮食，防止“籴至贵伤民，甚贱伤农”。此所谓“民”，据《汉书·食货志》韦昭注：“谓士、工、商也”。这些工商要自购粮食，可见已经不是奴隶主所豢养的“工商食官”的奴隶，而是“百工居肆”的独立工商业者。官府收购粮食，可见自耕农民必须挤出一点商品粮。平抑粮价的目的是保护独立工商业者和自耕农，以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范蠡、计然在越国，李悝在魏国实行“平籴法”，都收到“国以富强”的效果。

奴隶主大土地所有制崩溃，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对农业奴隶和工商业奴隶就失去了束缚力，出现了“民易去其乡”的情况。由于“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一些自耕农也改行成为小手工业者或商贩，由于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作为商品，失去土地的贫雇农，也转入城市依附工商业主，甚至又重新沦为工商业奴隶主的奴隶。因此，“背本(离开农业)而趋末食(转入工商业)者甚众”。这种情况，“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这样，市场到处出现了，商人到处出现了，货币的流通更为广泛了，农业、工业、商业的社会分工更为明显了。春秋战国以来，就陆续出现一些大城市，逐步形成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民族市场不断在扩大。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以及大梁(开封)、洛阳等，这些城市的繁华情况，有所谓“张袂成阴，挥汗成雨”(街上水泄不通的行人，举起袖子来可以遮住太阳，挥下汗水来好象在下雨)。这些“通邑大都”的大工商业主煮酒、制酱醋的每年成品和销售额上千瓮；屠宰牛、羊、猪的每年可出千张皮；贩卖谷物的每年上千钟；木竹商人年销千棵木材万根竹竿；运输商人马车百乘，牛车千辆；木漆器年销千件；铜铁器年销万斤至几十万斤。这些人都是“富埒王侯”，是“素封”之家，即没有封号的王侯。

但它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而是封建地主的消费经济。在封建地主经济中，工商业虽有一定的发展，而广大市场在农村，个体农民只能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商品需要量有一定限度。在小农经济下，离开土地的人多了，立即影响农业劳动力，工商业者也不可能无限膨胀。地主阶级所需要的，

不过是消费性的生产，因此工商业还没有大发展的前途。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工商业资本随时可以转入土地兼并，过多的资本也积累不起来。

但建立在个体生产基础上的封建地主经济，商品性生产还是比较强，因此一开始就要求尽可能扩大共同市场，这是由于物产分布不平衡，开发有先后，要求大、中、小市场加强经济联系，要求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联系，这是全国统一的经济基础，是形成中华民族的经济基础。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又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始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来进行统治。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及历代都行秦政法，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个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也就不同于西方居鲁士，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所建的帝国那样，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

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几次分裂割据，这是由于分封诸侯王，以及土地高度集中兼并，附随政治权力，形成门阀、世族、藩镇等，这是历史的倒退。这种倒退意味着加强农民的人身依附，以至拉回到绝对奴役的地位，这是广大农民所不能容忍的。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粉碎了这些历史逆流，巩固了祖国统一，不断推动历史前进。而在统一局面下，农民还是要遭受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还要继续和地主阶级斗争。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彻底消灭封建压迫剥削，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才能够获得彻底解放。

新沙皇胡说什么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满族和中国的其它少数民族都不算中国人，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也都不是中国的领土。胡说什么中国的北部疆界在长城，西部不超过甘肃和四川。中国的封建国家，在统一时各个朝代都有明确的边界，是中国各民族的地域。历史上中国的边界曾经有过很多变迁，但从来也没有局限于汉族居住的地区。在分裂时同时出现的不过是中国范围内几个地方割据政权，在这些地方割据政权内，同样是多民族交错杂居。长期以来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着伟大祖国的历史，边疆和内地，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久已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秦汉建立封建国家以来，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就逐渐形成了“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这种共同的心理素质。特别在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这种共同心理素质的反映是特别强烈的。1875年，英帝企图开辟滇缅交通，派兵侵入我边境，英国使馆派遣秘书马嘉理前往腾越带路，我边疆景颇、傈僳等族人民奋起击

杀马嘉理，宣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守土有责。1934年班洪事件，佤族、傣族、拉祜族和汉族人民群众奋起抗击英帝侵略军，一致认为中国人必须保卫自己祖国的神圣领土。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时期起了动员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伟大作用。

新沙皇全盘继承老沙皇按照民族确定国界的论调，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就尖锐地指出，这种所谓“民族原则”，“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又抱着老沙皇这个臆造出来的发明，在我边疆民族问题上继续作文章，我们要用历史事实来粉碎这些无耻谰言。

第三节 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儒法斗争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剧烈的斗争。首先是统一中国前和奴隶主复辟势力代表吕不韦、嫪毐(音劳矮)集团的斗争，其次是统一中国时，丞相王绾请求分封诸侯的斗争，再次是在一次庆功会上，同淳于越以古非今的斗争；又一次是同一群反动儒生攻击新政权的斗争。历史事实说明，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即位，年十三岁。在他亲政前，秦国处在政治上的逆转时期。这个逆转是，奴隶主复辟势力代表吕不韦、嫪毐阴谋篡权，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

吕不韦本人是一个“家累千金”并拥有“家僮”(奴隶)万人的大工商业奴隶主，因搞政治投机充当了秦庄襄王子楚的丞相。庄襄王死后，他独揽大权，勾结另一个拥有奴隶数千人的嫪毐，让他冒充宦官混进了秦王朝的宫廷，获得了秦始皇母亲(秦太后)的宠爱，“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毒国”。他们结党营私，结成了一个庞大的阴谋复辟的政治集团。

吕不韦还纠集了一批反动儒生，编纂了一部《吕氏春秋》。这部反动著作，继承和发展了孔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主张，进一步提出了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恶毒攻击主张社会变革，维护新兴封建制度的法家思想，鼓吹继续分封诸侯，保持奴隶主贵族割据统治的制度。由于当时在秦国，奴隶主残余势力声名狼藉，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吕氏春秋》不得不采取折衷主义的手法，打着“杂家”的幌子，标榜对各派学说兼收并蓄，而实际上贩卖儒家反动思想，鼓吹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路线。在秦始皇主持国

政的前一年，吕不韦将这部反动著作公布于咸阳市门，扬言“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妄图用千金不易来表示这些反动复辟思想应成为秦国的指导思想，篡改法家路线为儒家路线。

吕不韦还极力把这种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公元前 238 年春天，秦始皇开始亲政。在吕不韦的策划下，嫪毐立即发动武装政变，妄图杀害秦始皇，篡夺王位。秦始皇在摆脱了奴隶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下，在法家路线指引下，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镇压了这次政变，处决了嫪毐等人，流放了他的党羽四千多人，软禁了太后。第二年又查办吕不韦，吕畏罪自杀。吕、嫪复辟集团被清除。

这次斗争的历史说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一伙，全盘继承了吕不韦、嫪毐的反革命衣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无产阶级的权。他们在阴谋篡权的时候，也是极力制造反革命舆论，纠集一些反革命爪牙，编写什么《四书集句》，鼓吹儒家的反动复辟思想；还为自己编写什么语录，把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军阀、大党阀吹捧为什么“天马”、“至贵”、“超人”，什么“三个助手中最最好的助手”。还为他儿子编什么《讲用报告》，把那个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的小法西斯分子吹捧成什么“天才”、“全才”、“超群之才”。他们拚命研究“政变经”，宣传“政变经”，组织暗杀队、特务队，妄想搞些谋杀暗害，就可以把历史拉向后退。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历史上封建制终究要代替奴隶制；当前，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这是一个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吕、嫪搞复辟、失败、自杀；林彪搞复辟，也只能落得折戟沉沙，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秦统一中国后，新兴地主阶级夺得了全国政权，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奴隶主贵族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基本上垮了台，而这个阶级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继续在各处捣乱破坏，他们对本阶级的覆亡总是不会甘心的。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儒家为代表的反动复辟势力还十分顽固。这些孔丘的徒子徒孙，对新政权极端不满，暗地里结成党羽，诋毁朝政，造谣惑众，大量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

就在秦始皇统一中国那一年，围绕着国家体制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展开了一场儒法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儒家复辟势力首先跳出来的是王绾。

他顽固地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就国家的体制问题对新建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进行了指责。他说：要分封才能巩固统治，“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主张封秦始皇的儿子们为王，分土立国，实行奴隶社会“世卿世禄”的宗法统治。李斯站在法家的立场，坚决反对开历史的倒车，严厉驳斥了这种复辟倒退的反动主张。他指出，如果恢复分封制，就是分裂统一的国家，分封的结果必然是“相攻如仇讎”，决不是安宁之术。秦始皇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今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他和李斯都认为分封割据是内战的根源，果敢地否定了分封制，把郡县制作为单一的政治体制推行到全国。法家路线再次取得了胜利。

但是，斗争并未止息。公元前 213 年，在咸阳宫举行的一次庆功会上，以博士长周青臣为代表的一些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颂扬了秦始皇所推行的法家路线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各项政策措施，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家复辟势力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大唱“今不如昔”的滥调，明目张胆地大肆吹捧奴隶社会的分封制是从古以来行之有效的好制度，丧心病狂地攻击已推行多年的郡县制，并诋毁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各项新政策，叫嚷什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于是又在朝廷里掀起一场新的大辩论。斗争的焦点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实质问题是发展封建制还是复辟奴隶制的斗争。这时，李斯又一次针锋相对地揭露了这伙反动儒生的阴谋诡计，义正词严地痛斥了淳于越“颂古非今”的反动理论。他首先批驳了所谓“师古”的反动谬论，强调“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接着对反动儒生的“述古怀旧”，诋毁现实的种种罪行作了无情的揭露，指出反动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古非今，毁谤朝政，惑乱百姓，揭露这些反动儒生每当法令公布，就各自利用其私学来议论。进入政府机关则口是心非，走出来就参与街谈巷议，故意发表与法令不同的意见，用来沽名钓誉。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会使皇上的威势降低，下面的党羽形成，必须坚决禁止。李斯注意到反动儒生经常引用《诗》《书》及《论语》等儒家著作来制造复辟舆论。针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李斯提出“焚书”的主张。他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不是秦国史官编写的历史著作都要烧毁，因为战国时期其它国家的史书和当代反动儒生的历史著作，必然是诽谤秦政的)。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即不允许私人藏诗书百家语。而所谓“百家语”，主要是儒家的著作。至于其它有用的书，如兵书等，不在此例。最近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就是历史的见证。

还有博士官职掌的儒家著作，留作反面教材，并未全烧)。有敢偶语诗书弃市(有人胆敢私下传播儒家著作，查获就要斩首)。以古非今者族(灭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负责搜查的官员，见到或听到违禁事件而不检举的，与犯法的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脸上刺字，送到北方去筑长城)”。秦始皇毅然决然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立即执行。这是在思想战线上对反动儒家的专政，是维护新兴封建制的自卫措施。

但是，书烧了，反动儒生人还在，他们是不会就此而死心的。前 212 年，以侯生，卢生为代表的一伙反动儒生和方士，又跑了出来，公开咒骂秦始皇。指责“法治”是“专任狱吏”，攻击中央集权是“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秦始皇勤于政事是“贪于权势”。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惟恐天下不乱。大肆攻击后就夹着尾巴逃跑了。这就迫使秦始皇不得不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把四百六十多个违反禁令，以古非今，造谣惑众，攻击新政权，进行非法活动的反动儒生“坑之咸阳”。

恩格斯说：“任何地方发生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当时的社会要求就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对反动复辟势力实行全面专政。“焚书坑儒”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秦始皇、李斯总结了秦王朝建立前后，政治思想领域里两个阶级反复斗争的经验后所采取的革命措施，是法家路线对儒家路线的一次巨大胜利。

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无不咒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实质上是攻击秦始皇的反复辟政策。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不斗他，他要斗你。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反动儒家不断掀起复辟浪潮，一再威胁年轻的封建政权。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退却、投降只会造成历史的大倒退。秦始皇对于反动复辟势力的挑战，迎头痛击、坚决镇压，对他们实行阶级专政，是完全必要的。只是由于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镇压不能彻底，还让暗藏的复辟势力赵高之流钻入心脏，秦始皇刚死就颠覆了秦王朝政权。

尊孔反法的林彪一伙，借骂秦始皇来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1962 年北戴河会议林彪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71 年炮制《“571”工程纪要》，咒骂我们党和国家是“执秦始皇之法”；林彪死党还高吟什么“竹帛烟消帝业虚”；以及刘少奇两次抛出《黑修养》；要害问题都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动的政治目的都是要从内部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蒋介石一伙，也在台湾咒骂秦始皇；苏修御用学者遥相呼应，大肆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什么“粗暴毁灭文化”，借以诋毁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反华、反共、反人民，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为他们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撑腰打气。

解放前夕，所谓“自由民主人士”就在攻击：“你们独裁”。毛主席回答：“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他们又攻击：“你们不仁”。毛主席回答：“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¹。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党又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要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们还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节 赵高的复辟政权和秦末农民大起义

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在他们残酷镇压屠杀人民群众之余，又装出一副伪善面孔，咒骂秦始皇暴虐，以致“二世而亡”。目的是贼喊捉贼，企图转移视线，掩盖自己的暴虐。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总代表的秦始皇，他的专政有两方面，对奴隶主贵族的专政是进步的，对劳动人民的专政是反动的，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作为地主阶级，就是要剥削压迫农民。例如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基于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发展了封建帝王的私欲，滥用人力财力，大修阿房宫，大造骊山墓，海上求神仙等，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一对矛盾，进入封建社会，同时就存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

作为地主阶级，能够剥削农民一石，决不剥削九斗九；但是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他和农民还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过渡阶段，斗争锋芒都是指向奴隶制，指向奴隶主贵族。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秦王朝担负起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的历史任务，继续实行“耕战”政策，以争取农民阶级的支持；秦始皇后期虽然滥用人力物力，但是对于农业劳动力还是采取保护政策，不随便发“闾左”，是从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的。所以在秦始皇时代，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固有矛盾，还没有最后激化到爆发革命的程度。只有在赵高篡政，积极建立奴隶主复辟政权的时候，才使矛盾转化或激化，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爆发了农民大起义。

赵高是赵国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因为“痛其国为秦所灭”，怀着刻骨的仇恨，立誓要为奴隶主阶级报仇，以至自己搞了“宫刑”，混到王宫里面去，当了一名太监，由于他惯耍两面派，就用法家的律令来教胡亥，当了他的师傅。赵高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赵高的父母都因犯秦法而被判重刑，他本人因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差一点被处死。由于他能说会道蒙蔽了秦始皇，又“复其官爵”，给予重用，以至管理皇帝的卫队和印玺，并起草机要文件。

当秦始皇巡游到沙丘时，因病重曾令赵高起草诏书，要太子扶苏赶快从前线回来准备后事。诏书已经封了，但还未发出，秦始皇就死了。由于诏书和皇帝印的玺都在他那里，就施展一系列阴谋手段，怂恿胡亥篡改诏书，“废兄而立弟”。与此同时，赵高又去拉拢李斯，用尽各种威胁利诱手段。要李斯同意他篡改诏书，责令太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太子，李斯当时本来有权力除去这个祸害，但是赵高威胁利诱的重点是扶苏继位后，一定用蒙恬代他为丞相，这一更换对他不会有好结果。这些话打动了李斯，从剥削阶级的私利出发，李斯妥协投降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终于得逞。

胡亥即位为秦二世，实权全部控制在赵高手里。立即实行血腥的反革命阶级报复，大杀法家路线的执行人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却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守边将军蒙恬、蒙毅也早被杀害了。同时对各郡县地方官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屠杀。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赵高当时向胡亥建议，要“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反动复辟路线。

赵高劝诱胡亥想方设法压榨农民，尽情享受。采取“头令箕敛”的办法，尽量搜括天下的钱财来填塞他们无穷的贪壑。胡亥叫嚣：皇帝的尊贵，就在于拥有天下的人力物力这份大家当，可以尽情享受，为所欲为（“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淮南子·兵略训》载：“二世皇帝，势为天子……

纵耳目之欲，穷侈靡(音米)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音篲)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

胡亥、赵高大规模“发闾左”，充戍卒，实质上就是使已经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重新沦为奴隶，这是革命农民所不能容忍的。这样倒行逆施，就激化了农民同赵高复辟政权的矛盾。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都是“闾左”的雇农。他们被征调到北方去充当戍卒，到了大泽乡，碰上火雨不能前进，计算行程，赶到戍守的地方已经超过预定的期限，按照秦法就应该斩首。他们盘算，去是送死，不去就地造反也是死罪。同样是死，起来造反还可以死里求生。于是就杀了带队的军官，拉起造反的大旗来。他们的豪言壮语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种子，老百姓就不能当吗？)这一问，反掉了剥削阶级的“天命观”，挺起胸膛来革命。

陈胜、吴广起义一声春雷，广大贫雇农都起来响应，很快就形成一支起义大军。值得注意的是陈胜的好友吕臣率领的“苍头军”，是一支奴隶起义军，所谓“异军苍头特起”。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革命不可能彻底，因此还留下若干奴隶制残余，特别是一些工商业奴隶主，又把一些破产农民置于人身依附和奴隶的地位。这种情况，到了西汉又在重复着，这些奴隶制残余，只有靠起义的农民和奴隶来继续扫荡。吕臣率领的“异军”，就是奋起扭断奴隶枷锁的“苍头”。他们起义后不久，陈胜不幸为替他驾车的内奸庄贾“杀以降秦”，苍头军“攻陈下之，杀庄贾”‘，除了这个内奸。以后苍头军转战南北，非常英勇，对扫荡奴隶制残余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起义军内部，也混进了一些奴隶主贵族，如武臣、张耳、陈余等。他们利用起义军的力量，去报父兄之仇，去搞分裂割据。武臣声称要到北方去“徇地”，陈胜分给他一部分军队，他到了邯郸，就自立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此后韩广自立为燕王，田儋自立为齐王，魏咎自立为魏王，这些地方复辟势力，后来都被农民起义军一扫荡。

孔丘的八世孙孔鲋也混进起义军队伍，他向陈胜极力鼓吹什么“兴灭继绝，以为政首”，要陈胜封六国之后，陈胜斩钉截铁地回答：“六国之后，吾不能封也”。

这一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农民起义军，在打击地主阶级统治的同时，不到三年就把赵高复辟政权送进了坟墓。以后继续扫荡地方复辟势力，为西汉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继续实行法家路线，打下了基础，开辟了

道路。历史事实说明，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中，反对奴隶制复辟的主要力量，也是广大农民和一部分尚未转化为农民的奴隶。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复辟奴隶制就要重新陷入最悲惨的境地，因此他们反复辟的行动最果敢，他们的革命性最坚定，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而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是剥削阶级，不可能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在反复辟斗争中，单凭自己的力量只会感到束手无策，而剥削阶级的私利也会使他们动摇、妥协、投降的，李斯就是典型。

当前，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批林批孔反复辟运动，是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行动。在党领导下，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站起来的各族广大劳动群众，深深懂得走回头路，吃二遍苦的滋味是什么；而且反复辟是为了保卫自己江山，巩固自己的政权，绝不是象历史上社会革命以至改朝换代，到头来是替其它剥削阶级打江山，让其它剥削阶级来盗窃胜利果实。’因此在当前反孔，反一切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广大工农兵是最坚决、最果敢的主力军。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沿着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斗争哲学，自觉斗下去，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四章 汉承秦制，在集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儒法斗争

坚持法家路线的秦始皇，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剧烈。秦始皇死后，赵高篡政，法家路线就告中断。秦末农民起义，摧毁了赵高复辟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开辟了道路。刘邦正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顺应历史潮流，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在“汉承秦制”过程中，工商业奴隶主还有相当大的残余势力；异姓和同姓诸侯王分裂割据局面又不断出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奴隶主贵族军事政权也相继侵扰；汇合成一股反动逆流。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又继续开展着。在政治路线上，表现为集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儒法斗争。

从楚汉相争时起，就有项羽等复辟势力和刘邦等进步势力之间的儒法斗争；刘邦建国后至景帝刘启时，又有统一和分裂的斗争；武帝刘彻时，在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制，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武装侵扰，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郡县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中，也贯穿着尖锐剧烈的儒法斗争；昭帝刘弗陵时，霍光、杜延年等组织盐铁会议，指使“贤良、文学”，大刮翻案妖风，妄图以儒家路线取代法家路线。汉高祖开国后，经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法家路线基本上得到了坚持。从元帝刘奭以后，由于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变了，社会矛盾变了，儒法两家代表的阶级变了，儒法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变了，就属于另一个历史时期。

第一节 人民群众的浴血奋战，荡涤了中央和地方的复辟势力，打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天下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赵高复辟政权，这是第一个回合。在起义过程中，那些“散处闾巷之间”，“欲复其宗庙”的奴隶主贵族残余，也伺机而动，

企图在推翻秦朝后恢复奴隶主故国。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

。他们怀着共同的阶级仇恨和政治目的，要“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对这些地方复辟势力，人民群众还要继续扫荡。

例如项梁、项羽叔侄，就是楚国的奴隶主贵族。他们的父、祖项燕，是楚国的大将，在对抗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兵败自杀。楚国奴隶主政权覆灭后，项梁叔侄逃亡吴中。陈胜、吴广起义，他们也跳了出来，杀掉会稽守，打起“反秦”旗号。他们招纳奴隶主贵族残余和儒生，作为地方复辟势力的骨干。

陈胜遇害后，项梁的谋士范增幸灾乐祸地咒骂：“陈胜败固当”。“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

。就是说，这些贱民撇开王侯将相的种子而自立，是注定要失败，成不了气候的。他又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所谓“楚人”，是指楚国的奴隶主贵族；所谓“三户”，是指昭、屈、景三家大贵族；楚南公所说，就是楚国贵族流传着的复辟誓言。他建议项梁：“今君(指项梁)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兴灭继绝”的反动复辟路线。项羽采纳了范增的建议，“乃求楚怀王孙心”，“立以为楚怀王”，来号召和组织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

项羽初次出兵，就暴露出奴隶主阶级进行阶级报复的残暴本性。“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攻下襄城，把秦将士和老百姓全都活埋了上项羽救赵攻降秦将章邯军，和他们挺回西路进攻关中，行至新安城南，“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当时刘邦已入关，做了许多安抚工作，关中已经大定，而后来的项羽，又“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这就是“因天下之力”，“报父兄之怨”，残害人民，来发泄其阶级仇恨的典型事例。

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目的都是要“成割地有土之业”，因此曾在项梁军麾下的一些人，各自据地称王侯，而且互争地盘，攻打不休。项羽入关后，“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一下就封了十八路诸侯王，自称“西楚霸王”。这些诸侯王中，有不少是六国旧贵族。这些“高悬霸主鞭”的“黑手”，只有靠千百万翻身奴隶“奋起农奴戟”，才能够把他们扫除。刘邦重建新兴地主阶级的

封建国家，不过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结果。刘邦出身农民(他的父母都是有姓无名，刘邦弟兄也是以排行“仲”、“季”为名字；他二哥刘仲，是在家种田的)，懂得农民的疾苦；又身为亭长(基层小吏)，懂得地主阶级的统治方法。开始起义，便得沛县，以肖何、曹参为首的全部县吏，以及吹鼓手周勃、狗屠户樊哙、布贩灌婴等，成为起义军的领导骨干。

他们是小私有者，在政治上也会向两极分化。刘邦爬上统帅地位后，变成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利用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重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但是，这支起义军的阶级基础和奴隶主贵族残余不同，他们从上到下都是坚持反对复辟奴隶制的。刘邦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坚持法家路线，顺应历史潮流，要前进，要革新，要集中统一，要“以战去战”，要巩固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要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起义军的各阶级阶层，各有政治目的。广大农民和一部分尚未转化为农民的奴隶，坚决反对重新回到最悲惨的奴隶地位，要求一个全国统一、和平安定的生产环境；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建立一个地主阶级专政的、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反对赵高复辟政权、反

对地方复辟势力的共同目标下，统一起来了。

为了争取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持，刘邦采取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也跟项羽大不一样。关中地区是秦王朝的根据地。历史上变法较彻底，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较强大，社会经济也较为发展。如何争取关中的民心，占有这块根据地，是刘邦的重大战略决策。刘邦受命西攻潼关入咸阳，直捣赵高复辟政权的老巢，到了宛城，秦朝的官吏闭城固守，刘邦派人招降，答应仍然用他们做地方官，就开门迎降。由此“引兵西，无不下者”。刘邦严明军纪，反复告诫将士：“诸所过勿得掠卤”，于是，“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入咸阳后，“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与秦人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把赵高复辟政权奴役、剥削人民的苛重法令一概废除。“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饗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赵高囤积的粮食还很多，军食并不缺乏)，不欲费(不想再增加百姓的负担)。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项羽西入咸阳，宰割天下的时候，刘邦被排挤到巴蜀汉中当汉王。项羽分关中为三，立三个秦降将为王，企图封锁刘邦。项羽“衣锦东归故乡”后，刘邦出兵袭击关中，在当地新兴地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没有费多大气力就取得这根据地。“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刘

邦多次溃败，“肖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著于服役役名册的)者悉诣军”，转漕运输，不绝粮道。全得秦人的支持，不断补充兵员和给养，屡次转弱为强，终于打败和歼灭了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刘邦的胜利完全是人民群众浴血奋战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

人民群众对六国旧贵族的地方复辟势力是深恶痛绝的。早在汉二年项羽和齐王田荣争夺地盘互相攻战时，“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项羽又“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院田荣降卒，系其老弱妇女”，“齐人相聚而叛之”。

。谁要复辟奴隶制，搞分裂割据，谁就是人民群众的死对头。楚汉垓下决战，项羽突围而出，“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哄骗)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

。说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西楚霸王”的痛恨。

刘邦则是决心要解决“天下纷争”的局面。入关后，就准备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肖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作为日后承袭奉制、建立统一政权的依据。汉二年九月，刘邦派韩信等定魏地，虏魏王豹，就不再封王，“置河东、太原、上党郡”。三年冬十月，韩信等击赵，“获赵王歇，置常山，代郡”。可见刘邦是积极推行郡县制的。三年十二月，正是楚汉之间展开剧烈争夺战的时候，有人建议刘邦“立六国后以树党”，刘邦曾一度动摇，想采用这个策略来孤立项羽，已经刻印准备分封；张良陈说利害后，“汉王辍饭吐哺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大骂献策的儒生几乎败坏了你老爹的大事！立刻把印毁掉。四年黥布，彭越反楚，韩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张良、陈平说汉王应当乘胜追击穷寇，不要再留下分裂战乱的祸根。才一鼓作气追歼了“西楚霸王”，完成统一大业。

刘邦是个大法家、在组织路线上“任人唯贤”，许多谋臣猛将都是从项羽阵营里分化出来的。而项羽“任人唯亲”，“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仅有一个范增也受到猜疑，含恨而去，最后成为“孤家寡人”，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特别对儒生的态度，项羽和刘邦，更是鲜明的对比。“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刘邦则“慢而少礼”，最鄙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代表儒生。他漫骂儒生是“腐儒”、“竖儒”，“为天下安用儒生”？初起兵时西过高阳，酈食其去求见，刘

邦正在洗脚，听传达说求见的人象个大儒，刘邦说，替我谢绝他，“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酈食其瞋目按剑，破口大骂，老子是高阳酒徒，什么儒生呀！刘邦听了回话，知道这个人有两刷子、不象个腐儒，立刻赤着脚去接见他。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刘邦鲜明的爱憎。

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首先发难，终于推翻了赵高复辟政权，扫除了项羽等地方复辟势力，对儒家思想也进行了猛烈的扫荡，这不仅对于重建集中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伟大意义，而且对于历代农民革命斗争和儒法之争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当时，没有奴隶起义和农民革命对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毁灭性打击，也就不可能有刘邦法家路线的胜利。因此，我们说新兴地主阶级的天下，是人民群众浴血奋战打出来的。

第二节 地主阶级局限性，在统一局面中又留下了分裂割据的缺口

楚汉在战略决战前夕，刘邦征调韩信、彭越等军事集团会战，他们迟迟不发兵，以致在固陵又吃了败仗。刘邦问张良：“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

。刘邦急于消灭项羽，不得不暂时妥协，封韩信为齐王，封彭越为梁王，他们立即出兵。歼灭项羽后，“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汉王为皇帝”，刘邦即位后，迫于当时形势，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但是，对于这些分裂因素，开始就有所戒备。歼灭项羽后，立刻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且调虎离山，改封为楚王。不久韩信谋反，刘邦伪游云梦，召韩信来朝，捆绑起来带回长安，贬为淮阴侯。当时田肯贺献策说：齐、楚两国远在东、南，土地辽阔，民物富庶，“非亲子弟莫可使王”。刘邦由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想用亲族子弟来捍卫汉王朝，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于是封刘贾为荆王，弟刘交为楚王，子刘肥为齐王。以后平定其它异姓诸侯王，又以其地分封同姓子弟。秦始皇所设三十六郡(后已增为四十余郡)，汉王朝直接控制的只有十五个郡。这就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留下很大缺口。

但是，刘邦从秦王朝的灭亡中，认识到中央领导集团的重要性。即位后继续重用肖何、张良等法家。刘邦病危时，吕后问他：“陛下百岁后，肖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

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刘邦知人善任，在中央政权中保留下一个法家领导集团，为此能够多次顶住恶风险浪。

刘邦死后的恶风险浪，在中央，有吕产、吕禄的阴谋篡权；在地方，同姓诸侯王也大搞分裂活动。

吕后当政后，也效法刘邦重用同姓诸吕来树立党羽，这是反动的。吕后死，诸吕欲为乱，中央领导集团中的法家周勃、陈平、灌婴等坚决顶住。周勃持一节入北军，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脱去右袖)，为刘氏左袒(脱去左袖)，军中皆左袒”，可见人心所向，是要统一，要安定。当时陈平、周勃等使人迎代王刘恒，谋立为帝。刘恒召集左右议论，有的认为陈平、周勃、灌婴等汉大臣都是高祖时的大将，会打仗，有智谋，很诡诈，看来他们不甘居人下，也想当皇帝。“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建议刘恒称病不要去，免得被一网打尽。宋昌力排众议，指出现在的统一局面是很难动摇的。“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就是说，谁要搞叛乱、搞分裂，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不听他调动指挥的。宋昌对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刘恒鼓起勇气到长安，做了汉文帝。

刘邦大封同姓诸侯王，留下分裂因素，带来一些战乱；但是，人民群众心向统一，经过多次斗争，终于平息了。西汉初期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为统一与分裂之争，法家的正确路线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取得胜利的。

在高祖、吕后执政期间，这些同姓诸侯王多数还“幼在怀妊”，高祖又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如规定诸侯王只管政，不管军，又由中央派大臣为丞、尉，掌握军、政实权，进行监护，因此问题还不突出；到文帝时，他们“大抵皆冠”，羽毛逐渐丰满，就颇有异志了。例如淮南厉王刘长，是高祖的小儿子。文帝三年入朝，就不把文帝放在眼下，擅自椎杀汉大臣审食其；归国后，“数上书，不逊顺”。“擅为法令，不用汉法”。赶跑了中央派驻的大臣，“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以其郎中春为丞相”；“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使人与闽越，匈奴相勾结，欲谋反。还有济北王刘居居，与大臣共诛诸吕，自以为功劳大，封地少，也积极策划谋反。这些诸侯王，实行的是一条儒家路线，因此，“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当时，法家代表人物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论形势，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说法。这“可为痛哭者”，就是指

诸侯王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他指出这种形势好象是人睡在柴堆上，火未及燃，还感到太平无事，起了火，就不可收拾了。他认为，分封诸侯王，不论是异姓同姓，不加以控制，这把火终归是要燃起来的。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大抵强者先反。淮阴(韩信)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韩王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在汉初异姓诸侯王中，仅有长沙王吴芮没有反，不是不想反，而是小国寡民不敢反。他总结出这条规律，建议文帝“割地定制”

，加强“权势法制”来削弱地方割据，巩固中央集权。具体的策略，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目前诸侯王浮肿膨胀，“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的局面扭转过来。文帝采纳他的建议，在平定济北、淮南后，把齐国一分为六，把淮南一分为三。

文帝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还有其他的强大诸侯王尚未触动。例如吴王刘濞，王有三郡五十三城，楚王刘戊，也拥有四十余城。景帝时，法家代表人物晁错，继承贾谊的思想，向景帝分析当时的形势，建议对大国必须削地削爵。他敏锐地指出，在地方割据势力中，吴王刘濞收罗了一大帮子害人虫和孔孟之徒作为党羽，和工商业奴隶主相勾结，采铜铸钱，冶铁为兵，煮海为盐，积极准备造反的经济和军事条件，制造反革命舆论，野心最大最危险。建议立即采取行动，“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他的父亲从河南禹县赶来说，你提这样的建议，“刘氏安矣，晁氏危矣”。晁错坚持法家立场，不顾个人安危，还揭发曾经在吴王手下当过丞相的袁盎不是好人，刘濞送给他很多钱，双方勾结得很紧。

不久，刘濞联合楚、赵、胶西、济南、菑川、胶东等国，发动了七国叛乱，并与匈奴、闽越、东越等少数民族奴隶主申连，共同发兵。打出的旗号是“诛晁错，清君侧”。袁盎连夜去见景帝，说形势很危险，只有把晁错杀掉，才能使诸侯罢兵。袁盎用这个反革命策略，把晁错杀了，但七国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邓公从前线归来谒见景帝，景帝问他：诸侯听到晁错已死，是否罢兵？邓公说：“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毛主席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

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是奉此至宝。在《“571 工程”纪要》中，叫嚣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打击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完全继承了刘澜的衣钵。“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识别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

七国叛乱，是祖国统一过程中的又一个逆流，是不得人心的。秦末楚汉相争，历时五年，重新统一了全国，“黎民得离战国之苦”。这个统一，来之不易。“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同疲)转漕”，“天下匈匈数岁”。汉高祖即位不久，反击匈奴还师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经过战乱，三万多户的大县只剩五千户，残破的情况可以推知。因此，人民群众渴望统一，渴求安定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消灭项羽复辟势力不久，就有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大军阀韩信只身被缚，他所属的广大将士却按兵不动；彭越、黥布也是一代枭雄，但一竖反旗就顷刻瓦解。破坏统一的行为总是要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的。吴楚七国之乱，仅仅吴国就发兵二十余万。开始，其势汹汹，景帝派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①，不到三个月，下邳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吴王率数千人走依东越，为东越所杀。吴王发兵前，曾亲自串连胶西王，“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承一帝，至乐也。今大王与吴西向，第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始结”。胶西群臣预见到，即使叛乱成功，接踵而来的一定是无休止的内战。当然，这种内战，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的。因此，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主力军还是人民群众。

第三节 汉武帝坚决实行法家路线的历史功绩

汉高祖迫于形势，暂封异姓诸侯王，出现一系列叛乱；又错误地总结经验，众建同姓诸侯王，自以为汉王朝有了屏障，但是又出现一系列叛乱。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只是过渡的办法。汉武帝积极推行郡县制，大力加强集中统一的中央政权，才是较为彻底的办法。唐代柳宗元总结西汉初期的经验教训：“有叛国而无叛郡”，是很深刻的。

汉武帝不仅在中原积极推行郡县制，在边疆民族地区，也积极推行郡县制。他不仅要消除内地区分裂割据的因素，还要消除边疆民族地区分裂割据的因素。他切实执行“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统一路线，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秦、汉大一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开辟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当然，这不是由于秦皇、汉武个人的“雄才大略”，而是这条路线符合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结果。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出现了汉武帝这样的法家代表人物，适应历史发展，起了进步作用，他的历史功绩，是要加以肯定的。

作为地主阶级头目的汉武帝，在实行法家统一路线时，还是有他的阶级局限性。他的中央集权，除对奴隶主复辟势力专政外，还要对人民群众实行专政。他把郡县制推广到边疆，也不可能正确解决民族矛盾。但是，“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我们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肯定汉武帝的历史功绩的。

武帝在位的时间较长(公元前140——前87年)，共53年，16岁做皇帝，活了69岁，进行和完成了几件符合人民愿望的大事。

一、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促使长期分裂的中国逐步形成一个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个

景帝平定七国叛乱后，诸侯王、列侯还有相当的力量，同中央集权的矛盾仍然严重。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即在诸侯王死后，把国土分封给他所有的子弟，使他们皆大欢喜，其国势不削自弱。这些侯国统归州郡管辖，这样王国越分越小，中央的辖区(郡县)日益扩大，分裂割据的威胁就逐步消除了。接着，武帝又借列侯献金助祭祖庙的黄金分量不足，成色不好为理由，一次就废掉了列侯一百零六人。武帝又设刺史官，除考察检举不法的豪强、郡守外，还要考察国王，有罪的就上报，给予“除国”等处分。武帝的子女功臣也可以封王封侯，但不允许拥兵割据，只能够“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这种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大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武帝又把全国分为十三州，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三老、亭长、里魁，形成了一整套的统治体系。中央政令可以一竿子插到最基层。这样的国家，决不是古代西方的“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而是一个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体。这就为多民族的中国确定了共同的地域，促进了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发展。正如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指出的：国家在以农业为根本的前提下，广开工商业，制作舟楫，牛马车拉，发展水陆交通，把全国边远腹心、山区坝区、川河湖海的自然资源和工农业产品，汇集到大小都市，农工商贾，各取所需，全面发展生产，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整体。武帝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又注意全面发展农、工、商、交通事业，为多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这就是汉武帝加强和巩固集中统一的中国的重要历史意义。

二、改革财政经济制度，奠定集中统一和抗击匈奴的物质基础

汉武帝首先改革币制，严禁郡国和私人铸钱，由政府铸造五铢钱作为唯一合法的货币。又将过去被地方割据势力和工商业奴隶主所控制的盐、铁、酒等重要工商业收归国家专营，沉重地打击了这些反动势力，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

汉武帝对工商业奴隶主的打击，以“算缗”(音民)、“告缗”事件为最突出。汉武帝颁布“算缗令”，让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自报资产，以便征收赋税。可是这些人多隐瞒不报。汉武帝又下“告缗令”，对隐瞒不报或报而不实的，奖励告发，查实后，当事人戍边和服劳役，财产一半没收，一半奖给告发人。结果，政府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没收的田地，“大县数百顷(百亩为顷)，小县百顷余”。中等以上的工商业奴隶主和高利贷者，大多破产了，对进一步荡涤奴隶主残余势力起了重大作用。

武帝还设置“均输”(掌管运输的官)、“平准”(调节物价的官)等庞大的官营商业网，命令郡国每年交给中央的贡赋，不再运送实物，而是折钱交纳，附加运输费；再由均输官在低价地方买进货物运送京师，由平准官调节价格

出售。实质上就是统购统销，平抑物价。这个官营商业网，遍布全国，各地货物借政治力量得以大量流通，政治力量也因货物流通而愈益加强。

三、坚决反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武装侵扰

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古代北方的匈奴，是多民族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毛主席还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上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是经常不断的。匈奴奴隶主对中原各族人民的侵扰，殷周以来就很频繁。秦末到汉初三四十年间，匈奴族在大奴隶主冒顿单于统治下，武力达到空前未有的强盛。匈奴奴隶主武装都是剽悍的轻骑兵。他们作战不需要庞大的辎重后勤部队。每当秋高马肥，他们就闯进中原烧杀抢掠，毁灭城市和村庄，成年男女都被掠夺去当奴婢，破坏性很大。因此，匈奴和西汉的矛盾，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和中原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和新兴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1 年)，刘邦曾经结集主力部队迎击匈奴奴隶主的大规模武装侵扰，冒顿带领精兵四十万骑，把他围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境内)七天，几乎被俘。以后汉王朝不敢再打进攻战，一直采取“和亲”政策，企图以隐忍换取边境的暂时安静。但是妥协退让只能够助长匈奴奴隶主的气焰，他们“百约百叛”经常袭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西汉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指出“匈奴嫚嫚(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说了许多下流话侮辱她)侵掠”，“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今不猎猛敌，而猎田鼠”，“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可为流涕者此也”。建议文帝不要妥协退让。

为了保护先进的生产关系，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进行了一系列的备战措施。例如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实行“募兵备边”政策；并移民屯垦，筑城防卫；又大力提倡民间养马，建设骑兵部队。武帝刘彻处在封建制上升阶段，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又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有进行决战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从而作出反击匈奴奴隶主武装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符合中原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的。

公元前 133 年，武帝派人诈降匈奴，引诱它的主力深入掠夺，汉军三万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县)山谷中。不料计谋泄露，即将进入埋伏圈的匈奴

主力迅速撤退。从此西汉与匈奴展开了长期频繁战争。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役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127年，将军卫青率大军自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向西迂回，击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秦时曾经设置郡县的河套以南地。第二次前121年，将军霍去病自陇西两次出击，斩获匈奴四万余人。同年匈奴浑邪王杀了休屠王，率领数万人来投降，安置在塞外五郡。又在河西建立了四个郡，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走廊。第三次是在前119年，武帝大发士卒，由卫青、霍去病率领，分道深入漠北，捕捉匈奴主力。这次大战，匈奴死人八九万，单于率数百骑逃走，不敢再在漠南立王庭。汉军虽然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汉胜匈奴败的局面却最后决定了。

四、执行法家的统一路线，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郡县

汉武帝在西北、东南沿海、南部和西南等边疆民族地区积极经营开发，先后设置郡县，和内地一样看待，大破儒家把这些地区看成是“化外”的反动路线。

特别是汉武帝对于西南边疆的经营，和我们云南的历史关系最密切。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汉代称为“西南夷”，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的部落和部族。他们和内地各族人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早已形成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战国末楚国的农民起义领袖——和柳下跖齐名的庄骄，率领起义军来到云南，改变服装和风俗习惯，逐步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被推为滇池地区的滇王。秦始皇时，曾在云、贵、川接合部设置了一些郡县。楚汉相争期间，停派郡县官吏。汉初在今四川宜宾、雅安设置关市管理巴蜀与“西南夷”间的贸易。但由于“西南夷”的奴隶主们“自王故地”，不断侵扰内地郡县，又和四川的工商业奴隶主互相勾结，贩卖奴隶。《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南御滇棘、棘僮”，即南面役使滇棘族的奴隶。又《史记·司马相如传》：“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纍号泣，内响而怨”。说的就是贩卖奴隶的情况：把云南少数民族奴隶捆绑起来送往四川，远离父母和家乡，全家大小号泣。他们本来是心向内地的，这样做就加深了民族隔阂。而四川工商业奴隶主（“即铁山鼓铸（在铁山上开矿冶炼），运筹策（盘算怎样做生意，才能赚大钱），倾滇蜀之民（把铁制品高价倾销给滇蜀各族人民），富至僮千人（大工商

奴隶主拥有奴隶上千人)”。所有这些，都是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汉武帝在经营南粤时，就注意到必须开发这些地区。

武帝先后派遣唐蒙、司马相如修两条路：一条为“南夷道”，从四川宜宾沿滇东北修到曲靖，通往贵州东部和滇池地区；一条为“西夷道”，由成都通往西昌、会理。沿路置邮亭，工程很浩大。在原来的边寨地区撤除了关卡，便于边疆、内地各族人民的交通往来。对愿意归顺汉王朝的“西南夷”君长，多给金帛赏赐；不听招抚的，他用武力镇压。在此基础上，先后设置七个郡；在今云南境内的，有益州郡全部和群柯、越嵩、犍为等郡的一部分。在澜沧江以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设置郡县。

在此以前，武帝先后平定瓯闽粤少数民族奴隶主的叛乱，在今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设置了郡县。其重要意义，是破除了孔家店设置的华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大界限(所谓“华夷大防”)，实现了荀子所主张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法家的统一路线，沟通了边疆和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多数民族结合”，形成了“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也有民族压迫的一面；但在设置郡县的过程中，内地军民大量到边疆，其中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又和当地各族劳动人民结合，逐步自然融合。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同呼吸，共命运，结成深厚的战斗友谊以至“恩，若骨肉”的情谊。据西晋人常璩编写的《南中志》(即云南地方志)记载：内地汉族人民来到云南，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通婚，民族语言称为“遑耶”，即打亲家。少数民族内部通婚，称为“自有耶”，即自己的亲家。内地人民遇到兵祸或犯了法，就跑到少数民族亲家那里躲藏起来。有些汉族劳动人民受到官府的危害，少数民族亲家就聚集本族人民攻杀贪官污吏，替他们报仇。汉人和少数民族人民交情最厚的，称为“百世遑耶”，就象骨肉兄弟一个样。这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形成的过程。

第四节 汉武帝在执行法家路线过程中尖锐激烈的儒法斗争

汉武帝执行法家路线，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尖锐激烈的儒法斗争的。他初即位时，只有十六岁。当时崇尚儒术的外戚窦婴、田蚡等掌握着国政。窦、田把孔孟的忠实信徒董仲舒找来，奏对“举贤良对策”，“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其实这些都是窦、田导演的。武帝亲政不久，董仲舒“著《灾异之记》……有刺讥。……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时为建元六年(前 135 年)，武帝即位后六年，时年二十二岁。可见武帝对诽谤法家路线的董仲舒，是持严厉态度的。又在武帝初即位时，窦、田死党丞相卫绾上奏疏，说当时各国选送来京的“贤良”中，有一些是学申不害、商鞅、韩非等法家之学的，这些人会搅乱国政，必须严格清洗。当时在窦、田操纵下，年轻的武帝不得不批准；但在亲政后，并不采纳他的建议。《汉书·卫绾传》说，他当了几年丞相，不过是摆样子，吃闲饭，没有丝毫兴建。因此，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笔账应当挂在“隆儒术”的窦、田身上，和年轻的武帝是不相干的。但武帝亲政后，认为在加强集权专政的同时，有必要用一些儒术来装点门面，所谓“缘饰以儒术”。因此起用公孙弘为三公，封平津侯，不过是装装样子。武帝的具体实践，则是坚决执行法家路线。

武帝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充满着尖锐激烈的儒法斗争。当时儒法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下面几个问题上。

一、在国家政权上，统一和分裂的斗争

这是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继续。景帝平定七国叛乱后，一些诸侯王还要作垂死挣扎。其中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阴谋活动最厉害。刘安招揽了许多儒生、武士并且和刘赐等相勾结，不仅要搞分裂割据，还想篡夺中央政权。刘安也和吕不韦一个样，先造反革命舆论。那些孔孟之徒为他编了一部《淮南子》，也是以“杂家”的标签出笼，其核心恰恰是继承《吕氏春秋》¹。元朔元年(前 122 年)，他们的阴谋暴露，武帝坚决镇压，诛杀了他们的党羽几万人，其中当然包括了颇大一部分儒生。并公布他们的罪状，说淮南、“修文学”(即招揽儒生制造反革命舆论)、“流货赂”(即聚敛造反的物资，并用重金贿赂外戚武安侯田蚡等中央大员，企图里应外合)、怵于邪说，而造篡弑”(即被一些邪说诱惑，进行篡权夺位的阴谋活动)。说明武帝时在国家政权上，统一和分裂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

二、在经济命脉上，官营和私营的斗争

这是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发展。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并且为反击匈奴、统一全国筹措经费，采取了一系列中央掌握经济大权和经济命脉的重大措施。这是中央集权的物质力量，也是反击匈奴、统一全国的物质力量；对进一步加强全国经济的联系性，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执行这些经济政策，对地方割据势力，对工商业奴隶主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于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转移到经济政策方面来；当然，最终目标，还是争夺政权，还是由哪个阶级来专政的问题。

复辟派改变手法由经济政策开刀，无例外地都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董仲舒就大讲什么，古代向人民征税，不超过收入的十分之一，税率很轻，也就容易供奉；役使民力每年不过三天，也就乐于服役。他一面颂古非今，一面又借古讽今，大骂秦始皇从法律上承认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以及国家垄断山林川泽资源、和官营工商等政策，建议武帝“薄赋敛，省繇役”，一句话，就是建议中央不要和诸侯王以及工商业奴隶主(他们所谓的“民”)争利。公孙弘唱的也是一个调子。甚至在元封元年(前 110 年)天小旱，公孙弘叫嚷要把参与制定和执行这些经济政策的桑弘羊拿来“烹”掉，天才会下雨”。武帝对这些腐儒的胡说八道，不过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掌握财政实权的人，态度就大不相同了。曾经担任“大农”(财政大臣)的颜异，对这些新经济政策，私下颇有议论。有一次，武帝出了个点子，要把诸侯王剥削人民的赃款挤一点出来作为反击匈奴的经费，规定在祭祀宗庙时，他们供奉的玉石，要用一张汉王朝特制的“鹿皮币”包裹，这张“币”要收四十万钱，玉石的价值不过几千钱，颜异就当面反对，说是本末倒置，武帝很不高兴，就叫职掌司法的张汤把他攻击新政的私下议论收集起来；落实这个实权派阳奉阴违、攻击法家路线

的罪证后，就把他杀了。还有一个惯于投机的畜牧业大奴隶主卜式，他在王朝财政困难时，主动请求捐献若干财产作为边防费；武帝问他是不是要做官，他假惺惺地说是为了打匈奴。接连捐献几次，官就做大了，做到位居三公、很有实权的御史大夫，这时就露出狐狸尾巴来，攻击新经济政策，武帝毅然决然把他贬为太子太傅，叫他靠边站，吃碗闲饭，同时把桑弘羊提拔起来做“治粟都尉”(粮食大臣)兼“大农”(财政大臣)。

三、在匈奴侵扰问题上，反击和妥协的斗争

如何对付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孔孟及其徒子徒孙，无例外地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的苟安、偷生、妥协、退让的所谓“怀柔”路线，而法家则是执行坚决抗击的“诛暴强”路线。

早在元光年间(前134—129年)，武帝开始反击匈奴奴隶主武装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主父偃都上书切谏。徐乐用“土崩瓦解”来威胁，说抗击匈奴必然要劳民伤财，将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天下大乱。严安说秦始皇“欲肆威海外(当时秦王朝控制的疆域以外)”，“北攻胡”，“南攻南越”，以致民不聊生，“天下大叛”。还认为武帝兴兵抗击是“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主父偃上书说九件事，第一件就是谏伐匈奴。但他后来转变立场，在前127年，将军卫青反击匈奴，收复秦时曾设置郡县的河套以南地区时，积极建议置朔方郡，募民十万口筑城、屯田实边。公孙弘又多次延争，请求武帝不要“罢(音义同疲)敝中国(中原)以奉无用之地”，武帝就叫朱买臣提出十条置朔方郡的理由和公孙弘辩论，他一条也不能答辩。只好服输说：“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山东无知的人，不懂得置朔方有这样多的好处)。这个孔孟的信徒兼孔孟的老乡，以后就不敢再说了。

汉武帝作出反击匈奴奴隶主武装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和周密考虑的。当时的形势，第一、匈奴奴隶主武装侵扰几十年，严重威胁中原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进行反击，是符合中原各族人民的愿望的。表现在历次战役中，全体将士的昂扬斗志。例如李广多次深入匈奴腹心，孤军奋战，上下一心；卫青、霍去病远出塞外千余里，捕捉匈奴主力，无所畏惧；武帝为霍去病盖了几大院房子，在他回来休整时，要他去住新宅第，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第二、文、景以来已经作了不少应战准备；武帝又制定和推行许多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有进行决战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对于敌人，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不斗他，他就斗你，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当然，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作克敌制胜的充分准备，要分析形势，选择决战的有利时机。武帝曾经和卫青说：汉家初建国，许多事都在草创创造的阶段，加上边疆民族不断侵扰中原，我不变更制度，后世就无法可守；不出兵征伐，天下得不到安宁。这样做不得不劳民，结果后代又象我这样做，那就要蹈亡秦的覆辙了。这番话，有他的英雄史观，但也说明他对敌我形势作过

充分估计，而不是轻率决策的，所以他能够力排众议，下那样大的决心，也表现了法家的崇实精神。

儒家路线的出发点则是“边疆无用论”，“抗击必败论”。主张效法五帝、三王，“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用仁义道德来怀柔感化侵扰中原各族人民的边疆少数民族奴隶主，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来归顺）。武帝痛斥这条用仁义道德来装饰的妥协退让路线。元朔五年（前 124 年）下诏书，首先批驳孔孟之徒“法先王”的谬论，说“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繇（音义同由）殊路（即他们走的路子是各不相同的）”。接着转到主题，指出“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是当前的“急务”（主要矛盾），表明坚决反击的决心，来堵塞儒生之口。但事关路线斗争，这个“口子”是不容易堵塞的。

当武帝反击匈奴，已经取得很大胜利，匈奴奴隶主想喘一口气，派人来请求“和亲”。武帝就召集群臣议论。博士狄山说：“还是和亲好”！武帝问他好在那里。他就大骂“兵凶战危”，现在中原已经空虚，边民大困，再打下去，就要重复高祖被围困的历史。武帝又问法家张汤，该怎么办？张汤就骂狄山：“这是愚儒的无知妄言”！狄山顶他：“你说我愚，我是愚忠，你是诈忠”。武帝很生气，就问狄山：“派你去守一个郡，能够使匈奴武装不来侵扰吗”？狄山慌忙回答：“不能”；又问：“守一个县怎么样”？回答“也不能”；再问“守一个碉堡怎么样”？狄山考虑，再说不能，就要治罪了，只好硬着头皮说“可以”。于是就派他去守一个碉堡。守了一个多月，匈奴武装就来把狄山的头割去。充分说明真正空虚的不是中原，而是这群讲道德、说仁义的儒生；也充分说明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和可耻下场！

四、在边疆民族问题上，“化内”和“化外”的斗争

“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 1951 年复西北各民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的电报中所指出的。

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主要是孔家店在边疆民族问题上，一贯实行民族压迫歧视和民族分裂政策，孔丘的“春秋大义”，有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即把华夏族（即汉代以来的汉族）看成“自家人”，而把少数民族污蔑为和禽兽一样的“蛮貊夷狄”，在族称上都要加上“虫”、“犬”等侮辱性的偏旁，把边疆民族地区都看成“化外”，就是不可以教化，不同于中原的地区和人民。其罪恶目的，是用“华夷界限”来代替阶级界限，借此分裂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劳动

人民，掩盖各族劳动人民之间阶级弟兄的关系，欺骗他们互相歧视、敌视，反动统治阶级就可以“分而治之”。这是制造民族分裂的最阴险毒辣的反革命策略，被孔家店的徒子徒孙和一切反动派继承下来。

汉武帝统一中国，在边疆民族地区是设置与内地相同的郡县？还是保持各部落、部族各自独立的状态？是实行荀子提出来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化内”路线。还是实行孔孟主张的“不与同中国”的“化外”路线？’在武帝经营边疆民族地区时，也展开了尖锐激烈的儒法斗争。

一是粉碎田蚡、刘安谏阻开发瓯闽粤的斗争。瓯闽越是百越族的分布地区，“其民”与内地“鸡犬相闻，田畴相入，市贾相易(互相交易物产)，婚姻相通”，“其地”与内地“股掌相属(四肢和躯干连属在一起)”；是我国南方“山围海绕”的“海内之壤”。汉初立秦将赵佗为南粤王，闽粤旧贵族无诸为闽粤王，王摇为东海(东瓯)王。他们与汉王朝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各据一方，互相攻击，不时侵扰邻近郡县，勾结内地诸侯王复辟势力，牵制抗击匈奴的战争。因此，要不要削平瓯闽粤奴隶主割据势力，改置郡县，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统一国家的大问题。

但是，“好儒术”的太尉田蚡和“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的淮南王刘安，利用汉武帝即位未久，“年方二十”，妄图用儒术来统治天下。他们搬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破烂，把瓯闽粤说成是“无用”的“弃地”，散布开边置郡“得不偿失论”，妄图保持这些地区的奴隶主统治。

公元前138年，闽粤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田蚡跳出来：说：粤地从秦末就抛弃了。越人相攻击，是经常发生的事；他们臣属中原王朝，又屡有反复，不足以劳烦中原兴兵去救。中大夫严助立即驳斥：现在小属国遭到灾难前来告急，天子不去拯救，他们还能够到那里去申诉？王朝不理睬，又“何以子万国乎”？所谓“子万国”，意思是对待中国版图内各少数民族，要象内地人民一样对待他们，坚持“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法家路线。汉武帝愤怒地谴责田蚡说：“太尉不足与计”！（太尉尽说些荒谬话，不配商议国家大事！）立即派严助发兵去制止了这场混乱。

在东瓯事件后三年(前135年)，闽粤王又兴兵侵入南粤，南粤王向汉王廷告警，武帝派兵去制止。这时，与田蚡勾结的刘安又跳出来横加阻挠，说什么“两粤是化外之地”，是断发文身的蛮夷，不可以用汉家的法度来治理他们。他认为“得其地不可为郡县”，主张“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能够向王廷称臣纳贡就可以了。如果发兵救援，为了夷狄而疲弊中原，“不足

以偿所亡”(得不偿失)。武帝早已识破刘安和两粤勾结,想搞叛乱复辟的野心,不加理睬,径行出兵,没有攻打就制止了这场战争。事后武帝派严助去训斥刘安,他不得不假惺惺地承认自己“妄意狂言”。

汉武帝经过这两次与儒家的斗争,确立了开发南方的政策。因此在击溃匈奴后,便开始消灭瓯闽粤的割据政权。前113年,武帝使人说南粤内属,同内地诸侯王一样行使汉法(即推行封建制的法律)。次年南粤相吕嘉杀其王(愿意内属的)及汉使者,坚持地方割据。武帝发五路兵击南粤,吕嘉败死。前111年,在其地设南海、苍梧、鬱林等郡。东汉进步思想家王充说:“吴为荒服(边疆地区),越为九夷(民族地区),今一夏服(都归入华夏即汉王朝的版图,与汉为一家)”:。王夫之评刘安谏伐南粤事说:“越(粤)之不可不收为中国有也,天地固然之形势也,即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刘)安挟私以讦(毁谤)武帝”,“不问而知其情”,“岂有忧国恤民之心哉”!一针见血地揭破了刘安搞分裂、割据、复辟的阴谋。

二是粉碎公孙弘等人“盛毁西南夷无所用”的斗争。汉武帝在开发“西南夷”过程中,曾不断受到来自儒家的攻击和阻挠。当唐蒙率领军工、民工修筑“南夷道”时,派公孙弘去视察。他回到长安后,就“盛毁”(大肆诽谤)开发“西南夷”毫无用处,这样做是劳民伤财。武帝叫朱买臣和他辩论,公孙弘理屈词穷之余,还要坚持请“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当时正在和匈奴决战,武帝就把经营西南的事停了几年、。

无独有偶。当汉王廷上展开要不要开发“西南夷”的大辩论时,地方上也龟鸣鳖应。以从“西南夷”购买奴隶而发家致富的巴蜀工商奴隶主们,都纷纷起来攻击汉武帝的开边政策。当司马相如奉使巴蜀时,他们纠集了“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七人包围汉使,咒骂这样做是割内地人民身上的肉去喂胖那些蛮夷,疲敝自己的根据地去经营那些毫无用处的“化外”地区。他们主张,天子对边疆民族地区只能采取“羁縻”政策。

所谓“羁縻”,就是用络头把牛马拴起,即孔家店对待少数民族的反动政策。其实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征服者一方面允许被征服者继续保持原来的生产方法,一方面以获得贡赋为满足”。这些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敏感性很强,认为边疆民族地区设置郡县后,统一用汉家的法律,买卖奴隶就很困难了;当地社会经济一发展,奴隶来源就枯竭了。他们在内地要想“兴灭继绝”,全面复辟奴隶制,希望已经很微弱,就想方设法保留边疆地区的奴隶制,作为

进行复辟的根据地。这种“羁縻”之治，沿及后代发展成为反动黑暗的土司制度，是造成边疆民族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

第五节 盐铁会上大刮翻案妖风

汉武帝死后，昭帝刘弗陵即位，只有八岁，大权掌握在崇尚儒术的大将军霍光之手。他力图改变法家路线，实行儒家路线。经过几年准备，伙同党羽杜延年，到处网罗孔家店的牛鬼蛇神，用马车从各地拉了六十多个所谓的“贤良、文学”来，借口访问民间疾苦。他们策划组织一个辩论会，要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法家路线、方针、政策的桑弘羊去当箭靶子，其罪恶目的，是想通过对桑弘羊的攻击，全盘否定汉武帝的历史功勋，否定法家路线的胜利成果，否定在执行法家路线中的一切新事物，大张旗鼓地为孔孟之道翻案，从而改变法家路线为儒家路线。

这是一场壁垒森严、旗帜鲜明的儒法大论战。桑弘羊紧密结合现实斗争，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和拥有权势很大的黑后台的“贤良、文学”进行斗争。他用铁的事实把这些“贤良、文学”驳得体无完肤。他们种种强词夺理，掩盖不住法家思想的光辉。这些孔孟之徒在理屈词穷之余，就使用卑鄙手段杀害了桑弘羊。

论战的焦点仍然是武帝时代的那几个问题。他们选择的突破口是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新经济政策。从表面上看，攻的是经济问题，实质是要从根本上推翻中央集权制的物质力量，全盘否定武帝时代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达到复辟、分裂的罪恶目的。

他们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拍出孔孟“义利之辨”的破烂，咒骂集中统一的封建王朝“与民争利”，搞得“国富民穷”。桑弘羊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阐明自己反孔尊法的政治立场，理直气壮地说盐铁官营是为了“排富商大贾”，“绝并兼之路”，是为了抗击匈奴，是“有益于国”的。如果废除，就会损害了中央，便宜了地方割据势力。结论是“国家大业不可废也”。

贤良、文学所谓的“民”，就是那些搞地方割据，私自铸钱、冶铁、煮盐，聚积力量，阴谋叛乱，搞分裂、复辟、倒退的诸侯王、豪强、工商业奴隶主。他们要中央集权的汉王朝“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就是要让被推翻的奴

隶主阶级“恭喜发财”！就是要从政治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全盘复辟分裂割据的奴隶制！

这就看得很清楚，现代中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以至苏修叛徒集团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他们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与民争利”，也是搞得“国富民穷”。其险恶用心，和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及其黑后台一模一样。1959年彭德怀一伙大反“三面红旗”，大叫什么“得不偿失”，攻击人民公社“办糟了”；1966年刘少奇大叫要“三自一包”，要给“农民”“四大自由”；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之流也诬蔑我们“吃大锅清水汤”，“两个人穿一条裤子”；71年林彪一伙攻击我们是什么“国富民穷”，“缺吃少穿”；如此等等。他们也要“为民请命”，就是为地富反坏右请命；他们也要无产阶级“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就是要让地富反坏右“恭喜发财”。他们也是从经济问题上开刀，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瓦解社会主义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又打出孔孟“贵以德而贱用兵”的旗号，攻击抗击匈奴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根本不应该打。全怪几个“好事之臣”在武帝面前无事生非，惹起了成祸。桑弘羊用历史事实驳斥这些无耻谰言说：匈奴人强马壮，经常侵扰边境。文帝时进入肖关，烽火通到甘泉宫。

“群臣惧不知所出，乃请屯京师以备胡”。“故先帝(武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魄，仅以身免”。“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境为蔽扞也”。就是说，包括你们这些颠倒黑白、鼓唇摇舌的“贤良、文学”，能够高枕无忧，还在这里讲风凉话，完全是边民百战的结果。

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抗击匈奴奴隶主武装侵扰的正义战争，是关系到中原各族人民安危的自卫战争。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是武帝坚决执行法家路线的结果。在抗匈战争中，匈奴地区的各族奴隶被解放出来，摆脱了被奴隶主绝对奴役的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社会成员，是历史上一大进步；打垮了奴隶主武装后，在他们搞分裂割据的地区设置了郡县，也统一到中国的版图里，同样是符合这些地区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愿望的。这些土地和人民，一直是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以内的神圣领土和各族人民，是决不容许任何敌人窥伺侵略或搞分裂活动的。

在盐铁会议上，围绕边疆民族问题，也开展了大论战。代表奴隶主残余势力的贤良、文学，攻击武帝经营瓯闽粤和“西南夷”，使荆楚、巴蜀人民疲敝不堪。胡说什么那些“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必为它操心。又说什么从来没有听过疲敝华夏的人民来伏侍夷狄的。桑弘羊义正词严地痛斥儒生的谬论说：中国与边疆，就象肢体和腹心的关系。如果外面的肌体受害，内部的心脏有病，就会互相为害，而不是互相为助。牙齿失去嘴唇的保护，就会感到寒冷；肢体受了创伤，也会影响心痛。没有手脚身体就残废了，没有边疆内地就会受害。桑弘羊从这个整体观念出发，指出必须以内地的肥饶来调济边疆的贫困，边疆强了才能够保护内地的安宁。这样做，国家才能够平安无事。

“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的具体内容，即在边疆设置的郡县称为“初郡”，采取“勿赋税”以减轻负担的政策。派到边疆郡县的官吏，其俸禄一律由内地供给，不在当地征派。为了巩固边疆的郡县制度，促进经济文化发展，汉武帝承袭秦始皇移民实边的措施，招徙内地豪强带领许多汉族人民到“西南夷”地区屯戍垦荒，屯垦收入的粮食供给当地驻守和修路的吏卒，而在长安支付粮价。

东汉进步思想家王充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西南夷”由“化外”变为“化内”，在周朝边疆民族要通过几次翻译才能与中原相通，现在能够读汉文典籍的已经很多了。又说：“儒者称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汉兴以来未有太平，……此妄言也”。清人王夫之对于孔孟之徒“劳民伤财论”的毁谤，也给予有力的批判。他说：从一时的利害来看，是会增加当时人民的负担；但是从长远的利益来看，边疆巩固后，各族人民就受益无穷了。

法家在封建制上升时期，虽然能够提出比较进步的边疆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民族歧视，但封建制毕竟是剥削制，不可避免地要保持民族压迫制度。如在元封二年(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前111年，“诛且兰、邛君，并杀宿侯”等。在削平割据称雄的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也受到残害；设置郡县后，贪暴的边官进行掠夺式的刮削，这是阶级社会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只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够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族团结政策，真正做到“四海之内若一家”，这也是我们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是为消灭“人对人的剥削”，“民族对民族的剥削”而创造条件的

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奴役其它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无产阶级要在全人类的解放中解放自己，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宣布永远结束民族压迫制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①。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内地支援边疆，过去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做，力求边疆民族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工业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成为反帝反修的铜墙铁壁。

在边疆民族问题上，林彪一伙也效法孔丘大搞“以礼治军”、“去食去兵”，撤除边防，开门揖盗。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压迫，制造民族分裂。林彪在1966年就抛出“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1969年利用他窃据的一部分权力，命令在边疆强行贯彻。

这条反动方针胡说什么“我们的边防是搞政治边防”，“主要是加强边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根本不提反对社会帝国主义，不提对帝修反设防这个伟大战略目标，不提党的基本路线，不提党的民族政策，不提兄弟民族的革命团结，更不提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搞好边疆建设的根本保证。

他用心险恶地把政治和军事、政治和经济、军队和群众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借口边防部队“面广、线长、高度分散”，命令部队撤点集中，搞“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关起门来“突出”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治，一刀砍掉反修反帝这条最根本的无产阶级政治。他指责边防部队发扬我军“三队”的光荣传统是“不务正业”，命令撤销所有民族工作队；指责民兵工作“搞多了”，“民兵顶啥用”？力图破坏军民关系和军民联防，破坏铜墙铁壁的人民防线。他胡说什么“政治上的事要快快抓，有些事可以慢慢来”，“七分政治，三分生产”，力图破坏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破坏“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物质基础。他们一概否定边疆民族特点，在政策上大搞“一刀切”。他们还混淆两类矛盾，打乱阶级阵线。他们全盘继承孔丘“内夏外夷”的衣钵，歧视边疆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陈伯达在内蒙污蔑牧民“当了二十年伸手派”，咒骂牧民“吃亏心粮”。林彪说什么“民族干部可以要一点”，实质上一点也不要。郑维山咒骂内蒙干部是“属蛤蟆的，不打不跳”。甚至把全部青面獠牙露出来，说什么“我们来内蒙是征服者，不是胜利者”。再现出两千年前盐铁

会议上那一群“贤良、文学”的丑恶面目。因此，批林不批孔，挖不到他们的祖坟；挖开他们的祖坟来看看，活龙活现就是那一副僵尸。

第六节 反革命复辟派痛痒相关和汉武帝反复辟 的全局战略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历史上，凡属搞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都是南北呼应，互相勾结的。西汉的异姓和同姓诸侯王，他们在搞分裂活动时，都要勾结匈奴奴隶主贵族以至其它边疆民族地区的奴隶主贵族。汉初封在北方的异姓王韩信、陈豨、卢绾等都与匈奴勾结，最后叛降匈奴；同姓王刘濞也和匈奴有勾结，并且暗通闽粤、东瓯，勾结其它同姓国，掀起七国之乱。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又和两粤勾结，企图颠覆汉王朝；巴蜀工商奴隶主往往“窃出商贾”，勾结“西南夷”奴隶主贩卖“犏马、棘僮、髦牛”。他们痛痒相关，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的阶级本能都是要“克己复礼”，他们结成了搞复辟活动的反革命政治大联盟。他们里应外合，其共同目标是颠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分裂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

汉武帝从反复辟的战略全局考虑，在北方，力排众议，坚决反击匈奴奴隶主的武装侵扰；在中原，坚决粉碎刘安、刘赐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肃清诸侯王地方割据势力；在西北，先后派遣张骞、李广利等通西域，割断匈奴右臂；在东南沿海及南方，平定瓯闽粤少数民族奴隶主的叛乱，挖掉诸侯王搞分裂的依托；初次经营“西南夷”，正是和匈奴决战的时刻，中断了几年，后来听张骞说在西域见到“邛竹”、“蜀布”，是四川商人出云南经印度运去的，武帝为了寻求这条通往西域而不致被匈奴截断的道路，再度经营西南，终于设置了郡县。所有这些，都是和反革命复辟联盟针锋相对的全局战略。

西汉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几次儒法大论战表明：反对抗击匈奴和削平其他边疆割据势力的儒家，正是这个反革命复辟大联盟的政治代言人。法家要把郡县制推行到边疆民族地区，意味着对处在奴隶制下的边疆各族人民行使封建法律，这对当地人民是一种社会解放，而对奴隶主则是从削弱以至废黜。而儒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奴隶采取“攘夷”的镇压政策，对奴隶主则实行不触动其原有制度的“羁縻”政策，这是民族关系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早在春秋末年，当新兴地主阶级在诸夏各国到处得势的时候，边疆一些少数民族小国仍然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奴隶制度。当时孔丘哀叹：“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妄想把保存周礼传统的“四夷”小国作为复辟奴隶制的基地。有一次，鲁国新兴地主阶级当权派季康子要去讨伐一个叫颛臾的少数民族奴隶主小国，孔丘借口它是“先王”的“社稷之臣”，坚决反对出兵。又有一次，孔丘要到鲁国东部落后的“九夷”地区居住，梦想在东方复辟周礼。当然，孔丘是极端歧视少数民族人民的，但是他决不反对甚至要极力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奴隶制。这和他的徒子徒孙在西汉一面骂边疆少数民族是什么“不牧之民”，一面又主张“存其亡国”是一脉相承的。

到了清代，帝国主义在我国边疆民族中不断制造分裂，蚕食我大片边疆领土。代表儒家的曾国藩、李鸿章之流疯狂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实行媚外投降路线。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妄图扑灭中国人民革命，结果被中国人民推翻，逃到台湾省又搞分裂割据。我们党内搞分裂活动的机会主义头目，也要到处寻找他们反动阶级的阶级弟兄。王明不是早就投奔苏修，充当大汉奸吗？大叫“三和一少”的刘少奇，不是被苏修头目吹捧为“健康力量”，希望他们“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吗？大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林彪一伙，不是早就里通外国寻求“核保护伞”，以至卖国求荣，想当“儿皇帝”而折戟沉沙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凡是对内搞分裂，对外必然是投降主义者，卖国主义者。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真正集中统一的，“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国内各民族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大多数人专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政。我们的集中统一是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切阵地。“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让我们各民族革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更大的胜利。

第二部分

地主阶级转向保守时期儒法斗争的内容 和形式的演变

（公元前 48 年——公元 907 年）

第五章 西汉末至东汉，儒家思想逐步形成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西汉前期和中期，新兴地主阶级还面临着奴隶制复辟的严重危险，因此，勇于革新的法家思想仍占统治地位。这时的地主阶级，还是“生气勃勃的，是先进者，是真老虎”。他们要继续扫除奴隶制残余，巩固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要完成“一统天下”的历史任务，以利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法家思想不过是这种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西汉末至东汉，奴隶制复辟的严重危险已经过去，地主阶级一面专政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封建制度进一步巩固，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任务，主要是如何加强对农民阶级的统治，维护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反对变革、保守倒退的儒家思想，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此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地主阶级对个体农民进行细碎的盘剥，是地主经济赖以存在的物质关系。“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这种分散的进行个体生产的农民，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随时可以变为破产流民。他们揭竿而起，登高一呼，就会四方云集响应，形成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要维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就必须强化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和等级秩

序，而且要把这些“世间的力量”予傅“超世间的形态”，以增强对个体农民的威慑力。要用封建宗法关系对分散的个体农民进行直接统治。还要交替使用“屠刀”和“圣经”这两手，用一些“仁义道德”的说教来欺骗、麻醉个体农民。所有这些，只要把儒家思想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这些稍加改造的儒家思想，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种权力”建立起一整套反动理论，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封建地主经济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不断兼并集中，社会各阶级阶层不断向两极分化。皇室、贵族、官僚凭借政治权力，拥有大量土地，富商大贾凭借高额利润，兼并大量土地，不仅对个体农民加重了剥削压迫，对中小地主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严重的威胁。中小地主、寒门细族要求社会改革，要求抑制豪门地主，客观上也是符合个体农民的利益的。要变革，要进步，他们就继承法家思想作为精神武器，同维护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进行斗争。由于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得不以儒家的面目出现。因此在地主阶级转向保守时期，儒法两家代表的阶级变了，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变了。

第一节 复辟逆流的回光返照

——坚持维护没落奴隶制的思想体系的王莽，大搞
复古倒退

土地集中兼并，社会阶级两极分化，是伴随着地主经济而来的痼疾。秦时已经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秦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豪强，土地由集中转向分散。西汉初期、中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主要是自耕农相对增加的结果。但工商业奴隶主继续集中兼并土地，汉武帝以治缙钱来打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封建地主阶级自己不能堵塞兼并之途，只会助长它发展。成帝时，外戚王立占垦草田数百顷，张禹买田至四百顷；哀帝时，赐给宠臣董贤土地二千余顷；平帝时阴子方有田七百余顷；从这些典型事例可以看出土地集中兼并的激烈程度。哀帝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资财有好多万)；而贫弱益困”。土地集中兼并的结果，许多农民都沦为佃户，要向豪强地主交纳至少是对半分成的地租；而豪强地主仅仅负担三十分之一的赋税，最后还

是转嫁给农民。当时鲍宣就说：“民有七亡(七种受剥削的情况)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父子夫妇，不能相保”。遭到自然灾害，更是求生无路。如在王莽覆亡的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东方蝗虫大起，“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死者十七八”。此外不少世家豪族役使着大量奴婢，并用奴隶进行生产。市场上公开买卖奴隶，所谓“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和牛马关在一个厩里)”。

哀帝时，师丹曾建议限制占有田地及奴婢数，企图缓和阶级矛盾。汉王朝讨论出一个方案，即诸侯王、列侯、公主以至吏民“名田(占有的田地)皆勿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

。但是，贵族豪门的所有制，不是一纸空文所能触动的。这个方案，立刻遭到他们的反对，这一纸空文也就不敢再往下传了。

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大儒王莽跳了出来，想搞大复古，大倒退。这个奸诈巧伪的王莽，使尽了孔家店的一切阴谋诡计，篡夺了政权，建立了新王朝。他是言称尧舜，口不离《诗》、《书》，尊奉孔丘为“褒成宣尼公”，大造明堂、辟雍，为儒生筑校舍万区的复古狂。他的复辟措施主要是：

一、妄图复辟井田制。王莽说：“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他效法孟轲，把西周束缚奴隶、进行奴隶制剥削的井田制，美化成为奴隶主的“仁政”。而且妄图恢复这种“仁政”。他下诏令说：“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超过九百亩)，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原来)无田今分受田者，如制度(即一夫分受百亩)。敢有非(非议)井田制度、无法(无视法令)惑众者，投诸四裔(流放到边疆)”。这种倒行逆施，其动机和效果，都不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是开历史倒车，想把农民重新置于奴隶地位。反动卖国的胡适把王莽说成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牌号。在这里，奴隶制的井田制也挂上了“社会主义”的牌号，的确又是胡博士发现的“国宝”。胡适自称有“历史癖”，实质就是王莽一型的复古狂。王莽在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下一纸诏令，就想把封建地主的私田改为奴隶主的公田，而且按照“井田制”分配给农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虚用来欺人自欺的废话。诏令下达直至王莽覆灭时，南阳豪强樊重仍然有田三百余顷，阴子方家有田七百余顷。这些豪强地主丝毫没有触动。这道诏令只是激起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抗，所谓“天下警警然”(天下的人都在怨怒咒骂)。不到三年，“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

井田、奴婢、山泽、六莞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马克思指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王莽妄图向当时的经济条件发号施令，当然是行不通的。这些复辟行动很快就彻底失败了。

二、妄图复辟分封制。王莽在篡政前，就大肆鼓吹分封制的“盛况”，说什么夏有诸侯万国，周武王有诸侯八百，周公时一千八百，并引经据典，说《礼记·王制篇》的记载是一千七百多国。他奏请汉平帝定五等爵，划大小四等地来分封诸臣将帅。其政治目的，是要分封他的家族、亲信来结党篡政。其策略步骤，是先封刘氏家族来换取大封异姓诸侯。平帝元始五年(公元五年)，封孝宣(汉宣帝)曾孙信等三十六人为列侯”，之后就大封其家族、亲信凡数百人，“高为侯伯，次为子男”。

王莽篡政后，提出分封方案：“诸公一国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国众户二千又五百，土方五十里；……”中。已经封有爵位的：“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此外，还有“附城”等千余人。但这种分封和他的集权统治的封建国家是背道而驰的，复古措施和他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是直接矛盾的。他自己就通不过，只好扬言分封的地方还没有研究好，暂时不授国邑。每月支給几千钱，有些诸侯穷得靠当雇工度日。

拖了几年，这些“分封”诺言实在无法交代了，他召集大小诸侯再次进行欺骗说，我研究制作分封地图，考察经传，反复议论，要求符合经义，现在已经定下来了。有的可以去就国，有的还留在京师，由官府支給俸钱，公每年八十万，侯伯四十万，子男二十万。但这些诺言仍然是空头支票。说明这种复古狂热不过是欺人自欺之谈。也说明时代变了，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是不能照搬照用的；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如不加以改造，是不能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

三、实行“尊王攘夷”的民族压迫政策。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这一条凡是剥削阶级都可以使用，勿须加以改造。但是王莽怀着“攘夷(镇压少数民族)以安内”的政治目的，其行动就特别狂妄和愚蠢。他想用攘夷来树立新朝的声威；想用攘夷来募集破产流民，送到边境上去，以安定社会秩序；想用攘夷来搜括民间财物，以充实自己的府库；为此高举孔家店“尊王攘夷”的黑旗，进行规模巨大、次数频繁的攘夷战争。

王莽篡政的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就派使官到边疆民族地区，收回汉朝所给印绶，改授新朝印绶。国王改号称侯。如改名匈奴单于为降奴单于；贬西南夷的一个首领句町王为侯。从汉宣帝以来，边疆各民族和內地的交往联系日趋紧密，一向和睦共处。王莽这一挑动，“单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后卒以此皆畔”。

王莽正是要寻找这些借口，好实行他的“攘夷安内”政策。公元10年，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击匈奴。公元19年，又大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隶击匈奴。但两次大发兵，都屯驻在边境上，并不出击。目的是借此招募内地不能生存可能起义的穷人，送到边境上战死或饿死。

在西南边疆，则多次进行血腥的镇压屠杀。王莽贬句町王为侯，句町王邯很愤怒，王莽的边疆大吏牂牁大尹周钦就把句町王诱杀了。邯的弟弟承率兵攻杀周钦，王莽命令邻近的州郡出兵镇压，不能服。打出打进，“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王莽派遣平蛮将军冯茂，招募四川的丁男大出击，暴敛横征作为军饷，出入三年，病死饿死的士卒就占十分之六七。王莽调回冯茂，把他杀了，另派廉丹、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又有一大半战死病死饿死。这一系列镇压屠杀，直到农民起义大爆发，才被迫停止。

王莽“攘夷安内”的政策，结果是适得其反，边疆内地各族人民都起来反对他的暴政，待发已久的全国性大起义终于爆发了。起义的原因，正如王莽所说，百姓饥饿，惶恐不安，不知怎样活下去。当时，南方起义军有下江、新市、平林，东方起义军有赤眉，北方起义军有铜马等。小部数万人，大部数十万人，总数几百万。

地主阶级反对王莽的措施，也乘机起兵，以他们的地主武装为骨干，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攻占重要城镇。汉宗室刘演、刘秀，是南阳著名的大豪强，成了地主武装的首领。昆阳决战，刘秀以少胜多，击溃了王莽的主力部队，新朝也跟着这次战争崩溃了。

在此战役前，地主军拥立刘玄为更始帝。昆阳战后，他派申屠建攻长安。长安市民群起响应，攻入王莽宫，杀死王莽，结束了这个复古狂可耻的一生。这个复古狂临死还在学孔丘的腔调，说什么“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真是一副花岗石脑袋。

王莽站在豪强地主的立场，他的阶级基础也是豪强地主。但是他顽固地坚持维护没落奴隶制的思想体系，妄图复辟井田制、分封制来解救当时的社会危机，结果是自搬石头自打脚。这股复古逆流，不过是历史上的回光返照。

豪强地主不采用维护没落奴隶制的思想体系，也不可能解救这些社会危机，他们本身只能够发展这些社会危机。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用暴力革命来批判豪强地主，从而调整土地关系，才能够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推动历史的前进。当然，农民本身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彻底解决。

第二节 改造过的儒家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胜利果实被豪强地主刘秀篡夺了。刘秀本人兼有太学生、贵族、豪强三种身份，他的文武部属也全是这三种人。他在王莽覆灭后，陆续镇压和诱降农民军，次第削平割据的豪强。他在公元 25 年即皇帝位，称东汉光武帝。到 36 年，大将吴汉攻破成都，灭公孙述，结束了豪强割据，恢复了中国的统一。

东汉王朝是在农民大起义中由豪强集团建立起来的。反对豪强地主的农民大起义，在他们看来确实是暴风骤雨、惊心动魄的。因此，光武帝统一全国后，中心课题是如何统治农民，防止随时可能爆发的农民战争。光武帝是镇压农民最有经验的统治者，他深知专靠武力进行镇压，将会激起农民更大的反抗。因此在统一全国后，就不轻言用兵，“退功臣而进文吏”。皇太子问他怎样行军打仗，他说你不应该问这个。他回故乡时，一些亲戚议论他小时很温柔，想不到会做皇帝。他听了大笑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所谓“柔道”，就是暂时放下屠刀，交替使用“圣经”这一手。光武是太学生出身，从小就熟悉这一套。做了皇帝后，更是“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他和割据豪强争夺天下，戎马倥偬之际，经过曲阜，还派他的大司空去祭祀孔丘。回到洛阳，又跑到他新建的太学里去看望博士弟子们，给予赏赐。在农民起义中四处逃窜的儒生，“莫不抱负境策(儒家经典)云会京师”。他坐朝从早到晚、常常和公卿郎将们讲论经义。他大力提倡和传播儒术。目的是用“柔道”来作骗麻醉农民。并且屡赦天下，作了一些“省刑法”、释放宫私奴婢的表面措施，企图缓和阶级矛盾。

他的子孙明帝、章帝深得“柔道”诀窍。明帝即位后，设明堂辟雍(举行重大祭典、朝会讲学的地方)，“尊养三老五更。餐射礼毕，帝正坐自讲(亲自讲授儒家经典)。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儒生们手持经典询问疑难的章句)”。在辟雍四门外面围着听讲的人成千上万。他还广设学校，匈奴贵族也遣子弟来学。他的卫队侍从，规定必须读通《孝经》的章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讨论‘五经’注释的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章帝亲自出席决断)”。这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由官方出面组织的一次研究注释儒家经书的会议，也是一次尊孔复礼的宗教神学会议。班固撰集的《白虎通德论》，是这次会议的书面总结。东汉统治者通过研究注释“五经”，以封建国家法律的形式，大肆吹捧和抬高孔丘，并确定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班固所谓“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质上是到东汉才真正落实。

两汉以来，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儒家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一部分儒生顽固地坚持维护没落奴隶制的思想体系外，大部分儒生开始依附于地主阶级保守派。儒家思想本来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到西汉中期，它的阶级基础虽然消灭了，但是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又出现保守反动的大地主豪强势力；儒家思想借尸还魂，成为封建社会中这一部分保守反动势力的意识形态。

系统地改造儒家思想，来为大地主豪强势力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董仲舒是个典型。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西汉景帝时曾作博士官。武帝初即位，窦婴、田蚡把他找来，奏对《举贤良对策》，但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汉武帝并没有重用他；昭、宣二帝也没有怎么理睬他那些黑货。汉元帝开始尊儒后，才把他抬出来。成帝、哀帝、平时时，把他越捧越高。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尹)吕(望)无以加”；“管(仲)晏(婴)之属，霸者之佐，殆不及也”。刘歆把他比做孔丘的高徒颜渊，认为宰我、子贡、子游、子夏这些孔门大弟子都比他不上。东汉白虎观会议，就是阐述董仲舒的一系列反动观点的，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用封建国家法律的形式来确定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的。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和《举贤良对策》。它和班固撰集的《白虎通德论》，内容实质都是把孔丘神圣化，把孔丘的学说封建化、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理论化、系统化的。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里讲：“《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所谓“大一统”，有思想上的大一统和政治上的大一统。前者即《举贤良对策》中所说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就是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主要是罢黜法家，让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专政。政治上的大一统，就有许多改造制作。它是封建社会的大一统。而不是奴隶社会的大一统。它是儒家的大一统，而不是法家的大一统。

奴隶社会的大一统，那是《春秋》的原义。即孔丘自己解释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做到天子统管诸侯，诸侯统管大夫，大夫统管陪臣，大奴隶主统管小奴隶主。能够做到层层统管，就可以巩固奴隶制秩序，就算是“天下有道”。因此，《春秋》大一统统管的对象都是奴隶主。至于奴隶，则不在话下。因为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在奴隶社会里，有井田制牢牢地束缚住他们，各级奴隶主自己会控制掌握，这些“礼”是不下庶人的。所要防止的，只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陪臣执国命。这是奴隶社会的大一统。

封建社会的大一统，统管对象虽然也有中央和地方的文武百官，有时也有诸侯王，但主要对象则是由井田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分散的、进行个体生产的农民。集中统一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其主要职能就是统管个体农民，对农民实行地主阶级专政。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反复论述的，是怎样“教民”，怎样“化民”，如何“更化”，反对“任刑不任德”，这是用“柔道”来统管农民，企图建立起“大君者民之父母”的伦常关系，用三纲、六纪、五常、八端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紧紧束缚住，这是封建社会的大一统。

儒法两家的大一统更有本质的区别。法家的大一统，即荀况提出的“一天下”，“四海之内若一家”，是要消灭搞分裂割据的大小奴隶主，要统一全中国，要扩大共同市场来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这种“大一统”是进步的，是革命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的革命路线。当然，新兴地主阶级也要统管农民，但它还在向奴隶制革命的时候，这方面还不是重点。

儒家的“大一统”，在封建社会，是“君统万民”的“大一统”。当着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趋向于巩固，奴隶制复辟的严重危机过去了，地主阶级的一面专政确立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了，这个“大一统”就变成主要是对付农民的“大一统”。从这方面说，它是反动的，是反对革命

的，是统治、压迫、奴役农民的反革命路线。当然，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还是进步的，那是法家路线在继续起作用。

要对个体农民实行“大一统”，首先要树立封建国家、封建帝王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单靠世间的力量例如大印、军队、法鞭还不够，必须借助于超世间的力量。因此董仲舒之流就发展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改造制作了“天人合一”、“天人交感”、“王权神授”等反动理论，把谶纬神学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使儒学封建化、宗教化，作为吓唬老百姓的威慑力量。

董仲舒首先制造封建帝王统管万民的反动理论。所谓“《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白虎观会议也说：“缘民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也”。这是说，有了人民，必须有统管他们的“君主”，而且人民的愿望是“不可一日无君”的，他们强奸民意说，人民也需要这种“大一统”。他们又说，君统万民，是合乎宇宙规律的。白虎观会议所谓：“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天有众星，君有众民，都是上帝安排的。

董仲舒还说：“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白虎观会议也说：“王者往也，天下所往”；“君、群也，下之所归心也”。就是说“君”的职能是统管万民；如果君失其群，民不归心，这个封建专制制度也就完蛋了。

皇帝要能够统管万民，必须树立权威，必须神化皇帝，必须假借天意来确定君民之间的统属关系。董仲舒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这就是“君权神授”说，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他说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代表天意来统治人民的。“王者配天”，皇帝是与天相配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王者百神之君”，皇帝不仅是万民之君，还是百神之君。上帝是老大，皇帝就是老二了。白虎观会议也说：“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又说：“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皇帝是光辉灿烂，煌煌若日月，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他的意旨的。

皇帝既然是替天行道的“真命天子”，老百姓就不可不畏敬。董仲舒所谓：“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此见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闇”。所谓“谨事”，就是要恭谨小心地事奉。不谨事皇帝，就要坐牢杀头，灾祸来得很明显；不畏敬上天，更要受惩罚。这种惩罚是多方面的，很不明显的，所谓“至闇”。但“获罪于天”，是无处祷告求饶的，是无处隐藏逃避的，总有一天要遭殃。有了天的权威，统治者对人民的奴役，就可以从

政治上和精神上双管齐下，使人民群众不仅害怕地上的君主，而且精神上还要随时警惕来自上天的惩罚。历代统治者慑于人民的威力，无不采用这种以神道设教的办法，假借“天”威来弥补其权力之不足。

有了神权、君权，还要把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固定下来，把君臣父子、族党朋友的人伦关系建立起来，才能够统管分散的个体农民。这就是“三纲六纪”。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这是根据他的“天道一阴一阳”，“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把君臣、父子、夫妻的尊卑主从关系讲得更加明确了。白虎观会议则正式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说法，把君权、父权、夫权更进一步绝对化了。

他们说这些等级秩序、伦理规范都是本之于天。董仲舒所谓：“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白虎通德论》所谓：“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还说什么“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这样就把君权、父权、夫权的封建统治秩序，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且天是居高临下的镇压力量。所谓“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不过是代行天事。要有镇压人民的权威，要有上下尊卑的等级，封建社会的秩序才巩固得下来。董仲舒所谓“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这句话就说穿了此中的奥妙。

有了“三纲”还不够，还需要从横的方面把分散的个体农民拴起来，这就是族权。“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他们把由于家族关系凑聚在一起的地主和农民，说成是相亲相爱的集体。“必有家何也？所以长和睦也”。他们把家族关系美化成为一团和睦的，而且具有增长和睦关系的作用。“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大宗”和“小宗”，是在种族奴隶制下，有血缘关系的奴隶主贵族，按照长子庶子、分支远近来决定权位财产的继承和分配，决定君臣上下的关系，奴隶是不包括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把这套宗法关系继承下来，把地主和农民都包括在一起。家族内部最大的地主才能当族长，具有统治整个家族的权力。地主利用家族关系，“纪理族人”是真，至于所谓“通于有无”，那是盘剥同族农民的优先权。农民要借高利贷，

要卖田地房产，首先得找本族地主。家族内部的地主能够剥削农民一石，决不会只要九斗九的。

族权是同父权相联系的，所以董仲舒之流反复强调要崇祀祖先，要敬宗收族，要以孝悌为根本。正是为了通过千支万系的宗族组织，来统率分散的个体农民，来巩固封建政权。东汉的大地主往往兼有宗族长的身份，隶属于他们的农民则多半是宗族成员。因此，族权实质上是在温情脉脉的宗族外衣掩盖下，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贫苦农民的统治权。

横的联系进一步扩展到亲戚师友方面，这就是“六纪”。“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强理上下，整齐人道也”。有了这些大纲小纪，就可以把分散的千百万个个体农民拴在一起了。所谓“如罗网之言纪纲，而万目张也”。封建统治者抓住这些纲纪，就可以统管万民。所谓“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三纲”、“六纪”都是取法于天的，所谓“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上下四方)”，都是上天安排好的秩序。把“三纲”、“六纪”的秩序维护好，就可以做到天上人间的“大一统”了。

维护“三纲”、“六纪”等级秩序，又要靠“五常”、“孝悌”等道德规范，而孝悌是最根本的。他们说，天地、君臣、父子都是生和养的关系。“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天生万物，地养万物，因此要视天地如父母，“事天以孝道”。他们的前提，是把自然之天说成有意志、有目的之天，然后再进行类比，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就是说，受命于天，代天行事的天子，是万民的父母，是生养万民的，因此，要象孝顺天地父母一个样，以孝道事“天子”。这就制造出“地主养活农民”的极端反动的理论，作为地主阶级统治、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根据。

他们把天、王、父等同起来，贯穿起来，规定了为人子者，在下位者的根本义务是对天、王、父尽孝道。他们说，孝是天之经，地之义：“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此谓孝者地之义也”。孝和忠是一致的，忠君就是孝亲，因为君是民之父母。他们说对君忠孝，是天地法则。所谓“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再把这些关系延伸和扩大到尊师、敬长、慈幼，上下左右的关系都人伦化，就见不到阶级和阶级矛盾，不致于犯上作乱了。用家族、亲戚关系来掩盖阶级关系，是历代反动派最恶毒的一着。董仲舒深深领会孔家店的说教，领会“孝悌”的作用，孔丘的门徒

有若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他继承这套衣钵，说什么“贵孝悌”的结果是“万民听、生善于天下”。因此“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孝悌者所以安百姓也”。《论语》所谓孝悌“为仁之本”，因此它又是“五常”之本。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起安民定国的作用。“此威势之不足独特而教化之功不亦大乎”？

在这里，董仲舒又提出抓根本的方法来，就是要对万民进行“教化”。所谓“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圣人”的职能，就在于“教民”、“化民”。“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就是要广设学校，用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仁、义、礼、知、信和孝悌来教化万民。他认为，“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止也”。所谓“从利”，就是求生的欲望，求生的要求。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求生不得，就要起来造反。用军队、刑罚来镇压，是“不足独特”的，将会引起更大的反抗。因此要“更化”，即交替使用牧师这一手，“任德不任刑”，用“五常”、孝悌来进行教化，筑起一道无形的隄防，“教化立而奸邪皆止”。经过董仲舒改造制作的儒家思想，就是这道无形的隄防，是镇压人民的软刀子。他反复论证如何使用这把软刀子，以及这把软刀子的巨大作用。

他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三者皆举，则民如子弟，不敢自专，邦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虽野居露宿，厚于宫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治国安民的三件大事，一个是孝悌，一个是礼乐，至于衣食，老百姓自己向大地去要。没有土地怎么办？去给地主当牛马。而且，人民衣食不足，只要抓好孝悌礼乐，虽然野居露宿，也会感觉比住在宫室里还舒服。这道无形隄防修好后，皇帝就可以安枕而卧了。否则民如麋鹿，经管不住；家自为俗，号令不了。皇帝的城郭再修得怎样坚固，也比不上起义农民锄头钉耙的锐利。

他把人民群众污蔑为“瞑”，所谓“民之号取之瞑也”。瞑就是闭着眼睛，睡眠状态，浑浑噩噩，看不见“五常”、“孝悌”。“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就是要用教化来把他们惊醒，使之识别善恶，从而使之去恶就善。他把反动统治者捧上“教育者”、“改造者”的宝座，把劳动人民摆在“被教育”、“被改造”的地位，这就是他的反动教化观。人民不听教化怎么办？他说：“木者

农也，农者民也，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这就把他的狰狞面目全部暴露出来。总之，“德”也好，“刑”也好，都是刀子，一软一硬，交替使用，目的都是统管万民，镇压万民，来维护和巩固他们的封建大一统。

在地主阶级实行一面专政的时候，它最怕革命，最怕农民起来造反。因此，把没落奴隶主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改造制作成为以天命观为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作为在思想领域内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宣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企图假借天意来肯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合理性。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曾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思想，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他们用“三纲六纪”建立起维护整个封建统治的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深刻地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以后的儒法斗争，焦点就在于维护或反对这套封建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当然，以后的法家，不过是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也不可能全盘反对这套反动思想体系。

第三节 反对神学唯心主义和讨孔伐孟的斗争

董仲舒的封建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大讲“天人合一”、天人交感、“王权神授”，来树立封建帝王的绝对权威，逐步成为尊儒反法的正统思想。西汉末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加深和农民起义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妄想假借神意，欺骗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在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儒家经典和封建迷信结合起来，成为谶纬神学。

所谓“谶”，是一种类似谜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所谓“纬”，是与“六经”相辅而行的一些著作；它们假托神意，用图谶来解释儒家经典。这种谶纬神学，经过封建帝王的大力提倡，被奉为儒家思想的正宗。如东汉光武，篡夺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残酷镇压起义农民，并削平割据豪强，建立东汉王朝后，迫切需要一种神学理论为自己的统治进行辩护。他编造了许多神话，说他初生时，遍体红光，室内通明；生他那一年，郡内产嘉禾，一禾九穗，因此，取名为(刘)“秀”；在他起兵时，同郡的豪强李通说发现写有“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文。刘秀在他即位的祝词里，引用了《赤伏符》

上的两句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即“刘”字)修德为天子”。所有这些，无非要说明他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天下的人都应该臣属于他，不能违抗天意。

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他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图谶于天下”；章帝白虎观会议，进一步把儒家经学和阴阳五行以及谶纬柔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法典。一般儒生望风承旨，大加宣扬以干求禄位，谶纬迷信风行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但也遭到地主阶级中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反对。光武时桓谭(公元前9年至公元50年。字君山，今安徽宿县人)因坚决反对图谶迷信，遭到光武的迫害。“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桓谭上疏直接指斥光武“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相信谶记是何等的错误啊)”。！光武要建造一座“灵台”，在朝会上讨论地点时，主张用谶来决定；桓谭表示反对，说他“不读谶”。他在奏疏中还指出，谶记都是一些“巧慧小才伎数之人”伪造的，“以欺惑贫邪”，应该抛弃它。又在他的著作《新论》中指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他把封建帝王愚弄人民的鬼把戏戳穿了，光武非常震怒，说他“非圣无法”，要杀他的头，结果被贬为六安郡丞，死在途中。

桓谭《新论》今已散失，清代孙冯翼有辑录本。它在当时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中，具有很大影响。王充说：“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辞，莫不证定”。又说：“世间为文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识，则君山汉之贤人也”。王充大反神学唯心主义，其思想渊源，多来自《新论》。《论衡》一书，经常提到桓谭，对他评价很高，可惜这部书的全文已经看不到了。

东汉豪强地主的势力愈来愈强大，中小地主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和排挤。地主阶级的分化，逐步形成对抗力量，要求社会变革的代表中小地主的思想家，继承法家朴素的唯物论，对豪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神学唯心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进一步大造孔丘、孟轲的反，王充是杰出的代表人物。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公元27年(汉光武帝建武三年)，死于公元96年(汉和帝永元八年)前后。他出身细族孤门，祖父以贾贩为事，是有“市籍”，在政治上受到排挤的。早年曾到大学读书，后来出仕虽做过几年的州郡小吏，因好争谏，不合时宜，退而著书教授。“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但他并不因此而意志消沉，还是毕生奋斗。他的重要著作有《论衡》八十五篇，对孔孟、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体系，以至两汉的谶纬神

学等迷信思想都作了斗争。还写下了讨孔伐孟的檄文。他不怕政治迫害，表明了坚定不移的尊法反儒立场。

封建神学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天命观，王充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大破天命观。他明确地指出：“天道、自然也，无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就是说，天是自然之天，是没有意志，无所作为的。王充把天看成是一种自然物质属性，这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就否定了董仲舒之流的神学目的论的前提条件。

何以论证天是自然物质属性？“以天无口目也”，。王充说如果天有意志、有感觉、有作为，首先它应该有嘴巴，有眼睛，能吃、能喝、能够看。“今无口目之类，于物无所索求，夫何为乎”？“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天是一片云烟，那里来的感觉器官？

王充驳斥天生万物的谬论。他说：“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之手，并为万万千千之物乎”？万物春天生长，秋天成熟，都是顺其自然的，如果说天地是造物主，天地就应该有万万千千双手，同时制造万万千千的物。这些手都在那里？谁看得到呢？他还说：“如天地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如果天地是有意志、有作为的造物主，那末，它生下万物来，就应该使它们相亲相爱，不应该使它们互相贼害，为什么万物又互相贼害呢？

王充进而驳斥天地生人的谬论，粉碎了董仲舒之流“父天母地”、应该“孝天孝地”的胡说。他说：“儒者论曰：天地故(有意识、有作为)生人，此妄言也”。“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饥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于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就是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就象鱼生在水里，虱生在人身上一个样。他在这里提出“因气而生”的命题，是受到自然科学的局限，还讲不清生命的起源；但这个“气”，是物质而非精神，还是属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范畴。下面王充提出“种类相产”的命题，这点很重要。这就粉碎了董仲舒之流所谓“天地生人”、“天人合一”、“天人交感”，以自然现象比附人事的一切胡说八道。

王充进而驳斥“天生圣人”的谬论，粉碎了董仲舒之流“王权神授”的胡说。他指出：“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是虚妄之言。儒家传说，商人祖先简狄吞燕卵而生契；周的祖先姜嫄踏着一个巨人的脚迹而有孕，生了弃(后稷)；尧和汉高祖的母亲，都是与龙交配而生他们的。儒者的意图是要说明，“圣人”不是人生的，而是天生的，不同于“凡人”，因此应该统

治“凡人”。王充说：“物生自类本种。夫二帝(尧、汉高祖)宜似龙也”。就是说，万物之生，各有种类。“种类相产”，其子女一定要象父母，所谓龙生龙，凤生凤，龙生不出其它异类来。如果尧和汉高祖的确是龙所生，他们就应该象龙，为什么他们还是人呢？推而言之，契不象燕，弃也不象脚迹，传说禹母吞薏苡(草名)而生禹，可是禹也不象薏苡，他们为什么不象“本种”呢？王充进一步驳斥：“含血之类，相与为牡牡(雌雄)，牝牡之会(交配)皆见肉类之物，精感欲动，乃能授施。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能相与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就是说，生物都有雌雄，只有同类才能交配。儒家传说生“圣人”的龙、燕卵、薏苡等，都与人不同类，怎么能够和人交配，而且生出这样的“圣人”来呢？儒家的谶纬迷信，想借此来说明帝王将相的高贵，其结果正陷入理论上的矛盾。王充指出：“今贵人之气，更禀贱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儒家的谶纬神学，本想说明人的高贵，帝王将相又比“凡人”高贵，但是说来说去，帝王将相乃是禀受贱物之精而生，不是抬高而是贬低，打了自己的嘴巴。王充指出：“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人是万物之一，人群中虽然分化出王侯来，但就其属性来说，并没有异于常人的地方，甚至也没有异于万物的地方。

王充又驳斥上天赏善罚恶、祥瑞谴告等谬论，粉碎了董仲舒之流“天人交感”的胡说。他指出：“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就是说，天是自然无为的，因此人不能以他的善恶行为感动天，天也不会伴随人的善恶行为而降祸福于人。“世之圣君，莫有如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就是说，儒家称颂的“圣君”，无过于尧、汤，都说他们的政治很好，是太平时代。但尧时洪水滔天，汤时连续七年大旱。如果说这些天灾是政治的反应，那就要修改儒家的历史传说，即尧、汤不是“圣君”，而是“恶君”；他们的政治不是很好，而是很坏。儒家当然不会修改他们的历史传说和人物鉴定，那么只能说天灾与政治无关。王充说，水旱不过是自然现象。所谓“运气”，即自然现象的运行，“一暘一雨，犹一昼一夜也”。有晴(阳)有雨，就象昼夜交替运行一个样。

儒家传说“天监不远”，老天爷时时在监视着人君的一举一动。王充说老天爷既然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不多派一些尧舜之君来治理人世？尧舜之君是老天爷信得过的，有了他们，就不必时时监视和谴告，可以放心睡大觉，为什么偏要“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烦劳也”？老天爷经常派下一些庸庸之君来，让他们“失道废德”，又要随之以“谴告”，不是自找麻烦么？儒家又说，太平之世，天生一种“屈轶草”于王庭，遇有佞人(小人)入

朝，“屈轶草”就指着他，帮助“圣人”识别贤佞。王充说，“夫天能故生此物(屈轶)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不使圣王生得更聪明一点，具有识别贤佞的天性)，或佞人本不生。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烦也”？“造物主”生一怪物来降一怪物，更是自找麻烦，如果天有意志，就不必生出佞人来。

儒家又说，圣人出世，天下太平，就会出现麒麟、凤皇等祥瑞。王充驳斥：春秋之时，天下大乱，麒麟跑到鲁国白西郊，被人捉到，害得孔丘哭鼻子。光武皇帝生于济阳，凤皇来集，“夫光武始生之时，成哀之际也，未太平，而凤皇至”。王莽时也有凤皇来，它们的出现正是乱世。由此推论，麒麟、凤皇并非祥瑞，而是妖孽了。王充还说：“夫凤皇、麒麟圣，圣人亦圣。栖栖忧世(指孔丘怀着焦急的心情，到处奔走找官做)，凤皇、麒麟亦宜率教圣人(也应该受到圣的教化，向圣人学习)，圣人游于世，凤皇、麒麟亦宜与鸟兽会(也应该出来和一般鸟兽聚会)，何故远去中国，处于边外(传说凤皇麒麟不迁太平，则远处边外)？岂非圣人浊，凤皇麒麟清哉”，末尾这一问，问得很妙。就是说，凤皇麒麟避开乱世，远处边外，而所谓圣人如孔丘之流，则不分治乱，到处奔走求官，越是乱世越钻营得起劲。相形之下，难道不是圣人很污浊，而凤皇很清高吗？王充又说，有些“圣人”一心往上爬，爬不上去倒碰得头破血流，几乎送了老命。例如“文王拘于姜里，孔子厄于陈蔡”。“而凤麟独能自全于世，是鸟兽之操，贤于圣人也”。就是说，从操守来看，圣人还不如鸟兽。

王充痛快淋漓地剥开了“圣人”的画皮，得出“圣人”不如鸟兽的正确结论，从而捣毁了儒家吓唬老百姓的偶像。“圣人”的画皮，就是祥瑞、符命、天生、天降以至天谴等。恩格斯深刻揭露这些社会现象的实质是“那些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些反映中，世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世间的形态”。王充在论所谓的“天谴”时正确地指出：“谴告之言，生于今者，人以心准况之也”。就是说，上天谴告的说法，产生和流行于现在，不过是有的人以自己的愿望来要求老天爷罢了。这是击中要害的分析。儒家所说的“谴告”，实质不是上天对君主的“谴告”，而是上天对老百姓的“谴告”。儒家所谓：“人君失政，天为异；不改，灾其人民”，“天谴”的一切灾难是要由老百姓最后来承担的。这就要求老百姓不能违反“天意”，实质是不能违反君主的意志，否则就要遭受上天的谴告，带来巨大的灾难。儒家所谓：“天神谴告人君，犹人君责怒臣下也”。“谴告”的重点还是在臣下。儒家“以心准况”，目的就是“把世间问题变为神学问题”。马克思指出：“在

天国幻想的现实中寻找超人的人，他只找到了他本身的反射”。这种反射是现实世界的反射，是阶级社会的折光，是建立在直接的支配关系和隶属关系之上的。他们力图把这种支配关系赋予“超世间”的魔力，让它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把隶属者对支配者的恐惧，上升到对“天神”的恐惧，以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我们批判封建神学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就是要“把神学问题变为世间问题”，要把“天国批判变而为人间批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按照董仲舒之流的说法，“圣人”一是天生的，二是先验的，二者都是封建神学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王充以唯物主义自然观攻破了唯心主义天命观，又以唯物主义认识论攻破唯心主义先验论。

儒家宣传圣人是“生而知之”者，他们说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还编造了一些神话，说孔丘将死，留下谶书说：“不知是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说：“董仲舒，乱我书”。还说：“亡秦者胡也”。想以此论证圣人后知万事。王充说，这些神话，就是证之以后事，也是胡说八道，秦始皇根本没有到过鲁，“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床，颠倒孔子之衣裳乎”？这则神话编造得如此荒唐，“则言董仲舒乱我书，亦复不可信也”。关于“亡秦者胡也”这条谶记的来源，王充没有再驳，其实这是秦始皇时燕人卢生奏录的，那些神化孔丘的儒生，也把它挂在他们圣人的账上。

王充大胆否定孔丘的“生而知之”、“先知先觉”的谬论。他用孔丘自己的言行来戳穿圣人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神话。仅在《实知篇》中就列举了十六件丑事，粉碎了所谓“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谎言。例如：孔丘带着一大帮徒弟，到陈国去找官做，被群众包围起来，断绝了粮食。他们搜罗得点存米，派颜渊去煮饭，不巧梁上的尘灰落到甑子里，颜渊先想马虎过去，感觉太不干净，怕老师吃了生病；又想把污染的饭丢掉，感觉这是救命粮，一粒也不能抛撒；最后决定把污染的饭掇出来，连尘灰自己吃了。孔丘正饿得发慌，从远处看到颜渊的动作，以为他在偷饭吃，大为震怒。如果孔丘能先知，为什么会把颜渊的好心肠当作驴肝肺呢？又如孔丘路过匡，被匡人包围起来，要消灭这伙害人虫。孔丘只顾自己，丢下门徒们化装逃出来。那个体弱多病的孔门高徒颜渊，最后也脱险赶到了。孔丘说，我估计你是被他们杀掉了。王充议论此事说：如果圣人先知，第一、他就应该绕道而走，不去冒犯风险；第二、颜渊未到，认为死了，颜渊已到，才确知未死，可见孔丘

的“先知”，乃是骗人的鬼话。《论语》还记载：阳货要见孔丘，孔丘不敢见。因为阳货常常驳斥孔丘，使他见着阳货就脸发白，背流汗。阳货送来一对火腿，孔丘必须去作礼貌性的回访。就先派人打听，趁阳货有事外出的时候去他家道谢。但是冤家路窄，又在归途中碰上了，弄得孔丘很狼狈。王充说，要是孔丘能先知，为什么尽出自己的洋相呢？王充由此作出结论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之行事，未之有也”。“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

在独尊儒术，神化孔丘，尊之为“素王”(即所谓“有王之德，无王之位”的空头圣王)的东汉，特别是在皇帝亲自出面，定儒家经典为国教的汉章帝时代，王充冲杀出来“非圣无法”，对这座大偶像嬉笑怒骂，层层剥皮，充分显示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王充旗帜鲜明地写下了《问孔》、《刺孟》两篇讨伐檄文，他尖锐地指出，儒家的反动谬论是“伪书俗文”。儒家是一批“好信师而是古”的复古狂，是“以为贤圣所言而无非”的盲从者。他义正词严地说：“追难(反驳)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孔孟鼓吹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戳穿“孔子之仕不为行道，徒求食也”的两面派面目，指出孔孟等“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是充满了自相矛盾的东西。他还指出，孔丘企图使他的复辟之道推行于天下的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

他还对儒家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给予坚决驳斥，指出“焚书”是由于淳于越要搞分封，“坑儒”是儒生“为妖言”所引起的。他又指出，儒生们把“焚书坑儒”说成是“欲绝诗书”，完全是歪曲历史真相，“非其实而又增之”。

王充在一千九百年前奋起千钧棒，大打孔家店，这种造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反孔不可能彻底。他对“天命观”和“天才论”的批判较深刻，而对“三纲五常”并没有触动；他一面反对“天命观”，一面又陷入“宿命论”的泥坑里，他批判儒家复古主义的谬论，坚持进步发展的历史观，指出“汉盛于周”，“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但只是在同一条轨道上的渐进的发展，是属于“进化论”的历史观；他对“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而起来造反的农民寄予同情，但是他把饥寒的原因归结于年成不好，未能接触阶级压迫剥削的实质；他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也大都是用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指出孔学矛盾之处，而不能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去深刻揭露孔学的反动本质。这就由于身为地主阶级的王充，还不可能否定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等级秩序。

到了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革命农民响亮地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这是要求改天换地的革命口号。在这个革命口号的鼓舞下，农民起义军捣毁了许多地主庄园，消灭了一批豪强大地主和大官僚，从根本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黄巾大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豪强世族大地主势力，也猛烈地冲击了腐朽反动的儒学，客观上为三国时期法家路线的推行扫清了道路。

第六章 三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第一节 曹操的法治思想和实践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桓帝永寿元年),死于公元220年(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字孟德,沛国譙郡(今安徽省亳县)人,后来称为魏武帝,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著名的法家人物。

曹操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缓慢发展的中古前期,是东汉末到三国的时代。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例如: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与名门豪强之间的矛盾;宦官集团、名门豪强与寒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等等。但是,东汉末年的主要阶级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代表豪强、门阀、世族利益的东汉王朝,支持放纵豪门世族大量兼并土地,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及东汉政权机构人员本来就是一批豪强,所以他们爬上中央的统治地位以后,就拚命的掠夺土地,搜刮民间的大量财富,象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到了桓帝时这种强夺土地的情形就严重得无法形容了,象梁冀就把“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这样达千里的土地直接占为己有。大量兼并土地的结果,形成贫富两极分化。到了东汉末年豪族的发展情况是:“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车船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的境况。而在豪门世族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的人民则处于“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由”的饥寒交迫之中,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郡县都遭受了蝗灾,河水泛滥,大量的农民破产逃亡,而地方官吏为了进一步榨取民脂民膏,往往又虚报户口数字,把逃亡农民的赋税加在还未逃亡的农民身上,结果又迫使数十万户的农民离乡背井,出现了郡县阡陌之间到处是饿殍,就连当时的京师洛阳也是“饿死者相枕于路”的悲惨景象。这就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实质所在。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由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爆发了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特别是东汉晚年以张角为首的大规模的黄巾军农民起义。黄巾军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口号,沉重地

打击了封建老巢东汉王朝及其支柱——豪强大姓。在农民战争的荡涤之下，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统治的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候，由东汉王朝一手扶植起来的豪强大姓，他们既互相勾结趁机合力镇压黄巾军的起义，又彼此争权夺利，抢夺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集团的营垒。袁绍、吕布、公孙瓒等军阀势力就借此机会各自独霸一方，发动了无休止的内战，使社会生产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带来了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只有结束这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封建割据混战局面，实行封建的统一，才有可能给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在当时，要统一还是要分裂；要中央集权还是要地方分权；要革新还是要守旧的问题，成为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力量与腐朽势力斗争的主要焦点。这个时期的儒法斗争也主要是围绕着以上三个方面进行的，曹操所处的时代正是这种复杂斗争的时代。

曹操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早年对汉末豪强专横跋扈的黑暗政治就一贯不满意，从政初期就力图革新政治，并且与豪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曹操从小就“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崇尚军事家和法家的思想。公元175年(灵帝熹平四年)时，曹操才二十岁，就任洛阳北部尉。一上任就公开敢与豪强作对。在此期间，他执法森严，造了五色棒悬挂在门上，凡犯禁的就用棒打死。有一次皇帝信用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法夜行，被曹操毅然处死。可见曹操打击豪强是具有非常胆识的。这件事引起了宦官宠臣们的不满，地方豪强又气又怕，但又害不了他，后来只好借口以推荐为名，贬了曹操的官，调到顿丘去作县令。

公元183年(光和六年)，曹操任济南相，当时济南的多数县吏依仗着豪强的势力，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他到任后不久就罢了八个县吏的官职，对豪强势力又进行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曹操还反对孔丘的“天命论”和董仲舒鼓吹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谬论，他以不信“天命”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释阴阳四时，昼夜风雨等都是自然现象与人无关的事实。他任济南相时，一下子就捣毁了六百多座祠堂，并且规定所有官民一律不得进祠堂作祭祀鬼神的活动，禁绝了“淫祀”。由于他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反对天命进行了一系列“除奸邪鬼神之事”的活动后，又遭到了儒家的敌视和豪强势力的排挤，只好退回老家去。但是，曹操的尊法反儒思想和实践，从这时候起直到谋求统一全国的全部过程中，始

终是坚定不移。建安十年，在他平定冀州以后，又反对儒家的厚葬，颁布了禁止厚葬的命令。

曹操不信天命，不信鬼神，却相信和依靠人力，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强调了人的作用。以后在他的一切实践中，总是从发挥人的作用出发，运用人的智慧与力量去战胜一切，他面对袁绍的挑战，坚定地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就是要以法家思想去实践那个“道”——而不是儒家信奉“天命”的“道”。而是打击豪强，消灭割据，完成统一的历史要求和任务。

豪门世族地主是割据分裂的社会基础，也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腐朽势力。董卓之乱后，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袁绍网罗了一批儒生，作为分裂割据的吹鼓手。他独霸一方，进行分裂战争，力图实现他割据称王称帝的野心。这股复古势力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统一。袁绍自己就表白过有“争取天下”的野心，还把占有的四州分封给他的儿子们，搞复古倒退，并与韩馥等同谋拥立一个叫刘虞的幽州牧做皇帝。他的一切活动，目的都是为建立“国中之国”。袁绍的兄弟袁术，在扬州也早想当皇帝，为建立一个“国中之国”作好了一切准备。各地大大小小的豪强也乘机争权争霸，出现了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局面。

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控制了政权之后，摆在他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努力争取国家的统一，实行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问题。他为了结束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谋求统一，公开地站在豪强割据势力的对立面，把国家的统一当为己任。

曹操先后打败袁术、陶谦。这时兖州的豪强乘曹操带兵外出的机会，兴风作浪，儒家的知识分子边让也随之制造舆论反对曹操，被曹操杀了。经过艰巨的努力，曹操消灭了吕布的割据军事力量，镇压了兖州的叛乱。

官渡之战前夕，袁绍想用大军打垮曹操，劫持汉献帝，维护世族地主的统治，便亲自率领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许昌扑来，想一口吞灭曹操。面对这种形势，曹操坚决进行抗击，但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如孔融之流吓破了胆，散布各种悲观论调，甚至密谋投敌。曹操痛斥了孔融之流的悲观论调，指出了袁绍的弱点，他用法家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了当时最顽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袁绍，这对冀、并、幽、青四州世族地主的割据势力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官渡之战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是，北方的乌桓奴隶主贵族，制造事端，袁绍的儿子袁熙、袁尚率残部逃到那里与

乌桓奴隶制军事政权勾结，准备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曹操为了统一全国，安定北方的社会秩序，公元207年，他率领了部队，跋涉千里，平定了三郡乌桓，消灭了袁熙、袁尚、公孙康在辽东的残余势力。

从公元197年到208年，曹操消灭封建割据的战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先后杀了吕布，灭袁术、破袁绍，铲平了刘表、马腾、韩遂等豪强势力的大小山头，结束了群雄长期混战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北部，巩固了北部边防，为后来的西晋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曹操后来也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也说明曹操是执行法家路线，维护封建统一的。

东汉末年，由于豪门世族大量兼并土地，农民大量逃亡，加上各个军阀集团连年混战，战火弥漫于幽、青、豫、徐、兖、冀等州。他们为了争夺地盘，在激烈的混战中残害人民，不注意生产，使得土地荒芜，形成了有兵无粮，有土地而无农民的严重现象，致使“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蝮螺)。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破坏。曹操而对这一现实，取法秦皇汉武的措施，吸取他们的经验。他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并且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是岁(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这是曹操施行了先秦法家“以农富国”、“兵农合一”的耕战政策。他在许昌兴办屯田，以后逐渐地推广到扬州、淮南、芍陂各地区。他把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控制和组织起来，按不同的编制，在公家的土地(荒地)上进行生产。同时也抑制了世家豪族土地的兼并和掠夺劳动人手。另外，还把军队中的一部分士兵，也用来扩充农业生产。曹操实行民屯、军屯这一措施之后，在较快的时间内，恢复了北方的农业生产。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和积聚军资的需要，他还提倡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方法，改革农具，推广良种，开辟稻田，农业生产获得发展，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平定袁绍以后，并下令“重(严)禁豪强兼并之法”，规定新占领的地区免除当年赋税。曹操还取消了汉代的口赋、算户而实行征收户调，对小农只收田租亩四升、户绢二匹、绵二斤，其他不得擅自征收。为了防止豪强地主向中小地主或一般农民转嫁赋税，曹操还下令“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实行屯田及户调制的办法之后，有力地打击了豪强，促进了农业生产，基本上解决了当时严重存在的流亡问题和豪强兼并土地的严重问题，并且为前线提供了急需的军粮，减轻了人民远征运粮的

徭役劳苦，为曹操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北方以至为后来的大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的生产生活起了有益的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贯彻执行什么样的路线的问题。东汉王朝所谓的“任子法”就是长子继承权的世袭制度，所谓的“征辟察举”也是直接为地方官吏推荐人材而规定是直接掌握在世家豪族手中的。根据“任人唯亲”这条用人路线，只能是毫无才能的纨绔子弟执掌政权，这些人既不会带兵打仗，又不会治理国家。结果是“奸邪盈朝”，朝政腐败而不求革新。

曹操在用人问题上，承袭了先秦法家韩非“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法家思想，主张从有实践经验的基层队伍中选拔政治军事人材。曹操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选拔人材的标准当然是能够坚持“法治”路线的人，有能力治理国家而地位低下，有进取心的人。他曾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从公元210—217年，曹操先后几次下了“求贤令”，明确宣布“负有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都录用。这就直接地冲击了豪门世族在政治上的垄断权，打破了当时崇尚名教的虚伪风气和严格的门第等级的限制，使中小地主中的革新派和中下层军吏有进入政治界立功晋级的机会。如郭嘉只不过是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曹操召见后，与他谈论“天下事”，发现郭嘉很有胆略，就表奏他当司空军祭酒。以后在曹操征吕布，灭袁术击败刘备，以至消灭袁绍和平定三郡乌桓的战争中，郭嘉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干。又如出身于郡督邮的满宠、出身于郡小吏的张既，曹操都给以破格提拔，委任要职，加以重用；在战俘中也选拔人材，象张辽、徐晃就是从俘虏中选拔来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魏国的名将。曹操对那些有才能的人，即使反对过他，他也加以重用，陈琳曾为四世三公的袁绍写过讨伐曹操的檄文，骂了曹操祖宗三代，但投降曹操之后得到了重用。所以，在曹操部下“拔出细微，登为守牧者，不可胜数。”

曹操坚持了一条“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但是这条路线的实行也经过激烈的斗争，钻在曹操政权内部官居太中大夫的孔融（孔丘的二十代孙）却跳了出来，极力反对“唯才是举”的路线。他主张用人要以“德行”、“忠孝”、“出身门第”为限，下层官吏虽有才能，也不能做大官，只有他们那批豪门世族地

主才能享受高官厚禄，这就是孔孟鼓吹的世卿世禄那一套。儒家的这套谬论，符合了当时世家豪族地主搞分封割据、复古倒退的利益和愿望，豪强地主的头子袁绍就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四世三公”的后裔，而以“德行”、“门第”鄙视曹操。曹操坚决反对儒家以“德行”、“门第”的用人路线，他把儒家的这种思想斥之为“似管窥豹”的一孔之见。他以“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法治主张，有力地驳斥了孔融之流。孔融顽固站在世家豪族立场处处反对曹操的法治，当袁绍率领十万大军进攻许昌的时候，他散布各种悲观论调，并企图策划投敌。曹操征乌桓时，孔融又利用历史故事来讥笑曹操，那时曹操缺乏粮食，提倡节俭，而在军内禁酒，他以此攻击曹操说，夏朝和商朝也因为女人而亡国，那么现在为什么不下令禁止结婚呢？在用人这一组织路线问题上，孔融不遗余力地反对曹操，用尽了侮辱、挖苦、讽刺等手段。孔融还要曹操下令实行“王畿之制”恢复分封，搞复古倒退。曹操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法家的组织路线，反对儒家“任人唯亲”，于公元208年终于杀死了孔融，除掉了一个反对派的急先锋，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势力及其代言人。

曹操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上，极力主张变革，执行“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为后来的大统一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千百年来，曹操被污蔑为“白脸奸臣”、“乱世奸雄”，这是儒家之徒制造的舆论。曹操二十岁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以来，他的一生主要是在于推行法治路线，致力于结束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以国家的统一为己任，用“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斗争策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物质上都为全国的大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斯大林同志说过：“如果不摆脱封建分散的诸侯混战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定自己的独立”。曹操的法治思想和实践，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了人民要统一的愿望和要求。

鲁迅先生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曹操是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一个英雄，是法治路线的执行者和实践者，应当给予他一定的历史地位。

当然，曹操所以能够执行法治路线，对当时的社会作了一些改革，客观上对人民起到了一定的有益作用，首先是历史的主人推动历史前进的结果，

他在前期具有法治的思想和抱负，但在豪门世族的压力下终归失败退回老家。他在中后期能够比较顺利地执行法治路线，是借助于黄巾军农民起义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以东汉王朝为首的豪门世族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曹操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表，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由四分五裂中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也只能是建立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权。他在初期镇压了黄巾军的起义，这肯定是他的污点，也是地主阶级本性的景露。我们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在历史上坚持统一，进步、革新、前进的一面，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和实践

诸葛亮是我国人民熟悉的一个历史人物。一千多年来，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把他歪曲为儒家人物，利用他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同时并立，也是法家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革新派人物。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东汉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人。出身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因父母早死，十四岁随叔父豫章太守诸葛玄寄居荆州，投靠荆州牧刘表。十七岁时，叔父死，他便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躬耕龙亩”，同下层人民有过接触，对当时割据称雄的风云人物也颇知底细。他关心“天下大势”，注意调查研究。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商谈如何统一中国的大计，请他出来帮助自己建立政权。

早期法家代表人物，都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和实现国家的统一。诸葛亮是早期法家思想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东汉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东汉王朝从此名存实亡。许多世家豪族大地主便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名，乘机拥兵自立，割据一方，互相混战，天下大乱。诸葛亮反对世家豪族搞分裂，主张中央集权和统一。他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同刘备进行第一次对话，分析天下形势，他给刘备制定了一个统一全国的战略和策略。这就是：先取荆州、益州以为根据，在所统治的地区内安抚西南各部族，同东吴孙权结成同盟，整顿好内政，然后等待天下有变，就可以出军宛、洛、秦州，一举成就统一事业。他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并问刘备：

“将军岂有意乎”！这就说明诸葛亮在未出茅庐之前，已具有这样的思想：就是力图利用“三分天下”的形势，待机建立一个象汉初那样统一的封建国家。

诸葛亮从分析当时的客观情况入手，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利用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为统一全国创造条件，坚决抛弃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在登上政治舞台后的二十多年政治生活中，他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承袭了先秦法家的基本思想和主张，表现了他的法家思想特点和实践精神，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在理论上，诸葛亮反对儒家的“天命观”，信奉早期法家“天人相分”的思想，强调人的作用。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人力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天”的意志，“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曹操开始时“名微众寡”，后来却击败名高兵多的强敌袁绍，“转弱为强”，诸葛亮总结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儒家所宣扬的“天命”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反动思想。儒家鼓吹“天命”的目的，不过是用它来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行径涂上一层“天命”的神圣灵光，藉以欺骗劳动人民，制造一套压迫有理，造反有罪的反动谬论。诸葛亮把“命”理解为“性”，认为“天命”就是人的一种思想，指出“圣人”把自己说成是“且受于天”，目的是为了欺骗人民而抬高自己。“圣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圣。”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去那层“天命”的神圣灵光，揭露了儒家思想愚弄人民的实质。他反对在一切行动中效法“圣人”，以为如此不足以成大事。他还强烈反对宿命论，指出有些人认为孔丘没有做成大事，是因为没有遇到赏识他、信任他的君主，是命运不好。这说法是错误的。他主张：一个人要有大志，做大事，就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决不能等待命运，更不要到处游说去求助别人，这样做是可耻的。从这种思想出发，诸葛亮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先验的知识和天生的才能，任何人要取得对事物的认识，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所以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曾提到“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表明诸葛亮承袭了法家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这是他推行法治的思想基础。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诸葛亮亮蜀之初，就面临着执行儒家的“礼治”路线，还是法家的“法治”路线的问题。他继承和发挥了前代法家实行法治的进步思想，在行动中坚持了法家的政治主张，在法家政治路线的指引下，竭忠尽智，辅助刘备建立蜀汉帝业。公元前 214 年，刘备占领了益州；公元 218 年又占领了汉中，于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了。

公元 223 年(蜀汉章武三年,建兴元年),刘备死,诸葛亮辅政。刘禅提出:“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诸葛亮“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教后主,蜀国“事无巨细,皆决于亮”。从公元 223 年开始到 234 年的十一年中,诸葛亮继续积极地发挥和贯彻他的法家思想和主张,因此,蜀国经济上、政治上都很有起色。

奖励耕战,富国强兵,是先秦法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商鞅、韩非等早期法家曾以实施耕战的思想和主张确定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诸葛亮承袭了法家这一思想。他根据法家“以农治国”的理论,提出“唯劝农业,勿违其实”,“唯薄赋敛,无尽民财。”主张劝导老百姓好好从事农业生产,统治者不要妨碍他们及时耕种收割;征收的赋税要尽量少一些,不要把他们剥削得太穷,以免影响再生产和引起老百姓造反。先秦法家认为:“而力而俭者富”;诸葛亮在主张发展生产的同时,也积极反对奢侈浪费。他强调,金银璧玉之货,锦绣绮罗之衣,雕文刻镂等伎作巧玩,以及重门画兽的住宅和坟墓,都不是老百姓所要求的,统统不应该提倡;丰年不要奢侈浪费,歉年也不用太俭约,平时应该有所储备,以补荒年的不足。都江堰的灌溉工程是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的命脉,诸葛亮“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结果“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左思形容当时蜀国“封域之内”水道四通八达,土地平整,庄稼长得很茂盛。他还实行“兵农合一”政策,不仅平时“休士劝农”,在战争中,也曾渭水边实行“屯田”,军民杂处,从事生产。经过多年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休士劝农”,“分兵屯田”等法家“兵农合一”和“重本抑末”政策的实行,诸葛亮就在蜀国限制了豪强地主贪得无厌的剥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当时的蜀国出现了“田畴辟,仓库实,器械利,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虽面临魏国强有力的威胁,却能保持三分天下有其一。同时,它也是诸葛亮为实现统一理想而多次进行南征北战的物质条件。

在政治上,诸葛亮制定了“汉科”(蜀汉的法律),要全体官民遵守;提出“赏罚必罚”的法治原则,不允许豪门大族、贪官污吏贪赃枉法。他说:“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他坚持这些原则,并把它作为蜀国的法度,恢复肉刑,反对滥赦,用严刑峻法打击益州豪强。诸葛亮的这些法治原则提出后,开始就受到刘璋旧政权留下来的官吏法正的反对,他劝诸葛亮说:“初有

我国，未垂惠抚，且主客之义，宜相降下，愿弛刑禁，以慰其望”。意思就是要诸葛亮放弃法治原则，对益州的豪门大族采取优惠宽容的措施，也就是要实行儒家的“礼治”。诸葛亮严词拒绝，回答说：蜀中士绅非常跋扈放纵。用高官尊荣他们，官做大就看不上；用恩典笼络他们，恩典一施就怠慢起来。我现在使他们懂得法治的威信，法执行了，他们才知道感恩；不滥封官爵，他们才知道官爵的可贵。由于诸葛亮奉行“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和“法不阿贵”的原则，所以同时代人张裔称赞他对关系疏远的人，该赏的一个不漏；关系亲近的人，该罚的也不包庇；没有功劳的不能封官；有钱有势的人也不能逃避刑法。（“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常璩也说：“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虽亲必罚。”诸葛亮还发展了先秦法家的执法原则，根据犯人对自己罪行的态度来处理罪犯，所谓“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坦白交待，重罪也可以从宽释放），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用谎言隐瞒罪行，轻罪也要从严惩办）”。他主张“宫中府中，俱可一体”，反对“内外异法”。对一向“深加器异”的马谡犯了罪，也坚决处死。李严被他撤消一切官职，没有怨气。廖立被罢免为民，闻亮死而垂泣。史载由于诸葛亮的这种明法措施，在蜀国境内做到“吏不容奸（官吏不敢为非作歹），人怀自厉（人人向善），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这些话未免有些夸张，但也可看出它的积极效果。

诸葛亮坚持了“任人为贤”的法家组织路线，在用人方面，反对以门第资历来选拔官吏，认为“人君选举，必求隐处”。因为“直士出于众下”。正直能干的官吏来自基层群众之中。他还主张“取人不限其方”（破格提拔）。他大胆擢用刘璋的部属、姻亲董和、黄权、吴懿等人，越级拔擢李严属下杨洪为蜀郡太守，又提升杨洪属下被人贱视的贫寒之士何祗为广汉太守。刘备要治蒋琬的罪，诸葛亮为之开脱，并加以重用。诸葛亮还任用了一些反抗蜀国的南中少数民族人士参加蜀国政权。

诸葛亮在蜀国的法治虽然取得不少成效，但未能在争取全国统一而治的斗争中赢得胜利，这是因为他的对方曹操也是卓越的法家人物，所行的法治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蜀国统治区域只占魏国的九分之一，实力远不如魏。刘备依照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取得四川，公元219年又占领汉中，关羽在樊城大破曹军，许昌以南人心震恐，因此曹操有迁都之议，这是刘备势力的极盛时期。但尊儒的关羽同诸葛亮在联吴等战略上，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关羽刚复自用，破坏了诸葛亮的吴蜀联盟，失去“用武之国”的荆州。刘备倾全国之力，孤注一掷，被吴将陆逊大败于夷陵（今湖北宜都），致使诸葛亮统一

全国的战略部署遭到严重挫折。蜀国从此失去了统一中原的力量。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维持了二十多年，后来宦官黄皓抛弃诸葛亮的法家路线和政策，蜀国便一蹶不振了。

儒法两家围绕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争论，主要表现在对边境民族地区施行“法令由一统”的郡县？还是把边疆民族地区当作“不与同中国”的“化外”？

战国末期，荀况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与儒家的

“内诸夏(汉族地区)而外夷狄(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抗。西汉桑弘羊主张内地边境“一体论”(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反对儒家的边境“无用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诸葛亮承袭了法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总结了西汉末以来对边疆用兵的历史经验，早在“隆中对策”中就制定了对西南各族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为辅(“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方针。

蜀国统治时期，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统称南中，居住着叟、昆、青羌、濮、僚等族。自汉武帝推行移民实边的法家政策，汉族人民不断移入南中屯戍垦荒，促进了这一地区的阶级分化与民族融合。汉代移民中的军屯官吏，长期任职，到东汉末年发展成为“方土大姓”，即移民中的统治剥削阶级。他们一般依附中央王朝，在国内出现分裂时，他们也要寻求一个内地割据王朝的支持。三国建立之初，南中大姓分化为以李恢、吕凯为首的亲蜀派和以雍闿、孟获为首的亲吴派。雍闿赶走李恢，独霸滇中，杀害蜀益州郡太守正昂，又假借鬼教执送蜀继任太守张裔于吴，由于雍闿反蜀投吴得不到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使孟获欺哄叟族说：“官家要向你们征收胸前尽黑的乌狗三百头，玛瑙三斗，新木长三丈(新木最高只二丈)的三千枚。你们能得到吗？”这些都是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叟族信以为真，附和了雍闿。公元223年，雍闿乘刘备病死，勾结越嶲郡(今四川西昌)“叟帅”高定和“永昌郡”(今贵州遵义南)太守朱褒举兵反。诸葛亮从公元223年到224年，一直采取政治争取方针，令李严写了六次信给雍闿，又由困守永昌的吕凯写信劝喻，对朱褒也极力迁就，均遭拒绝，诸葛亮感到政治争取无效，遂于公元225年揭开了南征序幕。

南征军分三路出发，马忠率领东路军，由川东进入牂牁，对付朱褒；李恢率领中路军，由平夷(今贵州毕节)向建宁(曲靖)，直捣雍闿、孟获后方。诸葛亮亲率西路主力军，由成都到安上(今四川屏山)，溯金沙江南行进入越嶲境内。这时由云南来西昌驰援的雍闿被高定部曲所杀，诸葛亮乘机攻下越患，击杀高定。孟获统领雍闿部队，撤回滇东，诸葛亮于“五月渡泸”(金沙江)，追

击孟获。他出兵时采纳马谡的“攻心”建议，想生俘高定未成。至是对孟获及其部下采取不虐待敌俘的“七纵七擒”策略，终于使孟获心服投降，遂平南中四郡。诸葛亮从三月出兵到秋天会师滇池，历时半年左右。

南征所以取得胜利，从客观上看，由于南中各少数民族与四川汉族“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政治上从属蜀国，较之旧属相距很远的东吴，有利于发展经济关系。吴国土族势力较大，赋(租税)调(兵役)较重，南中人民不愿附吴。雍闿一出兵就被叟兵杀死，投吴派失败的形势早就决定了。诸葛亮从改善民族关系出发，通过争取“为夷汉并所服”的孟获，达到“夷汉亦思反善”的目的，也起了重要作用。

诸葛亮南征，是他推行法家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法家人物王夫之(船山)写《读通鉴论》，评论了诸葛亮的南征与曹操的征乌桓一样，意义相同。他说：“魏伐辽东，蜀征南中，一也。皆用兵谋国之一道也。与隋炀之伐高丽，唐玄之伐云南异矣”。王夫之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对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作了具体分析和评价，反对儒家不加区别的把所有对边境用兵诬蔑为“好大喜功”谬论；或者大搞其“攘夷”的大汉族主义政策。诸葛亮的南征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和对祖国西南边疆的进一步开发，在祖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诸葛亮南征后对南中的治理，是他的法家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巩固边境的郡县制度。西汉在西南边境设立的郡县，东汉末年大乱后已名存实亡，蜀国官吏未能深入南中，行使职权。诸葛亮鉴于大姓、“夷帅”作地方官，势大难制，就把原来设立的益州、永昌、越巂、牂牁四郡划为七郡，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增加云南、兴古及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设立的朱提郡。郡区缩小，县数大大增加。建宁郡是雍闿和孟获的根据地，分割得最细。在郡县制度下，处于奴隶社会的边疆各族人民可以享受到内地封建法律的一些保护。

诸葛亮对南中的第二个重要措施是打击奴隶主势力。西汉时，南中只有夜郎、滇、邛都三地进入奴隶制社会。蜀国统治时期，南中多数地区盛行蓄奴制度。据《华阳国志》记载：禽坚的父亲出使越渴，“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又说：“(群)郡寡畜产，虽有僮仆，方(比)诸郡为贫”。把畜养僮仆(奴隶)多少，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志。诸葛亮继承了秦始皇、汉高祖迁徙山东富豪和六国贵族入关的法家政策，对南中奴隶主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徙其豪帅(奴隶主当权派)于成都”，“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属，习

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使这些大奴隶主不能再左右南中的事情。为了削弱南中奴隶主的反抗力量，充实蜀国兵源，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飞军。”后来伐魏时，马谡败于街亭（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只有王平所率领的这“五部”全军而还。诸葛亮还从滇池地区移民入蜀，并由李恢从永昌“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这种大量迁移少数民族人民到内地，同时迁汉族人民去实边，是法家开边疆，巩固统一的有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促进民族融合。

诸葛亮为了巩固政治上打击奴隶主的成果，又从经济上削弱他们的实力。他在迁徙“劲卒青羌”入蜀的同时，把“夷帅”统治下的一些“羸弱”的人分配给大姓作部曲，既满足了大姓的要求，又不会形成象“青羌”那样强有力的反抗力量。此外，还有一些不服从大姓的所谓“刚狠”的“恶夷”，诸葛亮鼓励大姓出金帛收买他们，招徕得多的并可世袭官爵，“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蜀国鼓励大姓扩充部曲，使一些落后部落脱离“夷帅”统治而成为大姓的私属，这就削弱了“夷帅”奴隶主的实力，也削弱了大姓的财富，减少了对蜀国政权的威胁，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促进南中封建因素的生长。

西汉移民实边，从事屯垦，本来就有把内地封建生产关系扩大到边疆的用意。西汉以后，儒家的“礼治”占上风，没有继续搞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屯田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诸葛亮在南中设置的“五部都尉”，当时是调整官营屯田的管理机构，使大姓管理官营屯田合法化。“夷汉部曲”是一种新生事物，以往屯田户主要为汉族移民，诸葛亮让大姓招募少数民族为部曲，和汉族人民共同生产，不仅促进少数民族封建因素的增长，而且加强民族融合，使“夷帅”和大姓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化为“夷汉部曲”与大姓之间的阶级矛盾。南中部曲对大姓的人身依附性很强，称为“家部曲”，相当于奴隶身份，但比之纯是“僮仆”的奴隶不同，即包含着某些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马克思说：“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诸葛亮自然不可能在南中立即推行封建制，而只有因势利导地促进阶级分化和大姓的经济发展。

诸葛亮还从上层建筑方面进一步加强屯下部曲关系。据《华阳国志》说：“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偿还分配给大姓的部曲价格），又与瑞锦铁券（作凭据），今皆存”。其主要目的虽然是通过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等艺术形式，确立统治从属关系，巩固统治。但这对于维系内

地王朝与边境各族之间的纽带，也有一定影响。至今云南各族人民把他们的祖宗制度和一些日常事物的起源，往往归功于诸葛亮，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惜，在诸葛亮扶植下产生的封建因素，由于两晋初年废除屯田制，东晋以后，统一为割据所代替，复辟势力相对增强，在一些点上的“屯下”处于四周奴隶制经济包围之中，遂逐步消失。法家路线没有能够在南中继续贯彻下去，不能不是云南长期停留在奴隶制的原因之一。

诸葛亮在打击奴隶主势力的同时，注意改善蜀政权与南中各族关系，取得了“纲纪初定，夷汉粗安”的成绩。诸葛亮对反抗蜀国的大姓和“夷帅”，采取尽可能不杀的政策，“不运粮”，减轻徭役。张翼代李恢为康降都督，“持法严，不得殊俗和”，于是“以马忠代张翼”，改变了一些高压政策，“甚垂惠爱”。后来霍弋代阎宇为都督，“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载重允当，夷晋(汉)安之”。马忠、霍弋在南中推行诸葛亮的法治，打击当地豪强，不允许汉官贪赃枉法，比起后汉“居官者富及累世”来说，多少减轻了各族人民的一些负担。

在蜀国统治南中近四十年中，政治较前稳定，民族关系有所改善，生产也有相应的发展。史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赋出叟犀濮耕牛战马金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永昌“檀华布”大量出现于成都市场。[3]如果南中不得到进一步开发，是不可能提供这样多的军资和财富的。

诸葛亮在南中实行的一系列法家政策，促进了西南边境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因而诸葛亮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西南各族人民中享有较高的声誉，至今许多不识字的少数族劳动人民并不知道孔丘其人，但是对“孔明老爹”的传说事迹却相当了解。但是，诸葛亮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自然不可能不压迫剥削人民，特别是他为了进行当时难以取胜的北伐战争，使南中各族“供出官赋，取以给兵”。当时吴人张俨批评他“空劳师旅。无岁不征，……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虽然是站在敌国立场说话，但不容否认，诸葛亮的连年用兵，加重剥削，在相当程度上也损害了他的民族和睦政策的成果。

诸葛亮的法家思想和实践，一定程度上革新了东汉末年我国西南地区豪族大姓统治的弊政，所推行的法治以及一切军事经济措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他虽然没有完成统一事业，但在

革新与守旧，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儒法斗争焦点中，诸葛亮的法家思想。较之那因循守旧的儒家思想，具有鲜明的进步性。

但是，诸葛亮毕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这是东汉末年那种社会形势的产物。东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黄巾农民大起义，地主阶级的统治发生动摇，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军阀混战，保守倒退与革新进步的斗争突出起来。为了挽救整个地主阶级的危亡，从长治久安的阶级利益出发，便产生从法家思想中寻求出路的革新政治要求。在他的实践中，也只是在不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某些调整，根本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不可能解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对基本矛盾。说到底还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诸葛亮的法治，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具体说就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思想本质是地主阶级的，不是劳动人民的。这是他的法治的阶级本质。

作为封建社会向下坡路缓慢发展时期的法家人物，诸葛亮也不可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更不可能如今天一样旗帜鲜明地对孔孟之道进行批判，他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孔孟思想。只有今天，在无产阶级与一切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的情况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下，才能对儒家的反动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一句话，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和实践，有他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过是我国历史长河中一定时期的产物而已。

第七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儒法斗争的表现形式 和特点

（公元 265——589 年）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政治思想斗争概况

黄巾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汉末的门阀地主阶级及其尊奉的儒学，为三国推行法治路线，开辟了道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曹魏政权，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厉行法治，结束了豪强地主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北方。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击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最保守、反动的门阀地主阶级。但在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门阀地主阶级，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还有相当雄厚的力量，随时准备反攻倒算，复旧倒退。

曹魏后期，以司马懿父子为首的门阀士族地主集团，通过宫廷政变，篡夺了曹魏政权，建立了大地主专政的西晋王朝，改变了曹魏的政治路线，推行礼治路线，分封诸侯，造成了司马氏内部争夺政权的八王之乱和由此引起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割据混战局面，北中国遭到了严重破坏。西晋灭亡后，司马氏集团逃到江南，在当地区门阀地主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王朝。东晋之后，依次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

在北方，则由少数民族军事贵族和部分汉族地主先后建立了十六个王国，最后统一于鲜卑族北魏王朝。不久又先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一时期整个北方是处于奴隶制残余势力和汉族门阀地主的联合统治之下。到公元 589 年，隋王朝统一中国，才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这就是西晋复旧倒退种下的祸根。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门阀士族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维护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他们力图保持分裂割据的局面，不愿出现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这一时期政治腐败，人民灾难深重。生产发展缓慢，就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专政的结果。各族劳动人民同受汉族门阀地主和少数民族贵族的压迫、剥削，以逃亡农民为主体的“流民”起义，不断发生。西晋时在四川有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在长沙有杜弢领导的来自四川的流民起义；在河南山

东一带有王弥领导的起义。北魏末年有北方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在南方，东晋末有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南齐时有唐寓之领导的起义。农民的不断流亡和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者。门阀地主阶级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就大力发展唯心主义。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也出现了十分复杂曲折的情况。总的形势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唯物主义和三国时期法家的进步传统受到打击和压制。斗争的特点是唯物主义反对玄学和佛教唯心主义的反动同盟。西晋统治者恢复了“以孝治天下”为特点的礼治路线，同时发展了维护封建名教的玄学。东晋南朝则出现了唯心主义的玄学、佛教、道教又斗争又勾结的局面。表面看来儒家、法家都遭到排斥。儒法斗争似乎已经熄灭，其实这只是思想斗争形式改变所造成的错觉。原来以天命论、神学目的论作为理论基础的西汉儒学已不得人心，儒学荒废。世代以传经守礼，通经致仕起家的门阀士族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不得不变换手法，用道家的无为思想来对抗法家要求革新进步的积极有为思想。门阀士族的代言人精心炮制了一套“以无为为本”的玄学唯心主义理论，作为儒学的补充。玄学强调名教出于自然，实质是企图从侧面论证儒家的名教纲常是天地万物的本性，为剥削压迫有理进行辩护，叫劳动人民安于现状，不要造反。很明显，玄学就是儒学的变种。因此不能说东晋南朝不尊孔，不尊儒，儒法斗争已经熄灭。实际上魏晋时期的无神论者和反映农民要求的进步思想家们对玄学的批判就是对儒学的批判。在斗争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都以法家思想为武器。因此，我们应该把无神论者反玄学的斗争看作是儒法斗争的继续。

同样，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大力提倡佛教，也不是他们悲观厌世思想的反映，而是他们政治上反动、顽固的表现。门阀士族为了维护其特权地位，除了乞援于道家外，也求救于佛教唯心主义。他们力图使儒佛结合，使佛学成为儒学的助手，共同充当剥削制度的掩护物和愚民的工具。这时反映庶族地主阶级要求革新进步的代表人物，在农民反抗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又举起法家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武器，继承法家的进步传统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有为思想，对儒家的天命论，对门阀士族的特权思想，对佛教的“神不灭论”，进行了深刻批判。这实际上是儒法斗争在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继续，只是斗争形式和特点同前一时期有所变化，有所不同而已。

在北方，这一时期斗争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当时民族矛盾的实质是少数民族的奴隶制残余和汉族封建生产方式之间的

矛盾，首先是少数民族军事贵族不断挑动民族战争，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不是被屠杀，就是被掠夺为奴。汉族的坞堡主(豪强地主)则部勒同族和邻里的农民作为自己的部曲(家兵)和农奴。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使整个北方成了人间地狱，这正是宗教唯心主义滋长的好土壤。为了毒化群众的灵魂，各王国的统治者都大力提倡佛教作为统治和驯服各族人民的精神武器。

随着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不断加强，阶级矛盾逐步上升，各王国的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必须联合汉族门阀地主，建立封建统治的政权，走封建化的道路，才能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稳定统治秩序。为了适应封建化的需要，取得封建统治的经验，各王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吸收汉族的寒门知识分子，名儒、官吏、士族充实政治机构。同时大力提倡儒学，尊孔读经。儒家的阴阳五行、谶纬迷信思想和佛教唯心主义居于统治地位，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儒法斗争，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未熄灭。如前秦丞相王猛实行过法治，打击豪强，奖励耕战，统一了北方。北魏末年农业科学家贾思勰著有《齐民要术》，继承了法家的进步思想传统，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总之，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政治黑暗，唯心主义猖狂，由于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团结一致，辛勤劳动，社会生产力还是有所发展，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也有了新的成就。很多科学家，同时是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家，直接、间接都受到了法家进步思想传统的影响。因此不能说儒法斗争到这一时期成了空白。

第二节 西晋的尊儒反法和礼治路线

建立西晋政权的司马氏的祖先是东汉以来的豪门大族，

弋有人做过将军、太守等官。司马懿是曹魏的太尉。曹操死后，司马氏父子掌握军政大权。他们纠集了一批世代传经守礼的儒生家族即门阀士族作为死党，用残杀手段消灭了曹氏势力，最后由司马炎导演了一幕“尧舜禅让天下”的丑剧，篡夺了代表中小地主的曹魏政权。司马氏继承了东汉门阀士族的衣钵，尊儒反法，大力推行复旧倒退的礼治路线。在经济上、政治上尽量满足门阀士族的利益和要求，实现门阀地主阶级专政。其具体内容是实行分封制，强化士族制和发展儒道结合的玄学唯心主义。

晋武帝司马炎鉴于曹魏时同姓诸侯不得统军治民，王室孤立而亡的教训，因此仿效西周时的分封制，大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以郡为国，捍卫中央。大国有民户二万，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次国有民户一万，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小国有民户五千左右，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国王可自选文武官吏。同时中央还委派诸王出任要害地区的军政长官，如以汝南王亮都督豫州诸军事，楚王玮都督荆州，淮南王允都督扬、江(江西)二州诸军事。这些国王既掌握着地方的军政大权，就逐步形成为分裂割据的独立王国。随着中央控制力量的削弱，就爆发了楚王玮、汝南王亮等八王争夺王位的战争。诸王在混战中，纷纷争取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族贵族参战，种下了五胡十六国大乱和南北朝长期分裂的祸根。

西晋政权的阶级基础主要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故在分封同姓的同时，不得不分封异姓的士族。早在曹魏时期，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站在门阀地主的立场，反对法治，说什么：“天下土崩之世，由秦灭五等之制。”因此，他主张恢复西周的“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号，以法定手续来巩固门阀士族的特权地位。到司马昭、司马炎父子执政时，司马朗的主张得到了实现。高级士族一般都受五等爵号，并实际分封土地，这样的封国有五百多个。为了给受封和不受封的士族以适当官职，政府又大量增设都督、将军、州刺史等高级官职以安置上层士族，让王国和五等爵国自选文武官吏，以安置中下层士族。为了保证高级士族做大官的特权，又将曹魏选拔人才的“九品官人”之法加以修改，即按照士族出身门第的高低和儒家道德标准，把士族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等九个品级，选拔三品以上士族进入领导集团。

在经济上，在不触动门阀士族原来霸占的土地之外，又规定按官品占田、占客(佃户)，荫亲属的制度。一品官占田五十顷，每品递减五顷，第九品可占田十顷。这是国家额外加给他们的土地。为了保证地主庄园所需的劳动力，一二品官可占佃客(依附农民)五十户，三品十户，最低的八九品一户。此外门阀士族还可按官品高低荫亲属，多至九族(由高祖至玄孙)，少至三族；宗室(皇族)，国宾(曹氏后代)、圣贤后代(孔孟之徒)也可庇荫亲属。被庇荫的人，不编入国家户口，不向国家纳租税和服役。这种制度实际是法律承认士族有权从国家总户籍中分割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属，从国家的总赋税中分割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赋税。这是大土地制形成过程中，第一次用国家法律来保证封建庄园发展的反动措施。东晋、南朝在庄园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门阀地主阶级专政，就是西晋强化士族制度的恶果。

在思想战线上，西晋加强门阀士族专政的措施是尊孔崇儒和发展玄学唯心主义。

西晋的高级士族多数是东汉世家大族的子孙。他们一脉相传，发展到东晋、南朝时还是江左“盛门”，“衣冠”不绝。如西晋的开国功臣王祥的祖父王仁就是东汉的青州刺史，王祥的从子王衍是西晋的大尉，王导是东晋的丞相。王祥就是《三字经》里吹捧的所谓卧冰求鱼孝敬母亲的“孝子”。日食万钱的大官僚何曾，也是以事亲尽孝，被当作“礼法之士”的典型。这两人都是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帮凶，是极端残忍、腐化的伪君子。司马氏集团对“三纲五常”里的“忠”“孝”两个主要内容是各取所需。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尊孔、崇儒、传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司马氏集团篡夺了曹魏政权，触犯了“君为臣纲”，是名教罪人。忠孝不能两全，但总要取其一端。他们不敢提以忠治天下，就只好提以孝治天下。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为了宣扬“以孝治天下”，装模作样地打破帝王不守三年丧礼的惯例。说什么：我家世代是传经守礼的儒生人家(士族)，不能因为做了皇帝就改变我的儒生本色和尽孝的天性(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目的在表明他的身份不仅是帝王，而且家庭出身也是纯粹的高贵士族。鲁迅先生在《而已集》中指出：司马氏“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皇帝宝座)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司马氏强调“孝”，不是不要“忠”。他们对别人可以不忠，但不容许别人不忠于自己那个“儒生人家”的门阀士族政权。所以司马氏这家名教的败坏者，还是要举起名教礼法的破旗，这就是司马氏一定要尊儒和实行礼治的阶级根源。

为什么司马氏尊儒，同时又发展玄学？这是由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玄学是地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产物。玄学的各个派别反映着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和政治集团的利益。

最早的玄学家何晏、王弼利用道家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提出“无为政治”的理论，主张“大臣专权，君主无为”。这是为曹魏集团内部的新贵族篡权而服务的玄学唯心主义。

其次是嵇康，阮籍一派接近于中小地主阶级的玄学家。他们同情曹魏，反对改朝换代，反对司马氏的虚伪名教和屠杀异己的恐怖统治，但又不敢公

开反对。因此，便假借道家的无为学说，采取清谈的方式和不守礼法的佯狂行为攻击礼法之士，鄙薄周公、孔丘，对抗门阀士族专政。因此，司马昭无中生有，硬把“不孝”的罪名加到嵇康头上，把他杀了。

稍后于嵇康的另一派玄学家郭象则是门阀地主阶级专政的辩护士。他竭力调和“名教”和“自然”的矛盾，认为司马氏篡魏和传说中尧、舜、禹的转让政权都是出于天道自然。他把司马氏从巧取豪夺而得到皇位，说成是什么“失之不求，得之不辞”，竭力为司马氏的礼法名教修补漏洞，为门阀士族专政找到“天理”作为根据。

东晋南朝时，随着封建庄园经济不断发展，士族制度进一步巩固，这时玄学就成了专为门阀地主阶级专政服务的理论武器。

第三节 魏晋玄学是汉代儒学的演变和改装

魏晋玄学是两晋南朝门阀地主阶级专政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的名教纲常和先秦道家的《老子》、《庄子》自然无为的思想的结合；是儒家封建伦理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是所谓逃避现实，不问政治的超阶级的清谈。

以“天命论”作为理论基础的西汉儒学的阴阳谶纬等神学迷信思想，经过桓谭、王充等唯物论者的批判和黄巾起义的扫荡，已经漏洞百出，大大降低了欺骗和统治人民思想的作用。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门阀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吸取了汉代天命论、目的论在斗争中失败的教训，他们改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经典，把《周易》、《老子》、《庄子》合称为三玄，避免了两汉神学目的论的形式，建立了比“天命论”、谶纬神学思想更细致的儒学唯心主义的新体系。

最早的玄学家是曹魏的外戚何晏及其支持者王弼。曹魏后期在宗室和外戚中间产生了一批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地位的新贵族。他们结党营私，干涉朝政，形成了以曹氏宗室大臣曹爽为首的反对法治的分裂势力。为了制造篡权舆论，何晏、王弼内外呼应，综合儒家的“名教礼法”和道家的“自然无为”提出“无为政治”的理论，宣扬“大臣专政，君主无为”。正始(公元241—249年)时曹爽、何晏集团掌握了中央实权，达到了“人臣专政”的目的。

当代表旧门阀士族的司马氏父子，乘曹魏政权内部分裂的机会，族诛了曹爽等亲贵大臣，并逐步消灭曹氏势力，终于夺取了曹魏政权。这时，为司马氏政权辩护的郭象一派玄学得到了发展。

西晋灭亡后，随着北方门阀士族的大量南迁，士族专政在东晋南朝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为此服务的玄学完成了儒家和道家合流的工作，提出了“玄礼双修”的统治理论。也就是说当权的贵族既利用儒家的“礼法”以巩固家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也利用道家的“无为”学说以论证其所享受的特权是出于自然。归根结底，就是论证门阀大地主阶级专政是出于自然，是天经地义的。

为了从理论上搞清玄学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有必要论述玄学的奠基人王弼、郭象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王弼的“贵无”思想

王弼(公元226——249年)根据儒家《周易》中为名教纲常辩护的神秘主义和道家《老子》书中“自然无为”的思想提出“以无为本”和“有生于无”的观点，来说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名教和自然的关系。王弼把客观事物叫做“有”，把超越事物之上的精神叫做“无”或“自然”。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本体。它虽然不是有人格有意志的上帝，可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封建的名教纲常都是由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无形的精神是第一性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所以他说“以无为本”。世界上实有的万事万物是第二性的东西，都是由无形的精神产生的，所以他说“有生于无”。王弼强调“以无为本”旨在说明，决定万物存在的是超万物之上的“无”或“自然”。因此人们必须按照“自然无为”的原则行事。这一观点运用在政治上，就是叫百姓要“以无为心”，“无所求焉”，这样就可使“民无所争竞”。这实际上是宣扬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叫劳动人民接受“无为”的思想，放弃改变现状的任何要求，不斗争，不反抗，让封建剥削制度万世长存。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改装。

王弼强调“有生于无”的旨在论证“名教”出于“自然”。他认为社会政治制度和三纲五常(名教)也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最好表现。他认为圣人根据自然无为的原则设官分职“立名分以定尊卑”完全是必要的。王弼宣扬孔丘的名教和礼治就是按照“自然无为”的原则办事，只是孔丘“予欲无言”口头上不讲“无为”而已。他认为明王和圣人的政治作用就在于因势利导，使天下之人都遵守“自然无为”的原则，然后才能遵守封建名教的政治原则，充分发挥“以达于礼”的礼治作用。由于作为儒家礼治路线理论基础的“天命论”早破产了，因此，王弼不惜捏造历史，硬把“无为”论加到孔丘头上，煞费

苦心地把“天命论”偷换为“无为论”。可见玄学家王弼实际上是孔孟之道的信徒，是礼治路线的辩护士。

二、郭象的“崇有”思想

王弼之后的另一派玄学家郭象(公元 252—312 年)是司马氏门阀士族地主政权的辩护士。郭象“崇有”是特别着重名教纲常的作用，他认为“名教”和自然界都是客观存在着的“有”，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这种理论似乎是唯物主义，实际是唯心主义。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万物自生论。郭象认为万物既不是由“精神”也不是由“物质”产生出来的，而是突然自生出来的，莫名其妙的独自存在着。因此，他认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郭象狡猾地用神秘主义的万物“自生”、“独化”论去代替“天命论”、“目的论”。接着他就提出“名教”是“自然”的最好表现，它和万物一样都是莫名其妙的独自存在着，所以名教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谬论正是西晋腐朽、残暴的门阀士族专政最需要的反动政治理论。司马氏篡夺了曹魏政权，变法治为礼治，敲骨吸髓地剥削农民，肆无忌惮地纵欲作恶。照郭象的看法，既然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 facts，那就都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对现状就不需要任何改革。

第二，根据“名教”即是“自然”的观点，郭象进一步论证了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他认为上下尊卑之分，贵贱之别，正如一个人的头长在上面，足在下面，脏腑在内，皮毛在外，都是自然的，所以它们都要各自安于现在的地位，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各安其分”、“各当其能”。经济上的贫富悬殊，政治上的贵贱差别，都是自然而然的，既不能逃避，也不可能改变。这就是说：贫贱的人要甘居贫贱，富贵的人则安享富贵。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各守本分，就可“相安无事”“各得其所”了。也就是说，只有按照封建等级制度的名教的原则去生活，才最符合自然。郭象宣扬知足自乐的“安命”哲学，比孔丘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简单说教要细致隐蔽得多，因此，它的欺骗性危害性也就更大。

第三，内圣外王合一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传统政治思想，儒家认为具有天赋美德、才智的圣人就应该是统治天下的圣帝明王，尧、舜、禹、汤就是这样的内圣而兼外王。复辟的祖师爷孔丘自吹“天生德予于”，野心家孟轲

自封是“天降之才”就是想内圣外王兼而有之，要由他们来重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为了适应阶级斗争新形势的需要，郭象狡猾地避开了儒家王权神授的谬论，他利用庄子自然无为的神秘主义来重新建立内圣外王合一的反动理论，作为维护封建名教、封建君主制度的精神支柱。

郭象认为世界是由自生自灭而各自孤立的事物凑合而成的。可是芸芸众生往往不懂得自己的本性是生下来就有的，不能改变的，所以往往违反着自己的本性去行事，生来是臣妾的材料，又不甘心当奴才。他说，如果有一千个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而又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人，要么就会作乱，要么就会一哄而散（“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因此，郭象认为要治理好天下，就需要少数具有理想人格的神人和圣人出来统治。他所谓的圣人就是具有“自然无为”精神境界的人，能本着“无为”的精神，用名教去治理天下的人。这样的理想人格，是他们“独有”的，是众人所没有的。所以这样的“独有之人”就是至贵之人。他们不但可以治理一国，而且可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郭象认为尧、舜、禹、汤、仲尼（孔丘）就是这样的独有至贵的神人和圣人。明明孔丘是相信“天命”和“天生德于予”，郭象硬把他树为无为政治的一面旗帜，尊之为“素王”。郭象注解《庄子》，发挥了庄子的神秘主义，有时则引用庄子的某些命题，反其意而用之。如庄子说，穿牛鼻、络马首是违反了牛马的本性，破坏了自然。郭象却说，穿牛鼻、络马首正是顺着牛马的本性，更好地发挥牛马的作用。他认为：圣帝明王的功德就是由于他们能顺着人和万物的本性，因势利导，发挥他们的最大作用。生来是臣妾的材料，圣人就诱导他们服服贴贴去当奴才，生来是贫贱或富贵的人，圣人都要把他们纳入封建名教礼治的轨道。也就是说，贫贱者被剥削是自然的，富贵者坐享剥削来的果实也是自然的，合理的。他甚至还说什么，为了老百姓的幸福，圣人才不得不出来统治天下（“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很显然郭象的内圣外王合一论，就是对门阀士族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行为的颂扬。林彪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除了直接贩卖孔孟的天命论天才论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外，同时也贩卖庄子和郭象捏造的所谓“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为独有，独有之人，是为至贵”的反动论理。郭象主张独有至贵的圣人，神人应当君临万民。林彪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挂在他的床头正中，说明他是以最高贵的超人自居，他要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要主宰世界，统治天下。

魏晋时，谈玄说妙的，主要是门阀士族的王公贵族，或依附他们的所谓名士清流（名士实际是儒生）。因此，人们就误认为玄学是魏晋南朝的主要思

想，误认为当时不存在尊孔崇儒的问题。其实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儒家的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制度。门阀士族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儒家宗法思想和等级制度的产物和代名词。所谓门阀士族就是地主阶级上层的某些家族，世代传经守礼，把孔丘作为敲门砖，通过察举或九品官人之法而取得政治经济特权。他们的发家史，就是礼治路线的演变史。老庄讲“无为”是奴隶主垮台后悲观绝望思想的反映。门阀士族及其玄学家讲“无为”，则是他们纵欲作恶的遮羞布和加强统治和剥削的武器。他们宣扬“以无为本”“不为物累”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和奴婢，可以坐享剥削成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口说看不起富贵名位，互相标榜“超脱”、“清高”，正是因为他们凭着出身门第这块招牌，已经充分享受高官厚禄这些特权，用不着求人而钻营奔竞。他们有时也不遵守儒家的某些烦琐礼法，这是为了便于他们肆无忌惮的去过奢侈荒淫纵欲的腐化生活。以上这些表现好像是玄学人生观的特殊标志，和儒家所谓的洁身自好、守礼君子的作风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儒家从他们的祖师爷孔丘起，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巧伪人。孔孟的人生观和玄学的人生观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唯心论。尽管它是从超党派的姿态出现。但从政治路线和它的阶级实质来看，实际就是披着道家老庄外衣的儒家礼治路线。由于它伪装得比较巧妙，所以长时期来被误认为它是儒家的对立学派。

在历史上的思想政治路线中，魏晋玄学到底属于那个学派，它的政治作用是什么，在儒法斗争史上，它处在什么一个地位，长时期没有搞清楚。这主要是因为：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不断深入，唯心主义往往采取更细致、更隐蔽的方式，所以比较难于识别。从政治斗争着眼，我们的初步看法是魏晋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礼治路线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各种思潮、各种派别，辨别他们代表那一个阶级，属于那一条路线是有好处的，这对于现实斗争也是有借鉴作用的。

第四节 魏晋唯物论者反对玄学唯心主义的斗争

魏晋时期和玄学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唯物论者杨泉、裴颢、鲍敬言、范缜等先后对玄学和有神论思想进行过尖锐斗争。其

中鲍敬言还着重揭露批判了门阀士族的罪恶统治，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要求。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禁绝，他们的著作大都失传了，保留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

一、杨泉、裴颜对“贵无”思想的批判

杨泉，西晋初人，生卒不可考。他吸取了汉代张衡、王充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天地万物是由水和元气构成的。他在所著的《物理论》中提出“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从而反对王弼“有生于天”的谬论。他指斥玄学家的“虚无之谈”和聒耳的春蛙秋蝉一样令人烦厌。

反对王弼“以无为本”的，有医学家裴颜(公元267—300年)的“崇有论”。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但“自生而必体有”，即必须以“有”(物质存在)作为基础和先决条件。他指出：“济有者、皆有也”，否则自生就不可能。同时指出事物的变化和相互作用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和郭象的自生说和无因论是针锋相对的。“崇有论”肯定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批判“精神”产生万物的谬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他从生产生活着眼，还提出了“劳而后婴”的观点，论证“有为”的必然性，强调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这是对门阀士族荒淫纵欲生活的严厉斥责。他同情寒门庶族，反对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主张用人要打破贵贱的界限，要以德材兼备作为选拔标准。这种用人路线上的革新主张，是对门阀士族政治特权的挑战，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反映农民要求的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

鲍敬言，东晋初人。他的“无君论”思想反映了农民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意志和要求。他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门阀地主阶级的君主专政制度，公开反对儒家的天命论和礼治路线。有关他的思想资料，保存在他的论敌葛洪的《抱朴子》中。鲍敬言着重批判了西晋人伪造的《列子》一书，其中《杨朱篇》集中反映了门阀士族的剥削意识，极端腐化享乐的生活态度；《力命篇》则宣扬贫富贵贱、上下尊卑的区别是“天命”决定的，不可改变的，竭力为门阀士族的罪恶统治辩护。天命论和“人定胜天”从来就是思想战线上唯心和唯物、儒家和法家斗争的一个焦点，从孔丘到董仲舒都是把天命论作为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鲍敬言的“无君论”集中批判揭露了儒家“天生蒸(众)民

面树(立)之君”的君权神授说。他首先指出天没有意志，不是神，不能主宰世界。他根据唯物主义自然观，论证天地是由物质性的阴阳二气形成的物质运动的不同形态。他指出，“天地之位，一上一下”，是自然现象，无所谓尊卑，从根本上动摇了君臣上下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他进一步揭露君主及其统治机构不是由于天授，而是强者治服弱者，巧诈者欺压愚者的工具。他列举了门阀贵族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纵欲作恶的大量事实。从而指出，贵族们纵欲不已，必然要加重对于农民的剥削和劳役，这就造成恶性循环，把农民逼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想叫农民不造反是不可能的，(欲令勿乱其可得乎)。鲍敬言把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灾难的根源都归结为君主制度，因此，他提出了“无君论”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上古时代没有剥削压迫的无君无臣的原始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他认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的贫苦农民如能回到无君的社会，就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顺天分地”，过着“穿井而饮，耕田而食”，“安土乐业”的自由幸福生活。鲍敬言的政治理想反映了当时处于农奴地位的农民群众对门阀士族专政的抗议，渴望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之强烈愿望。他站在唯物主义立场，深刻批判了君权神授学说，这是对儒家封建名教和礼治路线的有力打击，同时也是对农民斗争的有力支持。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鲍敬言不可能认识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所以他把君主制度和国家的产生，归结为暴力夺取的结果，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他幻想回到无君的原始社会去，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他在理论上的这些弱点，给他的论敌葛洪留下了进攻的借口。

葛洪(公元284—364年)是镇压农民起义而受到封侯重赏的刽子手。为了消灭黄巾起义曾经利用过的原始道教的革命的影响，他创立了为门阀地主服务的贵族化道教，宣扬“老子”的玄(道，一)是天地万物的根源，说什么：“有因无而生焉”，重弹玄学家王弼“有生于无”的老调。他站在门阀士族的立场，写下了《诘(责问)鲍篇》的毒草，对《无君论》进行反驳，并乘机贩卖“有圣人作(兴起)，受命自天”，大肆宣扬天命论和君权神授，美化君主制度，掩饰门阀地主的罪恶，为封建名教和礼治路线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葛洪对鲍敬言的挑战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一历史事件，可以说明东晋南朝，虽有所谓儒、玄、佛、道的不同流派，但在政治上它都是为门阀士族专政服务的，是以儒家为核心的反动文化同盟。葛洪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打的是道家老子的旗号，但从他的阶级立场和主要政治观点来看，实际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是封建名教和礼治路线的狂热辩护士和支持者。

第五节 东晋南朝佛教和儒学结合的政治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剥削制度的掩护物”、“宗教是愚民的工具”，“宗教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两晋南北朝时，国家长期分裂，社会动荡不安，矛盾重重，反动统治者就更需要宗教作为剥削制度的掩护物和愚民的工具，这就是当时佛教特别兴盛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佛教为了取得统治者的支持，以广传播，分享剥削果实，就不得不加速适应门阀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不得不走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充当儒家的助手，为维护封建名教和巩固宗法等级制度而服务。东晋南朝佛教教义不断革新和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儒佛结合的过程。具体表现是佛学和玄学、高僧和名士(儒生)结成了反动的文化同盟，名士谈佛理，高僧读儒经。如东晋时高僧慧远(公元334—416年)深居庐山，结交权贵和儒生。他既通晓玄学，又精研三礼、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和毛亨所注的诗经)。他以退出政治的形式来积极参加政治，所以当时人称他为“黑衣宰相”。慧远大肆宣扬如来佛和周公、孔子立论虽不同，但可以互相影响；出发地点虽不同，目的地则是一致的。他强调“内(佛)、外(儒)之道，可合而明，”儒佛相结合，就能相得益彰，发扬光大，更好为门阀士族的政治服务。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慧远聚徒讲授《丧服经》，以儒家经师自居，为门阀士族严格辨别世系亲疏、门弟高下服务。他造就了一批儒佛兼通的知名之士，如宗炳、雷次宗等。他还利用玄学“贵无论”来革新佛教大乘空宗“本元”的教义。他参照玄学“有生于无”的观点，论证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虚幻不实在的，只有人的精神或灵魂才是永生不灭的真实本体。因此，他叫人不要去计较地位的尊卑，贫富的差别。他认为那都是虚幻的东西，不值得对它们有所爱憎；思想感情不受牵累，就能超脱人世所谓的苦乐；死后，永生的灵魂才能进入理想的极乐世界。

宣扬灵魂不死说的，有慧远的教外弟子宗炳和刘宋的大官僚郑鲜之(御史中丞)等人。宗炳著有《明佛论》，郑鲜之著有《神不灭论》，作为善恶报应、三世轮回的理论根据。

配合慧远宗教哲学的，有刘宋时竺道生(公元364—434年)的涅槃(极乐世界)佛性(人人有佛性)学说。涅槃佛性说宣扬，在现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公平的 and 幸福的极乐世界。生下来就具有佛性的人，只要修善去恶(即按照儒家的善恶标准)就都有进入极乐世界的平等权利。佛教叫劳苦大众去追求虚构的

未来世界的平等，实际就是要维持现世界的不平等，就是要劳动人民放弃斗争，忍受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生活。佛教这种平等的谎言和进入天堂的廉价门票，可以起到儒家“天命论”所不能起的欺骗作用。因为儒家硬说贫富贵贱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只有安天乐命别无出路，连一张进入天堂的廉价门票也不肯给。在阶级斗争新形势下“天命论”大大丧失了作为剥削制度掩护物和愚民工具的作用，佛教及时出来充当儒家的助手，成为门阀士族精神统治的新工具，这就是儒佛结合的阶级实质与政治意义。

第六节 唯物论者范缜反对“神不灭论”的斗争

南朝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到齐、梁时，更加腐化堕落，他们无德无才，只靠着门第出身，世代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否神授，是否合理？门第为什么有高低？人为什么要分贵贱？人与人为何不平等？这一连串问题儒家已不敢正面回答。佛教用“神不灭论”，因果、轮回及时回答了儒家难以回答的问题。佛家不象儒家那样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讲的是一套似是而非，令人难以捉摸的骗术。胡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生行善，故今生富贵；前生作恶，故今生贫贱；今生行善，来生可生在富贵人家，甚至可以升入天堂；今生作恶，来生就变牛马，或下地狱。他们的结论是：富贵贫贱有别，祸福遭遇不同，不是上帝和天命造成的，而是自己一生行为的善恶带来的后果，因此，一切应当由自己负责。如果怨天尤人，甚至起来反抗剥削者压迫者，来生必受更重的恶报。可见佛教对劳动人民只有残忍，并无慈悲平等。贵族是佛教天堂的座上客，农民则是地狱的后补人。这种由自己负责的善恶报应说，把门阀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种种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其政治目的就是论证，剥削压迫有理，造反有罪。这和儒家天命论的结论完全一致，也就是“黑衣宰相”慧远所说的，儒家和佛家是殊途同归，“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经过宋、齐统治者如萧子良等的提倡，儒佛结合进展迅速，到梁武帝时达到高潮。

一、范缜前无神论者反对“因果报应”的斗争

在儒佛合流的过程中，南朝无神论者思想的先驱戴逵(?—395年隐士)、何承天(公元370—440年天文学家)、刘孝标(公元462—521年小时曾被掠为奴)等，都着重批判了因果报应说。戴逵曾著论批评门阀贵族的腐化生活，指

出恶人反而富贵，可见善恶报应之说没有根据。何承天则与神不灭论者宗炳等进行过多次争论。他用“薪尽火灭”来论证人死，灵魂不能独自存在。他说：万物都是由天地自然产生的，生死荣枯是自然的规律。草木死了，没有来生；人死，肉体腐败，精神消散，那里还有来生。有力地驳斥了因果轮回说。刘孝标著《辩命论》对“高才而无贵仕，饕餮(贪财、贪食如恶狼)而居大位”的黑暗政治表示愤恨，揭穿了因果报应说为门阀贵族特权辩护的实质。他指出：天命、鬼神能赏善罚恶的说法是欺人的谎言(福善祸淫，徒虚言耳)。他认为“命”不是人格神，“命”就是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它是“鬼神莫能预(干涉)”，“触山之力无以抗”的。他揭穿了佛家的因果说和儒家的天命论是一路货色；透过现象抓住了问题本质。

但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这些无神论者有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把人的精神，看作是一种可以独自存在的特殊的细微物质。这就为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说留了后门。范缜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并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因果说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把唯物主义无神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范缜反对“神不灭论”的斗争

范缜(约在公元450—515年)是有名的“神灭论”者。他出身寒微，少孤家贫，在政治上一直受到门阀贵族的排斥打击。南朝齐、梁之际，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公元489年，齐竟陵王萧子良一次大会名儒高僧，宣扬佛教因果报应。范缜在座公开和萧子良争辩。萧子良派人向他进行威胁利诱，说什么坚持“神灭论”就会损害封建名教，放弃“神灭论”就可赏以高官。范缜义正严词地回答说：我不能“卖论求官”，不能出卖无神论的观点，去换取高官。这种敢于斗争、藐视权贵的反抗精神，大灭了唯心论者的威风，大长了唯物论者的志气，千年之后的唯物论者王夫之还深为感动地赞扬说“缜不屑卖论取官，可谓伟矣”。

公元502年萧衍灭齐，建立梁朝，叫梁武帝，他是儒家又是佛教信徒。公元504年他宣布佛教为国教；又为孔丘立庙，置五经博士，大力促进儒佛合流。他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指责范缜“违经(儒经)背亲，言语可息(不许再说)”，并组织人围攻范缜。范缜以问答体裁写成了《神灭论》公开揭露佛教的欺骗和剥削的实质，勇敢地和王公贵族们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挫败了他的论敌。

范缜神灭论的主要内容和贡献。

第一，范缜用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反对唯心主义的形神二元论。“神不灭论”者认为：人的肉体和精神(灵魂)是两个东西(形神不一)，精神是暂寄居在人体中，凑合在一起(形神相合)；人死，精神和灵魂就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从而得出精神不灭，灵魂可以永生的结论。范缜认为：肉体和精神不是可以分离(形神相即)的两个东西，而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统一体(名殊而体一)。肉体存在，精神就存在，根本没有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形谢则神灭)。

第二，范缜从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原理论证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是本质和作用的关系。好比一把刀，肉体是刀口(刃)，精神是锋利，锋利是依赖于刀口的。没有刀口就没有锋利；没有肉体就没有精神。从来没听说过，刀口不存在而锋利能单独存在的，那能说人的肉体死亡而精神知觉能单独存在？(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神亡而形在？)范缜明确指出，精神现象是肉体产生的作用，精神是依赖肉体而存在的，肉体死亡，精神必然消灭。自王充以来的无神论者，在论证形神关系时，都错误地把精神看作是一种细微的特殊物质。照此说法，肉体和精神都是物质，当然精神就可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这就为灵魂不灭论开了后门。范缜明确指出知觉、思维的精神现象是人的肉体(物质实体)所产生的作用，精神本身不是物质，这就杜绝了神不灭论和灵魂永生的后路。这是唯物论发展中的一大贡献。

第三，有神论者不承认精神是肉体的作用。他们拿人质和木质来对比，认为人的“质”和木的“质”相同，可是人有知觉，木头没有知觉，从而否定精神是肉体的作用，坚持人的精神，灵魂可以单独存在。范缜指出，物质有不同的种类，人的“质”和木头的“质”是不同的；人是有知觉的物质，木是无知的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质(形体)所特有的属性，不是所有物质都具有精神作用。不能因为木无知而人有知觉就证明有脱离人体而存在的精神和灵魂。

第四，佛教信徒为了维护生死轮回的谬论，诡辩说：既然人体有知觉，人死后，身体还在，当然也应当有知觉，可见灵魂是不随着人的死亡而消灭。范缜答复说：物质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从活到死，人的“质”起了变化，活人和死人的质是不相同的。只有活人的形体才有知觉精神作用，死尸就没有精神作用，正如活着的树木能开花结实而枯木则落叶凋谢一样。枯木不能再变为活树，同样，死人决不能变为活人。既然精神是人质的作用和属性，人体是死而不能复生的，故精神也是灭而不再存在的。故人死变鬼，鬼有灵

知，鬼又变人，三世轮回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范缜认为儒家重祭祀，只是劝人尽孝的神道设教，并非真有鬼神。

三、神灭论的政治意义和局限性

“神灭论”反对“神不灭论”是一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门阀地主阶级的皇帝、王公提倡神不灭论的政治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名教和等级制度，巩固门阀士族专政。齐竟陵王萧子良认为坚持“神灭”等于破坏名教。梁武帝因为范缜坚持“神灭论”就硬给他加上离经叛道的罪名，流放到广州。梁武帝虽然信佛，但从没有忘记和门阀士族命运相关的孔孟之道。他亲自聚众讲授儒家经典，《周易讲义》、《中庸讲疏》就是他口讲的记录。有一次梁武帝问寺庙壁画家张僧繇为什么要在佛寺里画孔圣人像。张回答说：“将来还得靠他”，一语道破了孔孟之道是地主阶级的命根子。

东晋南朝的门阀贵族们，饮食终日，谈玄说佛，懒得看书学习，厌烦儒家的烦琐经典，这是事实。如果因此就认为他们忘记了名教门第，不尊孔，不尊儒，那就错了。他们在反驳“神灭论”，理论上辩不过范缜时，就引经据典，就搬出孔老二的话来压范缜。他们对范缜施加政治压力时，也是左一个“恐伤名教”，又一个“违经背亲”。由此可见“神灭论”表面上是一场反佛的思想斗争，实际上是庶族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反对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场政治斗争。

此外，东晋南朝时期，由于门阀贵族的支持。寺院经济大发展。佛寺拥有大量的土地财产，不纳租税，免服徭役，放高利贷，隐蔽户口，畜养奴婢。这些寺院地主和世俗门阀地主一样，是一大群残酷的剥削者，破坏生产，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当有神论者质问范缜说：“认识了精神消灭的道理，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范缜回答说：现在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灭，一心幻想灵魂转生，来世升入天堂的结果。懂得了“神灭”，就懂得只有耕田吃饭，养蚕穿衣，才是人生的真实事业。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的中小地主阶级在门阀士族和僧侣地主的土地兼并下，要求打击豪强，发展生产的愿望，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的要求。由此可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往往是和发展生产的先进思想联系着的，是和法家反对保守，要求革新进步的政治路线联系着的。从这一意义说“神灭论”和“神不灭论”的斗争，也是思想政治路线上儒法斗争的反映和继续。因此，我们对魏晋时期无神论者的历史作用应当肯定，不可低估。

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还有不少缺点错误。例如他在驳斥萧子良的因果报应说时，他认为人的富贵贫贱之别，好比一树花，有的花瓣落在贵人的厅堂上，有的落在厕所里。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什么善恶报应，这对打击宗教迷信和门阀贵族的特权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认为富贵贫贱只是人的遭遇有幸与不幸，是偶然性在起作用，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偶然论和王充的宿命论一样都是唯心主义的社会观，都不懂得在阶级社会中，富贵贫贱的差别是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偶然论和宿命论一样，只会让劳动人民相信命运。放弃斗争，在政治上起的作用是消极的、又由于范缜受地主阶级传统观点的束缚，对孔老二这尊偶像和儒家的经典不敢怀疑。因此，当他的论敌引经据典，强调圣凡有别，祭祀有礼时，他在回答中，就暴露了地主阶级的偏见和唯物主义思想的不彻底性。他错误地认为“圣人”的才智不同于凡人(一般人)是由于“圣人”的生理结构有特殊之处，与众不同。这就走向了唯物主义的反面，得出了和唯心主义者先验论、天才论一样的结论。同时，他还认为鬼神虽不存在，但儒家利用祭祀来教育启发人民的孝子之心是神道设教，还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乃是巨大的保守力量，象范缜这样不屑“卖论取官”的战斗无神论者，还是摆脱不了孔孟之道传统的束缚。他的失足之处是历史的倡鉴。至于他敢于坚持无神论，不屑“卖论取官”的反潮流精神，则是继承和发展了法家荀子、韩非、王充以来的进步思想传统的，是应当肯定和发扬的。

第七节 前秦丞相王猛的法治与北中国的统一

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起，北方陷于混战局面。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地主先后建立了十六个王国。这些少数民族多数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或者正向封建社会转化。各王国在争夺政权的过程中，都以大屠杀和虏掠人口作为征服手段。在各王国残暴的军事统治下，沉重的赋税剥削和无止境的征发，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生产遭到破坏，黄河流域充满着战乱、饥饿、死亡的恐怖。当时的汉族豪强地主则筑坞堡武装自卫，隐蔽户口，成为一股强大的封建割据势力。少数民族贵族也强占土地，强迫汉人为荫户，如前燕鲜卑贵族的荫户总数超过王国户口，有的甚至“古山护泽，卖樵鬻水”。

在残酷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下，以汉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渴望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融合。

另一方面，各王国贵族，在人民的强力反抗下，则联合汉族豪强地主，加强反动统治。他们除利用佛教毒害人民外，还大力提倡两汉的儒学，以谶纬迷信，蛊惑人心，搞复旧倒退，逆历史潮流而动。

当时建立前秦王国的氐族是西北、关中的旧族，汉化较深，破坏性较小。前秦统治者苻坚慑于人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吸取匈奴、羯等军事贵族残酷统治的失败教训，不得不改弦更张，走封建化的道路。可是当时氐族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集团反对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多次举行叛乱。同时，留在北方的汉族豪强地主已形成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地方割据的半独立王国，有左右政治局势的实力。苻坚为了排除上述两和势力的干扰，加强君主专制，实现统一全国的野心，因此在也统治的前期，大力争取中小地主阶级的支持，重用出身贫寒的汉族知识分子如王猛等人，实行法治，镇压氐族旧贵族的叛乱，但同时，他又提倡尊孔读经，恢复西晋的士族制度，争取汉族豪强地主的支持，化阻力为助力。由于前秦政权得到了中小地主阶级的支持，又信任王猛推行法家的富国强兵的耕战政策，故能在较短期内结束了七十多年的割据混战局面，实现了北中国的统一。统治区域由华北、东北扩大到西域(今新疆)及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

王猛(公元323—375年)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

出身贫家，幼年时卖畚为业，后读书，喜兵法、有谋略，主张“治乱邦以法”，后因同乡吕婆楼(前秦尚书)的推荐，深得苻坚的信任。王猛担任京兆尹(首都长安行政长官)时，本着“法不阿贵，刑罚不避大臣”的法治精神，“禁勒豪强”，不等苻坚批准，果敢地镇压了危害百姓的不法权豪贵戚二十多人，使得“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苻坚也感叹着说：“我如今才看到天下真的有法了”。

370年王猛出兵进行灭燕的统一战争。他坚持改朝换代而不残害人民的方针。进军期间，军纪严明，燕国人民仍然各安其业。可以看出法家对待人民的态度与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儒家是大不相同的。王猛灭燕后，留用原来郡县官吏中的有用人材，包括归附的士族，废除旧时燕国的暴政。为了打击关东的分裂割据势力，他把燕国的王公贵族，匈奴、羯等余部和汉族的坞堡宗主共约二十万户迁到关中(陕西)，加以管制，为中原人民除了一害。这对恢复发展生产，实现国家的统一，也是个有力措施。王猛担任丞相后，力图在前秦广大地区推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和用人路线。他“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罚必当罪”。加上统一后，社会比较安定，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

恢复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关中水利灌溉工程，丰年出现了每亩十斛的高产收成。由首都长安通向各州的大道上，都种上了槐柳，设立了亭驿，商业逐渐活跃，南北贸易也局部得到恢复。旧史说：王猛相秦，“国富兵强，道不拾遗秦国大治”，未免夸大其辞，但可以肯定的是：王猛反对分裂割据，反对向奴隶制倒退，坚持革新、统一的法治路线，这对密切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融合，实现国家的统一，发展社会生产，是有贡献的。

在十六国初期，北方汉族人民大量南迁，促进了长江流域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北方汉族人民为了挽救向奴隶制倒退的危机，都希望由汉族的东晋封建政权来重新统一中国。王猛从发展封建经济出发，故也认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东晋封建政权是“中华正统”，和奴隶制的残余势力比较，还有较雄厚的力量；另一方面，北中国虽已统一，但内部矛盾重重，落后与先进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仍然存在，奴隶制的残余势力，随时有叛乱复辟的可能，故当务之急是加强法治，巩固新建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实现封建化。所以王猛临死之前，一再劝告苻坚千万不要发动对晋战争，应当消灭北方的奴隶制残余，继续打击汉族门阀地主的割据势力。

可是苻坚在君主专制制度基本确立之后，由于军事贵族的阶级本性未变，他开始腐化倒退，逐渐缩小统治集团的阶级基础，由依靠中小地主阶级转向主要依靠旧军事贵族和汉族豪强地主。重用暗藏的、伺机复国的前燕鲜卑贵族慕容垂等。王猛死后，他马上取消了以前实行过的带有法家色彩的措施，由儒法兼收并用，转为提倡佛教，独尊儒术。例如在王猛当政时期，苻坚弟苻融在河北违法自选官吏，效法春秋时期，齐、鲁的尊儒，擅自建立学宫，受到政府弹核后，苻融主动派人到长安向王猛请罪，可是在王猛死后苻坚在旧势力的支持下，带头崇佛尊儒，连四军将士也得读经，选派儒生前去讲授。

由于苻坚改变了王猛的法治路线，幸灾乐祸的暗藏敌人前燕贵族慕容垂等私自议论说：王猛死后，秦国的法治逐渐废弛，现又开始奢侈腐化，秦国的殃祸快到来了。图谶预言燕当复国，看来是会灵验的，我们应该结纳英雄豪杰，顺从上天旨意，叛秦复国。因此，当苻坚准备大举伐晋，受到群臣反对时，鲜卑慕容垂和羌族姚萇就乘机暗中怂恿苻坚伐晋，请他“圣心独断”，一意孤行，发动一场非正义战争，加速秦国的崩溃，以便达到他们分裂复国的目的。

公元383年苻坚征发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九十万大军伐晋。由于苻坚复旧倒退，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奴役剥削，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故

苻坚伐晋必然失败。同时，由于鲜卑贵族慕容垂等别有企图，军心涣散；加上南北两方汉族军民，互相呼应，奋起抗战，故淝水会战，秦军一触即溃，前秦政权迅速瓦解。鲜卑慕容垂在黄河下游建立了后燕，羌人姚萇在黄河上游建立了后秦，达到了分裂复国的目的。不久北方又分裂成更多的王国，十六国的黑暗统治在北方又继续了半个世纪。公元前439年，落后的鲜卑拓跋氏好战集团统一了北中国，曾一度在封建社会里发展过奴隶制，使北方人民群众在反对复辟倒退的斗争中，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

总之在十六国的黑暗统治时期，王猛的法治实践在短暂的十多年中，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恢复了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这对于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重新实现多民族祖国的统一事业是有贡献的。

由于旧史关于王猛的记载十分简略，因此，我们很难确切论证王猛法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从主流看，可以说他是继承了法家的进步传统的。但王猛毕竟是一个地上阶级的政治家，他和苻坚有一致也有矛盾的方面。从他的斗争策略来看，他迁就过苻坚的尊儒兴学和恢复士族制度；在阻止苻坚重用鲜卑、羌族贵族的斗争中，表现出软弱动摇，他认为东晋门阀士族政权是“中华正统”。这些都说明他没有完全摆脱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因此，不能和苻坚的错误思想进行有效的斗争，也不能形成以法家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故王猛一死，旧势力马上抬头，法家路线就告终结。

第八节 北魏末年贾思勰的尊法反儒思想

公元五世纪初，十六国的旧贵族经过百年的混战和民族融合，已基本封建化了。公元420年鲜卑拓跋部统一了北中国，国号北魏。处于奴隶制初期阶段的拓跋部贵族大量掳掠人口充当奴隶。这种历史的倒退，受到了汉族和已经汉化的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到魏孝文帝时，拓跋内部主张封建化和反对封建化的斗争还很尖锐，为了加强统治，他不得不进一步争取汉族门阀地主的支持，有计划的执行尊儒汉化的方针。随着门阀士族政治地位的上升，两汉儒家复古守旧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这对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在北朝，除佛教艺术有所发展外，科学技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束缚，成就不大。重要的学术著作只有酈道元的《水经注》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贾思勰是北魏末年的一位农业科学家，生平不详，只知他做过山西高平太守。他著有《齐民要术》十卷九十二篇。自序提到，他在写作中“采摭(取)经传，爰及歌谣农谚，询及老成(老农)，验之行事(实际观察)”。即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系统地总结了五世纪前我国农业、园艺和食品工艺的丰富经验，写成了农业科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巨著，也反应了科学领域儒法斗争的状况。

儒家的祖师爷孔丘鄙视生产劳动，仇视劳动人民。历代尊儒的反动统治者和封建士大夫只顾残酷剥削人民，从不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他们对科学工作者的成就，诬蔑为“雕虫小技”，妄加鄙视，或唯心主义地加以歪曲，纳入儒家礼治路线的轨道。儒家思想是科学的死敌。因此，我国历史上有成就的科学家一般都是尊法反儒的，贾思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从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序中，可清楚看出，他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写作过程，都贯穿着尊法反儒，不破不立的战斗精神。他继承了法家管仲，李悝，桑弘羊等的先进思想传统；充分肯定了法家革新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对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同时，揭发批判了孔丘和儒家思想对生产和科学技术所起的阻碍与破坏作用。

他阐述了《管子》“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的重农思想，并引用李悝，商鞅变法的实际效果作为论据。他说：“李悝为魏文侯尽地利之教，国以富强；秦孝公用商鞅，急耕战之赏，倾夺邻国而雄诸侯”。他称颂汉代法家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

贾思勰在尊法的同时，把斗争矛头指向孔丘。他借芸田老人在子路面前骂孔丘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算什么夫子！”的话来揭露批判儒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鄙视农耕，仇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他还引用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批判了孔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思想。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生在勤，勤力可以不贫”，“谨能胜祸”。他认为天时虽好，不去耕种，“谷亦不可得而取之”；天时虽坏，努力生产，也可以“菜盈倾筐”。这就是荀子“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的人定胜天思想的发挥，也是对儒家天命论思想的有力批判。

从贾思勰的尊法反儒思想，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儒家两家的路线斗争是贯串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等各个方面的，以及科学文化的各个领域的。因此，我们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就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否则，

就不易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斗争服务。

第八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儒法斗争

第一节 隋文帝杨坚重法轻儒

公元 581 年，北周的外戚杨坚夺取了宇文氏的政权，建立隋王朝。他为了完成和巩固国家的统一，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和打击门阀地主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元 589 年，消灭割据江南的陈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杨坚“未及十年，平一四海”的主要原因是：经过几百年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大大小小的农民和士兵的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奴隶制残余和门阀地主，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的发展，统一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其次，杨坚是一个重法轻儒的政治家。他和这个时代的其他法家代表人物一样，表面上是尊儒的，但实际上是执行的法家政策，因而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杨坚即位后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限制、打击门阀地主、加强中央集权。

从东汉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门阀地主，经过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一度有所削弱，但在此后的军阀混战中，他们又筑起大量的坞、堡，聚族而居。这些族人逐渐沦为部曲。自耕农和部份中小地主为了逃避繁重的力役、兵役和苛捐杂税，也不得不交出土地，以换取门阀地主的“保护”。在这种力量支持下建立的政权，当然不敢触动他们的利益，不仅不能搜刮逃户，还要把政府掌握的农民赐给他们。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中，门阀地主的势力仍然在不断发展，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更重要的是占有大量依附于他们的劳动力。这些依附农民，不受政府管辖，他们既不是政府的“编户齐民”，当然也不承担政府的课役。而门阀地主则是“百室合户，千丁共籍”。“一宗将近万室”他们“恃势侵夺、富有连畛瓦陌，贫无立锥之地”。丧失土地的农民，被迫投靠门阀地主，中央政权所控制的户口“十亡六七”。

门阀地主是分裂割据势力的基础，而分裂割据又为门阀地主的发展创造条件。在政治上他们反对统一，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变革；在用人方面，主张根据门第高低，反对唯才是举，力图维护儒家赞美的“世卿世禄”，垄断当官的特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世代传经，把孔孟之道作为维护其反动

统治的思想武器。他们是当时最反动最腐朽的阶级，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门阀地主急剧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激化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从西晋末年起，农民起义连绵不绝，此伏彼起。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权与分裂割据，门阀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要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限制、打击分裂割据势力的基础——门阀地主。而门阀地主的削弱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人民的。自公元五世纪起，南北双方的历代王朝都采取了一些限制门阀地主的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杨坚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和门阀地主争夺劳动力，把荫蔽在门阀地主户内的劳动力转到国家的户籍本上。在长期的战乱中，虽然“豪强征敛，倍于公赋”，但是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兵役、差役，只好投靠门阀地主。为了把他们重新纳入国家的户籍本上，必须使编户的负担低于门阀的“征敛”，隋政权颁布了新的课役制度，新规定把丁年略为缩短，课役稍稍减轻。同时为了保证丧失土地的农民有地可种，又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但仅仅采取这些措施仍然不够，这些依附农民本身没有能力摆脱门阀地主的束缚。因此，杨坚又采纳高颖的建议实行“大索貌阅”，挨家挨户进行检查。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查出了大量的被荫蔽的户口，削弱了门阀地主的势力，加强了隋王朝的力量。在这里必须指出，杨坚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隋王朝的剥削，巩固隋王朝的统治。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史学家吹捧杨坚“轻徭薄赋”是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这是完全错误的。“轻徭薄赋”只不过是统治者争夺劳动力时采取的一种手段，这些措施归根到底都是对统治阶级有利的。

在政治制度方面，杨坚也作了一些改革。南北朝时，政治黑暗，各种机构，重重叠叠，所谓“十羊九牧，民少官多”。北周宇文氏尊儒复古，仿周礼设置了许多虚有其名的官职，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杨坚掌权后把这些冗官全部废除，同时在中央设立三省六曹分管全国的行政事务；把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权简化为州、县两级；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平陈后把北周创建的府兵制改为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使几十万长期脱离生产的职业兵变成“亦兵亦农”；的生产者，这一措施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选拔官吏和用人方面，杨坚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法，创建了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材，还主张“有才必举”为庶族地主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打破了门阀地主的垄断地位。同时还废除了地方

官自己选拔助手的制度，规定全国大小官员一律由朝廷任免、州县的佐吏也要由吏部选授，从而结束了自东汉以来，门阀地主控制地方实权的局面。

杨坚还坚持“法治”，对于妄图搞分裂割据的叛乱者和贪官污吏，都给予严厉的惩罚，大批官僚和贵族都因谋反和犯法被杀。

杨坚表面上也搞了一些尊儒活动，实际上“不悦诗书”，公元601年，他以学校多而生徒不精为理由，下令废除全国各地的学校，只在京师保留一所。著名的儒生刘炫、刘焯等，都没有得到重用，甚至连课役都没有免除。

由于杨坚重法轻儒，执行了一条“法后王”的改革路线，加强了中央集权，限制削弱了门阀地主，统一了全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国家控制的户口由三百六十多万户增加到八百九十多万户，生产发展，经济繁荣，隋王朝搜括积累的财富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隋开皇时出现的这种繁荣景象，首先要归功于劳动人民，这是几百年来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长期反抗斗争的结果，是各族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杨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坚死后，杨广继承皇位，他凭藉高度集中的皇权和杨坚长期搜括积累的巨额财富，大肆挥霍，胡作非为，对内大兴土木，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的残酷压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三次远征高丽，其中一次动员人数多达二百万，骚扰遍及全国，人力、财力遭受巨大损失，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最后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王朝的反动统治。

农民起义军捉到隋王朝的官吏、门阀地主和读经书的反动儒生一律处死，用武器批判了反动的孔孟之道，狠狠地打击了地主阶级。

旧贵族李渊也乘机起兵，混水摸鱼，攫取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唐王朝。虽然胜利果实被地主阶级窃取，但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革命精神和批判孔孟之道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劳动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每当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总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向全副武装的地主阶级发起猛烈的进攻，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第二节 法家占主要地位的唐代前期

一、李世民的法治思想

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最顽固最反动的门阀地主。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隋末农民起义打击和削弱了门阀地主的基础上，出现了唐代前期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家空前统一的强盛局面。

政治路线决定政策，政策又体现路线。唐帝国强盛的另一原因就是由于它前期的主要当权者李世民、武则天等人推行了进步革新的法家路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在推行法家这一政治路线的过程中，儒法两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李渊虽然是唐王朝的开国之君，但是他所推行的基本上是儒家的反动路线。他执政期间，任人唯亲，分封宗室，恢复早已被杨坚废除的州大中正，重用门阀地主出身的官僚，纵容皇亲国戚为非作歹，他们骄恣纵横，“并兼田宅”，四子齐王李元吉在并州“纵其左右攘夺百姓”，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起兵之初就对突厥俯首称臣。当突厥奴隶主贵族不断地对中原地区骚扰和破坏时，又束手无策，甚至企图烧毁长安，迁都逃避，由于李世民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才没有实现。

李世民是唐王朝的实际缔造者。从太原起兵到统一全国，主要是他的功绩。和李渊相反，他主张唯才是举，广泛提拔重用庶族地主中有才能的代表人物，持法严明，论功行赏，对突厥奴隶主的侵扰主张抵抗、反击。由于路线不同，再加上儒家立嫡立长反动理论的影响，李渊决心把皇位传给长子李建成。李建成喜酒色游畋(音甜，打猎的意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李渊的宠妃“谄谀赂遗，无所不至”。“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夺人田宅，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他的所作所为和李世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了夺取政权，双方斗争十分激烈。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次阴谋杀害李世民，都没有得逞。在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生死关头，公元626年，李世民毅然发动了玄武门政变，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迫使李渊

交出政权。唐代初年的儒法斗争以执行法家路线的李世民取得胜利而结束了第一个回合。李世民上台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的措施，法家路线得到了进一步贯彻执行。

李世民刚刚即位，突厥的二十万大军就打到了渭水边，李世民下令拘押了突厥的使臣，亲自带兵迎战，粉碎了突厥奴隶主妄图把中国历史车轮拉向后退的反动战争。此后，他连续派李靖、李勣等率领大军打击突厥；侯君集等平定高昌，最后消灭了这些地区奴隶主和封建主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这些战争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应当充分肯定。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侵略衣钵，对于我们美丽富饶的国土垂涎三尺，为了制造侵略借口，胡说什么“中国北方领土是以长城为界”。事实上，在长城以北居住的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居住的地区（一部分现被苏修霸占，包括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出生地——碎叶城）从来就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李世民消灭了这些地方割据政权后，被尊为天可汗。唐政府在这些地区设置了都护府，羁縻州，派官设守，历史的记录有力地驳斥了苏修侵略者的无耻澜言。

李世民之所以能完成统一事业，和他坚持执行法家一贯主张的耕战政策是分不开的。他执政期间，大力推行均田制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奖励生产，重视农耕和战备。他说：现在中国虽然安定了，但是如果忘记了备战，人就会懒惰。他主张农闲时要讲武。他深深懂得以战去战的道理。即位不久，他就亲自带领诸卫将卒在殿廷练习射箭。当时很多人认为士兵带着弓矢在皇帝面前习射是十分危险的，要求废除。他拒绝这一意见，坚持训练。从此以后，战士都积极练武，练成了一支十分精锐的部队。

李世民坚持“法治”，对于犯法的官吏严刑惩办，绝不姑息。他对诸葛亮所执行的“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这条法家路线十分赞赏。他自己也严格按照这一原则办事。有个叫高甑生的犯了法，有人说他是秦府的旧人，希望能得到赦免。李世民回答说：“他以前有功劳我并没有忘己，可是现在治理国家就要遵守法律，不管对谁都一样，如果牧免了他，有功的人很多，都犯了法怎么办呢？正因为这个原故，我才不赦免他”。李世民还一再告诫他的臣下，要求他们要遵守法律，忠于职守。对工作要认真负责，否则就要亡国亡家。对于地方官他也十分注意，把全国各地方长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名字下边记录着他们的功劳和过失，有功的提升，有错误的立刻就贬降。

在用人方面，他坚决反对李渊用人唯亲的儒家路线，坚持用人的标准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大小，而不是根据亲疏远近。他所选拔重用的魏征、王珪等人原来都是他的仇敌，而对于窦诞等过去虽然交往密切但是缺乏才能的人坚决罢免他们的官职。他重用房玄龄、杜如晦，是因为他们有才能，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秦王府的勋旧。他一再声明用人的标准是看有没有能力承担这一工作，而不因为过去亲近或疏远而有所差别。

为了广泛地选拔人材他把隋代开始创立的科举制进一步确定下来，设立进士，明经两科作为中央政府选拔人材的主要途径，广泛地为地方地主阶级中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打开了入仕当官的大门。从东汉以来长期被排斥的“寒门”，在政治上没有特权的庶族地主通过科举，一旦考中，就可以当官参与朝政。这对门阀地主势力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李世民还通过修氏族志的办法，进一步削弱门阀地主的势力，降低山东门阀地主的等级，有意地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

李世民还反对天命，他认为吉凶在人和阴阳没有关系，“阴阳拘禁，朕所不行，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禁，农时甚要，不可暂(暂)失”。但是，由于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地位的转变，李世民也搞了一些尊儒的活动，如让孔颖达编写了《五经正义》，尊孔老二为先圣，凡是通一大经的都可以当官。他还经常到国学、太学视察，增筑学生宿舍一千二百余间(连驻在京师的部队里也派了博士，教授经书)。国学的人数达到八千多人；还一度打算分封宗室、功臣为世袭刺史，由于李百药等人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但是从他的全部活动观察，他基本上执行了法家路线。

二、女政治家武则天的法治路线

李世民死后，李治继承皇位，门阀士族势力又开始抬头。

李治亲自执政时间不久，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进入宫廷，经过激烈斗争，逐步取得政权，大力推行法治。

武则天(公元 624——705 年)，父亲武士裴(音户)虽然是一个家富于财的大商人，又是随从李渊起兵的有功之臣，但是从门阀之家看来这一出身是低贱的。当李治要封武则天为皇后时，以褚遂良为首的门阀地主出身的大官僚激烈反对，要求李治“妙选天下令族”，就是说要选皇后就要从出身高贵的门阀地主家里挑选。她当了皇后以后，首先赶走了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李

治死后，徐敬业等旧势力以匡复庐陵王为名发动叛乱；他们妄图分裂国家，割据江东。宰相裴炎，大将程务挺和唐王朝的宗室越王等都企图推翻武则天。他们的出身是门阀地主，他们受的教育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在他们看来，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根本不能也不应管理国家大事，他们勾结起来发动一次又一次叛乱。由于武则天及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这些叛乱都很快地就平定了。她对政治上的反对派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绝不手软。反动的史学家恶毒地攻击她“严刑峻法”。实际上她所杀的都是李唐的宗室、大贵族、大官僚，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门阀地主。

从东汉中期逐步发展起来的门阀地主，大体上分布在江南、山东、关陇三个地区。江南地区的门阀地主从东晋以后已经逐渐削弱，隋文帝平陈之后，它们起兵反抗，企图维持分裂割据的局面，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隋末农民大起义给予江南和山东地区的门阀地主以沉重打击；李世民通过修氏族志又一次削弱了山东门阀的政治地位。可是作为门阀地主的另一支势力——关陇集团由于和李唐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没有削弱。但是，在武则天统治期间这支力量遭到了沉重打击。

武则天在打击门阀地主的同时，采用破格用人的办法，大力提拔庶族地主中有才能的人物，如狄仁杰、姚崇，宋璟等，这些人或多或少做了些有利于社会生产，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武则天统治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她采用了自举、殿试。武举等措施，广开仕途，培养人材，她选用人很多，但不称职的很快就被罢官，真正有才能的很快就提升。由于她善于用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杰亦竞为之用。”

这一批庶族地主涌上了政治舞台，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新型的力量，他们坚决拥护武则天，是她镇压门阀地主的有力助手。

武则天比较重视发展生产，她做皇后时，提出了十二条建议，第一条就是勤农桑、薄赋徭。她自称“不爱身而爱百姓。”当然，实际上武则天根本不可能真正爱百姓，她也根本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但由于她打击了大贵族、大官僚，打击了门阀地主，在客观上对于人民是有利的。

武则天当权时，对儒家是极端轻视的，盛极一时的国学、太学几乎连人影都看不见了，诗书礼乐也很少听到有人学习，“二十多年里，礼乐废散。”武则天轻视儒家是很自然的，孔老二早就胡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董仲舒又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反动说教，儒家还宣扬“牝鸡司晨，唯家之索”。认为只有男子才是一家之主，妇女只能是被压迫的对象。武则天牢牢掌

握政权近五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对儒家宣扬的男尊女卑的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

武则天敢于冲破儒家男尊女卑的枷锁，这和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密切关系。在她当皇后的前两年(公元653年，越州女子陈硕贞起兵反唐，自称文佳皇帝。她实际上是我国第一个女皇帝。在她的启发下，李治死后，武则天改唐为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全国的女皇帝。

武则天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她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一生中和李唐宗室斗，和贵族官僚斗，和门阀地主斗，冲破层层阻力，突破儒家礼教的束缚，掌握了五十年政权，当了十五年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创举。

武则天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这时的地主阶级早已失去了初期的革命性，向着纸老虎转化，反动性日益加强。但是，在地主阶级内部，东汉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门阀地主仍然享有特权，他们代表着地主阶级中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而一般庶族地主没有这些世袭特权，被排斥在政权之外，随时有被兼并的可能。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武则天代表着庶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掌握了政权，继承推行了“法治”路线，打击、限制了门阀地主的特权，使一些庶族地主能够在政治、经济上冲破门阀地主的垄断。特别是她继李世民之后，较彻底地摧毁了门阀地主中最后一个堡垒——关陇集团。从而使门阀地主的统治宣告结束。她这种打击腐朽、反动、保守势力的措施，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前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是进步的，她的作用应予肯定。

与武则天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几继承了东汉王充《问孔》的反潮流精神，在他的著名史学评论《史通》中，写下了《疑古》，《惑经》两篇，指出儒家的经典——五经前后的矛盾，是非无准。刘知几的这些著作，为武则天的革新路线制造了舆论。

唐代前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加强，但这并不是刘少奇、林彪一伙所鼓吹的什么“让步政策”的结果。唐初的强大，决不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施行什么“仁政”；社会的发展，更不是什么地主阶级发善心，对劳动人民“让步”的“功劳”。推动唐初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急风暴雨般的隋末农民战争。在斗争中，农民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捣孔庙，烧“圣经”，使得“学者沦丧，儒教凌迟”，用武器的批判狠狠打击了儒家反动思想，猛烈冲击着最腐

朽、最反动的统治势力——门阀地主，扫除了阻碍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腐朽势力，体现了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正是隋末农民战争削弱了大地主的保守势力，庶族地主得到了一些掌权的机会，李世民，武则天也才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推行一条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法家路线，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整个封建社会看，唐以后逐渐转入后期，地主阶级中革新派的力量日益弱小，而李世民、武则天本身的阶级和历史局限，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尊法反儒，他们所执行的法家路线也后继无人，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了。

第三节 法家代表人物柳宗元的反儒斗争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生于公元 773 年，死于公元 819 年，虽然他只活了四十六岁，但却闪烁着战斗的光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和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柳宗元主活的时代，是唐王朝走下坡路的时代。安史之舌虽已平定，但是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唐王朝与藩镇之间，官僚与宦官之间，矛盾重重，政治非常黑暗。经济上，统治集团为了支付日益庞大的军费和满足其骄奢淫洗的生活，横征暴敛，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掠夺。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除了乞灵于孔丘，提倡尊孔读经之外，又想借助于佛教，幻想用宗教迷信来麻醉人民。佛教广泛发展传播的结果是寺庙占有大量土地，大批的僧侣地主不纳税、不服役，享有种种特权，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唐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不保夕。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中小地主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打击藩镇，削弱割据势力，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取得唐顺宗李诵的信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颁布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改革法令：废除了给长安一带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宫市”，免掉在横征暴敛下人民积欠的租赋钱五十二万余贯，降低盐价，并且试图夺取宦官的财权和军权。这些措施的矛头都指向了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势力，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却遭到宦官、藩镇和大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勾结起来发动政变，迫使顺宗退位。王伾病死，王叔文被杀，八名参加革新的改革派被贬到边远地区做“司马”，柳宗元就是其中的一个。政治斗争的失败并没有能使他屈服，相反地，他的斗志更加旺

盛，在被贬逐的十四年里，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唯物主义的著作，针对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的韩愈的唯心主义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韩愈(公元768—824年)，是唐代反动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和柳宗元相反。他一贯主张复古倒退，以孔孟之道的卫道士自居，写了许多宣扬儒家学说的毒草。他对柳宗元等进行的改革运动十分反感，在他草拟的《顺宗实录》和《永贞行》等诗中，对王伾、王叔文、柳宗元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胡说什么“一朝夺印付私党”，“小人乘时窃国柄”，竭力掩盖历史的真象。韩愈极力宣扬儒家的天命论，胡说“天能赏善罚恶，有功于天的就要受到赏，有祸于天的就要受到罚，”公开宣扬天有意志，人的命运也由天决定。

柳宗元在《天说》，《天对》等著作中痛斥了这种反动的天命论，他指出：天、地、元气、阴阳和果蔬，痲痺、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东西，他们本身都没有意志，他们都不能赏功，也不能罚祸。有功的人就是自己有功，有祸的人就是自己有祸。(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就是吉凶在人而不在于天。

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始终和柳宗元并肩作战的刘禹锡(公元772—842年)曾写了三篇《天论》，提出天人交相胜的观点。他认为政治黑暗，天灾可以胜人；政治清明，人可以战胜天灾。他指出：“人所以胜天者，法也”。进一步发挥了人定可以胜天的法家思想。

刘柳二人对于韩愈妄图以天命来反对改革的谬论进行的有力批判，反映了唐代中叶，在尊天命和反天命这个重大问题上儒法两家的激烈斗争。

韩愈不仅鼓吹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而且相信有鬼神妖怪的存在，相信“天人感应”。柳宗元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辩明天人之分，写了《时令论》、《断刑论》，不仅进一步批判了韩愈的唯心主义天命论，而且是对先秦以来儒家的唯心主义天人感应论进行的一次总的清算。

《时令论》批判了儒家经典《礼记·月令》中所宣扬的宗教迷信思想。《月令》规定经济生产和政治措施这两方面每月应该做的事。它提出农业生产必须随着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农业措施。因此，国家的庆赏和刑罚，以及国君的衣、食、住也要按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国家就要有灾难。柳宗元充分肯定了前者，批判了后者的宗教迷信，这表现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断刑论》进一步批判了所谓“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迷信说教，明确地提出了“天”与“人”的根本区别“无心”和“有心”。天即自然界是无意识的，人是有意识的，秋冬的霜雪，并不是要惩罚草木，春夏的雷霆也

不是为了要惩罚巨石和花木，草木和巨石都是无意识的东西，谈不到什么有罪可罚。人的赏罚是有意识的，并不需要效法无意识的秋冬的霜雪和春夏的雷霆。而天人感应论就是混淆了天人的区别，把天说成是有意识的东西，结果导致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

在《非国语》一文中柳宗元指出：山崩、水涸都是自然现象，都是阴阳二气运动的结果，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坚持用自然本身的原因说明地震等自然现象，从而破除了对一些自然变化现象的迷信。

柳宗元的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发展的社会历史观。这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著名论文《封建论》中。

自从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以后，坚持复古主义的儒家和主张变革的法家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如三国曹冏(音窘)著《六代论》，晋陆机著《辩亡论》都力主分封。唐王朝建立后，李世民也一度打算分封，讨论时，只有儒家的颜师古等赞成，由于魏征、李百药的劝阻，没有实现。武则天死后，尊崇儒家的刘秩又跳出来鼓吹实行分封制；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称王称霸，他们也主张分封。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作《封建论》，用社会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辩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优劣，充分肯定了秦始皇所起的进步作用，坚决反对搞复古倒退的分封制，在当时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

在《封建论》中，柳宗元痛斥了儒家的两个反动论点。主张分封制的第一个论点是：分封是圣人的意志，是不能改变的。这一论点的理论根据就是反动的天命论。天命论是儒家宣扬“克己复礼”的理论根据；把天命论运用到社会领域就是圣人创造历史，这是典型的英雄史观。针对这一论点，柳宗元指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就是说分封并不是圣人的意思，而是当时形势所造成的，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具体分析了殷周两代没有改制的原因，指出殷灭夏是依靠了三千诸侯的力量，武王伐殷是由于有八百诸侯归附，靠这些力量灭了殷朝。所以汤武不能把帮助自己的诸侯全部废掉，只好维持原来的分封制，并不是他们不能改，而是由于客观形势决定不能改变。

主张分封制的第二个论点是：周由于实行分封制，享国八百年，秦行郡县制，两代就灭亡了。柳宗元在考察了周秦两代的历史之后指出：周维持了八百年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从平王东迁以后，就名存实亡了。周朝灭亡的原

因就在于施行分封制，造成诸侯割据、互相兼并局面，是“失在干制，不在于政。”而秦在平定六国之后，把各国的都会变为郡的首府，废除世袭诸侯，代之以由天子任免管辖的地方官，把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说明郡县制是优越的。至于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有了比较好的郡县制度，但是并没有把权力完全交给郡县官吏，有能治理人民的官吏，但没有任用他们当郡县长官，再加上刑法严酷，徭役繁重，以致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怨恨和反抗。(有理财人之治，而不委郡邑，有理财人之臣，而不使守宰，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其错误在于政治措施没有搞好，而不在于制度本身。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立郡县“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的进步作用。用历史进化论观点指出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他还总结了秦以后统一和分裂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西汉的“七国之乱”时，是“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中叶后藩镇割据是“有叛将而无叛州”，原因在于军队，而不在于州县。进一步论证了郡县制的优越性。指出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郡县制、“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斯大林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柳宗元作《封建论》辩明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优劣，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赞扬郡县制，否定分封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唐中期以后藩镇割据，严重危害中央集权统治的问题，是为了消除分裂，维护统一。当时儒家代表人物认为唐朝一开始实行郡县制就搞错了。柳宗元分析唐朝早期历史，指出：“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可以为宜也。”实行郡县制是完全正确的，他要求唐政府“善治兵、谨择守”加强郡县制度、削弱藩镇势力，表示坚决反对实行分裂的分封制。

柳宗元的《封建论》反对复古，反对分裂，主张统一，主张进步，客观上也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

林彪一伙大搞分裂活动，企图另立中央，破坏祖国的统一，这一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任何人妄想搞分裂，搞倒退，搞复辟，都决不会有好下场。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柳宗元对儒家典籍也进行了批判，他反对迷信古书、反对盲从“古训”，认为“古之言理(治)者，罕能尽其说。”而且古书中正确的东西与不正确的东

西常常混杂在一起，使后人弄不清楚谁是谁非，这是古代“为书者之罪也。”只有那些“拘儒瞽生”之流，才盲目地抱着死框框不放。柳宗元的上述意见和韩愈提出的“师古”是针锋相对的，有力地批驳了他的复古主义谬论。

针对韩愈为首的儒家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天赋道德说教，柳宗元著有《天爵》进行批判。文中指出：“道德观念，不是天生就有的，道德品质出于人的学习。这和韩愈的天然“性三品”是对立的。韩愈所大肆宣扬的“性三品”，即人性可以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是汉代反动儒生董仲舒从孔丘那里贩卖来的。孔丘把人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为上等，学而知之的次一等，困而学之的又次一等，困而不学的是最下一等。他还胡说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林彪也模仿他的祖师爷的口吻，说什么：“老百姓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想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恶毒地攻击劳动人民是“下愚”，而他自己则是“我的脑袋长的特别灵”的“上智”。从孔丘到林彪，他们贩卖的是同样的货色，他们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圣人”。毛主席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孔丘、林彪这些自封的“上智”，“圣人”，实际上都是最愚蠢的蠢材，在历史的车轮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遗臭万年。

柳宗元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在政治斗争中虽然失败了，但是在思想战线上却用犀利的笔锋写出了大量的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辉的著作，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儒家宣扬的种种谬论，对唐代以后儒法斗争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直到今天我们学习他的代表作《封建论》时，还可以受到不少启发，他是中古史上杰出的反儒战士。

第四节 五代时柴荣的“法治”措施

唐初，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影响，李世民，武则天推行了一条法家路线。因此，阶级矛盾处于比较缓和的阶段，出现了一百多年安定繁荣的局面。但是，与此同时，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并未改变，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所以，大地主仍然在不断地兼并破产农民的土地，到李隆基(唐玄宗)末年，就已经“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踰于汉成哀之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也逐渐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的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但唐统治者为了搜括军费和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更加重了对人民的压榨，沉重的兵役、租税、宫市和土地的急剧兼并，使得农民再也不能生活下去。

浙东农民裘甫首先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公元859年，他聚集几百人发动起义，‘几个月中，就发展到几万人，坚持与唐军战斗八个多月。裘甫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吹响了农民革命的战斗号角。公元875年，震撼全国的黄巢大起义，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天补平均大将军”率领起义大军、转战南北，纵横数万里，狠狠地打击了唐王朝的腐朽统治。“冲天”、“平均”这两个鲜明的口号，标志着农民革命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象两把犀利的匕首，直指孔丘及历代反动儒家赖以骗人的理论基础——“天命观”，从根本上打击了“君权神授”的反动观点，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均平”则是针对封建的等级制度，是对门阀制度的特权提出的战斗号令。它代表了农民要求经济上的平等和政治上的解放的革命思想。在这些革命口号的鼓舞下，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军，所向无敌，势如破竹，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公元881年，农民军攻下长安，唐僖宗逃跑，农民军在长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策略上的错误，攻下长安后，黄巢不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满足于已取得的胜利，给地主阶级以喘息之机，重新组织力量向农民军进攻，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最后失败。

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经过这场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的荡涤，不少大地主、大官僚被起义军镇压。“天街踏尽公卿骨”，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写照。门阀地主在农民大起义中，纷纷望风而逃，特别是关中，河南等地，原来是门阀官僚大地主最集中的地方。起义军在这地区多次转战，使得这些世家大族谱牒散失、家家流亡，世系也弄不清了，再要讲什么门第高下，已不可能。起义军还用革命暴力夺取土地，一些大地主逃到江南，丧失了原有的特权，一些农民也获得了土地。因此，在这次规模巨大的起义之后，门阀地主彻底毁灭了，这支封建社会中最黑暗、最腐朽的势力，在农民革命战争的冲击下，上崩瓦解。这是黄巢起义不可磨灭的功勋。

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唐王朝已名存实亡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遍及各地。农民军的叛徒朱温在军阀的连年混战中，逐渐发展壮大，公元907年灭唐，建立了梁王朝。此后短短的五十多年里，在中原地区相继建立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其它割据一方的有前蜀、吴、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十国，史称为五代十国。这是我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大分裂，也是时间最短的一次分裂。它表明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是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分裂

割据势力最终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五代时期大小军阀仍然连年混战，他们为了夺取皇位，干尽了一切罪恶勾当，甚至不惜卖国投敌，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石敬瑭为了能当上儿皇帝，竟然把北方的边防重镇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由于屏障尽失，此后数百年间，北方的奴隶主贵族多次南侵，黄河流域的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充当儿皇帝、复辟资本主义，结果是粉身碎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五代时期战争频繁、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五代十三个皇帝只有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周世宗柴荣三人，由于出身贫贱，略知人民疾苦，即位后，比较注意人民生活、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柴荣，他即位后，大力整顿纪纲，实行法治，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此后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唐中叶以后，北方的契丹族日益强盛，奴隶主贵族贪婪成性，经常带兵侵扰今华北地区，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特别是石敬瑭割让燕云后，北方门户洞开，无险可守，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保全皇位，只有屈膝投降，向契丹奴隶主称臣纳贡，把从人民手中搜括来的财物送给契丹奴隶主贵族享乐。

柴荣刚刚即位，北汉统治者勾结契丹大军又一次南侵。是投降，还是抗战，对柴荣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文官的头子太师冯道，这个孔丘的徒子徒孙，是迎降的老手，对契丹更是怕得要死，他反对抗战，想等到兵临城下时，投靠新的主人。柴荣坚决拒绝了投降派的主张，亲自带兵迎战。战斗中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和步军都指挥使何徽等临阵逃走，柴荣临危不乱，督率亲军奋战，终于打败了契丹和北汉的联军，稳定了北方的形势。为了申明军纪，坚持法治，柴荣下令把樊爱能、何徽等临阵逃走的七十余名将校全部判处死刑；同时整顿军队，把丧失战斗力的士兵全部淘汰，改变了唐中叶以来骄兵悍将勇于内战，怯于外敌的局面，从此军纪严明、军威大震。

为了早日完成统一事业，他广泛征求意见。王朴献平边策，分析了全国的形势，提出了统一的步骤和具体的措施。他采纳了这些意见，先派兵攻蜀，取得四州，又攻南唐，取得十四州、南方的疆界略有扩大之后，立即挥师北上，计划收复燕云，在攻克瀛(河北省河间县)莫(河北雄县)等地后，因病重只好收兵，不久死去。他的志愿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已为赵匡胤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方面，他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轻的免官，重的杀死。对人民的生活也比较关心，颁布均田图，平均各地的田税负担。他不信天命，限制佛教的发展，废除寺庙三万余所，迫使大量僧尼还俗，减少了寄生虫，增加了劳动力，对社会生产是有利的。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他下令允许耕种逃户的庄田，规定三年之内逃户回来的双方平分土地，五年之后归耕种人所有，从而使许多荒芜的土地重新开辟。

柴荣在位将近六年，他主张统一，坚持抗战，奖励生产，整顿军纪，严惩不法官吏。由于他贯彻了法家治国的基本思想；因而取得了不少成绩，初步改变了唐末以来的混乱局面，为北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第三部分

封建社会向后期过渡时期的儒法斗争

(宋元明清公元960——1840年)

第九章 宋元时期的儒法斗争

第一节 革新与守旧的斗争

一、北宋经济政治的特点

我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北宋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地主阶级内部统一集权和分裂割据的矛盾不很突出，而土地兼并往往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地主阶级内部的两派斗争，儒法斗争也是围绕这方面而进行的。

北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它不是经过农民战争洗刷后建立起来的，因此原有的大地主并未削弱，土地兼并仍剧烈，阶级矛盾未缓和。赵匡胤及其继承者除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外，还采取优待大官僚、大地主等办法，从而加深了对人民的剥削。

对文臣武将给以优厚的俸禄，允许他们大量兼并土地而没有任何徭役负担，赋税承担很少或不承担。又大罪设置官吏使

地主阶级中有较多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以强化地主阶级的专政工具。

对农民的剥削则完全承袭五代的苛捐杂税，如人头税任何人不能免，有的贫民因此杀死小孩。残酷的徭役往往使人民倾家荡产。江南有出嫁六十多岁的老祖母以躲避差役，京东的农民有父亲自杀以免儿子应役。连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古者刘剥之法，本朝(宋朝)俱备。”农民虽然终年辛勤劳动，从事生产，但到收获时“公私之债，交互相争，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这个封建政权就是如此敲骨吸髓地剥削人民来喂养大批寄

生虫。真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宋初在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提出“吾疾贫富不均，吾为汝均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贫富”的革命口号。他们所到之处，对于“富人大姓”则“令其家所有财粟”一律交出，除留给本人的“生齿足用”外，都一律调发大赈贫乏。他们每攻下一地，就狠狠打击那些宣扬封建道德的贪官污吏，并把他们的财帛分给广大人民。起义军“均贫富”的革命行动，不但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孔丘的“贫贱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最强大最有威力的反孔斗争，也是封建社会后期农民战争不断发展的新特点。

北宋民族矛盾很尖锐，当时在宋王朝西北面有辽和西夏政权，这些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政权统治者，不断向中原发动进攻，进行骚扰破坏，他们所到之处，“焚烧村落”“杀掠人畜”这一小撮反动军事贵族的掠夺，对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对当时各族人民的接近和民族融合，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但是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北宋统治者在军事上推行“守内虚外”的反动政策，把全部力量用来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对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南下骚扰破坏则采取屈辱退让的政策。赵光义曾说：“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予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这种重内轻外的政策，使北宋王朝在民族关系中，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在内政方面则有“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冗是多余无用之意）之害。巨大的开支，军费占十分之七，使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纵容大地主兼并的结果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他们手上，甚至中小地主的土地都被兼并。在这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内部的进步人士要使政权摆脱贫弱的困境以巩固封建统治，主张用革新的办法来防止辽和西夏反动政权的骚扰破坏、限制大地主的兼并，实行一条法家路线，但另一派却坚持纵容、保护兼并的儒家路线。于是产生革新和守旧之争。

二、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

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的社会地位、解决封建政府的财政危机，宋仁宗时范仲淹曾主张改革，但很快因遭到大地主集团的反对

而失败，并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竞争。神宗时辽和西夏反动政权的威胁益大，财政上更加捉襟见肘，部分统治者也认为如不及时“兴利除弊”则可能有“一旦之忧”。必须正视现实，进行改革，否则后果将难于想像。这样宋神宗决心任用法家代表人物王安石实行变法。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清江）人，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他是我国十一世纪的著名政治改革家，他继承了法家的变革发展思想，根据商鞅、韩非的“苟可以强，不法其政”“事异则备变”的原则建立了和儒家正统思想对立的“荆公新学”。他把一切先儒对经书的传注废弃不用，而代之以自己撰述的《三经新义》（三经指《周礼》、《诗》《书》）、《字说》等著作，并以其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他蔑视儒家竭力鼓吹的经孔丘修改过的《春秋》为“断烂朝报”拼凑成的东西。他嘲笑儒家那一套烦琐哲学是坑害人的“无补之学”。他反对“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的现象。当宋神宗问他如何开始改革时，他的回答是“变风俗，立法度”。这可以看出他坚持革新的精神。

王安石面对辽和西夏反动统治者的严重威胁，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提出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变法措施。首先冲破大地主大官僚的阻挠，建立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是指当时的户部、度支、盐铁三个机关的总称），主持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以富国强兵为总目标，以限制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和免税特权为中心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在理财方面按照“理财以农事为先”的方针，制定：（一）青苗法，在每年正月和五、六月由政府向农民贷钱粮，收成以后再归还，春借夏还。夏借秋还以抵制地主豪强对农民的高利贷剥削。（二）免役法，作为劳役盛余而存在的差役，在当时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免役法规定依户等向役户征收免役钱，政府用收来的钱募人应役，即使是原来有免役特权的官僚地主也得出钱助役。（三）方田均税法，丈量耕地面积，据以定税，杜绝大地主等瞒产漏税，是有利于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四）农田水利法，在各地兴修水利开垦荒田，发展生产。（五）市易、均输法。市易法是在大城市设立市易务收购滞销货物，待畅销时才向市场销售；均输法是命东南各路了解生产情况和朝廷需要。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在整军方面。既实行“将兵法”训练现有的雇佣兵，更本着商鞅的“什伍之法”制定保甲法，把居民联为保甲、使农村的壮丁都受到军事训练，具有当兵作战的能力。又设置军器监，改善制造

大批武器。经过这番整顿，逐渐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对于西夏反动统治者的骚扰。一反屈辱、妥协的反动路线。派遣名将王韶、宗谔率兵抗击，收复了西夏反动统治者霸古的河湟等地区的大片失地，初步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境地。总之，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削减了大地主阶层的特权，限制了土地兼并，防止了辽和西夏反动统治者的骚扰，当时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由于变法革新打击了大地主阶层的特权。这必然会引起特权享有者的反对，于是以王安石代表的革新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集团都是极端尊儒反法的。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人拚命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抵制王安石的改革，他们把同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捍卫孔孟之道的斗争。抬出孔孟和董仲舒的腐朽不堪的“天命论”。大力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把维护封建秩序的“三纲五常”抬高为“天理”并以此来论证封建制度的永存，“祖宗之法不可变”，如果变动了就会出乱子。面对这种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王安石知难而进，无所畏惧。他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并指出如果真有所谓“行之万世”而不变的“太古之道”，那么圣人就不用有所发明了。他在驳斥孔丘所谓道之兴废是由天命决定的时候说，如果一切都由天命决定，世间上的人干什么呢？“苟命矣，则如世之人何”，在这里他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事在人为，同时又批判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天命论。他深刻地指出那些“据经泥古”的儒生不过是“庸人”，并没有什么见解和才能。

顽固派以天灾出现是变法招来的，改变祖宗的法制会丧失人心，对守旧派反对革新的舆论是必须考虑的，王安石对此毫不迟疑地回答，“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认为天灾是自然界本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怕呢？至于祖宗之法是否可变，他认为“尚变者，天道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变动不停的，为什么旧制度就不能变？况且祖宗之法，“未必尽善”所以“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对于当时守旧派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和诬蔑之词，王安石根本不考虑。这种坚强的态度，不仅有力地回击了顽固派的进攻，而且否定了孔孟之道的所谓“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体现了法家的战斗精神。他在回答司马光的信中说，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办，只是墨守陈规，

我决不干。“如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这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态度的坚决和不怕困难的意志。

在改变不了王安石变法决心的情况下，顽固派便大肆攻击诬蔑，说什么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是少正卯式的人物。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大声惊呼“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表示要同他拚命。司马光的喽罗吕诲说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辩，行伪而坚”，范纯仁大骂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王安石在《商鞅》诗中针锋相对地回答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还特别推崇汉朝著名法家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对唐朝刘晏的理财办法也很欣赏，想按照这些人的变法精神来对当时社会进行改革。

从上面可见，王安石的新法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限制了大地主豪强的势力。这场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是当时阶级矛盾，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反映，它并不能解决封建社会内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同时这时封建社会正在过渡到后期，地主阶级正转化为纸老虎，其反动虚弱的本质，日益暴露，而王安石所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的力量也很薄弱，他的变法又是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限度内提出来的，而不是象农民大起义那样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变法就得不到广大农民的真正拥护，这就注定了王安石的法家路线必然以失败告终的命运。在顽固派的压力下，神宗不得不一度诏罢新法。到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用司马光为相，就把新法全部推翻。“荆公之法”，也废弃不用，这说明改良主义的措施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从此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把宋王朝引向更加腐朽没落的境地，统治集团更加奢侈浪费，各级政府的大小贪官酷吏都竭泽而渔地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土地更加集中，赋役更加沉重，人民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宋末年终于爆发了以宋江、方腊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一方面揭露以宋徽宗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荒淫无耻，鱼肉人民的罪恶，并进而质问道：“你们成天说皇帝是天下人民的父母，那有这样虐待自己子女的父母？”真是“安有此理”。这就彻底戳穿了儒家长期编造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把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维护封建制度的“三纲五常”，另一方面他们又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革命的平等互助的原则。它冲破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对于遭受严重剥削压迫的农民具有极大号召力。人们不断地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增强了农民军的战斗力，多次打败宋政府派来镇压的军队，给予宋王朝更沉重的打击。起义军虽然因统治阶

级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但是这两次革命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谱下了壮丽的歌曲。直到今天人们还怀着崇敬的激情来传诵他们的英雄事迹。这个在儒家路线指导下的北宋王朝经过人民革命力量的打击后，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最后被南下的金统治者所摧毁，北宋灭亡。

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王安石的高度评价。王安石是无愧于改革家这个称号的。可是顽固地坚持儒家路线的保守派总是尽量诬蔑咒骂王安石的新法。南宋理学家朱熹等人认为王安石“学本出于刑名度数”，即是说王安石的学问都是以法家理论为出发点的。他们还说如果王安石落在孔子手里，必定要受到“少正卯之诛”。还有这样的诗句“最狠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说明他们对进步和革新的愤恨和仇视。他们还力图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之于王安石变法，胡说什么“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事实上，正是司马光等大地主大官僚顽固派推行尊儒反法路线，苟且因循、积弱不振所造成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反对保守，坚持前进，反对倒退，不怕权势，不怕漫骂，不怕围攻，力排流言蜚语，坚决实行新法的斗争精神是可贵的。顽固派恶毒咒骂王安石，并将吹捧孔孟之道的调子越唱越高，目的无非是要打击进步力量，阻止革新，开历史倒车而已。所以当有人要求变革时，他们就声嘶力竭地说“又一个王安石也，”还群起而攻之，把进步思想视为洪水猛兽，拚命加以扼杀。叛徒卖国贼林彪也跟在这伙顽固派屁股后面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借以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发泄其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说明他和历代反动派是一丘之貉。

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也有一些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肯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其进步性。但由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观点的局限，使他们不能作出真正的较科学评价。

王安石的坚持革新，敢于冲破各种阻力的精神，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的阶级局限使他不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不能把对顽固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四、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如他颁布的农田水利法，设置军器监等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措施，对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就是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开展他的一系列的科学实践活动的，而他的科学实践活动又是积极为推行新法服务的。

沈括(公元1031—1095年)他不仅积极研究自然科学，而且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朝廷新政规划，巨细括莫不预”在政治实践上也对新法的实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在王安石的变法活动中，曾主持过多处水利工程的修建，掌管过军器监、司天监和三司使的工作。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测量学，地质学和药理学等方面都有新的发现。

沈括推行法家路线的农战政策。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从事水利工程的兴修，注意改革和农业息息相关的历法，重视耕作技术和农时，并亲自参加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活动。为了加强战备，在掌管军器监时，研究城防兵器，战略战术及行军运粮法。讲求武器改进，加强军器生产，实行军事改革，这些富国强兵的科学活动和政治实践，既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又用实践成果积极为推行新法服务。由于推行法家革新的政治路线，使政治和生产紧密结合，在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基础上，坚决革新的沈括才能在科学实践中作出贡献，起了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我们从这里看到法家思想路线对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沈括所写的《梦溪笔谈》，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当时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对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很重视，如当时发明世界上最早的活字版印刷术的布衣毕昇，为人民同声颂扬的木工喻皓及解决了黄河决口的关键性技术问题的河工高超等人，在儒家纂修的史籍上毫无记载，沈括却有详细的记述，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成就，成为今日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史的珍贵资料。沈括的贡献虽很大，但因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思想中还夹杂着一些宿命论和一些迷信思想，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剔除的。

第二节 理学和理学的反对派

一、阶级矛盾激化和人民的反孔斗争

北宋亡后，中国形成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各族人民遭受着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南方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而又更加激化。广大劳动人民既要抗击金贵族的南下骚扰，又要反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斗争是复杂而又艰巨的。

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是腐朽的北宋王朝的继续。它一面向金贵族奉表称臣，纳贡割地，屈膝投降，实行民族投降政策；另一方面采取残酷手段，血腥镇压农民起义，以加强自己的反动统治。它的统治地区虽然缩小了，但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并不减于北宋。利用各种苛杂名目榨取农民血汗。夏秋两税，身丁钱等都沿用北宋税名，还有更多的捐税，数不胜数。在征收时还百般挑剔勒索，如农民多种早稻，政府却偏要晚稻，农民只好向商人地主去买，结果又增加了一重负担。同时官僚地主们对土地的兼并也十分猖狂，长江下游的圩田，湖田差不多都被权贵豪强夺去了。如当涂的广洛圩，宣城惠民圩，芜湖的万春圩等无不为豪强所占，鉴湖田二千五百多顷都被兼并了。大部分农民失掉土地成为佃农，有的沦为赤贫，无法生活下去。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既愤怒于统治阶级的苟安屈辱，又仇恨他们对自己的压榨和奴役，纷纷组织起义军。如鍾相最初曾组织抗金的“忠义民兵”，后来又领导农民起义军在湖南武陵一带和南宋政府军斗争。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就是说，从革命农民的立场看来，封建统治者传统的所谓“法”都不是“善法”，因为他把一样的人分成了贵和贱，贫和富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要推翻统治阶级的邪法而代之以“等贵贱，均贫富”的“善法”。他们把诛杀官僚地主和没收这些人的财产作为行“善法”的实践。这种革命的主张和行动无不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反映了农民阶级对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用以欺骗

人民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富贵贫贱是天所决定等反动谬论，不仅投以蔑视的眼光，而且用针锋相对的革命思想来驳斥它，也正是对封建制度提出的抗议。他们以简朴而有力的语言宣传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真理。鼓舞劳动人民奋起反抗的决心，周围几百里的人民都积极参加，称为“投拜

法下，莫知其数”。后来，这支农民起义军虽然被南宋统治者镇压下去，但革命的反抗精神在后来的革命者中间保持下来，继续战斗。如 1165 年湖南李金起义，1175 年湖北赖文政领导的茶民起义军。这些事实说明人民群众是讨伐孔孟之道的主力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人民的反孔斗争势必威胁到地主阶级赖以维持其统治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地主阶级内部而使其产生不同的反映。以朱熹为代表的保守派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主张屈辱苟安。对人民反抗则加强镇压，并竭力从思想上来麻痹欺骗人民，提倡理学以维护封建统治。反之陈亮、叶适等则继承法家的战斗精神，反对妥协投降的苟安思想，并深刻地揭露批判理学家的迂腐无能，对重大政治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是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落后与先进之争，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儒法斗争的继续。

二、程、朱理学的反动性

历代反动统治者用以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的儒家思想，如孔丘的“天命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等都在历代农民革命沉重打击和唯物主义思想家有力批判之后，已经逐步失去其欺骗性。到了宋代又经过王小波、李顺、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军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和行动的猛烈冲击，再加上王安石变法的斗争而使其百孔千疮，儒家思想需要重新修补和粉饰才能发挥其麻痹欺骗人民的作用。理学正是适应这种反动目的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北宋的程颢、程颐 and 南宋的朱熹自认为是孔孟的直接继承人。他们吸取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孔孟之道作了精心的修补、阐发，形成体系庞大而又极端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即后来统治中国思想界几百年的理学。它形成于北宋中叶到南宋而极盛，后来分为两大流派，一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理学；一是以程颢、陆九渊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心学。

程、朱的世界观是纯粹唯心的。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物质是精神派生的。朱熹说，在未有天地之前，就有一个永恒存在着的“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精神在物质之先，“理在气先”。那么，“理”是什么？就是封建伦理道德，就是三纲五常。所谓“张之为三纲，化之为五常？”上运就进一步把维护封建制度的“三纲五常”抬高到“天理”的地位，

来为封建制度绝对不能改变的政治路线作理论根据。既然“理在气先”，那就先有“三纲五常”之理，才有现实的“三纲五常”的关系，先有君臣的“理”，才有现实的臣君关系。而且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个“理”是永恒不变的，纵使山河大地都塌陷了，毁灭了，这个“理”还永恒地依然存在。“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说得真是吓人，连天地都毁灭了而束缚人民的“三纲五常”还依然存在，那么谁还敢反对它和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呢？所以地主剥削农民是天经地义的，是永恒存在的，是不可抗拒的天意，是合乎天理的，即便有谁要反对它，也不能成功。在这里朱熹给“三纲五常”披上神秘的理学外衣，看上去使人眼花缭乱，其实质不过是妄图论证封建制度合理，地主对农民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人民反抗就是大逆不道。是用来镇压农民阶级制止革命斗争的谎言，其反动目的十分明显。

朱熹还进一步把孟轲以来儒家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加以修改补充而提出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他认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天理”就是封建纲常名教，是善，是礼，和它相对的“人欲”是指人民争生存反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要求变革的进步思想，是非理，是万恶。天理人欲不能并存，“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两者之分就是封建地主阶级是非、善恶的根本界限，所以要保存天理，消灭人欲才能达到至善。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箝制人民的思想，防止人民造地主阶级的反。为了消灭人欲，人民必须接受帝王“圣贤”的教化，禁绝一切必要的物质欲望，忍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不去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封建秩序。而封建统治者则在完全体现“天理”的幌子下，却可以为所欲为地残酷剥削人民，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穷凶极恶地满足他们的私欲。由此可见“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提出的一条反动政治纲领，是从孔丘的“克己复礼”直接继承下来的。他也曾明确说过：“孔子‘克己复礼’……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又说：“理的条目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总之就本质而言，“存天理，灭人欲”，正是在思想领域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因此后来的进步思想家李贽、王夫之、戴震等无不对这个反动理学核心，天理人欲之说痛加驳斥。

朱熹为了扩大孔孟之道的影响，还把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重新作注，编在一起，称为《四书集注》，广为传播。从南宋经元明清几个朝代历七百年之久，朱熹的注释被奉为孔孟之道的标准答案。《四书集注》集中了孔孟儒家反对社会变革的复辟经，集中了孔孟儒家搞阴谋诡计、政治欺骗、尔虞我诈的权术经，集中了孔孟儒家反对实践、鼓吹闭门思过、

反省内求的修养经。《四书集注》是南宋以后历代反动派反对革命，欺骗人民的重要反动思想武器。朱熹是个典型的最虚伪的道学家，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孔孟之道反动政治思想路线的集中代表。

林彪鼓吹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把朱熹编注的《四书》摘抄下来，拼凑成《四书集句》，奉为他搞反革命复辟的“座右铭”。林彪如此崇拜《四书》和朱熹，‘与行将灭亡的反动派如此息息相通，充分说明了他是一切被推翻的反动派的代理人。他的反革命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封建法西斯王朝，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把我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万恶的旧中国。

三、陈亮、叶适的反理学斗争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当朱熹大肆鼓吹理学，叫嚷“存天理，灭人欲”之时，除农民革命军对之给以武器的批判外，还有唯物主义者陈亮、叶适等人，异军突起，高举批判的旗帜，对理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首先，他们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事物的道理(规律)不是精神产生的，它存在于事物之中，而不能在事物之外去找规律。“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事物之间。”充满宇宙的是物质，日常生活无非是一件一件的事所组成。”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这就否定了理学家“理在气先”，理是超世间永恒存在的谬论。

其次，对“存天理，去人欲”的批判。叶适是主张功利的。他认为理学家拿天理人欲作为分别圣人和狂人的界限，是没有道理的。“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是“择义未精。”朱熹为自己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反动命题捏造历史根据，胡说什么夏商周“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而且规劝陈亮将来不要做三代以下的人物。陈亮反驳道：“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即是说他宁可作一个“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的“英雄”而不愿当所谓没有人欲的“三代以上人物”。

再次，驳斥朱熹的历史退化论。朱熹认为天理人欲不可并存，他把人类划为“圣”“凡”两种，把历史割裂为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两截，三代以上专以天理行，三代以下则专以人欲行，所以三代以上是盛世，三代以下的历史

便进入了长期的黑暗状态。陈亮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从“道在物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世界的客观性质，古今是一样的，作为认识客观世界的人，古今都是一样活动，并不存在绝对的“圣”、“凡”之别或古今的不同。他指出汉唐时也是万物丰富，社会一样繁荣，为什么就说道不存在而完全是“人欲”？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是错误的，整个历史是向前进步发展的。叶适也反对朱熹的历史退化论，他说宋代是在周朝数千年之后，如宋代还学周公之法，那就开历史的倒车了。

最后提倡功利，反对理学家的空虚无能。陈亮、叶适处在民族矛盾尖锐、南宋国家危急的时代，对与金统治者的和战问题上，他们是主战派。陈亮几次上书皇帝，分析形势，要求扭转妥协求和的局面，并提出收复失地的计划。由于他好发议论，批评时政，为当权者所憎恨，曾三次被捕入狱。叶适也是主张抵制金军，收复失地、反对妥协投降的。

陈亮注重事功，而反对理学家空谈“义理”，这是他的“道在物中”，唯物主义观点在政治上的具体应用。他对当时理学家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出严厉的批评，指出原来读书做事的人还有点“各务其实”，但自从理学流行后，认为“一艺一能”即有点实际技能的人不算是“圣人之道”。一般风气是“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本来没有学问，偏要装作莫测高深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空虚无知，“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无。”大家不读书，不干事，天天空谈，终于把天下事情都荒废了。当朱熹劝他跟着理学家走，当一个“蒋儒”时，他说自己只愿当个“成人”或“英雄”，不想作只会修身养性的“醇儒”。同时他还认为规规矩矩“不敢有一毫做作”只会当别人传声筒的人，是没有实用也不合时宜的。他说，古和今是不一样的，不能完全以古代圣贤的行事作准则，那种只有“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为何物”的儒者，他自己不屑去作的。

叶适针对孟子、董仲舒以来把道义和功利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所谓“仁人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话是讲得好听，实际上是行不通。既然反对功利，不讲功利，结果什么也办不成。所谓“道义”只能成为装饰门面的漂亮话了。“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个阶级的功利主义。”朱熹等人口头上反对功利，而实际却在拚命维护宋王朝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他们的“存天理，灭人欲”只不过是骗人的谎

言。陈亮、叶适所提倡的功利是地主阶级的功利，而不是人民大众的功利。但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代表了反对理学派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特别是针对风行一时的理学空疏虚伪的危害性，是有它的历史进步意义的。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儒法斗争中，尊儒反法思潮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尊儒是为了维护或复辟其反动统治，反法是为了反对进步的力量。程朱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盛(极)一时的最反动最露骨的儒学。它代表着大地主、大官僚等最反动最黑暗的势力，是他们大量掠夺土地、残酷压榨人民等罪恶行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陈亮，叶适代表着地主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坚持法家唯物主义路线，反对理学这个大地主专政的精神支柱，从而冲击了孔孟之道。这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节 元代统一，结束了中国的分裂局面

——驳苏修对南诏、大理史的恶意捏造

北宋统一中国，但在北方还有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政权，在西北还有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在西南还有白、爨贵族建立的大理政权。十二世纪初，女真贵族兴起，逐步取代辽政权，建立金政权；又向南侵扰，把宋王朝压迫到长江以南，成为北中国的统治民族。

十世纪以来，蒙古高原上的蒙古等游牧民族，都在北中国的辽、金贵族政权控制之下。十二世纪初，蒙古贵族铁木真崛起，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各部族。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进而统一北中国。1252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兵迁回南征，由陕西临洮进兵，经四川入云南，结束了南诏、大理相继割据达515年的地方政权。又攻打南宋，1276年陷临安，1279年陷崖山，宋王朝最后覆亡，元王朝代之而兴，蒙古族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建立了蒙古贵族、色目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以及其它少数民族贵族共同专政的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

蒙古贵族政权兴起后，就向中亚和欧洲诸国侵略扩张，曾一度建立地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但在成吉思汗死后不久，这个凭借武力建立的蒙古大帝国就逐步瓦解了。

云南的南诏地方割据政权，是在八世(纪)中叶建立的。当时云南的主体民族是东西两爨。西爨又称白蛮，是最先接触楚文化和汉文化，与楚人和汉人互相融合的白族先民，分布在滇池和洱海地区。东爨又称乌蛮，是彝族、哈尼族，的先民，分布在滇东北、滇东南以及洱海的山岳地区。洱海平坝地区的白蛮(白族)，在唐代初年，建立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称为“白子国”。后为当地强悍的乌蛮(彝族)所征服，先后成立六个“诏”(意即大首领、大酋长)。唐玄宗时，六诏受吐蕃(西藏贵族政权)威胁，有五个诏常弃唐归附吐蕃。南诏主彝族皮罗阁始终附唐，因而深得唐的支持，兼并了五诏，进爵为云南王。当时滇池地区的西爨发生内乱，南诏主乘机扩张，占领西爨地，并用武力胁迫西爨(白族)二十余万户迁徙到大理、保山一带(当时的永昌郡)。

唐玄宗及其宰相杨国忠在边疆民族问题上，是实行孔家店的“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以至镇压屠杀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支持南诏统一六诏，目的是利用南诏去攻打吐蕃；他们又防止南诏扩张势力，进而统一云南，因此对滇池地区的西爨政权力加保护。南诏终于向东面扩张，这就不利于“分而治之”的策略。唐王朝实行武力镇压，751年至754年，三次发兵远征云南，都被南诏击败，唐兵先后死亡、溃散约二十万人。迫使南诏依附吐蕃，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是这项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恶果。

尽管唐王朝多次无理加兵，但在安禄山反叛(755年)，唐王朝极端危困时，南诏还是有意归唐。李宓征南诏，全军覆没的第二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唐的时候，阁罗凤还在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立一大碑(南诏德化碑)，表示(叛)唐出于不得已。阁罗凤对臣属说，后世可能又归唐，当指碑给唐使者看，明白我的本心。793年，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决定归唐，遣使者分三批到成都向剑南节度使韦皋表示诚意，韦送使者到长安见唐德宗。794年，唐遣使者崔佐时到羊苴咩(音斜法，法读阴平)城(今大理)和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下。异牟寻献出吐蕃赐给的“赞普钟南国大诏”金印，请复南诏旧名，唐仍封之为云南王。南诏主共传十三代，有十代受到唐王朝的“云南王”、“南诏”、“滇王”等封号。

后来南诏的宰相汉族郑买嗣以及白族大姓赵善政、杨干贞相继篡权。公元937年白族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地方政权，仍与宋朝保持臣属关系。根北宋人所写的《云南卖马》，所载：太平兴国(976至983年)初，宋太宗册封大理主白万为“云南八国都王”。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又授大理主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大理王”。南宋的记载，乾道九年(1173年)，

大理派李观音得等二十三人到邕州(今广西南宁)卖马,向宋王朝要回许多汉文书籍。大理官商以战马、山货、药材到内地交易,换回锦缯、器用及汉文书籍,是经常不断的。宋代铸造货币,主要靠云南供应原铜。云南和内地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割断。直到南宋末年,大理还因为抵抗忽必烈的进攻遣使向宋王朝报捷,受到宋王朝的奖励。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别有用心地把一时割据的中国云南地方政权说成是“存在了五百年”的“独立王国”;别有用心地把元代封建王朝统一云南,结束地方割据,说成是“蒙古侵占”了南诏、大理这个“独立王国”;别有用心地把南诏、大理史和中国历史分割开,写在《印度支那》一节内;别有用心地把以白族、彝族为主体建立的南诏、大理,说成是“傣族”建立的。种种历史捏造,全盘继承老沙皇侵略扩张的衣钵,为新沙皇妄图分裂我国,并吞我国制造舆论,这些阴谋一定要揭穿。

云南早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远在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农民起义领袖庄骄率众来云南,被推为“滇王”。秦汉在云南设置郡县后,云南一直是历代王朝的一个政区。即使是南诏、大理割据时期,它们和中国封建王朝并未取消法律上的统治与隶属关系。南诏的建制仍隶属于唐王朝的剑南节度使云南安抚司。从韦皋到王建,有六七个剑南节度使都兼任云南安抚司,这是在西安出土文物中的泥封印信证实的。不得已而叛唐的阁罗凤,在他的《南诏德化碑》中表明:“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彼若纳我,犹吾君也”。其孙异牟寻上唐王朝的书信中又表明:“世奉中国”,“子子孙孙世为唐臣”,这能说是“独立王国”呢?大理政权,继续接受两宋王朝的封号,经济文化联系,日趋紧密,更谈不上什么“独立王国”。

云南设治两千多年。即使南诏、大理一时割据,时间还不到四分之一。苏联《世界通史》的编者为什么不看四分之三以上的统一年代,而要截头去尾,挖出一时割据的中国云南地方政权称之为“存在了五百年”的“这个国家”呢?更为恶毒的是,他们把南诏、大理史和中国历史分割开,写进《印度支那》一节内,也就是把曾经建立过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的云南省,从中国版图内挖出来,并入“印度支那”这个地区范围内。这种挖空心思,歪曲和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法,赤裸裸地暴露了新沙皇的政治侵略阴谋。他们胡说什么清朝以前中国的北部疆界在长城,西部不超过甘肃和四川。言外之意就是说新疆、青海、西藏、云南等省区都不是中国的领土。新沙皇积极筹组什

么“亚州集体安全体系”，这是下一着棋。妄图在这些历史捏造的基础上，组建瓜分中国的股份公司。

苏联《世界通史》的编者，还别有用心地把元代封建王朝统一云南，结束地方割据说成是“蒙古侵占”了南诏、大理这个“独立王国”。中国古代的中原各族与北方诸部落、部族，不断有斗争，也不断在融合。多民族的中国，有统一的局面，也有分裂的局面。十二世纪初，女真崛起北方，南宋建都江左，只能说是北中国为女真族封建王朝所统治，南中国为汉族封建王朝所统治。大江南北，都是多民族的中国。

蒙古是受女真封建王朝控制的部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并在公元1234年灭亡金朝后，只能说是北中国的蒙古封建王朝代替了女真封建王朝。蒙古封建王朝西征中亚、欧洲以至印度支那，对这些地区的国家来说，当然是侵略和侵占，但是蒙古封建王朝在中国版图内用武力统一了云南一时割据的地方政权，怎么能说是“侵占”呢？

苏联《世界通史》的编者，还继承英法殖民主义分子对傣族历史的捏造，把以白族、彝族为主体建立的南诏、大理，说成是傣族建立的。由于解放后，已经把印度殖民政府情报局副局长戴维斯少校所编造的“南诏是傣族建立的独立王国”的谎言揭穿了，在他们的《世界通史》里，才不敢赤裸裸地使用这样的字句，而是改变提法说“傣族属于南诏”；但在前面安了个傣族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部落”的前提，就在这个“独立王国”里，把其它部落挤走了，至少是摇身一变，取代了主体民族的地位。他们还继续捏造，胡说什么“在汉族的压迫下，傣族向南移动”，“蒙古封建王朝征服中国，在1253—1254年间消灭了南诏(大理)，加紧了傣族部落向印度支那半岛的迁徙。”他们想用这些历史谎言来挑拨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挑拨我国与友好邻邦之间的关系。

关于南诏，大理的主体民族，在明太祖派傅友德等征云南时，大理段氏的后代，仍被元朝封为“大理总管”的段信直世在给傅友德的信中还说：“云南根系白、爨故地”，这句话就把南诏、大理的主体民族说得一清二楚了。解放后当家作主的云南各族人民绝不容许殖民主义分子当面造谣，那种别有用心地把“白族”混同于“傣族”的无耻谰言，早就被事实粉碎了。

至于傣语各族，很早就定居在滇、缅、泰、老、越边境。在我国境以内的傣族，很早就是多民族祖国的一员。苏联《世界通史》所说“傣族属于南诏”，这倒是千真万确的。樊绰《云南志》记载傣语各族“并在永昌、开南”，

即分布在南诏设置的两个“节度”区。永昌辖区在今保山以西，包括德宏，直到缅境伊洛瓦底江。开南节度除统辖今景东、镇沅、景谷、普洱、思茅外，还包括“茫乃道黑齿等类十部落”。西双版纳景洪古称“勐乃”或“勐泐”，“茫乃”当为异译。“黑齿”、“金齿”等均为傣族别称。樊绰的记载说明西双版纳傣族以茫乃道为中心而总隶于开南节度。《云南志》称：金齿、黑齿等傣族，“皆为南诏总之，攻战亦召之”。当时的傣族将领还有名列《南诏德化碑》碑阴的，如“大军将赏二色绫袍金带赵龙细利”。“赵龙细利”这个傣族官名，直到解放前勐腊傣族土司的属官还使用着。碑阴还有“大军将赏二色绫袍金带黑嘴罗”。“黑嘴”即“黑齿”，也可能是个傣族将领。这是傣族“隶属于南诏”的实物见证。

苏联《世界通史》的编者还继承英法殖民主义者的谎言，继续编造傣族被汉族压迫由江浙南迁到云南又远征印度支那的神话。《史记》、《后汉书》等古文献早就记载着掸语族(即傣语族)的分布地区，和现在的分布地区基本相同。解放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景洪、勐腊、孟连等县的傣族聚居区相继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在孟连风景山还发现古人类的洞穴遗址。这些文化堆积说明，远在五、六千年前，西双版纳地区就有居民，粉碎了苏修御用学者关于中国边疆民族外来的历史捏造。

苏联《世界通史》关于傣族历史的精心结构和苦心安排是，先来个“蒙古帝国”，再来个傣族建立的南诏“独立王国”，而后“蒙古侵占”存在了五百年的“这个国家”。按照他们的强盗逻辑，无非是要说明，所有这些，都不关中国的事。对元、明封建王朝的更迭，苏联《世界通史》的大标题是：“中国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斗争”。按照这个强盗逻辑，明代封建王朝接管云南行省，又要变成“中国侵占蒙古侵占过的国家”了！这些险恶用心。新沙皇已经为苏联《世界通史》的编者说穿道皮！

就国内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上层分子对被统治民族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族压迫，是非正义的。蒙古贵族政权在统一中国过程中，残酷地屠杀和奴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野蛮的军前掠夺把许多农民变为“驱口”或“嘉户”，其社会身份与奴隶无异。还把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强加在封建制之上，如圈占大量农田为牧场，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奋起抵抗这种民族压迫，进行过前仆后继的正义斗争。“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汉族上层文天祥、张世杰等反抗民族压迫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同样是正义的，是符合人民群众的

意愿的。文天祥被俘。任凭敌人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服；要他招降张世杰，他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元兵最后攻下崖山，张世杰突围招集残军准备再战，又遭风覆船殉难。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推动下，元世祖忽必烈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采纳了汉、蒙大臣中主张变革、反对保守，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这一派的意见，战胜了蒙古贵族内部的倒退、保守势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元世祖忽必烈命群臣“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在中央。“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在地方，把全国划分为十一个行政区，每一个行政区设“行中书省”，作为中央中书省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划分全国为二十二个监察区称为“道”，有的直属中央御史台，有的分属地方的行御史台，监察地方行政。行枢密院不常设。遇有战争需要，临时设置。行省下有路、府、州、县四等，个：有哪一百八十二。府三十八，州三百五十九，县一千一百二十七(1)。这一系列政权组织，是贯彻了中央集权与加强地区统治的企图的，是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

蒙古贵族初入中原，为了适应游牧民族的生产需要，蒙古贵族别迭等曾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个计划虽未实现，但仍有大量农田被废为牧场。元世祖时赵天麟说：“王公大人之家，或占田近千顷，不耕不种，谓之草场，专放孳畜”，是破坏农业生产的。元世祖多次颁发命令禁止。他实行重农政策，注意屯垦，兴修水利。还重用具有法家思想的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采纳他的计划，兴修不少水利工程，灌溉大量农田；疏通运河河道，便利南北交通。郭守敬还长于天文历数，他的“授时历”于1281年颁行，推算极精，算出每年有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天，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周期，只差二十六秒。和现行的格里阁里历即“公历”的一年周期相同，而早于“公历”的出现三百多年。他还设计了天文仪器十三件，并实测了各地的经纬度。

元世祖征云南，采纳了从征大臣们的建议，采取民族和睦政策，不乱杀人。有人说“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据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立即发布“止杀令”，遍传城市乡村。因而没有大打恶打，就攻占大理。段信直日投降，封为世袭云南总管，还让他继续统率大理的主力部队“爨白军”。但是留守的将领和蒙古贵族很贪残，激起各族人民的连续反抗。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召见

赛典赤瞻思丁说：“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任命他为平章政事行省云南。

赛典赤来云南后，继续采取民族和睦政策。罗槃甸叛(今元江因远坝)，亲自出征，“有忧色”，将领们问他担心什么，他说：我担心你们“劫虏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则又从而征之”。到罗槃甸，几次招降，罗槃主迟疑未决，有的将领不听约束，奋勇强攻，赛典赤把他拴起来，要按军法从事。罗槃主听到后，“乃举国出降”。“由是西南诸夷翕然款附”。

赛典赤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他和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经营规划，治理滇池，疏通海口，“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又修松花坝，开南北两渠，昆明坝区的水利灌溉，粗具规模。还把种桑养蚕技术介绍给爨白人。

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元世祖和赛典赤都推崇儒学，宣扬“三纲五常”等反动说教，其后代甚至把孔丘吹捧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世祖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互争权利，互相残杀，皇帝荒淫昏暴，大臣专政弄权，尽量搜括“生民脂膏，纵其所欲”。滥发钞币，加深了财政危机。土地高度集中，官吏贪暴，加重了人民痛苦。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等级划分更严格，民族歧视更厉害，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元末社会的阶级剥削民族压迫交织成的社会矛盾，日益深刻，终于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人民大起义。有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有徐寿辉、张士诚、方国珍等在各地大起义。濠州起义军郭子兴的部将朱元璋，乘刘福通北伐时机，渡江南下消灭了南京附近的一些元军据点，攻占常州、江阴、扬州等地，建立了根据地，实行水利修整与屯田政策，奖励工商业，整顿盐税和商税，保证了军需民食，取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又相继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对抗势力，进一步统一南方。命徐达、常遇春北伐，1368年攻占大都，推翻了元朝统治；元顺帝遁走上都，1370年死于应昌府。朱元璋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明王朝。

第十章 明清时期的儒法斗争

第一节 明中后期的阶级矛盾及社会变化

朱元璋参加并领导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是一次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也是一次农民的反孔斗争。在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之后，朱元璋代表地主阶级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基本上实行法家路线，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如他打击大地上豪强，“立法多右贫抑富”，严惩贪赃枉法官吏，重视加强法制。大将胡大海镇守浙东，儿子在京犯酒禁，朱元璋亲手杀了胡大海的儿子，而且说：“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大明律》、《大诰》三编中有些就是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纪录，成为后世遵循的法律。同时他还注意发展生产，使明初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一度有所发展。这一切反映了朱元璋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进步的作用。

但是到了明中叶，儒家的反动思想和路线，在明朝的最高统治者中又占了上风，因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仅在明中期的七、八十年间，在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历时两年、遍及八省，曾三次打到了北京附近。他们到孔丘的家乡山东曲阜县，根本不理睬封建统治阶级那一套“尊孔”的反动规矩，他们打进了孔庙，就在大成殿前喂马，并把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丢进污水塘里，砸烂供献孔丘的祭器，焚烧孔丘散布“克己复礼”复辟经的处所(洙泗之地)，对这个被统治阶级弄得乌烟瘴气的地方，进行了一次大快人心的革命洗刷。这种革命行动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封建制度的愤恨，对孔丘和儒家思想的蔑视。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在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由于工商业的进一步发达，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从而使当时前城镇市民阶层产生了新的政治要求，逐步形成一股反封建专制主义束缚和摧残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市民运动。这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对工商业采取暴征苛税的反动政策和禁止市民自由活动的专制主义上。城市平民反重税反掠夺的斗争，最有名的如1595年山东临清市民反税监马堂。群众万余人放火烧了马堂的税署并杀其爪牙三十多人。事后政府用武力镇压，查捕“首恶”，织筐工人王朝佐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临刑神色不变，深受当

地人民敬仰。还有 1599 年湖广人民反对陈奉的斗争。陈奉到荆州征收店税，市民数千“飞砖击石”把他赶走。到武昌，市民数百包围衙署，放火烧巡抚衙门，将陈奉爪牙六人投入长江，陈奉逃入楚王府得免于死。1601 年，苏州爆发了丝织业中机户织工反税使孙隆的斗争，群众万余人用乱石打死税官多人，包围税署，要求停止征税，在政府武力镇压下，织工葛贤英勇牺牲。1602 年苏州反刘成的斗争，景德镇反税使潘相的斗争。1603 年矿监王朝到门头沟征矿税，矿工纷纷涌进京师示威，政府被迫撤回王朝。1606 年云南反杨荣的斗争。1612 年福州反高棅的斗争等等。从万历到天启全国就有二、三十起反矿监税使的斗争，象这种城市市民的普遍爆动在中国封建社会还是第一次出现。

这些斗争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城市经济发展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同时也表明腐朽的封建制度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这种市民反封建运动，与当时广大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相呼应，形成了一股使得明代封建王朝摇摇欲坠的社会力量，封建统治者惊恐万分。因此，明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他们感到程朱理学不太灵了，于是又改变花样，以主观唯心主义形式鼓吹孔孟之道，并把它推广到社会下层中去，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屠杀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反动的心学家王守仁(别号阳明，公元 1472—1529 年)就是这个时期大搞尊儒反法的代表人物。他在刽子手的生涯中，总结了一条“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反革命经验。因此他大肆进行封建的反动说教，提出“心即理”，要人们闭门修养，求“良知”，实现“知行合一”。他宣称只要反省内求，去掉“人欲”，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企图用这种唯心主义的修养经，消除农民造反念头，消灭城市平民反封建压迫的要求。不难看出，他在政治上推行的是一条维护明朝反动统治的路线。

然而，不管反动地主阶级怎样千方百计地加强思想统治，但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已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封建制度面临全面崩溃。特别是新产生的市民阶层参加了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行列，在这种社会变化较大、阶级搏斗较激烈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一些较进步的思想家为支撑明朝危局，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进行变法。同时在地主阶级中一些较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多少带上市民的色彩，他们有摆脱封建束缚的要求和倾向，对封建制度的反动腐朽也有所认识，能够揭露和批判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多少击中封建社会和儒家的要害，对法家也有较高的评价，将一些长期以来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戚继光、张居正、李贽就是十六世纪高举尊法反儒旗帜的进步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进步的作用。

第二节 明中叶沿着法家路线前进的戚继光和张居正

一、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抗倭斗争

明中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受倭寇(日本海盗)的骚扰很厉害，这批日本海盗打着来通商做买卖的旗号，实际上是进行武装侵略，掠夺沿海地区的财富。当时对这种残暴的侵略罪行，大地主当权派和历代儒家一样，采取投降妥协政策，用各种办法阻止人民的抗倭斗争。江苏、浙江、福建地区的一些大地主，他们不仅和倭寇勾结，通风报信，共同分赃，甚至干脆和倭寇一起进行掠夺活动，东南沿海地区，广大劳动人民和一些中小地主、商人都受害不浅，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抵抗倭寇的侵略。戚继光担当抗倭任务到沿海地区以后，代表这个地区主张抗倭的中小地主和商人，联合人民积极进行抗倭斗争，结果把日本海盗从浙江赶到福建，又从福建赶到广东，最后从广东全部被赶走，基本上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从而巩固了海防，保护了生产的发展。戚继光不愧为抗倭民族英雄。

为什么戚继光能够打败倭寇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人民，依靠人民的力量。靠人民群众提供的情报，掌握倭寇动向；总结人民群众抗倭斗争的经验，从实际出发狠狠打击侵略者。戚继光的这支抗倭军队，从成份到训练、战术等直到跟群众的关系问题上，都是按法家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组织起来战斗的。戚继光以法治军很严，他曾对士兵讲，我执法是严的，决不宽容，谁犯了法，即使是我的儿子、侄子也不饶恕。他的舅舅(管后勤)不好好干，就被他公开毒打一顿。不难看出，以法治军，依靠人民力量，就是戚继光赢得抗倭胜利的根本原因。

从戚继光的抗倭斗争，可以看出，儒法两家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民族压迫中，大地主当权派和儒家往往是搞投降、妥协、勾结敌人，压迫人民。法家则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抗民族压迫的，在这点上他们跟劳动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客观上是一致的。因而他们能

够联合群众，依靠人民力量，赢得胜利。因此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法家这种进步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二、张居正的变法革新

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诸王、公主、宦官、大官僚、大地主加紧兼并土地。景王载圳(世宗第四子)“多倩(美)田”，“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数万顷”。明世宗嘉靖皇帝好道教，土木祷祀之费“月无虚日”。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张居正，目睹这一现状，并亲自了解到直隶有占田七万顷的大地主，而农民很少土地的情况，为缓和阶级矛盾，支撑明朝危局，张居正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了变法。

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成进士，明穆宗隆庆年间入阁，明神宗万历初年任内阁首辅，总共在内阁十余年。他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当时中小地主的利益，进行了变法革新。

张居正的变法内容主要是：第一：加强中央集权。他针对明中叶中央集权被削弱的形势，极力提倡加强君权。他提出“崇诏令”“振纪纲”，并向穆宗建议，按照法家精神办事，掌好君权。张居正执政期间，提高了君权，也加强了内阁实权。内阁成为政治的中枢。第二：整顿吏治。他提出“严考课之法，名审实之归”。对官吏的考课分三等：称职、平常、不称职。提升或罢免都要“一以功实为准”。经张居正这样严厉督责，改变了过去有些地方官对中央隐瞒情况的现象，上面能较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加强了中央集权。第三：重视武备，巩固边防。把李成梁、戚继光等将领派到东北、西北镇守重要边防。第四：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为了打击大地主豪强隐瞒土地，不纳税供役，张居正决定清丈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这是张居正针对“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所采取的措施。实行之后，确有“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之效。”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项重要的税制改革，即一条鞭法。这是两税法以后的新税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一个州县为单位，将应纳的赋税、徭役统统计算在一起，按地亩摊派上缴政府；遇有需要出工，政府出钱招募；其余应交杂税贡物一律免除；征收物为白银。其结果不仅简化了税收项目，而且反映了农民依附身份的相对放松，也在一定

程度上适应了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其他还有治河、治淮等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改革措施。

总之，张居正是以法家的思想进行改革的。他的改革就是“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这次改革在加强中央集权，解决财政困难和巩固边防等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张居正是一个尊法反儒人物，他反对儒家“不达时变”，认为不能同他们搞变法，说他们“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而他特别肯定了秦始皇的功绩，他说秦始皇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他所创建的新制度到了明朝还在享受它的好处。

三、张居正的法家路线为明中后期科学技术的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居正当政以后，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上暴露出来的有关国计民生的严重问题，本着法家路线的“农战”政策，尊法反儒，对政治、经济、军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企图收到富国强兵的效果。由于明王朝的昏庸腐朽，革新时间各项政策虽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但是“一条鞭法”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法家在政治上要求前进，反对倒退，要求革新，反对保守，就比较关心生产，比较注意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因此法家革新的政治路线，在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基础上，对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明中叶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横扫了孔孟的威风，有力地打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在阶级斗争的风暴扫除障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的大道上，张居正顺应时代要求所推行的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对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明中后期著名的科学家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他们的努力作出重大贡献的。

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字东壁，湖北蕲春人。幼年家境清苦，父亲要他读孔孟书，应科举，求功名。他厌恶孔孟说教，摒弃科举，立志学医。他阅读了近千种参考书，走了上万里的路，亲入深山采药。品尝百草，向千百个农民、渔人、樵夫等劳动人民学习，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对每一种药物

的名称、产地、制作过程、气味性态和主治等，都做了比较详尽的叙述和辨析，最后还附有该药的验方，书中还有不生附图。他经过长期的刻苦研究和实践，穷毕生精力，编纂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药物学名著《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记录了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等药品共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并附有历代医方一万多则。集我国本草之大成，对后世影响很大，很早就被译成拉丁、德、英、法、俄、日等好几种文字，在世界和学史中占有一定地位，直到现在还受到世界学者的重视。

李时珍不信鬼神，坚决反对方士们求仙，炼丹欺骗幻想长生不老的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斥责方士说的尽是混话。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虽大骂方士服食成仙的思想，但他又亲自介绍了一些迷信的服食方法。

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号玄扈，上海人，局理朝末年热爱祖国的科学家。他总结了我国传统的科学知识。吸取了天主教士翻译西方科学中的有用部份，结合当日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与需要，应用到农业、手工业和军事的实施与改革上面，图谋国富兵强。这就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推进了一步，使当时的科学技术呈现出有进入近代科学的倾向。

徐光启深受法家“农战”政策的影响，从小就有大志，逢人便讲说富强思想。认为富国必以本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中怀愤激，时览兵传。”看到倭寇侵扰，边防军异常腐败，就提出军事上的“备御之要”(选练“得胜兵”，利用新式火器)与重农的“根本之策。”因此对于农事、水利、历算和兵法都有较深的研究。

徐光启在科学技术上有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农学上的成就和贡献特别突出。他总结农业技术经验，编纂了一部内容广博的《农政全书》，书中在总结保存劳动人民生产经验和技术的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和推广，在破除迷信，反对风土论(如北方不宜种稻等)方面，发扬了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因此，《农政全书》在我国农学遗产宝库中成就卓著，有些资料和意见，今天还有参考和利用的价值。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在致力科学研究的同时又信奉天主教，他的“有神”思想，就多少阻碍了他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北乡人。约生于公元1597年左右，卒于清顺治康熙年间。他根据当时的生产状况，写了一部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科学技术名著——《天工开物》。书中对饮、衣服、用具、制盐、制糖以及陶瓷、冶铸、造船、燃料、制纸、兵器等生产原料和生产方法，都有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并附列绘图。通过这些详细的记录，特别是附图加以说明，可以使人明

确地知道当年劳动人民生产的情况和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成就，总结了明以前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经验，既提高到科学理论的认识，还驳斥了许多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成了研究古代生产技术的宝贵资料。宋应星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天工开物》是我国科学史上一部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性的卓越著作。

宋应星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他生长在农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农业生产。同时，江西也有不少的手工业、萍乡有丰富的煤，广信(今上饶县)有铜，景德镇的瓷器更是全国瓷器的中心，造纸业也很兴盛。商品经济较发达，交通也较前代便利，这就为他写作《天工开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利，《天工开物》讲到灌溉用的水车及农具的制造和利用。手工业则很多利用机械生产，如制盐的有凿井机、吸卤机，制油的有榨油机，纺织的有花机和腰机。这些有的是明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有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革新。

宋应星对当时受孔孟轻视劳动思想影响的公子哥儿很不满意，他气愤地说：富家子弟，把劳动人民都看成是囚犯，轻视农民。但他们每天早晚都要吃饭，只知道它的味道，却忘了它是怎样来的。他勇敢地与反动的孔孟思想作斗争，重视生产实践，鄙视寄生生活，是与法家路线的革新精神相一致的。

第三节 李贽的反传统思想

李贽(公元 1527—1602 年)号卓吾，福建泉州人。当过二十多年的小官，曾在云南作过三年姚安知府，因为和那些“知有己，不知有人”的上司，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处不好而辞官退职。他的主要思想是尊法反儒。正是由于他具有敢于反传统的思想，便一直使他遭受统治阶级的迫害。恰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不平之意)，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但他继承了法家的进步思想和斗争精神，不畏强暴，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其主要思想有下述两方面：

一、批判反动的儒家思想

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总是以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欺骗愚弄人民思想的统治工具。南宋以后，更是把集孔孟思想之大成

的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于是孔子成了圣人，成了人间“上帝”。人们只能以孔子的是非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有谁敢反对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犯上作乱”，甚至遭到杀身灭族之祸。与李贽同时，竭力维护封建道德的道学家耿定向，就是坚持应该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标准。他顽固地提出，对孔子的是非标准不但是“不可不依仿(按照)，而且是不能不依仿，不容不依仿。李贽针锋相对地指出，人应该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不需要迷信孔子，如果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那么孔子以后就不能作人了，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后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还认为是非标准是随时间而变化的，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标准“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怎么能以孔子的是非作为人们作人的是非标准呢？如果古今的人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那就是没有是非了。“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一句话，孔子是值得模仿的，孟子模仿孔子就算不得一个好男子(“非夫”)。他以“一犬吠影，众犬吠声”，即夜里一只狗看见影子叫，别的狗也跟着乱叫，来形容道学家的盲从附合，没有自己的见解，这不仅否定孔子之是非，而且是对儒家思想的叛逆。

反动的道学家朱熹，曾经无耻地吹捧孔老二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李贽对此十分尖锐地嘲讽道：老天爷不生仲尼，世界永远是黑暗的。难怪以前的人只好整天点着蜡烛走路。反共老手陈伯达吹捧林彪是能除千年暗的明灯，能灭千年愚的“天才”，好象没有这个卖国贼，历史就将是一片黑暗，一片愚昧，只有他才是人类的主宰，决定着历史的命运。对照一看就知道，林彪一伙不仅搞反革命复辟、搞阴谋诡计，要两面派，继承了孔丘“克己复礼”的复辟经，就是在吹捧自己方面也 and 孔丘、朱熹是一样的。

《论语》上说孔丘喝酒没有一定的量，但不会多喝到神志不清的程度(“唯酒无量，不及乱”)。李贽对此也轻蔑地说：“大圣人！大圣人！其余都与大众一般”

。也就是说，孔丘除了酒量比别人大外，其他也没有什么两样，这算什么圣人！难道还值得人们如此尊敬和崇奉吗？

反对理学家的“道统”：

自从孟轲提出五百年天就要生一个圣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他自己就是孔丘的直接继承者的谬论以后，唐朝的韩愈也以儒家道学正统继承人自居。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自称他的哲学体系是继承了孔孟以来的“道统”，具

有法统的垄断地位，是不能反对的。李贽给予反驳道：如果道统在宋以前失传，到朱熹才重新接下来，那么，为何南宋并不强大？奄奄一息象死人一样，反不如那些道统失传的朝代那样强大呢？可见朱熹的自我吹嘘已达到了荒唐的地步。何宋室愈以不竞，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破之失传哉？好自尊大标帜，而不知其诟诬亦太甚矣”。他质问朱熹说，既然得到了道统，又经常在皇帝身边，为什么对于南宋当时遭到强邻欺侮却毫无办法？只知道一味揭发宦官当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道学家的正心诚意究竟有什么用处，难道就是为了揭发宦官的小问题吗？“或者圣人正心诚意之学，直为内侍一身而设，顾不在乎夷狄中国之强弱也，则又何贵乎正心诚意也”

李贽还把儒家的所谓圣贤人物一一加以批判。他认为孟轲“舛(错乱)谬不通”，“执一害道”。董仲舒是腐儒，程颐、朱熹的见解是“真不成话”，“胡说甚”，没有价值，朱献“无学无术”。在李贽看来，理学家们虽受到统治阶级的吹捧，事实上没有本事。理学对后世“流无穷之毒害”。是害人误国的“伪学”。他概括而又一针见血的指出：“儒家者流”不过是“依仿陈言，规迹往事”的顽固守旧派而已。所以，李贽不仅是反对儒家的个别人物或理学的某方面，而是指斥，批判了儒家整个思想体系及其所维护的封建制度。

反对“存天理、灭人欲”：

自从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反动命题以后，统治阶级都象抓着救命稻草一样拿来作为加强思想统治镇压人民的工具。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劳动人民安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永远不起来造他们的反。李贽对这个反动谬论，也十分反对，他认为不能把“天理”、“人欲”对立起来，“天理”就在“人欲”之中。因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圣人”也不能“不衣不食”，也不能灭掉“人欲”。如果人没有欲望，一切都是“画饼之谈”。他这种把人伦物理归结为物质生活的满足，脱离物质生活就没有社会伦理可言的主张，对处于饥寒交迫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有现实意义的，在当时具有反封建、反理学的进步作用。

揭露道学家的虚伪面目：

李贽痛恨那些虚伪成性的道学家，自称“见道学家尤恶”。他认为这些人“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言行不一致，惯耍两面手法，反不如“身做这事，口讲这事”的老百姓好。他揭露道学家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宫，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讲说仁义自若也”表面讲道学、暗中追求富贵，不过是“被服儒雅，而行同狗彘(猪)”的衣冠禽兽，是道道地地的两面派。他还

刻画这些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家伙们，往往是以万物一体取得别人帮助，等到别人有困难需要他帮助时，他却以“明哲保身”来置身事外。他嘲笑道家们的无知无能，平常只知道“打恭作揖、终日匡坐(正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大圣大贤人，但遇到国家有事，则又毫无办法。在李贽的笔下，这些本质反动又极端虚伪的孔丘的徒子徒孙们，简直是原形毕露了。

反对男尊女卑：

我国封建社会的妇女，长期受到四条极大绳索的束缚，处于社会底层。孔丘胡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充分反映他极端轻视妇女的反动思想。后来，他的反动胡话成为儒家经典和压迫妇女的依据。宋代道学家们更加发展了这种反动观点，公然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谬论来束缚妇女。不准他们在丈夫死后再结婚。李贽在妇女问题上表现出他的正确见解。他认为，人固然有男女之分，但不能说在见解上也有男女之分的。在他晚年流寓湖北讲学时，允许妇女听讲，统治阶级骂他勾引良家妇女，他也不理睬。他还赞成男女婚姻自由，十分肯定西汉卓文君能自己作主和司马相如结婚。把被道学家骂作“淫奔”的行为称作“善择佳偶”，这种男女平等的思想正是对封建传统的批判。

重视工商业

李贽生活在十六世纪后半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萌芽了资本主义因素，东南沿海一带，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封建社会内孕育起来，这对于李贽是有影响的，加上泉州是中国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他的祖父又曾从事航海经商事业，这些因素促使他重视工商业，认为传统的轻视工商的思想是错误的。“商人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众、所得者末”意思是说商人们带着几万的资本，在旅途中遭受风涛之险，还要受政府关吏的欺负，在市场进行贸易时又要忍受人们的指责谩骂、万般辛苦才得到一点小利，凭什么应该被鄙视？他还认为开采矿藏和经商都有利于人民促使社会进步，不能轻视他们。

二、赞扬法家

西汉中叶以后，主张复古倒退的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标榜提倡的官学，儒生们一般都是反对进步、反对社会变革的。他们对法家和执行法家路线的人物都十分仇视。他们骂秦始皇是“暴君”。李贽却旗帜鲜明地为秦

始皇“辩雪”。赞扬他统一中国，“混一诸侯”是很大的功绩，是千古以来的第一个好皇帝“千古一帝”。实现了法家的进步主张。和他反儒思想一样，李贽的尊法思想也是贯穿在他的整个历史观中，他对多数法家人物都给予肯定的评价。如对先秦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革新的人，李贽的评价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学问，能建立一定的事功。“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他爱读韩非的著作，说韩非能“益人意智”。他肯定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都是“大有雄略的皇帝”。当他读到汉宣帝批评他儿子元帝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何足委任”的话时，称之为“千古不易之谈”对西汉前期的法家代表人物：贾谊、晁错、桑弘羊等他都大力赞扬，如说“桑弘羊者不可少也”。对曹操的评语是“必如曹盖德等方可称为江河湖海之水”。推崇武则天是能够掌握正令、明察事情，作出较好的决定“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对王安石变法也高度赞扬，批评顽固派司马光等对王安石的攻击是“通胡说”，“所见又在安石下矣”，李贽深有体会的说，他这种把长期以来被儒家歪曲的历史还原其本来面目的工作是困难而艰巨的，真好象是和千百万人作敌的战斗。从这点就可看出他不畏强暴的战斗精神。他深知自己的思想会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惧和愤怒，自己的著作将会遭到烧毁的命运，所以把这些著作称为《焚书》。

事实正如他所预料那样，封建统治者对他的迫害、日益加甚，愈来愈残酷。终于烧毁他的书，将他本人下狱治罪。其罪名是“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称道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他在狱中被迫自杀。死前写了一首诗：“有志之士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勇敢的人没有忘记会丢掉脑袋，我现在不死还等待什么，只求这条老命早归黄泉”。这个坚持和传统斗争的七十六岁的老人终于被反动统治者残酷地迫死在监牢之中。

但李贽毕竟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必然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所以他对儒家的批判不彻底，他的思想中也有落后和唯心的东西，他还不能用科学的世界观深刻地揭露儒家思想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

第四节 唯物主义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批判君主专制制度

一、明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及维护这个制度的孔孟之道。

当明末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日益加强，人民生活不下去的时候，统治者也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了。真是“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1628年(崇祯元年)在陕西首先燃起农民战争的火炬。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高举革命旗帜，在“迎闯王、不纳粮”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地进入北京城，推翻朱明王朝，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制度。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无不以革命暴力来批判封建等级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孔孟之道。农民军所到之处，在猛烈冲击封建制、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还要摧毁砸烂那些宣扬儒家反动思想、压制人民反抗的孔庙、郡学、把孔孟之道从神圣独尊的宝座上拉下来，把“至贤”们的塑像烧成灰烬，砸得稀烂，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张角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王小波、李顺提出：“均贫富”，钟相杨么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方腊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及元末农民军提出的“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响亮口号，都是要求改变封建剥削压迫、贫富悬殊，并以革命暴力打击贵族世袭制，批判孔孟所鼓吹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思想。许多农民起义军还对孔孟及其徒子徒孙直接进行讨伐。隋末农民起义军，“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刘六、刘七统率的农民起义军冲进曲阜孔庙，“秣马于庭，污书于地。”表示

了对孔孟之道的极大蔑视和反抗。这次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对这些反动说教，打击得更为痛快彻底。在河南嵩县，烧毁大量儒家经典，捣毁了封建统治者建造起来欺骗麻醉人民的二程(程颢、程颐)祠庙，这些革命行动充分反映革命人民对孔丘、二程等人及其所宣扬的反动谬论的极端鄙弃和憎恨。他们用革命暴力批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反动观点，提出“均田”、“免赋”的革命口号来否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通过革命斗争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还批判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刑不上大夫”的封建伦理道德和法权思想，大杀贵族、官僚、大地主和反动儒生。例如，

在河南诛杀了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程佳祚等。许多官僚地主化装易服、仓惶逃走，“弃坟墓而转徙他乡者十有八九”，郑州的贵家大族“覆宗绝祀者，不可胜纪”，对封建统治者实行革命的专政，彻底否定长期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程朱理学。革命斗争锋芒直指儒学，直指反革命的老祖宗孔圣人，地主阶级对此感到心惊胆战，哀叹地说，这次革命弄得封建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是“千古之奇变”这些都雄辩地说明了农民革命战争的巨大威力，劳动人民才是批孔反孔的主力军。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历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失败是这样，明末农民起义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在明将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镇压下而失败了。清军进入北京逐步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革命形势逆转，逐步形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局面。

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变化剧烈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内部有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因为感到民族矛盾的尖锐而参加抗清斗争，在斗争失败后，又转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试图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以供后来统治者参考。这些人当中有的原来和当权的官僚封建大地主集团有某种矛盾，有的和新兴市民阶层有联系，有的比较接近实际、接近下层，注意研究和接受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这就使他们能够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环境中，较实际地观察分析社会现象，在客上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某种趋向，从而继承了法家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针对唯心主义哲学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有力的批判，把唯物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如王夫之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也能够对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反动性看得更清楚些，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孟之道的批判也比较深刻，较能打中要害，如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同时他们对历史上法家的评价也就更高些，肯定得更多一些，这样就形成了明末清初儒法斗争的一个新阶段。

二、王夫之对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王夫之曾积极投身于抗清斗争,1648年,他在衡山组织武装,阻击南下的清军,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人。失败后投奔了广东桂王。因不满小朝廷的腐败政治,又受到坏人排挤,愤而脱离桂王,回到湖南,隐居衡阳石船山,终生从事哲学政治方面的著作,他在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方面都超过了以往唯物主义的水平,他通过对宋明以来主、客观唯心主义的清算批判,把旧唯物主义发展得更加完备。他虽然没有自称为去家,但实际上有不少观点是和先秦法家的思想相近似。在这一时期、他吸取法家的进步思想,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王夫之尊法反儒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狠批理学、心学和发展唯物主义

在宇宙观方面、王夫之认为“天下唯器而已矣”(器指具体的事物)，“凡虚空皆气也”(气指物质)，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性的“气”。整个世界是物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实体。他说，比如越有山，并不因为我没有到越就说它不存在。王夫之还从物质的运动变化上论证了物质的不灭性，他说“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不曰生灭”。因为作为具体物质的“车薪”经过火烧后“而为焰，为烟、为烬”，只是“特细微(无声音无形质)而人不见尔”。其实，客观存在的物质并没有增加和消灭。王夫之这种观点，有力地批判了陆、王的“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异说”。

在批判客观唯心主义者二程、朱熹的“理在气先”，把

“三纲五常”作为先验的绝对神精的唯心论观点时，王夫之进一步肯定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原则。他指出：“未有弓矢”就没有“射道”，(道，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未有车马”就没有“御道”。这就是说客观存在的各种物质东西与具体事物的规律的关系，只能是先有具体事物，才有事物的规律。没有客观事物，就没有各种事物的规律。因此、各种事物的规律不能存在于客观事物之先，之外。而只能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

在认识论方面，王夫之在知和行问题上批判了朱熹的“知先行后”的学说，提出他的“行先知后”，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王夫之强调主观符合客观才能有正确的认识，而主观要符合客观，就不能离开

行而谈知，行是知的基础，知来源于行。“如见人食梅、则涎流不能自禁、若从未尝食梅者，涎不必流”。不难看出，王夫之是坚持必须通过实践才能有知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正如他所说的“人于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欲闭内而灭外、使不得合，则虽圣人不能舍此、而生其知觉”。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什么也不见不听，心里就空空如也、一无所有，只有与外界事物接触、主观才能符合客观、才能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不同外界事物接触、就是圣人也不能有知识。这样，王夫之肯定并坚持了从物质到认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他认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即物”，是取消客观世界、用主观代替客观，是错误的。不难看出，他这种观点是对儒家理学所谓“圣人生而知之”，“心即理”等主客观唯心主义的深刻批判，同时还否定了“唯天才论”。

“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朱熹为箝制劳动人民思想，防止和压制广大农民起来革命而提出来的反动哲学命题。王夫之对此给予了坚决的批判，指出：“圣人有欲，其欲即天之理，天无欲其理即人之欲。”他认为圣人也是有欲望的，人欲就是天理、天理应该符合人欲，没有人欲就没有天理。王夫之以唯物的感觉论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对人欲作了新的解释。这种看法，反映了当时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不能生存下去，要起来斗争的要求，可以看出他对于贫苦农民是有所同情的。

同时，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还包含有辩证法思想。针对儒家鼓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和反动保守观点，王夫之提出了“质日代”“道日新”的命题，即世界上的各种物质从形式上看好象没有变化，而实际上它的质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他说，“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灯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远而不察耳。”就是说，江河之水，表面看古今一样，实际今水并非古水。同样是火，昨天的火也不是今天的火。因为水火近所以我们能觉察，日月远我们就很难觉察，但是由近及远可以推知，日月也是在变化着的，发展变化是自然界的必然趋势。因此，天地间没有“废然而止”的绝对静止。如果“废然而止”就等于“熄灭”，所以“静者静动，非不动也”。“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王夫之这种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者鼓吹“静为躁君”，用静止去主宰运动，妄图把自然界和社会运动变化的程序条理都置于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之工。他指出，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是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发展中，要否定这种变化是办不到的。

(二)坚持厚今薄古，反对复古倒退

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把历史的变化说成是“天命”即神的意志所决定，而圣人是按照天意行事的。因此历史的发展也是圣人决定的。孔丘宣扬“天命论”，朱熹更具体地发展了“天命论”，提出了唯心主义的“天理”（三纲五常）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天理”主要是通过帝王的心来表现出来，硬把帝王说成是“天理”的体现者。他认为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三代以后人欲横行，是霸道政治。因此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搞倒退。

王夫之对这种复古主义作了坚决的批判，他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人类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是“变化自新，生生不息”地进行着，如江河之水时刻变动，如“人身肌肉爪发”天天在新陈代谢，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天变道亦变，自然社会也在变，而且这种变不是杂乱而无章、越变越坏，而是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有规律的变化着。社会也是从野蛮到文明的变化着，越到后越文明，后代总比前代强，“世益降，物益备”，是今胜于昔的。因此他大胆推断出人类社会是由兽类逐步发展变化来的。他指出“唐虞以前……衣裳未正……婚姻未别……人之异禽兽无几也”。他反对把古代看成黄金时代的观点，他从当时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推断出古代社会历史的情况是“三代沿上古之封建，无异今川广之土司”。这种观点是符合科学的。他的这些论断无异是对复古主义者的一个沉重打击。他尖锐指出：朱熹等人“好古”“崇古”“复古”就是硬要把人类社会拉回到禽兽世界去。王夫之说他们是“泥古过高而非薄方今”只知守故物而不能知当前的新事物，这样的人，“虽其未消，亦槁而死”。

王夫之还认为，历史既是不断进化的，因此各种制度也要因时制宜，随时代变化而发生变化，“时随势而法必变”。他指出“洪荒无揖让之道，唐震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就是说，社会是发展变化的，时代不同了，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如洪荒时代没有“君主”因此就不会出现象后代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的那种推位让国的事情。唐虞时代是讲禅让的，正因为那时是禅让时代，所以就不会发生象后世汤放桀、武王伐纣那类事情。同样汉唐之时也和当今不一样，治国之道当然和现今不同。今天不会出现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随时代的变化，将来的事情也必定与现今不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夫之社会进化的观点，所以他主张“趋势更新”。“趋势”就是法家提出的“法后王”即反对复古倒退，主张革新前进。他指出“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就是说古代的办法是用来治理古代的天下的，它不能用于今天，更不能用它去

办事。他又进一步说：“从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今日治天下适宜的办法后代不一定适用，就不要用它来要求后代。很明显，王夫之的这种观点与法家的“法与时移”，“便国不法古”“因世而为之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与儒家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明显的对立。王夫之的“趋时更新”的观点后来成了近代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

(三)高度评价秦始皇

王夫之厚今薄古的进步思想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对秦始皇的评价，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两千多年来被厚古薄今的儒家诽谤攻击，而王夫之则高度评价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统一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功绩。

王夫之指出：郡县之制建立了将近两千多年不能改变，古往今来的人都推行这种制度，是势所必然，若不是由于理那能够如此呢？“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他认为合乎当时形势需要的，就是合理的。那些主张分封制，为分封制辩护的都是废话。王夫之根据历史进一步对比了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优劣：第一、他指出，周代那种诸侯世国，大夫世官的办法是不合理的。统治者的儿子生下来就当统治者，农民的儿子生下来就当农民，而从人的才能来说。统治者会有愚蠢的，农民会有聪明的，因此“秀不能终屈于顽”。就是说，聪明的人不能永远被压在愚蠢的人下面，于是要发生变化。而在郡县制下，有才能的人可以被选进统治阶级“以尽其才”。这里要指出，王夫之所谓有才能的人是超不出地主阶级范围的。不过他的这种观点比起奴隶主阶级贵族世袭的“天命论”显然还是进步的。第二，他认为实行郡县制，保证了国家统一，革除了分封制必然造成的那种“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的局面，人民遭受战争祸害的痛苦。

总之，王夫之认为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尽管他的社会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他不可能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但他认识到历史发展有它的道理，并不是什么上天安排。他这样高度评价秦始皇，在反对当时的复古主义、唯心主义是有进步意义的。可以看出，在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王夫之的思想是达到了较高水平的。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王夫之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唯心主义东西，尤其在历史观方面，他因为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动力，最后不能不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是他厚今薄古主张革新的社会历史观对

以后的进步思想家和革新运动都有积极的作用，例如对谭嗣同、章太炎等都有影响。

三、黄宗羲的民主思想

(一)明代君主专制的加强：

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机器也更加强化。参加并领导过元末农民战争的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后便积极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其办法是，在中央废除秦汉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隋唐以来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三省制(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府(管军事)院(主监察)，并直接隶属于皇帝。地方则废除元代以来的行中书省，削减地方权力。分设掌管民政、财政和军事，司法的三司、直属皇帝，使皇权空前高涨。

但皇帝独揽大权，势必不能兼顾，转而依靠其左右亲信。因此明朝许多皇帝都信任宦官，把大权交给厂卫(特务组织)，依靠这些人来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和对大臣官吏们的控制，终于形成宦官专权、特务横行，政治极端腐朽，各种矛盾激化，爆发了大规模农民战争，导致明朝灭亡。

(二)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人，青年时期参加过反对阉党的斗争。明亡，又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一直拒绝与清政府合作。他根据自身经历，从中小地主和市民的利益出发，总结明灭亡的教训，写出著名的政治作品《明夷待访录》，其中某些观点能较中肯地批判理学和君主专制制度。

他大胆提出，成为天下大害的就是皇帝，“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皇帝之所以是天下大害的原因是由于他把天下的利益尽归自己，灾祸则统统推给别人，公然把自己的私利说成天下之大公，要所有的人都放弃自己的利益来为他的私利服务，当他在夺取政权时，杀了许多人，搞得别人家破人亡。只不过是为他取得政权，建立他自己个人的产业。“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个人之产业”。在夺得政权后，更是肆无忌惮地对人民残酷剥削压迫，离散天下人之子女，供他一人的淫乐享受，还认为是理所当然，是使用自己产业的利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这样残酷暴虐的皇帝，人民怎么受得了？所以天下之不得安宁正是有了皇帝。”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

为君也”。在这里，黄宗羲揭露了我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君主专制制度带给人民的灾害。

他进一步提出，天下民为主，君为客的观点。皇帝应该为天下万民做事，“以天下万民为事”。而不要让天下的人为自己服务。天下的治和乱，不在一家一姓的兴或亡，而在老百姓的能否活得下去。”“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人民生活得好就是治，反之则是乱。在皇帝下面当臣的是要协助工作，为天下万民作事，不是皇帝的奴婢。如果皇帝能关心“万民之忧乐”认真负责，当臣的应该努力帮助他，如果皇帝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当臣下的没有必要为他效忠”，杀身以事君”。君臣关系是师友，而不是主奴，一个人如果不作官，他跟皇帝的关系就跟路人一样，没有什么应尽的职责，这些观点不仅否定了儒家思想宣扬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信条，而且把“天子”降低到一姓的地位，并进而把“一姓之兴亡”和“万民之忧乐”对待起来，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公开予以藐视。

他认为当时那些不以万民为事的暴君，已经激起万民的愤怒。大家把他看成仇人，称他叫“独夫”，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一般见识卑下的小儒还胡说什么“君为臣纲”。君尊臣卑是天经地义，谁也不能违反。“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样强调皇帝的重要，而把人民的痛苦看得一钱不值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从批判现存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而否定唯心主义先验论理学的政治理论基础——三纲五常，把斗争深入到哲学领域。

怎样才能免除君主专制之弊：

黄宗羲提出以“众治”代替“独治”的办法。

首先、主张法治“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不能只靠人来治，必须建立一定之法规。在他看来，历代封建政府所行之法乃是“一家之法”。因为皇帝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产，总想自己的子孙世袭，垄断这个统治权，传之万代，享受无穷，于是建立起他的私法。这种法，对天下人来说，不过是“非法之法”，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样一来，前面的皇帝为了满足自己强烈的自私自利的贪欲而制定“一家之法”。后来的皇帝又以他自私自利的贪欲来破坏这个“一家之法”。破坏它的固然给人民带来灾祸，可是制定它也同样危害人民””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那些俗儒还公然竭力维护这种私法，胡说什么“一代有一代之法”，后人绝对不能改变祖宗的成法，真是盲从附和、毫无见解。

黄宗羲的“天下之法”，当然不会是代表劳动人民之法，而是代表部分地主和市民利益的法，使这些人不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压制而能够各得其私”，“各得其利”，得到保护和发展，这在当时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其次、主张设丞相。黄宗羲明确指出，明代政治之坏，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开始，“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罢丞相后，虽设内阁学士，但负责拟稿而无实权。原来丞相的权落在那些口传皇帝意图的宦奴(指宦官)手上，以至后来皇帝极端腐化，宦官专权，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说，如果明朝不废丞相，也许皇帝还有所畏惧警惕，宦官也不敢肆意横行。因此主张设置宰相一人，参知政事若干人来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以避免皇帝专横独断，宦官为非作歹。与此有关，他还批判儒家经典(《周礼》郑玄注)是诲淫之书。根据这书规定，皇帝宫中养着成千上万的妇女、宦官以供皇帝一人淫乐，招来宦官弄权之祸。他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的丑恶本质揭露出来，也就把儒家视为万古长存的真理否定了。

当然，宰相之有无，并不是君主专制，政权腐化的决定因素。君主专制独裁乃是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国家机器不断强化，剥削阶级反动腐朽的产物。但黄宗羲能大胆揭露反动阶级的罪恶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主张把学校作为“众治”机关，他认为皇帝的见解不一定正确。“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所以，皇帝也不敢认为自己的见解正确，“不敢自为非是”而任意孤行，那么是非由谁来决定？黄宗羲的回答是把学校作为评议的场所，“公其是非于学校”。这比李贽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又前进了一步，因为孔子毕竟是死了的“圣人”，而皇帝却是掌握着生死大权的活“上帝”，触犯了他就会丢脑袋的，能提出如此明确的观点，足见他英勇无畏的精神。

(三)黄宗羲农商业并重的经济思想：

黄宗羲反对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儒家传统思想，他认为世俗儒生不了解工商业的重要，而视为无足轻重的部分，事实上工商和农一样重要。“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盖皆本也。”这反映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的需要，也看出黄宗羲能随时代要求而提出新见解。这种不泥古守旧的态度，是继承了法家的革新精神。

他还揭露当时政府赋税方面有三害：一是赋税一代比一代重，人民生活一代比一代痛苦。到了明代赋税积累太多，人民能够生活的已寥寥无几了。“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二是“所税非所出之害”。明代赋税征银，

人民要将实物换成白银缴纳，没有一年农民不受损失的，统治者把人民当仇敌看待。“是有天下者以斯民为敌也”。三是“田无等第之害”。政府征收田赋，不分土地好坏，同样负担。那些耕种坏地的人每年收入还不够租牛和赋税的费用。农民逼得生活不下去，“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封建政府面临崩溃前夕，很快就要爆发农民大起义。

不容否认、黄宗羲的哲学思想还有不少唯心主义成分，政治思想也有落后的观点，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有不少进步的东西。他敢于斥责最高封建统治者，大胆揭露君主专制及维护封建制度的纲常伦理，给唯心主义理学以有力地打击，反映了强烈的民主色彩。他的《明夷待访录》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大量刊印，成为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武器。

第五节 清代初期的儒法斗争

一、清初统治的加强及康熙的法治措施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政权。但因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清贵族篡夺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农民的血泊中建立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各族人民的封建专政。由于清政府曾把落后的生产方式强加于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如在某些地区实行“圈地”政策，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在南方的江阴，嘉定、扬州等地大肆屠杀汉族人民，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清统治者入关后镇压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及各地的起义军。在清政权残酷屠杀下，鲁东、鲁西地区呈现“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惨景，鲁南也是到了“农民恨诅天无眼，不见僵尸满路稠”的残酷景象。

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反动政权，除了竭力强化国家机器外，还把牧师的职能与刽子手的职能结合起来交替使用。他们继承了宋明统治者的衣钵，以孔孟之道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钦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朱熹这个偶像被抬进孔庙，列为“十哲之次”，这个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成了继孔孟之后的思想界的权威。他注释的《四书》成为封建社会的法典，科举考试的教条。社会上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如果有人议论朱子，就会遭到迫害和镇压。甚至明末李贽、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也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禁止。此外，清王朝还大兴文字狱，在意识形态领域内

实行极端严厉的思想箝制政策。又大修《四库全书》，收卖笼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引诱他们脱离政治、脱离现实、钻入故纸堆中，进行繁琐考据。在这些高压政策下，考据学成为箝制思想，培养奴才的重要手段。鲁迅先生说：“太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反动儒生的行径，被深刻地勾画出来了。

清王朝建立后，虽因其高压政策带给人民以极大的痛苦，但在清王朝的第二个皇帝康熙统治时期，社会经济曾一度有所发展。康熙推行了一条法治路线，为促进社会的发展、捍卫国家主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康熙、名玄烨(公元 1654——1722 年)，八岁继位，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公元 1662——1722 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推行法治路线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康熙亲政后，面临由于连年战争造成人口锐减，满州贵族乘机疯狂掠夺农民土地的局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康熙于 1669 年下令废止“圈地令”，以限制土地的集中，一面又采取了奖励垦殖、兴修水利等发展农业的措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对于那些搞分裂割据的败类，他主张坚决镇压。从 1681 年到 1722 年康熙进行了“削藩”斗争，先后平定和统一了西南、台湾、漠北、西藏、新疆、等广大的边境地区。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继承和发展了秦始皇废除分封设置郡县的制度，实行了中央集权的有效的统治，确定了中国的辽阔版图。

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巩固后，康熙又对深入黑龙江流域猖狂进行扩张的沙俄侵略者给予坚决地回击。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侵占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以后，又把侵略魔爪伸进我国神圣领土黑龙江流域，妄图躺占黑龙江地区。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一直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满族兴起后，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先后统一了明朝管辖的整个东北地区，建立了行政管辖机构，当地各族人民都按照满族的传统编入八旗，统一由宁古塔将军管辖。史书上记载：宁古塔将军“所属东至海，东南至希喀塔山界，东北至飞牙海界，西至威远堡”康熙统治时期为了对付沙皇的侵略，又增设了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并“镇以重臣，屯以劲旅”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管辖。

公元 1643 年，以波雅尔科夫为首的第一批沙俄侵略者，偷偷进入我黑龙江下游侦察地形、搜集情报、屠杀当地居民。这伙披着羊皮的豺狼，一个冬天竟吃了五十个中国人。此后，沙俄又多次派匪徒入侵我黑龙江一带，烧、

杀、抢、掠无恶不作。1657年，以哈巴罗夫为首的一批哥萨克匪徒，又一次侵入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交汇的黑龙江一带，他们仅在攻陷达斡尔人木城时，就杀害了男俘616名，掠夺了243名妇女和儿童。沙俄侵略者在我国领土上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彻底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凶残和野蛮。对于沙俄的野蛮侵略，我国东北地区军民奋起反抗，给予侵略者应有的惩罚，表现了坚定的爱国主义的崇高气节，斯捷藩诺夫这个侵略分子就是被我国军民击毙的。

对于沙俄的入侵，在清朝庭内部也引起了激烈地争论，是进行坚决的抵抗还是屈辱退让？实际上是反映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康熙坚决驳斥了朝廷内一些儒生大臣反对出兵、主张退让的谬论，主张进行抵抗。他说，沙俄侵略者“扰害索伦、赫哲、飞平喀，奇勒尔诸地……剽窃人口，抢掠村庄，攘夺貂皮、肆意多端……扰害益甚……应即翦灭”表现了康熙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意志。在中国人民的严厉惩罚下，沙俄帝国被迫派出代表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1689年8月，中俄双方代表在尼布楚举行谈判，谈判之前，康熙在指示中国全权代表索额图时指出：“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江之一河一滨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只有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才与之画定疆界，“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在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援下，中国代表粉碎了沙俄谈判的种种阴谋，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两国边界的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为界，岭南的土地和河流属中国，岭北的土地和河流属俄国，乌第河地区“暂停存放”，留待以后“再行定义”。条约还规定、拆毁沙俄在雅克萨修筑的据点，撤走沙俄在这里的殖民者。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人民坚持反侵略斗争的结果，它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属中国人民的领土。康熙在与沙俄斗争的过程中坚持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行动和原则是正义的、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

今天的苏修新沙皇继承了老沙皇扩张主义的衣钵，在世界各地到处伸手、干涉别国内政，它竟叫嚷什么中国北边的领土以长城为界。新沙皇的胃口比老沙皇的还大。并且苏修还为老沙皇的侵略行径辩护，胡说“《尼布楚条约》是靠武器的力量加给俄国的”，并大肆攻击康熙。苏修的猖狂反华活动，恰恰证明了我国人民在历史上进行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是正义的，康熙在这一个原则问题上的爱国主义立场和坚决抗击沙俄侵略的业绩，应充分地肯定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康熙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推行法治路线的措

施、抗击沙俄应给予充分肯定，但在另一方面，为了巩固政权和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提倡尊孔，推崇程。朱理学。所以在肯定康熙功绩的同时，还要看到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二、人民的反孔斗争和清王朝统治下儒法斗争的特殊形式

客观形势的发展是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压迫剥削就有反抗斗争。压迫剥削越重，反抗就越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就是这样，他们是反封建，反孔的主力军，他们总是以自身的革命行动对地主阶级所概定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伦理道德进行大胆的挑战。1674 年左右出现了反清组织“天地会”，这个组织包括了反清的各阶层，上自富商、地主官吏、下至胥吏、兵士、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业者及脚夫、城市贫民等等，其中以社会的下层群众为其主要力量。

还有不少劳动妇女为了砸烂三纲五常的约束，与男子们一起举旗造反。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女将乌三娘，原是杂技艺人，后来投奔起义军，成为王伦的得力助手，曾参加过攻打寿张、阳谷、堂邑等战役。占领这三县后，他们开仓济贫，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到了清代中叶农民要求有“永佃权”，也就是要彻底砸烂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这个口号具有“为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愿望”。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是批判和否定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封建社会的行将灭亡。清政府的武力镇压和思想箝制政策并不能挽救地主阶级“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零落衰败的命运。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推动下，法家对儒家的斗争也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着。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只是加速了它自己的没落，使得地主阶级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理学也产生了怀疑，甚至反对。他们继承了法家的革新精神，要求改变这种腐朽沉闷的局面。在儒家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当时，他们为了避免因反儒学遭到迫害，便采用注释儒家经典或利用小说的形式，不断对官方哲学——理学展开批判。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儒、法两家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戴震，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统

治极其残酷、思想箝制非常严厉的情况下，不畏强暴，用锋利的笔与反动理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抨击封建制度，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的理学，与程、朱、陆、王唱对台戏。特别是针对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的思想受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新派的推崇。

戴震生活在号称所谓“盛世”的雍(雍正)乾(乾隆)时代，也正是清政府统治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在思想领域内，程、朱的理学占了绝对统治地位，迫害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字狱比任何时候都厉害。如果有谁稍触犯了程、朱理学就有被杀害的危险。雍正时谢珩世注解《大学》，没有按照朱熹《四书集注》本的观点，结果竟被顺承郡王锡保奏告谢挤世毁谤程朱，雍正皇帝亲自批谕为“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大臣们竟议罪该斩首。在雍、乾时代死于文字狱中的进步人士不知有多少。中国历史上的思想箝制政策达到疯狂的地步。在这种黑暗的时代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到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面临土崩瓦解危险的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乞灵于反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一条从孔丘的“克己复礼”直接继承下来，而又加以发展的反动政治纲领。几百年来，死于这条反动纲领之下的不知有多少人。他们讲的所谓“天理”，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即三纲五常)，人民或有进步思想的人起来造封建制度的反就是“人欲”。因此，要存“天理”就要消灭“人欲”。这种把“人欲”看成是罪恶，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官僚地主阶级提出来麻痹人民压制人民要求生存和反抗压迫的反动哲学。可见，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罪恶目的，就是箝制人民的思想，防止和压制广大农民起来造地主阶级的反，宣扬“灭欲存理”就是要将人们引上僧侣主义的道路，去欲存理成了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反革命工具。

针对程、朱哲学宣扬“灭欲存理”，戴震进行了大胆的挑战。他提出自然与必然一致的理论，来证明“理”与“欲”的一致。反对程、朱的反动理论提出了“理存乎欲中”的唯物观点。他认为“理”与“欲”并不冲突。在戴震看来，饮食男女、穿衣吃饭，是人生而有的自然需要和要求，即人欲。也就是人的本性，而社会的一切道德观念、行为都最终离不开“欲”，都是以“欲”为基础的，因此所谓存天理并不在人欲之外，而是在人欲之中。理与欲根本不能分开。没有欲就根本谈不上理，针对朱熹的“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的反动谬论，戴震进一步指出：人有欲望才产生行动，并在行动

的过程中，经过实践证明做对了的才叫做理，如果没有欲望没有行动，又怎么会有理呢？“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结于至当之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了”这就有力地驳斥了程朱理欲对立理是善、欲是恶的观点。

戴震反对程、朱将天理——人欲并立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清王朝前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一再遭到摧残，但它毕竟还是缓慢地发展着。到戴震所处的雍、乾时代，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出口货物如丝、茶、瓷器的出产区安徽、浙江、江西等省最为明显。戴震的家乡是安徽茶叶中心休宁县，他自己也曾从事经商，因此他能了解市民的要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一般人民的痛苦，他对统治者借程朱理学来排斥人欲反对人民的基本要求的反动说教表示深恶痛绝。他提出的关于天理、人欲的一致性的学说，充分发挥了反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是当时一般市民阶层向封建统治者争取基本权利的理论基础。

戴震在驳斥了程、朱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谬论后又进一步指出：统治者要劳动人民“灭欲存理”，维护三纲五常永恒不变。在这个前提下，统治者就可以用“理”来责罚卑贱者（指劳动人民），长者、贵者按照“理”的规定来责罚幼者、贱者，虽然责罚错了，但这样做是符合“理”的要求。因此是理所应当的，如果卑者、幼者、贱者反过来用自己的理（正义的斗争）来回敬他们，那么即使做对了，因为违背了三纲五常的规范、仍然是大逆不道，就是人欲横流了。戴震还进一步揭露了清政府的贪污腐朽，如统治者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法。他说，在位的人人贪污，无官不贪，对人民压迫剥削很厉害。劳动人民因为生活不下去而起来造反，这并不是民性不好，而是由于官吏贪暴所致，社会的动乱是由于统治者的压迫引起的。可是统治者不承认这个问题，还说是劳动人民性不善，是人欲在作祟，把责任归于劳动人民，甚至与人民为敌，与人民对抗，真是使人困惑不解。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有势力者“理伸”，没有势力者“理屈”，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局面，是由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三纲五常”的理学家程、朱搞出来的。因此，戴震揭露程、朱理学在本质上的反动“同于酷吏（残暴的官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而理学家则“以理杀人”，而且“以理杀人”，尤甚于“以法杀人”，被害的人“不胜指数”。他无限愤慨地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揭露了理学杀人不见血的反动政治本质。很明显，程、朱的理学完全是为“尊者长者、贵者和上之人”服务的。对于劳动人民它是一把血淋淋的软刀子。在“理”的迫害和指责下，多少卑者、贱者、幼者和下之人丧

失了生命。程、朱的“理”只能保护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封建礼教杀人比残酷的刑法杀人还要凶狠厉害。戴震在十八世纪就以哲学的语言喊出了反对礼教的呼声。可见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争取民主、自由的萌芽。这与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戴震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在自然观上，他批判了朱熹的“理(精神)在气(物质)先”，“理生气”的精神第一物质第二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先有气，才有理，并揭露理在气先，这种观点的错误实质在于把理作为气的主宰、就等于“以神为气的主宰”。如果说，“理能生气”就等于“神能生气”。他指出这种观点同道家的“真宰”说和佛家的“真空”说是一致的。所以程朱理学不过是道教佛教唯心主义的继承者。在认识论上他主张由“血气心知”，要通过五官来认识外界。反对“复其初”的唯心主义自我修养。戴震还通过对动植物的分析，看到了事物的共性和个性，不仅指出了物质运动和规律不能分开，而且分析了不同事物有不同的分理，即事物的特殊性。他这些观点反映出了十八世纪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但他还不理解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总之，戴震是继承了历史上法家的坚持进步、坚持革新、重视现实反对倒退的前进精神的。他的这些充满战斗精神的论点，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原则，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大胆挑战。因此他的思想曾受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等人的推崇。

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戴震还不可能彻底认清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的反动本质，他看到了“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但是他不懂得人的阶级性。他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人，超阶级的人，并把人性解释为人的自然情欲。而不能用阶级的观点解释人性。因此他不能彻底揭露出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反动阶级本质。尽管他的思想中具有某些朦胧的启蒙思想，但总的说来，他还脱离不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也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传统意识。他提出的“遂己之欲，广之能遂人之欲”的“圣贤之道”是十足的空想。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要求、愿望是根本对立的。也不可能有一致的“情”“欲”，因此，戴震主张社会伦理的“必然”(理)合乎“自然”(欲)，本质上是从改善封建制度而不是推翻封建主义的目的出发。他发出了反对礼教的呼声，却提不出新的内容，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这都是由于他的阶级立场以及历史的局限所决定的。

与戴震同时，进步的文学家曹雪芹，通过所著优秀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描写了封建社会破败迎落的景象，提出了冲破封建礼教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反孔思想。

《红楼梦》是一部描述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政治历史小说，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中也包括了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尊孔与反孔的斗争。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线索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反映了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被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迫害致死的一条条人命暴露了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血腥罪行，也是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的反动性、腐朽性的有力揭露和批判。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成功地塑造了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歌颂了他们的叛逆精神，并深刻揭露了封建卫道士贾政的虚伪和残忍。《红楼梦》中，贾宝玉因不愿“留恋于孔孟之间，置身于经济之道”，就被贾政打得皮开肉绽，还扬言要将他勒死。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尊崇儒学与反对儒学的斗争是何等的激烈，正如林黛玉所讲的“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斗争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中间决没有调和的余地。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对奴隶反抗的热情歌颂，成功塑造了晴雯、鸳鸯等奴隶的形象。并以同情和赞美的态度描写了他们反对礼教纲常和名分等级制度的斗争，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孔孟之道和朱熹等人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深刻批判。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要求个性解放、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儒思想是与当时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分不开的。十八世纪前后的中国虽然还处于封建社会，但资本主义萌芽已有所增长，新兴市民阶层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曹雪芹和当时其他进步思想家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乃是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由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封建落后的思想也混杂其中，我们在肯定《红楼梦》的同时，还要“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兼收并蓄，囫囵吞枣。

从上看来，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给予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沉重打击，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康熙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顺应当时潮流，推行法家路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有所增长。但因乾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加深剥削压迫、土地兼并剧烈、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又因害

怕社会进步、采取压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遂使资本主义的萌芽得不到发展。随着统治者的荒淫腐朽，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西南苗族起义、川楚白莲教的农民起义、天理教的农民起义，广西天地会的农民起义、湘西瑶族的起义，先后在全国各地与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其中如苗族起义波及贵州、湖南、四川三省。清统治者征调七省兵力前去镇压，耗去军费七百万两、损兵折将、屡吃败仗。又如川楚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波及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五省。清统治者用以镇压这次起义的军费在一亿两以上，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再如天理教在京郊的一支起义队伍，曾乘嘉庆帝出游热河的时机攻入皇宫，使统治者惊惶失措。这些义军，虽先后被清统治者镇压下去，但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正当清王朝的统治日益动摇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不断输入商品和鸦片，走私牟取暴利，破坏国计民生，白银大量外流，封建社会面临着严重危机，一个大的社会变革时代即将到来。就在这样严重气氛的激励下，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针对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革新主张，出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也是反侵略战争的抵抗派。他们以法家思想为武器，反对守旧，要求革新，为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大喊大叫，坚决同尊儒反法的封建顽固派和投降派进行斗争。进步思想家龚自珍和抗英派林则徐、魏源，就是这一时期提倡改革的代表。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对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的憧憬，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形成了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

第四部分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反孔尊孔的斗争

(公元 1840—1919 年)

“中国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时期。

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一部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在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面，集中表现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反封建方面，这一时期充满了维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革命与改良、推翻封建统治与维护封建统治、革命势力反复辟与封建势力复辟的斗争。这些斗争反映在文化战线和思想领域里，就是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就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

由于孔孟之道不仅是封建统治者压迫中国人民的思想工具，而且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因此，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来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通过揭露尊孔与复辟，尊孔与卖国之间的联系，中国人民越来越认清了一切反动派尊儒反法、崇洋卖国的反动本质，从而在近代史上展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战斗场面。

同时，在中国社会里，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城乡小资产阶级外，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些不同的阶级，对于孔孟之道持有不同的立场和抱着不同的态度。

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当权者和顽固派，都是尊孔、复古、崇儒、反法、卖国的。但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具

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一些继承了法家进步传统的思想家如魏源等，就曾提出革新要求，反对投降卖国，主张抵抗外国侵略。资产阶级的情况颇为复杂。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基本上和地主阶级顽固派一样，都是尊孔的。这个阶级中的改良派，其基本态度也是尊孔的。但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为了“救亡图存”，他们同顽固派、洋务派展开了爱国还是卖国，变法还是守旧的大论战。他们继承了法家主张变革、发展生产的进步思想，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观点，发起了一次变法维新运动。企图通过改良的途径，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变地主阶级之法，为资产阶级之新，发展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一种革命力量，但是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反帝、反封建不彻底，反孔也是如此，并且有不少人是尊孔派。这一部分资产阶级，从它的阶级基础、政治主张、经济要求和思想根源来看，都和封建社会中的地主阶级法家不同；但是它要革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因此，它继承了历史上法家要求革新、要求进步的传统，基本上是站在尊法、反儒、反孔、爱国这一方面的。无产阶级、农民群众以及城乡小资产阶级，即人民大众，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力量，也是反孔批孔的主力军，并且在反帝斗争中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这些阶级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一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爱国还是卖国所进行的斗争，贯穿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

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逐步深入，人民大众思想的逐步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的任务，以及彻底批判作为一切反动派进行反动统治的思想工具的孔孟之道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

第十一章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尤其是广大农民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更为深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以农民为主体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革命风暴越来越猛。仅据《清实录》记载，1843——1850年间，各地农民起义大小不下七十多次。真是“山雨欲来

风满楼”。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 1851 年初正式爆发了。

第一节 横扫孔孟之道势如疾风骤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既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又是一次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反孔斗争。太平天国革命的领袖洪秀全，是这场反孔斗争中的旗手。

洪秀全(公元 1814——1864 年)广东省花县人，出身农民家庭，小时入私塾读书，十四岁时因家贫失学，在家协助父兄耕田。从十六岁到三十岁任本村私塾教师。他身居农村，又参与农业劳动，所以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他是我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鸦片战争前后，他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社会动荡不安，农民暴动风起云涌，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并且毅然投身革命，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洪秀全读过孔孟的书，在发动起义以前他所写的几篇反封建的著作中，也夹杂了一些儒家的话。但是，当他一旦投身革命时，便深感儒家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是发动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严重障碍。他认为，要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反孔，打碎千百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1843 年，他不顾儒家教条造成的舆论压力和封建势力的迫害，第一个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捣毁了村塾里的孔丘牌位，把几千年来被历代权势者们供奉的“大成至圣先师”打翻在地。封建统治者惶恐万状，咒骂洪秀全“大逆不道”，解除了他的塾师职务。洪秀全不怕打击，不怕失业，离开家乡，无所畏惧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了发动革命，洪秀全在 1845——1846 年间写了《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等革命文章，向封建制度挑战，表达了反对封建阶级压迫、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的思想，主张用革命的办法去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洪秀全还把以清朝皇帝为头子的地主反动派比作“阎罗妖”在地上的化身，号召农民起来革命，奋力除“妖”。“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洪秀全创造了一个有着鲜明反孔内容的生动故事。它借“皇上帝”的权威，把孔丘押上审判台，宣判他维护封建反动统治的罪行。故事说：“皇上帝”把孔丘的书陈列

出来，发现里面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于是派人把孔丘抓来审问。孔丘开始还狡赖，后来被问得哑口无言，打算逃跑。“皇上帝”大怒，下令把他捆绑起来，严加鞭挞。孔丘再三讨饶，哀求不已。最后，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被罚去种菜了。故事中，洪秀全所讲的那个“皇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反对封建统治、争取解放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化身。这个故事使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威风扫地，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因此，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把反孔斗争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唤起千百万农民，拿起刀枪奔赴战场。气势磅礴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势如破竹的进军途中，不仅摧毁地主阶级政权，而且对孔孟之道发动了猛烈的冲击。太平军所到之处，南自湖南，北到山东，沿途烧孔庙、拆宗祠，把被历代反动统治者奉为圣经的《四书》、《五经》一概斥为“妖书”、“邪说”。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以后，在洪秀全的领导和主持下，成立了“删书衙”，对《四书》、《五经》进行删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尽净。”太平天国明令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能买卖也，否则问罪也。”清政府史书中也曾记载：“凡一切妖书文物，一概毁化，读者斩，收者斩，卖者也斩。”洪秀全自己带头不读经书，并且不准他儿子读经。

历代权势者们尊孔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修建孔庙、学宫和学庙，作为儒学教官的衙署。这些庙堂和学宫，历来是地主、官僚、儒生们出入的地方，劳动人民根本不能进入这个“圣地”。可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拆毁了孔庙，把孔丘的牌位劈碎，扔进粪堆。并把江宁“学宫”改为“宰夫衙”，在孔孟的“圣殿”里杀牛屠狗，用狗血浇在孔孟塑像的头上，表现了革命农民对孔丘这个反动阶级的“圣人”的极端仇恨和蔑视。太平军在自己势力所到之处，横扫孔孟之道，荡涤污泥浊水，其势如疾风骤雨，使社会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鼓舞和推动了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从十九世纪五十一——六十年代，革命烽火燃遍全国。在上海、福建有小刀会起义；在广东、江西有天地会起义；在广西有“昇平天国”农民革命；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有捻军起义；在贵州、云南有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各地人民在起义过程中，也掀起了声势颇大的反孔斗争。

在淮北的捻军起义，后来北上进入山东境内，继续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反清斗争，同在南方的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遥相呼应。捻军不仅打击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且直捣孔孟老巢——曲阜的孔庙和邹县的孟府，打碎偶像，砸烂祭器，焚毁庙堂，使地方官吏和孔孟后裔威风扫地，狼狈不堪。

1856年，云南哀牢山彝族人民在雇农李文学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军提出了“铲除满清赃官，杀尽汉家庄主”的口号。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他们把帅府、督府附近的田地收归军耕，或交还原来的土地所有者，实行免租废赋、荒年不纳等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这支起义队伍也象太平军一样，在所到之处横引孔乱之道。他们进驻孔庙，捣毁神器祭物。1860年，起义军攻占危雄城，纪律严明，不入民房，驻扎在孔庙，把《四书》、《五经》和“征租册”、“功德簿”等全部焚毁，把战马关在大成殿里、用孔丘牌位给伤员做马蹬。奏凯归山时，起义军把孔庙的学署、明伦堂、孝义祠、节孝祠等全部捣毁，孔庙只剩下殿架大门。事后，反动官吏召集一批儒生，在断垣残壁的孔庙里“哭灵”，咒骂起义军“不仁”，“冒渎圣贤”。此外，李文学起义军又大破“男尊女卑”的纲常名教，倡导妇女解放，规定凡18—40岁者，不分男女都得练习战阵，“战时则集之，不战则耕”；又规定，凡男女双方有不情愿者可以退婚，重娶改嫁。由于起义军进行了反封建和反孔的斗争，所以男女老幼都能为革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使起义坚持了二十多年。

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一向是权势者们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越是在封建统治风雨飘摇的时候，他们越要祭起孔丘的亡灵，装腔作势，自欺欺人。就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朝咸丰皇帝特地去曲阜“朝圣”，还亲自到封建王朝的大学里讲学。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击中了封建统治的要害，使得大官僚、大地主曾国藩之流如同祖坟被挖，捶胸顿足，破口大骂。他拚命标榜程朱理学，咒骂太平天国反孔使得“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曾国藩这个大儒，对太平天国革命怀着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1853年，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协助湖南巡抚督办团练，他顾不上在家守丧之“礼”，破门而出，先后招募了一万七千多人，组成反动地主武装——流军，它和后来李鸿章组织的淮军，都是清王朝用来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的反革命武装力量。

曾国藩这个口颂孔孟，高唱“仁”“恕”的伪君子，完全是一个手执屠刀、杀人如麻的大刽子手，外号“曾剃头”。1864年湘军攻入天京后，在城内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曾国藩在给清廷奏书中自供：“毙贼十余万人，秦淮长

河，尸首如麻。”又据曾的幕僚赵烈文供认：“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天京浩劫，又一次暴露了儒家所谓“仁义道德”的血淋淋的本质。

第二节 向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宗法思想挑战

1853年冬，太平天国在天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以土地制度为核心，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

十九世纪以来，在日益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地主豪绅勾结贪官污吏，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劳动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太平军《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文告指出，在清王朝统治下的社会，“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贪官污吏，布满天下……剥民脂膏”，是一个“饿莩(音瞞，指饿死的人)流离，暴露如莽”的凄惨世界。

针对这种情况，太平天国首先把矛头指向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耕地按农户人口平均分配。“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使“天下丰荒相通”，达到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境界。

在当时战争环境下，《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在太平军控制的地区里，官僚、地主纷纷逃亡，寺庙被毁，留下的土地就自然归农民耕种；在一些地方，农民只向革命政权纳赋，不再向地主交租；不少地方强迫地主减低租额，勒令地主交出粮食或一些浮财。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破坏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再一次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太平天国主张平分土地，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这当然只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是一种革命的、进步的主张。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平分土地是农民的革命愿望的表现。”太平天国发展了历代农民起义“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赋”的口号，反映了千百年来世代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其

意义是重大的。在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孔丘抛出“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目的是要恢复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到了封建社会，孔学和儒家思想转而为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服务；太平天国否定这种土地制度，就是对封建经济基础及其精神支柱的一个严重的打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太平天国在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又勇敢地对整个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提出了挑战，大破四权，大反孔孟之道。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信天，不信天命，否定“君权神授”。洪秀全指出：“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又说：“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力主破除迷信，指出菩萨是木石、泥塑、纸画的偶像和“死妖”，切不可信、切不可拜。太平天国主张人人平等，反对孔丘和儒家那一套封建名教和等级制度。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太平天国狠反“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在我国历史上实行了较彻底的解放妇女的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妇”，使妇女首先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男子的依附，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在政治上又规定了妇女参与国家政治、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政策。因此，太平天国有女将军，女状元等等。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是英勇善战的女将军，傅善祥是有名的女状元。在战争年代，出现了一个“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壮丽局面。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又规定“凡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成商品的封建买卖婚姻制度，禁止缠足、娼妓、蓄婢等恶俗。这些解放妇女的政策和措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创举，激发了广大劳动妇女的革命积极性，她们踊跃参加革命，英勇杀敌，或者积极从事生产劳动，为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妇女精神面貌完全改观。一个外国人在天京游历后曾这样写道：“在街上行走时，所见到妇女在路上者之众多，确是一种新现象。她们衣服装饰大都甚好，其外观十分可敬。许多骑马往来驰骋于路上，其他则徒步而行，大多数是大脚的。”妇女们“举止端庄，其礼法仪注，完全合度。比较旧制度、旧礼教，这是新的现象”。

太平天国提出的平等思想，深切地击中了封建制度及其卫道士的要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千百年来的精神枷锁，

一概被革命的洪流冲垮了。特别是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主张和实践，把孔丘“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反动说教批驳得痛快淋漓。封建统治者为此痛心疾首。曾国藩气急败坏，疯狂嚎叫：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曾国藩之流站在反动立场上，才真正是头朝下，脚朝天，倒看事物。太平天国把被歪曲、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这是农民革命所建立的一个奇勋。

总起来看，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同清王朝、曾国藩一伙之间的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反复礼与复礼、推翻封建统治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严重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日益腐朽没落。曾国藩之流从挽救这个王朝出发，又打出了“克己复礼”这面破旗。他把封建社会的“礼”看成是支配万事万物的根本信条，叫嚣只有抓住这个“礼”，才能“弭乱世于未形”也就是防止人民造反。他声嘶力竭，妄图苟延清王朝之残喘，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他在组织湘军时炮制的臭名昭彰的《讨粤匪檄》就是他的反革命自供状和挽救清王朝统治的宣言书。

太平天国反孔也就是反“克己复礼”。针对孔孟“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说教，洪秀全指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这几句话充分表达了农民群众要求变革的思想。后来，洪仁玕又进一步提出了“革故鼎新”的口号。所谓“革故”，就是要革清王朝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命；所谓“鼎新”，就是要实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正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由衰败走向灭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三节 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发扬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肩负着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双重任务，既要抗击清政府的围剿，又面临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以及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所以，这一场革命，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路线对清王朝卖国主义路线的斗争。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孔孟之道，荡涤污泥浊水；外国侵略者赖以统治中国的支柱——清政权受到沉重打击，摇摇欲坠。因此，

英、法、俄、美等国大为震惊。它们力图绞杀中国革命，并且通过这一罪恶行动，把清政府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一方面，它们看准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穷于应付革命。1857年底，英法联军首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俄、美四国通过战争和其它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更多的特权和赔款。另一方面，英、法、俄、美等外国侵略者，十分仇视太平天国革命，千方百计加以诬蔑和破坏，直到赤裸裸地进行武装干涉。

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恶毒咒骂太平军为“一群土匪”，“绝大多数追随者来自中国危险的阶级”。太平天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孔斗争，外国侵略者却把自己打扮成为中国文化的保护人，胡说太平天国反孔是“摧残信仰”，“破坏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结构”。他们所说的“信仰”、“数千年文化传统”，就是指孔教和儒家思想。后来，外国侵略者还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一艘军舰命名为“孔夫子号”。历史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强盗为了侵略中国，惯用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依靠炮舰，另一手就是乞灵于孔孟之道。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成企图干预。1853年初，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北华捷报》周刊这样写道：“起义运动的最后成功，将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敌对行动的信号。”这既是侵略者惶恐不安的自供，也是在为发动武装干涉煽风点火。但是，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胜利进军，使外国侵略者感到不知所措。他们暂时改变了手法，伪装中立，借以窥测方向，伺机而动。1860年，太平军革命势力席卷江南，计划攻打上海，这时外国侵略者就再也按捺不住，撕下“中立”的伪装，积极策划进行武装干涉。这一年6月，美国流氓恶棍华尔勾结清朝反动官僚买办，首先拼凑了一支镇压太平天国的“洋枪队”。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结束，英、法侵略者也急忙调兵遣将，在上海等地组织武装干涉的联军。这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从中国割去大片土地、攫取许多特权的沙皇俄国，更是特别卖力，它送给清政府一万支枪，五十门大炮，并且表示愿意派兵帮助它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阴谋进一步掠夺中国。

在绞杀中国革命这件事情上，外国侵略者从卖国求存的清政府那里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清统治集团中的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奉行了一条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奴颜婢膝，同侵略者狼狈为奸的卖国主义路线。

1861年初，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派恭亲王奕近(音亦辛)等人主持。奕訢把外国侵略只看成是“肢体之患”，而把太平天国当作“心腹之害”，竭力向洋主子献媚讨好。大刽子手曾国藩，这时已出任两江总督，并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他大肆宣扬卖国哲学，鼓吹对外国侵略者应当按孔丘的“忠信笃敬”四个字办事。这就是说，外国侵略者镇压中国人，中国人也要对他们“相敬相让”。当清政府军队和湘军、淮军被太平军打得晕头转向向时，曾国藩一面哀叹“大局”“万难支持”，一面叫嚣“舍借助洋兵，实别无良策”。卖国贼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英国人在《北华捷报》周刊上说：“清廷的瓦解，对我们只有坏处而無好处。”曾国藩也公然宣称：“洋人与我同其利害”。他还厚颜无耻地叫嚷：“洋人助我攻剿发匪”、“有德于我”。老沙皇表示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一拍即合，胡说帝俄同中国“素无嫌怨”，急忙奏请清廷同沙俄约定时日，共同出兵。中外反动派开始勾结，他们举起屠刀，要对革命群众实行血腥镇压。

历史证明，对中国的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大军阀来说，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界线。他们是一群民族败类。尊孔必然卖国，卖国需要尊孔，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基础和政治路线。从清王朝统治集团、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从蒋介石、汪精卫直到林彪，都莫不如此！

在太平天国这一方面，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当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处于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没有提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看不清它的实质。尽管这样，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民族的根本利益问题上，却是大义凛然，寸步不让，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了一条维护民族尊严、保卫革命政权的爱国主义路线。

在太平天国革命势力迅猛发展，清政府节节败阵的时候，狡猾的外国侵略者，曾向太平天国试探，以平分中国土地为条件，帮助太平军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革命政权严厉拒绝了侵略者的诱骗，戳穿了敌人的花招，指出他们是“伪装友好，暗助清妖，派兵驻守清妖阵地，钳制我军行动。”洪秀全说得好，决不能“引鬼入邦”，使“天下失笑”！这对引狼入室，开门揖盗的曾国藩之流，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军事上，太平军在抗击清军的同时，用迎头痛击来回答外国侵略者。他们发扬了三元里人民英勇杀敌的爱国主义精神，从1860——1862年，先后在进攻上海和上海地区、浙江沿海的战斗中，多次打败外国侵略者。号称“常胜军”的“洋枪队”，由中法反动派混合组成的“常捷军”，都一败涂地，损兵

折将，法国海军提督丧命，美国水师提督被打伤，“洋枪队”副统领被活捉，其头目华尔也在一次战役中毙命。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西方强盗闻风丧胆，清朝官员惊慌失措。曾国藩的左右手、浙江巡抚左宗棠供认：“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华尔毙命后提任“常胜军”头目的美国人戈登，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战斗得非常英勇”。在英勇的太平军面前，清朝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一概成了纸老虎。

在外交政策方面，太平天国反对屈膝投降，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太平天国拒不承认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拒不承认侵略者在“租界”享有特权；并且严正声明，租界区属于天朝，象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天国管辖。太平天国主张在平等基础上通商往来，外国通商者要遵守天朝法令，不得擅入内地，严禁贩卖鸦片的害人贸易。

清朝政府尊孔卖国，太平天国反孔爱国，两条路线，截然相反，何其鲜明！

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太平天国内部也有反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多数领导人，代表了反孔爱国这一条路线。叛徒李秀成尊孔惧洋媚外，是另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革命政权坚持反孔，李秀成却违反纪律，私读“妖书”，在住宅里挂满了孔孟的“格言”（林彪与他何其相似）。他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大行中庸之道，胡说清朝统治是“天命而来”，清政府对人民“其情本重”。在他管辖的地区内，重新塑制了孔丘的偶像，建起了孔庙，尊孔复古势力又在抬头。与此同时，叛徒李秀成还在政治上执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路线，给太平天回！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李秀成担负东征军事重责，但是，1860年太平军打下苏州，正在准备进攻上海时，他还写信给英国驻华公使，请后者和其他国家公使去苏州“会商”，以“结今日之新盟”。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相勾结，力图阻挠。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他又写信给英、法、美三国公使，呼吁侵略者“推诚相与”，幻想他们自动撤军。从这些尊孔惧洋媚外的言行来看，李秀成后来堕落成为叛徒，决不是偶然的。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战争。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拿起武器，英勇地向封建主义宣战。革命势力遍及十八个省，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对清王朝进行了十四年的斗争，其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深，都超过了封建社会中的历次农民战争。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提出了鲜明的反封建的斗争纲领，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把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历代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在这一方面更是望尘莫及。洪秀全第一个砸烂孔“圣人”牌位，太平军怒斥孔孟经典为妖书邪说，又次雄辩地证明，劳动人民一向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他们是批孔的主力军，历史的创造者。

太平天国英雄们，继承了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他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的战士，不愧为真正的民族英雄！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真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太平天国所造就的历史功绩，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史册上闪耀着战斗的光辉。

第十二章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封建 顽固势力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封建统治者继续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又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贪婪残暴，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如此内外交逼的结果，使得农民起义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官僚仍旧死守祖宗成法，闭眼不看世界，他们在清政府中具有传统影响，形成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极端顽固派。另一部分官僚在鸦片战争后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成了外国侵略者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帮凶，这就是所谓的“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巩固封建统治，在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洋务派在“自强新政”的口号下，举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因此，他们是一个封建性买办性很强的政治集团，在清政府的中央和地方政权中都握有实权。他们垄断新式企业，限制民族资本的发展，主持卖国外交，镇压人民革命，同样反对任何变革，也是站在历史潮流对立面的反动派。除顽固派和洋务派外，在统治阶级中还有一些较开明者，鸦片战争后，他们痛感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衰微，因此要求革新，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借以拯救清王朝的统治，这是统治阶级中开眼看世界的一派人物。

第一节 改良主义思潮的产生和改良主义运动的 兴起

在开眼看世界的一派人物中，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吏，他们对封建制度持批判态度，要求刷新内政，抵御外侮，并开始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这些人是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其早期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浙江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他自己也是一个不得志的官僚。鸦片战争前夕，他支持林则徐禁烟的正义斗争。在林则徐奉旨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时，他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估计

到林则徐此去广州，有可能发生战争，因此建议林则徐：“……此行宜以重兵自随。”可见他是主张抗战的。在一定程度上，龚自珍看到了封建社会已处于奄奄一息的没落境地，因而深有感触，在1839年写了这样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意思是希望以风雷般的威力来改变当时封建社会那种乌烟瘴气、死气沉沉的局面。这种思想，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那些旧学者的因循守旧比较起来，是倾向于进步的。龚自珍是当时具有维新思想的一个代表。这一派人在学术活动中比较能够接近社会实际，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一些矛盾和弊病，有纠正时弊的抱负，他们自己叫做“经世匡时”。龚自珍认为，社会上各种弊病之源在于“贫富不均”，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平均土地”。他希望在“不讳私”(就是承认私有制)的前提下，改变一下地主阶级内部对土地的占有情况，借此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为对付当时社会的危机寻找一条出路。龚自珍这种变法要求和改革主张，同他哲学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是分不开的。他提倡“非命”，以此来对抗程朱理学。他揭露理学之所以提倡“天命”，是为了维护君权，愚弄人民，使之安于受压迫剥削的地位。他还反对把所谓“圣人之学”当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并且断言：“一祖之法无不敝”，就是说，死守祖宗成法是行不通的，必须不断改革。

魏源(公元1794——1856年)，湖南人，他深受林则徐的影响，并支持林则徐的禁烟主张与措施。魏源主张向西方学习，其目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借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这与洋务派为镇压人民革命而举办的“新政”是大不相同的。在抵御外患的同时，他还主张改革国内弊政。他的变革主张，也源于思想上的辩证因素和唯物主义倾向，建立在一个“变”字上面。他以为，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拿税法来说就是在不断地变化，“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他的结论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认识论方面，他强调“行”——即实践的重要性，反对儒家“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知识。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这说明，在魏源的思想中，包含了一定的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因素。

林则徐(公元1785——1851年)，福建人。他对英国侵略者在我国贩卖鸦片深恶痛绝，是当时清政府中主张严禁鸦片的主要代表，又是战争爆发后力主抗战的地方大吏。在鸦片流毒全国造成极为恶劣后果的时候，林则徐多次上书道光皇帝，要求严禁鸦片。1838年，道光指派他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他到广州后，一反过去清朝官吏盲目虚骄的恶习，专门组织人“刺探

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即买外国人办的报纸)。”林则徐在严禁鸦片的同时，仍然允许合法贸易，一面又认真准备对付英国将要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林则徐相信“民心可用，民力可恃。”这说明他对人民力量是有所认识的。在禁烟斗争中，他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人民的力量。战争爆发后，他组织军队和民间武装，狠狠打击侵略者，使得英国侵略军不得不暂时避开广东，北上进犯江浙，直抵白河口，威胁清政府。

鸦片战争前后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想，是在封建统治危机加深，外国资本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下产生的。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都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外要求抵抗侵略，对内要求革除弊政。在那“万马齐喑”的封建社会里，这种维新思想还是难能可贵的，是进步的。他们要求学习西方，改变现状的进步思想，成了以后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但是，他们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他们要求维新的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当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斗争高涨时，他们就惊恐万分，很自然地 and 顽固派站在一起，主张镇压。魏源曾办团练攻打太平军；林则徐虽然抱病在家，仍奉“圣旨”前去广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结果病死途中。他们主张并参与镇压农民革命这一事实，说明他们无法摆脱地主阶级本能对他们的决定作用。因此，他们的进步思想也不能不受到阶级的局限。

1856年，英法联合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虽然广大的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奋起抵抗，但是，清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路线又一次招致了战争的失败。1858、1860年，清政府分别与各侵略国家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随后，中外反动派又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从此，外国侵略者便利用它们攫取到的各种特权，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从世界范围来说，是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它的最高阶段——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强盗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对那些尚未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边疆和邻邦相继被侵吞，到1885年，终于爆发了法国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结果仍如以往，中国方面失败了，民族危机又加深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刺激，由于封建时代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在发展起来。从19世纪七

十年代起，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设厂，举办新式企业。到19世纪末，这种新式企业一共有七十个左右，据估计资金总数约有八百多万元。随着这些新式企业的创办，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早已产生，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充任了改良主义运动和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从中国当时这样一个社会条件出发，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要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还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参与政权的机会。中法战争后，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提出要向西洋学习，准许民间集资兴办作业，讲究技艺，建造铁路，重视农业，保护商务，还要求建立议院，成立商会等等。这一情况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已开始意识到，要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必须改变束缚这种生产力的旧的生产关系。这些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和要求，为以后的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爆发。在这次战争中，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路线，同清政府统治集团执行的卖国主义路线也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战争开始后，以那拉氏(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首的一伙卖国贼，一直不愿认真抗战，随时都在准备出卖民族利益，向侵略者妥协投降，结果导致了军事上的一再失败，最后由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是一个空前严重的卖国条约，它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民族资本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随之扩大。这时，民族资产阶级中较有力量的是刚从富商、官僚、地主转化而来的那个部分，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较多联系。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代表这部分人的利益。

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它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对着当时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严重的民族危机，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提出了变法维新的要求。这就使以前在先进知识

分子中传播的改良主义思想，发展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政治改良运动。他们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

在不根本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使资产阶级有参与政权的机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

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全国人民受到很大震动，要求拒和再战的呼声响遍全国，救亡图存已成为全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资产阶级利用这一形势，树起变法维新的旗帜，奔走呼号，宣传他们的改良主义主张，掀起一个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一运动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

第二节 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要求变革，必然导致在思想领域内向维护旧的封建势力的儒家思想开火。近代封建统治者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的衣钵，把儒家思想接了过来，利用儒家思想倒退、保守等特点，作为麻痹人民和反对变革的精神手段。后来，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中学”就是孔孟之道，“三纲五常”，这个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是不能变更的，所以要以“中学为体”。在不危及封建统治这一根本前提下，还要模仿西方搞一些军事工业及其它工业来为镇压人民、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这就叫做“西学为用”。这些儒家思想的卫道士，对于任何一点政治改良要求都不能容忍，他们死守着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教条，把入门的思想牢牢地禁锢起来，敢有言变者，无不被视为洪水猛兽，动辄被斥为“无父无君”、“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乱党”，扬言要对改良派处以“极刑”。他们反对任何变革，更反对改良主义运动。

毛主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以康有为，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继承了法家要求变革的传统，针对顽固势力害怕变革的反动心理，在“变”字上大作文章。于是，变与不变成了两派争论的核心问题。

当时，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主张的孔孟之道不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说教，紧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顽固派说：“法制未可轻变”，“凡子孙欲

革先人之法，其祸乱必尤甚于未革之世”。因此，“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行。”洋务派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还是要以儒学作为根本。

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不同的看法，为他们变法维新制造舆论。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写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一书，曾经引导人们去怀疑那些从来没有人敢去怀疑的儒家经典。后来他在自己的其它著作或奏章中，还不断阐发这种变的思想。他说：“变者，天道也”；任何事物“无一不变，无刻不变。”又说：“失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因此，康有为提出：“守旧不可，必当变法”，“能变则全；不变则亡。”他的学生梁启超，也大肆鼓吹“变”是不可抗拒的：“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一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康有为认为：“……由酋长而渐至君主，由君主而渐至君主立宪，由立宪而渐至共和”，都是在变化之中。这和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观点是显然对立的。康有为还在他的另一著作《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利用儒家公羊三世之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来附会孔丘所说的小康、大同之世。他认为，据乱世之后，进到升平世（“小康”）再而达到太平世（“大同”），这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但是，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是一种庸俗进化观点，只要渐变，改良，反对革命的飞跃，这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只要求君主立宪，而反对任何革命的举动。

谭嗣同（公元1865——1898年）在《仁学》（1896年）书中，更是大声疾呼要冲决纲常名教的罗网。他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的罪恶及其对人们的残害，触及了封建统治的理论根基——孔孟之道。他尤其反对君主专制。他说，在原始时代，本无君主：因为大家都要从事生产劳动，没有时间顾及公众的事情，于是推举一人为君主，所以是先有人民后有君主。“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这种“君末民本”的看法，是对儒家“君权神授”的传统思想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统治人们思想的“三纲五常”的猛烈冲击。

严复（公元1853——1921年）是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新学”的人，他猛烈地抨击中国的封建学术思想，是当时尊法反儒的突出代表。他在《辟韩》一文中，大胆驳斥了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韩愈，着重批判了韩愈的“尊君”思想。严复痛斥历代君主都是“窃国大盗”，认为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他认为，那些宣扬和发挥儒家思想的汉学，宋学和词章之学都应“且束高阁”。他肯定了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的功绩，指出：“秦之销兵焚书”

是出于“大一统”的需要。他在肯定法家商鞅、荀子时，提出了“因时变化，与时俱新”的主张，突出一个“变”字。严复大力提倡西学，认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强调要向西方学习。他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著作，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进化观点介绍到中国来。他翻译的《天演论》(英国人赫胥黎著)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天演论》一开始就介绍了世界是怎么发展演变到今天这样的，书中用天文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大量丰富资料，说明了世界发展变化的过程，证明“天”是变化着的。这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有力批判。严复大胆肯定法家荀子“人定胜天”之说，否定了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思想。在民族危亡之际，这种强调人的作用的思想，起了激励人们破除天命，救亡图存的进步作用。从严复的著作来看，他在尊法反儒方面迈出了较大的一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力宣传变法思想，封建顽固势力则力图阻挡这一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继续以祖宗成法不可轻变的反动教条来束缚人们的思想。面对改良派变法救亡的口号，他们穷凶极恶的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宁赠友邦、勿予家奴”，这就是他们宁肯卖国当奴才，也不准变法维新。义和团运动以后，他们更进一步投靠侵略者，无耻地向他们的洋主子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些孔丘的徒子徒孙们，原来都是一伙大卖国贼。他们宁可把祖国权益拱手奉送给侵略者，而对人民革命力量和进步思想则分毫不让。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那拉氏等是如此，以后的袁世凯、蒋介石，直至林彪也无不继承儒家传统，复辟倒退，卖国求荣。

在与顽固势力的争论中，资产阶级改良派传播了民主主义启蒙思想，面对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他们以“变法救亡”相号召，要求刷新政治，这在当时都是进步的。而且，由于他们要求革新，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力量，所以当时他们在哲学思想上也大体上是唯物主义的，也还敢于对唯心主义理学持批判态度。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宣扬进化观点的同时，又抬出孔丘来“托古改制”，这表现了他们极大的局限性。康有为硬把孔丘打扮成改良主义者，以此论证他的“布衣改制”是合乎“圣人之道”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活现出一副跪着“造反”的可怜相。其实，这种托古改制的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并不鲜见。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

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康有为也是要借用孔丘的名字和语言来使他的变法主张有所依据，并以此去团结那些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来赞助维新变法运动。这种情况也说明了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的长期束缚下，这些改良派的知识分子刚刚接触“西学”，他们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了解还很肤浅。手边又没有自己的象样一点的思想武器，于是，他们只好又回到孔丘那里寻找根据去了。康有为等人反儒不反孔，就反不到要害上，就不能使人们从根本上去怀疑儒家思想，并从儒家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第三节 变法维新运动的迅速失败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运动，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诏，宣布变法起，到9月21日就失败了。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变法维新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变法开始后，在一百零三天当中，新法上谕下达了一百一十多起，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但是，新法遭到顽固派从上到下的抵制、根本无法推行下去。清政府中以那拉氏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对变法维新极端仇视，不断地从各方面破坏运动，直至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害谭嗣同等六个维新人士。事变发生后，康有为等逃亡国外，变法运动最后失败。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害怕亡国，主张变法维新，错以对抗外国侵略，并求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运动。但是，改良派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害怕群众，害怕革命，他们也跟封建统治者一样，诬蔑人民群众为“乱民”，担心“金田之乱，将复起矣”，“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由此可见，他们主张变法，还有缓和阶级矛盾，强化封建统治机器，抵制人民革命的反动意图。他们依靠的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希望他从上到下地发一纸命令，一点一滴地实行变法，丝毫不想触动封建统治的根本，并且力避流血斗争。对于帝国主义，改良派也抱有幻想。这样的变法运动，其失败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以不流血的斗争推行新法，结果是以流血的斗争而告结束。

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打击下迅速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此后，除康、梁等少数人外，许多原来的改良主义者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变法失败以后，由于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侵略我国，也由于清政府更加腐朽，完全投靠了帝国主义，唯洋主子之命是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呈现出方兴未艾，日益高涨的形势。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康有为等改良派的头面人物，还死抱住光绪皇帝不放，仍然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当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革命派提出要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政治主张时，康有为等则倒退一大步，原来他们自己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这时也自认为是过分了。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逃到日本，当时孙中山也正在日本积极从事革命准备工作。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曾经想把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引导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但是，康有为顽固地拒绝了孙中山关于合作的建议，一再声称他受清帝恩惠深重，不能忘记，今后还要起兵勤王。进而组织保皇会，同革命派相对抗，终于堕落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反革命派。他们在日本、南洋等地的华侨中，宣扬“保皇”的主张，分化瓦解革命力量，使孙中山在海外经过长期奔波、辛勤工作后建立起来的革命队伍，遭到了保皇派的严重破坏。他们在政治路线上堕落成为保皇派以后，思想上就拚命维护儒家旧传统，曾经是“先进的中国人”的康有为、严复等又堕入了尊孔的泥坑，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改良派走向反动，成了革命的凶恶敌人，激发了更多的人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革命派迅速壮大，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形成。

第十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此后，帝国主义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义和团的农民英雄，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奋臂挥戈，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买办阶级崇洋卖国，尊击反法的反动路线，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更多的人走上用暴力革命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的道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斗争。其基本特点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斗争。斗争的实质就是革命还是保皇这样两条政治和思想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革命派高举尊法反儒的旗帜，同封建买办势力及保皇派的尊儒反法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搏斗。通过这场斗争，聚集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宣传了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兴起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于革命人民所做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的，更剧烈的革命。”威震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千千万万义和团的英雄战士，手拿原始武器，高喊着：“还我河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的战斗口号，男女老少齐上阵，浴血奋战。从山东到京津，短短几个月，反帝怒火燃遍了祖国山河。往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侵略者，在义和团的英雄面前，威风扫地，露出了纸老虎的原形。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清政府统治者吓慌了手脚。以那拉氏为头子的反动集团，大耍假宣战、真投降的两面派手法，在侵略者面前，为换取一

个傀儡皇帝的招牌，不惜出卖民族权益。最后，公开投降侵略者，实现了中外反动派公开勾结、绞杀义和团的罪恶勾当。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清楚地显示出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广大人民群众爱国主义路线和清政府封建统治者的卖国主义路线对比何等鲜明，斗争何等激烈。

义和团运动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它使帝国主义侵略者瓜分中国的幻想成为泡影，迫使那些曾狂妄吹嘘只要有一万名现代化装备的侵略军，就能横行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哀叹：“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之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义和团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激励着更多的人继续战斗。1900年，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的卖身契——《辛丑条约》签订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全国各地反帝、反封建斗争更是风起云涌。1901—1902年，北方义和团余众举起“扫清灭洋”的旗帜继续战斗。1903年，广西农民发动起义，坚持斗争达三年之久。1904年，河南开封，江苏泰州、广西梧州、江西乐平等地都相继爆发大规模抗捐抗税斗争，形成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抵制了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从此后，中国人民坚持的反帝爱国路线与清政府死守的投降卖国路线斗争就更加尖锐，旗帜也更加鲜明。这一斗争，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中国社会各种阶级力量的变化和政治态度。

义和团运动的被镇压，标志着单纯农民战争的结束。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正如列宁指出的，这是“亚洲觉醒”的时代，“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义和团英勇的斗争精神鼓舞下，进一步清除了改良派的影响，走向革命。他们高度评价义和团的历史功勋。1901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开智录》上，就登载了一篇文章，赞颂义和团“为中国民气之代表”，使“国民精神从此振刷”。

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一伙，却恶毒咒骂义和团是“匪”，“虽具人形，其实绝不知为人之理”，无耻地叫嚷要“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即企图借助帝国主义的势力，使光绪重新上台，“帝党复用，新政再行”。可见这时的改良派，已经完全滑到反动派一边去了。

为了和改良派划清界线，资产阶级民主派出版了一批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批判改良主义的报纸如《国民报》、《苏报》、《警钟日报》等，还印发了一些如《革命军》、《猛回头》等影响很大的革命书籍。。

《革命军》是青年革命者邹容所著。邹容(1885—1905年)，四川巴县人。他从小就“薄尧舜、非周礼”，反对封建礼教。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积极参加了留学生中的爱国革命活动。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他用通俗的文字，炽热的感情，写成了两万多字的小册子——《革命军》。书中愤怒地抨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热情奔放地歌颂革命是“至高无极、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革命能够“去腐败而存良善”，“除奴隶而为主人”。1903年5月，《革命军》由章太炎作序并在全中国发行后，犹如“雷霆之声”，震撼社会，一扫改良主义思潮的阴霾，激励着更多的人走上革命道路。

《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公元1875—1905年），湖南新化人。甲午战后，留学日本。他痛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政府的卖国求荣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决心投身革命。他用民间鼓词话本的形式、押韵的语言，写了不少通俗读物，形象地揭露清政府不过是“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卖国，他在书中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拒洋人，讲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此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

当时，《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这几本小册子影响极广，到处流传，引起了清政府极大的惊恐。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了“苏报案”。反动派借口《苏报》登载了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封闭报馆，监禁邹容、章太炎等革命者。邹容在狱中忧愤成疾而死，年仅二十一岁。他虽然被害，但革命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浙江有个农民曹阿狗。很有造反精神，有人送他一本《猛回头》，他熟读以后，在农村、城镇演说，宣传革命主张。清政府逮捕并杀害了他，并且出告示，把《猛回头》定为“逆书”，若有人再看，“杀无赦”。

但是，反动派的屠刀阻挡不了革命的潮流。压迫愈深，反抗越烈。清政府的高压政策，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对它的仇恨。《革命军》一书连续翻印二十多次，销售上百万册，在城市和乡村，不少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千方百计争相传看这些革命书籍，很多人“三读而不厌”。在改良主义思潮还

有一定市场时，这些革命书籍的出版和广泛流传，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扩大了民主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揭穿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嘴脸和改良主义的反动性，为紧接而来的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作了思想准备，在使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推动下，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孙中山，顺应日愈高涨的革命潮流，“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中国的改良主义作了尖锐的斗争。”

孙中山(公元 1866——1925 年)名文，字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出身农民家庭。孙中山童年时，常听村里老一辈人讲述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他对洪秀全十分钦佩，称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这样的革命者。十三岁时，孙中山到美国檀香山投靠其兄生活，在那里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这一期间，他亲眼目睹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掠夺华工等暴行和殖民地人民反抗压迫的英勇斗争，下定决心要“恢复中华”，致力于寻找挽救民族危亡，改革社会的途径。

孙中山也受过改良主义的影响。1894 年，他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政治。上书失败，后他来到北京。甲午战争前后，他看到清政府的反动腐朽，决心进行武装革命。并在 1895 年组织了广州起义。此后，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人士遭受屠杀，义和团运动被镇压，这一连串血的教训，使他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他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化，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他曾经指出：“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前夕，只要有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他看到全国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对清政府的打击越来越沉重。认为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可以比做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灭亡”。因此，他满怀信心地预见到：“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

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一些革命志士，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宣言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并且指出：今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敢有为石敬瑁、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同盟会的这个纲领，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思想。这种旧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它带有显著的资产阶级软弱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

彻底性和明确的工农政策，但是，“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

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反封建斗争不断高涨，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同盟会的纲领，矛头直指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直指那些奴颜媚骨的卖国贼、大地主和买办阶级，这样就集中反映了当时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这场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表现极为活跃，成了领导阶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正是这样，他们的活动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因而是革命的，进步的。

第二节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和力量也不断扩大，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面临这一场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政治斗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虽因戊戌变法失败逃到海外，却仍然死死抱住光绪皇帝不放，他们到处建立“保皇会”，竭力鼓吹“君主立宪”，破坏正在形成起来的革命力量，大肆叫嚣君主立宪是“防杜革命之第一要著”。这时的改良派，已经丧失了维新变法时那一点进步性，完全投靠了清政府，堕落成为地地道道的保皇派。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坚持着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立场，毫不动摇。两派“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不可调和。这样，一场在思想战线上彻底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大造革命舆论的论战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革命派方面，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他们把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作为阵地，发表了不少具有战斗性的文章；保皇派则以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为喉舌，鼓吹君主立宪谬论，两派旗帜截然相反。论战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来进行的。

关于政治路线方面：

第一，关于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使用革命暴力的问题。康、梁一伙鼓吹“保皇即革命”，幻想“今上(指光绪皇帝)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念念不忘光绪的恩情。他们为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政策大唱赞歌，早在1902年，康有为在《辨革命书》一文中，就喋喋不休地对“圣朝”“仁政”大肆吹捧。梁启超甚至歇斯底里地狂叫：“虽以匕首捶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他们视革命为洪水猛兽，百般咒骂革命，说什么如要革命，就将陷入一场“杀人流血之惨”的灾祸中。

针对保皇派的反动论调，革命派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清政府的反动政策，指出它并无丝毫改变，对“保皇即革命”的荒谬论调产加驳斥。1904年，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又指出：“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号召人们和保皇派划清界限，不要上当受骗。保皇派胡说什么革命将造成“杀人流血之惨”，革命派则大声疾呼，一定要以革命暴力来实现这场政治变革，认为只有通过流血的革命才能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才能进行建设。他们指出，要革命，就要把现存的“陋俗弊政”全部“掀翻而摧拉之。”章太炎热情地歌颂革命，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为补泻兼备之良药矣。”这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处于上升时期，为了夺取政权，他们倡导革命，歌颂革命的暴力。他们和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李斯，秦始皇一样，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来促成社会的变革。他们义正词严，把保皇派驳得体无完肤，连《新民丛报》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立宪主张，已经被广大群众视为“秽恶之名句”了。

第二，关于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

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两派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保皇派站在封建大地主立场上，认为地主占有土地有利于社会“勤勉殖富”，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权利，甚至主张“非惟本属私有者，不宜收归国有；即本属国有者亦当渐散而归诸私有。”他们恶毒攻击同盟会“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是对“下流者”的一种“煽动”，土地国有政策是“亡国政策”。并且还威胁革命派，说什么如果坚持改革土地制度，就是“中国的罪人”，就要“四万万人共诛之”。

革命派明确地指出，地主占有土地，徒手坐食，不能为社会生利反而分利，不利于社会生产。他们认为：“欲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则不外土地国有，使其不得于少数人之手”。由于“地权不平”才造成了“人权不平”。革命派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土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要进行革命，就必须改变富豪霸占土地的情况；他们坚持“平均地权”的口号，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同时也击中了封建制度的要害，对广大人民投入革命起了动员作用。它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保皇派一心要保存封建制度，就必然要维护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他们在上地问题上暴跳如雷，叫嚷“寸毫”不让，充分暴露了他们复辟、倒退的反动面目，同封建顽固派已经没有丝毫差别了。

第三，关于革命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问题。

保皇派在宣扬君主立宪的同时，还胡说“革命足以招瓜分”，叫嚷爱国就不应该革命，公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张目，妄图吓倒革命派。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足以制止瓜分”。他们用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的事例，说明在义和团兴起之前，“瓜分之说颇为嚣张”；而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的“民气”使帝国主义“不敢动瓜分之念”。他们理直气壮地指出：“革命党因惧瓜分而起革命，非革命以智瓜分！”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革命派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因而能够正确地指出，正因为有清政府这样一个一贯投降、媚外的奴才政府，帝国主义才敢于瓜分中国；只有推翻这个反动政府，才能够避免瓜分之祸。

这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由于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对帝国主义还存在着幻想，认为先生不会侵略学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爱国就应革命”的正确主张，与保皇派对立，这无疑是进步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是近代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斗争的一个高潮。

改良派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反儒不反孔，不敢碰儒家的祖师爷孔丘。康有为一直把孔丘奉为“救世主”。变法失败，改良派在政治上堕落成为保皇派以后，他们更是把原来那点反儒精神也抛弃无遗了。他们和一切反动派一样，

祭起了尊儒反法的破旗，抬出了孔丘这具僵尸，给他穿上一套时髦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新装，招摇撞骗，借以对抗革命潮流。这说明，康、梁一伙在历史上虽然曾经有过进步的主张，但是，当他们更复古、倒退，走向自己的反面时，总是拾起崇儒，尊孔这个“法宝”，借以吓唬群众，保护他们自己的。

早在1902年创办《国学报》时，梁启超就扯起了尊孔读经的破旗，大肆宣扬什么“保国粹为主义”(他们所谓“国粹”就是孔孟之道)，要“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妄图用孔孟之道和儒家传统来抗拒日愈深入人心的革命民主思想。

反动的清政府也被革命形势吓慌了手脚，再向孔丘求救。清政府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定为教育宗旨，把反革命祖师爷孔老二奉为“万世师表，”孔丘再次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亦步亦趋，在湖北成立“存古学堂”，大肆宣扬“保存国粹”，不读《四书》、《五经》就是“自忘其祖”，“自贱其宗”；“三纲五常”是“相传数千年不可变革的‘圣教’”。因此，“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等之说不可行也。”从张之洞的反动言论可以看出，当时民主思想的传播，对孔孟之道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

在反动派尊孔的大合唱中，康有为惟恐落后，自称发现孔教是“文明美备，万法精深，”甚至狂叫要人们大呼“孔子万岁”。梁启超叫嚷“大哉孔子！”说孔教是“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其它一些改良派人物，也趁机刮起一股“尊孔教为国教”，定孔子为国魂”的妖风。他们集会、出书，颂古非今，达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还对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进行恶毒的攻击。这些反动家伙自己成天过着奢侈腐朽的寄生生活，却大骂商鞅是“专恃功利主义，而偏缺道德教育”，“徒知治标而不治本。”他们对清王朝实行文字狱和用理学禁锢人们思想的现实全然不顾，反而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使中国人“思想一室”等等。总之，保皇派死死抱住孔丘“克己复礼”的衣钵，竭力要把历史车轮拖向后转，变成一伙地地道道的“复辟狂”

同保皇派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还保持着一个新兴阶级的革命锐气，他们要求实现政治上的变革，在从西方资产阶级寻找武器的同时，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尊法反儒思想，针对清王朝的反动宣传和保皇派的复古倒退活动，展开了斗争。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章太炎，是这场斗争中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1902年，章太炎写了《订孔》一文。针对当时梁启超“保存国粹”的反动观点，章太炎指出，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罪责就在孔丘身上，

孔丘是一切灾祸的根源。在这篇文章中，他揭露了孔老二“哗众取宠”，“覆帮乱家”、“汗邪诈伪”的政治骗子和阴谋家的嘴脸，剥掉了这个“万世师表”的画皮。1906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章太炎又进一步提出“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他号召人们不要“尊信孔教”，“不必读孔老二的书，”也不要学程、朱、陆、王的哲学。章太炎的这些反孔言论，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树起了一面打倒孔学的大旗。革命派继承着历代法家代表人物的传统，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把矛头直指儒家祖师爷孔丘，比封建社会末期那些主张革新的思想家又前进了一步。他们猛烈抨击儒术，指出儒家的经典都是杀人的“快刀利剑”；中国之所以落后，受列强的欺侮，“沉沦于苦海”，都是儒学的罪过，必须首先批判儒学，才能革命到底。他们说“宋儒尊三纲，定名分”，完全是为了“束缚臣民之思想，使臣民柔顺屈从”，以“有利于专制”，“在如今看来，孔子也是很坏的”同时，他们又继承了方设法家变法前道的思想，反对修古，不法圣人，并且提出了“时势变则理法从之变”的历史观，认为“今胜于古，”人人都可以做“圣贤”，那种认为“圣贤”是“万古之师”的说法，完全是“放屁的话”。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抨击儒家祖师爷孔丘的同时，又对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荀子、韩非、秦始皇等重新作了评价。章太炎认为，法家并不是象历代反动派所攻击的那样，只注重刑律；商鞅变法是“行法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他对法家商鞅虽有过誉之处，但他主要是针对历代儒家对商鞅的诽谤而发。章太炎对荀子、韩非、戴震等法家人物和进步思想家也加以肯定，认为荀子和韩非的学说都是正确的。他还引用戴震“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则不可救”的话，来揭露宋明理学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资产阶级革命派称颂法家，是为自己的革命要求寻找依据，从中吸取进步力量。他们能够对法家作出一些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是由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的。民主革命的逐步深入，推动了批孔斗争，批孔和尊法反儒，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反映。

革命派与保皇派这场大论战的实质，是坚持革命，结束漫长、腐朽的封建统治，把中国社会推向前进；还是坚持复辟、倒退，死抱住一个傀儡皇帝，让日薄西山的封建制度、清朝反动统治继续下去的问题。二者的斗争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是历史上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在这场大辩论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了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全国人民要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正确路线。列宁指出：“当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化了，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而在亚洲，却还相能够代表真正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还能够举起尊法反儒的旗帜，向孔孟之道开火，对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给予适当肯定，继承了法家要求进步，要求革新的传统；他们在向封建主义作斗争时是“生气勃勃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保皇派的反动嘴脸大暴露，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改良主义影响，参加到同盟会中来。改良派在当时“气为所慑，口为所箝”。《新民丛报》也不得不停刊。梁启超哀叹：“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堡垒亦禁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口谈革命”。保皇派败下阵来，日益堕落，最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通过这场大辩论，民主思想的传播更加扩大和深入，这就为辛亥革命大造了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节 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胜利

1905年——1907年大论战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与此同时，很多革命党人和同盟会会员，积极投入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他们自己组织或联络会党，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从1906年起，在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先后爆发了十多次较大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遭到清政府的镇压，但是革命影响却扩大了，群众也得到了锻炼。

1910年前后，国内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各地人民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此伏彼起，全国都“乱”起来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这一年中所发生的各种群众反抗斗争就达二百九十多次，比上一年增加一倍多，国内外反动派如坐针毡，他们惊呼：“民心思乱”，“危疑不可终日。”事实也表明，大革命已是一触即发之势，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911年(辛亥年)，因为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在川汉粤爆发了保路运动。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为了镇压四川人民如火如荼的

保路斗争，清政府把湖北新军调到四川去，新军西调，使湖北兵力空虚，造成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大好时机。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经过长期的准备，在10月10日打响了第一枪。酝酿已久的大革命，有如山洪爆发，在全国迅速展开。各省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纷纷独立，宣布成立“军政府”。云南也于当年10月30日在昆明举义，成立了“军政府”。12月，各起义省的代表在南京集会，29日投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组成了南京临时政府，宣告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终结。从此，民主共和代替了封建专制，中华民国代替了中华帝国，两千多年来，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被赶跑了，这的确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交相压迫下，资产阶级把刚刚夺得的政权拱手交给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2月12日，清帝退位。13日，孙中山提出辞职。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夺，革命的大好形势也就此断送了。

辛亥革命的流产说明，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这种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中，就已经暴露出来，在反驳保皇派的谬论时，有些地方就显得无力。例如：在对革命是否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上，革命派总是幼稚地认为，中国革命要推翻君主制，走欧洲各国共和制的道路，将会得到列强的赞助，只要“有秩序”地进行革命，就不会引起列强的干涉。他们不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又如在土地问题上，由于资产阶级当中许多人与封建土地制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不可能把“平均地权”自始至终地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也不可能去彻底地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上，他们也十分害怕革命人民起来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鲁迅在《阿Q正传》中说到当时的革命党不准人民革命，“阿Q忿忿地想：‘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个事实。毛主席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一系列的致命弱点，源发于资产阶级看不见群众的力量和害怕群众运动的阶级本质，因此，就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以上弱点，充分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十四章 辛亥革命后反尊孔反复辟反卖国的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功绩。但是，大军阀、大野心家、大卖国贼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篡夺了政权，绞杀了革命，建立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政。军阀独裁统治代替了民主共和；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和政治上的帝制复辟一脉相连；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这样，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的矛盾，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都更加激化起来，为这些矛盾所规定的斗争，由随之复杂交错。非常尖锐。

概括说来，在思想领域中，尊孔复古和反尊孔复古、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思想的斗争；在政治战线上，复辟和反复辟，媚洋卖国和反帝爱国的斗争，就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和反映。

第一节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派尊孔复辟媚洋卖国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大军阀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生长在一个反动透顶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和叔父，都是太平天国时期镇压捻军起义的刽子手，父亲也是反动地主武装的头目。袁世凯深受家庭的反革命教养，为人阴险奸诈，善于迎合钻营，因此得到卖国贼李鸿章的赏识。甲午中日战争后，袁世凯被派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从此他就抓住这支有几千人马的军队，靠它起家，大干反革命政治勾当。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加速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一批维新派人士遭到监禁和杀害，袁世凯却从此获得清政府中

以那拉氏为头子的顽固派的信任、提拔。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袁世凯又伙同帝国主义国家，大肆屠杀义和团。在爬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高位后，他又镇压了 1905 年爆发的反对美帝虐待旅美华工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且把铁路权益拱手让给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可见，这个以反革命起家的袁世凯，很早就是一个血腥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怂恿和支持下，清政府把袁世凯找出来“收拾残局”，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以后，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以武力镇压革命军，一面用“和谈”、“拥护共和”的伪装骗得了南方革命派的信任。1912 年 3 月，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从此，他肆无忌惮，接连演出了一幕幕尊孔卖国复辟的丑剧。达到了近代历史上倒退复辟的顶峰。

对袁世凯来说，尊孔卖国复辟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尊孔卖国是为了复辟，要复辟必然尊孔卖国。袁世凯一上台，就把孔丘奉为“万世之师表”，宣称要以儒教传统作为“立国之本”，并在全国广设“孔教会”，亲自发布《祭圣告令》，狂叫“惟此孔子之道，亘(音梗)占常新，与天无极”；竭力鼓吹“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可久稽，人民不可无主”等君权神授和君主专制谬论。1914 年，他率领百官，穿上古怪服装，搞了一次“尊孔祀圣”的“盛典”。第二年，又明令各学校都要“尊孔”、“尚孟”、“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中小学应把读经作为必修课；还规定去曲阜“朝圣”火车票可以减半价，借此收买孔孟信徒。

与此同时，保皇派头子康有为，也密锣紧鼓，直接和袁世凯的尊孔复古活动相配合。他鼓吹“以礼为治，以道为国”，电请军阀政府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入宪法”，并通令“全国祀孔仍行跪拜”。康有为叫嚷：“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乎？”真是奴才相十足，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推行了一条投靠帝国主义、卖国求荣的反动路线。他上台后不久，就保证要承担清政府所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借此博取帝国主义者们的欢心。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摧塌后，帝国主义者也要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他们看中了袁世凯这一条忠实走狗。袁世凯组阁后，英国政府在给它的驻华公使的电报中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德皇威廉二世接见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时表示，袁世凯完全可以“挟大总统之威权，一变中华民国为帝国皇帝”。英国驻华公使多次向袁世凯保证，将以全力赞助他恢复帝制。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之际，

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扩张，势力很大，袁世凯就一心要把日本作为自己的靠山；而日本帝国主义也深知袁世凯急欲称帝，大可利用，于是在1915年初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日本驻华公使在递交“二十一条件”时，露骨地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这就是说，只要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件”，日本就支持他高升到皇帝的宝座。袁世凯利令智昏，除表示个别条款“容日后协商”外，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借以换取日本的支持。可见，凡是要搞复辟倒退的反动派，对外无不投降卖国。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他们早已撤去了民族的界线，根本不存在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袁世凯、蒋介石、林彪都是这样的民族败类。

早在1914年5月，即承认卖国的“二十一条件”之前，袁世凯就以武力胁迫国会推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又下令解散国会，废除辛亥革命时制定的、采用西方民主政体的《临时约法》，另行公布了《新约法》，肆意扩大总统权力，延长总统任期，为称帝复辟铺平道路。在接受“二十一条件”后，袁世凯及其党徒，更加紧进行复辟帝制的卑鄙活动，牛鬼蛇神，社会渣滓纷纷出笼，同声“恭戴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除了鼓吹“君宪救国”的“筹安会”，通电“劝进”的“各界联合会”等御用组织外，还拼凑出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靖愿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袁世凯的美籍顾问古德诺，也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胡说中国人民知识太浅，不习惯于共和制，只适合于君主制等等。就在这乌烟瘴气的一片喧嚣声中，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宣布恢复帝制，粉墨登场，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是，袁世凯这个祸国殃民的大军阀大卖国贼，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被迫下台。“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

袁世凯政权覆灭以后，在段祺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策划下，经过日本牵线，大军阀、封建余孽张勋又演了一出尊孔复辟的朝胆。辛亥革命后，张勋和他的部下，仍旧蓄发留辫，表示史于清王朝。号称“武圣”的张勋和“文圣”康有为，一唱一和。张勋吹捧孔教“如日月经天”，“为人生日用之必需”，并加紧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复辟作准备；康有为则伙同清朝遗老、封建余孽利用“孔教会”展开活动，狂喊：“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并出版《不忍》杂志，为复辟制造舆论。1917年6月，张勋率领“辫子军”由安徽北上，康有为则带着早就写好的伪诏书，从上海去北京、一起演出了拥戴清帝溥仪复位的闹剧。但是，这一次复辟垮得更快，仅仅十二天，便烟消

云散。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伙狼狽溜出北京。溥仪只好再次宣布退价。

右派政变，决不可能长治久安，没有一个不短命。袁世凯和张勋的迅速垮台，就是明证。历史是决不会按反动派的意图倒退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从袁世凯到林彪，都逃不脱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袁世凯、张勋的尊孔复辟，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帝国主义者对外侵略时，一向是屠刀和“圣经”交替并用，非常注意精神文化侵略的。在侵略中国时，他们在“圣经”之外加上了孔孟之道这块敲门砖。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泛滥成灾；帝国主义侵略者，也披上了儒教和孔学的外衣。事情正如列宁在1913年就指出的那样，当时“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实行联盟的”。

袁世凯阴谋复辟时，日本反动学者有贺长雄就为他出谋献策：“将孔教作为伦理教育之基础”，并“特别优遇”孔丘后裔。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约翰斯顿、李佳白等人、吹捧孔丘是“中国独一无二之圣人”，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叫嚷只有“保存国粹”，把孔教“明定为国教”，才能“维系”中国和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这些洋儒们还把侵略说成友谊，标榜他们尊孔是由于“深爱中国之人”。可是，揭开侵略者的“慈爱”面纱一看，原来他们是不满意“中国爱国少年，热心革命”，抛弃了“国粹”，“脱离了孔教范围”。这就不打自招地道破了他们妄图以尊孔来阻挡中国革命潮流和便利自己继续侵略中国的罪恶目的。

沙皇俄国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充当了鼓吹尊孔复古的急先锋。清朝末年，以沙俄驻华公使库罗斯托维支为首的一伙反动分子，同清政府紧密配合，发表各种尊孔著作，大量刊印尊孔书籍，吹捧孔丘是“伟大的道德家”、“积极的思想家”。辛亥革命第二年，沙俄反动分子盖沙令窜到中国，同中国封建复辟势力相呼应，把孔丘的“礼”吹捧为“孔教之花”，胡说孔教是中国“国家新命之所托”，统治者只有依靠“孔夫子的权威”，才能达到他们所预期的一切改革”。沙俄侵略者如此露骨地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正是为了在中国找寻反动的社会支柱。

苏修新沙皇和老沙皇唱着同一个调子，怀着同样的目的。长期以来，苏修叛徒集团开动各种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地发表尊孔反华文章，吹捧孔教是

“中国哲学学说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儒学”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与此同时，又极力攻击秦始皇及“焚书坑儒”，诋毁法家。苏修新沙皇为了反华，就必然要鼓吹尊孔，恶毒攻击我们的批林批孔运动。勃列日涅夫一伙，把贩卖孔孟之道的林彪反党集团当作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为林彪反党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拍手叫好，妄图通过林彪这个“超级间谍”，实现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狼子野心。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击中了新沙皇的要害。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尊孔反华，正好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我们批林批孔越彻底，苏修新沙皇的日子就越不好过。

第二节 全国规模的反尊孔反复辟反卖国的斗争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辛亥革命时期，民主共和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尊孔卖国复辟的丑行，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和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一些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些发展。工人阶级人数增到二百万左右，工人运动高涨，罢工次数逐年增加。日益壮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军阀卖国和反复辟的政治斗争。1915年为反对“二十一条”而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1916年为反对法帝国主义企图在天津扩大租界的斗争，就是这一时期两次规模巨大，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

农民群众也积极参加了反袁斗争。1912——1914年间，白朗起义军在河南发难，转战陕、甘、鄂、皖等省，曾给军阀统治以有力的打击，人们称这支起义军为“公民讨贼军”。1913——1914年，内蒙古一些地区，曾经爆发规模颇大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起义，起义军消灭了袁军一个骑兵旅。学生和不少城市工商业者，也投入了反帝爱国、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行列。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全国人民反袁反复辟反卖国斗争的推动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仍然为挽救革命、维护共和，反对复辟倒退，坚持革新进步作了一定的努力，大造了革命的声势，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军阀的统治。

1916年12月25日，正当袁世凯爬上皇帝宝座、得意忘形之时，云南省首先宣布独立，掀起了讨伐袁世凯、维护共和制的“护国运动”。曾任云南新军协统的蔡锷，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等

人在昆明发动起义，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任都督。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来，蔡锷等人在云南首倡护国讨袁，并组成护国军，由蔡锷率领第一军入川。广大人民痛恨帝制，积极支援护国运动。入川护国军在同北洋军阀曹錕的“征滇”军作战时，打了好几次胜仗，云南的护国运动，得到不少省份的响应，在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斗争中贡献了一分力量。

袁世凯覆灭，张勋复辟破产后，北方军阀政府仍然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7年8月，孙中山毅然举起护法旗帜，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成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这时，孙中山虽然已经改变了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态度，对它不再抱有幻想，但是又把希望寄托于南方军阀如唐继尧、陈炯明等人身上，一心想依靠他们的武力来进行护法运动。但是，这些军阀表面上支持护法，实际上是要利用护法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和巩固自己的地盘。他们排斥孙中山的领导，大搞分裂活动，并通过护法政府与北方军阀妥协议和，以便保存实力，割据一方。这些投机分子，从内部破坏了护法运动。同时，这个运动除了以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口号外，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归于失败。经过这次挫折，孙中山也从中获得了一些经验教训，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要同军阀合作等于与虎谋皮。这些教训对于他后来的转变与进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斗争中，章太炎逐步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1913年秋，他从日本回到北京，只身“临总统府之门，大诤（音哆）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被袁世凯软禁起来。在这期间，章太炎陆续写了《驳建立孔教议》等一系列文章，向复辟势力开火；反击康有为攻击秦始皇和法家的谬论，《秦政记》和《秦献记》，就是其中的两篇。章太炎认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矛头直指孔孟一贯鼓吹的“法先王”；又指出，秦亡“非法之罪”，大胆地为秦始皇申辩。这两篇文章，以尊法反儒的鲜明观点和大量的史实，有力地驳斥了尊儒反法，复古倒退的邪说，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创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法家的进步作用，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革命舆论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

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吴虞等人，也对孔学和封建礼教进行过批判。吴虞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封建专制政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它流毒天下，为害之烈好比洪水猛兽。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儒家思想的本质，揭露了它的反动作用。

但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一个在政治上很软弱的阶级，这个弱点决定了它在反孔斗争中的不彻底性。当革命处于高潮时，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敢于反孔，尊法反儒，宣传新文化。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下，一遇挫折，他们就溃不成军，败下阵来。例如，一度以介绍西方新学、反对君主专制出名的严复，后来成了恢复帝制的吹鼓手；曾经勇敢地向孔教宣战的章太炎，到晚年也打起了尊孔读经的破旗，“正告国人”“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正如鲁迅所说，章太炎“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助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在五四运动时期还继续写过一些反孔文章的吴虞，后来也象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收起旗帜，悄然引退。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对孔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

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思想领域中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五四”以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开始传到中国来，对尊孔复古思潮和封建礼教都是重要的冲击和批判。

1915年，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一个“新文化运动”就开展起来了。它的口号是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反对迷信，提倡科学，以及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

当时，陈独秀这个混入党内的最早的尊孔派，以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和李大钊等人一起在《新青年》中担任编辑工作。陈独秀写过一些介绍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尊孔崇儒的文章，因此，在当时有点名气。但是，随着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出卖和背叛，陈独秀逐步沦为一个尊孔小丑。在被开除出党后，他抛出《孔子与中国》等黑文，鼓吹要对孔丘“重新评定价值”，赞赏孔丘建立了“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并说什么“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事实证明，陈独秀在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孔孟之道就是他的思想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大钊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他主张“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圈。”1916—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尊孔，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他说，孔丘不过是“数千年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圣人之虚声，劫持吾人之思想自由者，吾人当知其祸，视以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

社会在变化发展，伦理道德观念也会随之改变；为了改变不合时宜的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也在所不惜。这些看法，对当时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确是一个有力的反击。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以前，曾经卷入过反孔斗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知识分子，“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在新旧激烈斗争的转折关头，正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不管风吹浪打，砥柱中流，继续高举反对尊孔复古的大旗，毫不动摇地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1918年5月，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这篇小说是“五四”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它把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礼教的统治宣判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小说借狂人之口，对封建旧礼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彻底的揭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被尊孔派吹得天花乱坠的封建“仁义道德”，原来就是“吃人”哲学！在小说中，鲁迅不仅无情地揭露了摆人肉筵席的黑暗现象，而且指出：“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这就启示读者，要把斗争目标指向大摆人肉筵席的社会制度。鲁迅这样大声疾呼：“扫除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

“五四”前夕，鲁迅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小说《孔乙己》、《药》和杂文《我之节烈观》。这些文章象一把把匕首，深切击中了封建文化思想的要害。

正是勇于反潮流和大无畏的革命批判精神，使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五四运动直到三十年代中期，鲁迅以更加朝气蓬勃的姿态，向着中外反动势力冲锋陷阵，写下了许多至今仍然闪烁着战斗光辉的作品，系统地更加有力地批判了孔学和尊儒反法的思潮。

“五四”以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仍然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知识分子，又只限于几个大城市，除了“民主和科学”这个口号外，也没有同当时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把矛头指向了代表封建主义文化的孔学，唤起了人们的民主主义思想觉悟，因而起到了启蒙和宣传动员作用，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准备了条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前，马列主义就已开始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宣传它的伟大意义；并且认为中国 and 全世界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预见到“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8年出版的新刊物《每周评论》上，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也开始部分地译载出来了。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和马列主义开始传播的过程中，尊孔复古、顽固守旧势力也力图固守阵地，进行反扑。马列主义是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一切反动势力也都懂得这一点。面对在中国出现的新生事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只有对孔丘亡灵再三顶礼膜拜，妄图以孔孟之道来抵制新文化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传播。这种情况，正是“五四”前后反孔与尊孔斗争的一个特点。

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文化买办、反动政客胡适，就是孔学和儒教的一个忠实卫道士。1917年，他的《中国哲学史纲》一书出笼。孔丘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看家狗，被他捧成“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孔丘为复辟奴隶制而奔走呼号，在他看来就是要把“无道变成有道”；秦始皇“焚书坑儒”、防止奴隶主复辟，在他笔下成了一个“大劫”。也正是在“五四”前夕，胡适的祖师爷、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反动哲学家杜威来到中国“讲学”，恶毒污蔑马列主义，咒骂十月革命，狂热鼓吹“新旧文化汇合”，也就是要中国的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结成反动同盟，抵制革命思想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传播。到了“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就表演得更加猖狂露骨。他拚命诅咒“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叫嚷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充当了用复古主义和洋奴哲学来反对马列主义传播、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急先锋。

但是，反动势力决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猛烈冲击着一切旧文化和旧思想；不管胡适之流怎样逞狂挣扎，封建复古主义的节节败阵，都是注定无疑的了。

第四节 近代尊孔与反尊孔斗争的历史经验

尊孔和反尊孔的斗争，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和文化革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八十年来的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向我们揭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在某些方面具有近代史特征的历史经验。

(1)凡尊孔必守旧、必反动、必复古、必倒退，必搞复辟；到了近代，又必然和投靠帝国主义、媚洋卖国相结合。这是尊孔派的一条规律。地主阶级顽固派、洋务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是这样，袁世凯也是这样。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派，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大儒，他同样是按着上述规律走上反革命道路的。标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宣扬孔孟之道，尊儒反法，把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林彪效法孔丘“克己复礼”，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去，在国内建立封建法西斯的林家王朝，在国外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当上一个儿皇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比前一时期复杂得多。研究这一时期尊孔与反尊孔斗争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更好地挖掘它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2)害怕和敌视新生事物，千方百计地要扼杀新生事物，也是尊孔派的一条规律。他们要守旧、复古、倒退，就必然要打击新生事物。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反动势力的孔丘，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看不惯一切新生事物，拚命维护奴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企图阻挡封建制度的产生和社会的前进。两千年来，儒家和一切反动阶级、反动文化的代表人物，在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上都和孔丘一脉相承。在近代史上，清政府统治集团、地主阶级顽固派，拒绝任何一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革新和改良，生方设法扼杀了戊戌变法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原先也接受过一点新生事物，因而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强，但是，当民主革命这个新生事物出现时，他们就害怕、敌视，拚命保皇，反对革命。马列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传到中国，更是引起了一切反动派的仇视和反对。

大叛徒林彪，承袭了历史上一切反动派的故伎，一贯害怕和敌视新生事物。远的如土地革命时期，他对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这新生事物表示怀疑、悲观，实质上是妄图瓦解红军斗志，取消革命。近的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恶毒诬蔑干部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政策，妄图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想要阻拦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正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挖出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

级司令部，宣告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林彪一伙妄图抗拒新生事物，结果是被社会主义的巨轮碾得粉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3)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非常软弱的；它的思想文化比它的政治上的东西更落后，因而它在思想政治战线上表现得更加无力。这既是阶级本质所决定，也是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所决定的。近代革命与反革命、反孔与尊孔斗争的历史，再一次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它在文化革命中表现了更大的动摇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它“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历史证明，即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也不可能担负起彻底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历史使命。

(4)“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都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是批孔的主力军。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反孔斗争，不仅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而且说明了，社会越往前发展，劳动人民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也越加深刻。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还可能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去彻底批判孔孟的反动思想。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肩上。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批判和战胜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一场“打倒孔家店”的新战斗，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五四运动的最前列，代表着运动的正确方向和路线。从那时起，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对孔家店和尊孔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且一直把这种批判看作是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毛主席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作为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

反孔斗争，也揭开了新的一页，不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各个时代。